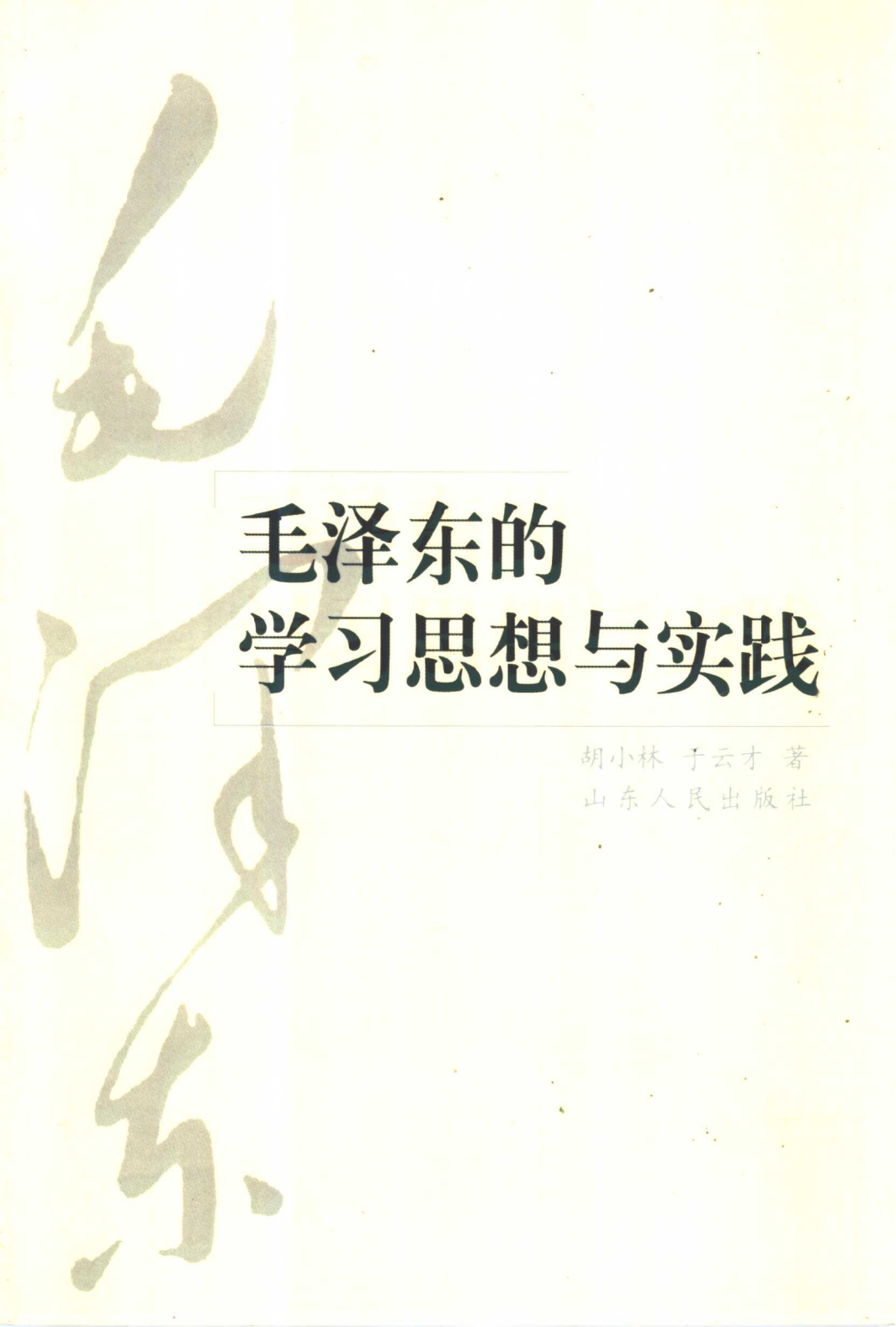




毛泽东的 学习思想与实践

胡小林 于云才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胡小林 于云才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学习思想与实践 / 胡小林等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8
ISBN 7-209-03293-2

I. 毛... II. 胡... III. 毛泽东(1893~1976)—学习方法—研究 IV. A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3876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4.5 印张 2 插页 370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定价: 28.00 元

才不胜今人，
不足以为才；
学不胜古人，
不足以为学。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的其他
领袖人物，每一个人都可
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
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
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

——史沫特莱

目 录

自序	胡小林[1]
----------	----------

第一章 毛泽东的学习生活与著述	[14]
-----------------	------

- 一 “红日”出韶山/14
 - (一) 韶峰看“日出”/15
 - (二) 人生驿站/18
 - (三) 英萌蒙馆/20
- 二 钟灵毓秀/22
 - (一) 故园蒙圣/23
 - (二) 东山情钟康梁/29
 - (三) 峥嵘岁月/34
- 三 毛泽东的著述及学习思想/47
 - (一) 毛泽东的著述/47
 - (二) 《实践论》与《矛盾论》的由来及其他/49
 - (三)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理论体系/53

第二章 学习的本质与特征	[58]
--------------	------

- 一 学习的本质/58
 - (一) “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59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二)“先行后知,知难行易”/62

(三)“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65

二 学习的特征/68

(一)“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69

(二)“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73

(三)“闭门求学,其学无用……”/76

第三章 学习的功能与作用

[79]

一 学习的功能/80

(一)“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80

(二)“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86

(三)“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90

二 学习的作用/94

(一)“我们的教育方针……”/95

(二)“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101

(三)“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104

第四章 学习主体的自我认识、修养与锻炼

[108]

一 学习主体自我认识/108

(一)“重现在有两要义……”/109

(二)“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112

(三)“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116

二 学习主体自我修养/120

(一)“即使世界止(只)有我一人,……”/120

(二)“不为浮誉所惑……”/123

(三)“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128

三 学习主体自我锻炼/132

(一)“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132

(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134

(三)“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139

第五章 学习目标设定

[144]

一 志者,宇宙之真理/145

(一)“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145

(二)“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148

(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149

二 实现自我/152

(一)“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152

(二)“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欺”/154

(三)“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58

第六章 知识与知识分子

[162]

一 什么是知识/162

(一)“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163

(二)“其知也,亦系经验而知之”/164

(三)“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166

二 什么是知识分子/171

(一)“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71

(二)“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174

(三)“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178

三 知识结构/183

- (一)“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184
- (二)“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188
- (三)“只有科学是真学问……”/192

第七章 学习的规律

[195]

一 拜人为师/196

- (一)……拜人为师,与人交谈,讨论/196
- (二)“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200
- (三)“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203

二 大同者,吾人之鹄/208

- (一)“大同者,吾人之鹄也”/209
- (二)“钢刀快不快,要试一试才晓得……”/212
- (三)“十月革命一声咆哮,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17

三 先博而后约/222

- (一)“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223
- (二)“仆读《中庸》,曰博学之……”/227
- (三)“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的发展……”/229

第八章 学习的范畴

[233]

一 主体与客体/234

- (一)“吾人种种之智识、社交,均为父母若朋友等外界势力所酿成”/234
- (二)“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238
- (三)“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241

二 理论与实践/245

- (一)“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246
- (二)“还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论和实际联系’……”/248
- (三)“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252

三 模仿与创造/256

- (一)“小孩子,……两岁学说话……”/257
- (二)“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259
- (三)“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264

第九章 治学态度

[270]

一 知识是一个科学问题/270

- (一)“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271
- (二)“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275
- (三)“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280

二 学习有两种态度/284

- (一)“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284
- (二)“学习有两种态度……”/289
- (三)“还要学会两种本领……”/293

第十章 学习的诸种运筹

[300]

一 学习的心理运筹/300

- (一)兴趣所致,读书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轻松……/301
- (二)“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305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 (三) “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310
- 二 学习的时间运筹/314
 - (一) “我会规规矩矩干活的,但我也要读书”/315
 - (二) “所谓五段课程……”/318
- 三 学习的智谋运筹/320
 - (一) “亲师而外,取友为急,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321
 - (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325
 - (三) “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328
 - (四) “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331
 - (五) “接着建立党组织”/335

第十一章 读书要讲究艺术

[339]

- 一 读书的基本方法/340
 - (一) “(我)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340
 - (二) 不动笔墨不看书/343
 - (三) 别具一格的《讲堂录》/348
- 二 各种书籍都要读/352
 - (一) 工具书与马列著作/353
 - (二) 攻读史书/356
 - (三) 读古代文学/357
 - (四) 学习自然科学与实用文化/362
- 三 读四大名著/367
 - (一) 自幼喜读、善用“三国”/367
 - (二) 读《水浒》,运用《水浒》/372

- (三) 读《西游记》,赞孙大圣/376
 - (四)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379
- 四 古为今用/385
 - (一) 批电影《武训传》与《红楼梦》研究/385
 - (二) 《不怕鬼的故事》/392
- 五 终身学习/396
 - (一) “我决心学习,至死方休”/396
 - (二)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398
 - (三) 临终索要之书——《容斋随笔》/401

第十二章 思维的艺术

[403]

- 一 要学会思维/404
 - (一) “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404
 - (二) “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406
 - (三) “一分为二”与“左、中、右”/410
- 二 思维的特征/413
 - (一) 思维的问题性/413
 - (二) 思维的概括性/415
 - (三) 思维的间接性/416
 - (四) 思维的能动性/416
 - (五) 思维的超前性/418
 - (六) 思维的逆向性/419
 - (七) 思维的借鉴性/421
 - (八) 思维的批判性/423
- 三 思维的类型/426
 - (一) 形象思维/427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二) 逻辑思维 /431

(三) 辩证思维 /435

主要参考文献和资料
跋

[441]

于云才[444]

自序

国内外,“毛泽东研究”的专家、学者成千上万;“毛泽东研究”的著述不计其数,仅我们搜集到的专著就有两千余种。这些研究成果,大体上分为三大类:一是,关于毛泽东生平、业绩的研究;二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三是,关于毛泽东生平、业绩与其思想的综合研究。所有这些研究,归结到一点上,就是毛泽东曾经取得了盖世无双的成功以及他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成功。

毛泽东为什么会取得盖世无双的成功?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又有三种观点:

——毛泽东之所以能成就一番奇勋伟业,是因为“毛泽东找到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他把欧洲‘产’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农民的翻身愿望成功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庞大思想体系,并用这种思想去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使千百万党员、数亿民众都自觉不自觉地按他的思想方法去思维,按他的生活方式去生活,甚至按他的表达方式去表达。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一个像他一样‘不但掌握世俗权力,而且还具有精神力量的领袖人物’”^①。这种观点,等于说,毛泽东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成功”;毛泽东之所以能创造伟业,是因为他“创造”了一种伟业。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从形式逻辑

^① 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语,见《毛泽东谋略》,湖南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的角度看,是一种恶性循环,是违背思维规则的,因而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也就是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并没有真正揭示出毛泽东成功的秘密,尽管他接下来又说:“毛泽东当然不是神。但是他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创造任何人间奇迹。他之所以能够走出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将中国革命一步步引向胜利,就他本人而言,还有三个不容忽视的主观因素在起作用。一是他的乐观主义……二是他的钢铁一般的意志……三是他那博大精深的谋略智慧。”^①这仅是毛泽东取得成功的一些主观因素。但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的这些“主观因素”是天生的吗?是从哪里来的……如此研究问题,岂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毛泽东之所以能成就一番奇勋伟业,正如一位世界名人说的:“教育像一艘船,领导人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生活海洋。毛泽东也毫不例外。是老师们驾驶着教育这艘航船,载着他,乘风破浪,从小小的韶山冲驶向了中国革命的大舞台。”^②这是毛泽东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吗?我们说,不是。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教育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古之学者必有师,从某种意义上说,无师自通的人是没有的。但是,教育对于人的成长、成功的作用仅仅是一种“条件”,而不是“根据”。况且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接受的又是一种旧式的教育,那种“子曰:‘学而时习之’”的教育。因此,毛泽东从来不承认“私塾”教育和“学堂”教育之船“载着他,乘风破浪,从小小的韶山冲驶向了中国革命的大舞台。”相反,他曾多次说“讨厌”那种旧式教育,也因此他曾几度退学而自修。这就是说,旧式教育对毛泽东的成长是有作用的,但其作用是极为有限的,不能估计过高;旧式教育对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后来的毛泽东的作用根本无从谈起。毛泽东走向中国革命的大

① 《毛泽东谋略》,湖南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版,第 1~2 页。

② 《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8 月版,第 6 页。

舞台,那是他远离学校,受了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影响的结果。如果把毛泽东的成功归于教育的作用,那么,在“毛泽东研究”的道路上,就自觉不自觉地滑向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泥沼,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出真正科学的结论。

——毛泽东之所以能成就一番奇勋伟业,河北省石家庄市一个20岁名字叫王小平的女孩子说:“毛泽东何以能获得如此辉煌的大成呢?他创造这个大奇迹的大奥秘是什么呢?最大奥秘就在于他获得了真正的学业大成,即获得了事业大成、人生大成所需要的高本领、高素质。再深入一步:毛泽东是怎样获得学业大成的呢?绝不仅因为他善学——他早就实现了真正的学习的革命!毛泽东大大超越了《学习的革命》一书中单一层次的变革,他实现了“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学”三大层次的大变革,从而实现了真正的学习革命,获得了学习的最大效益!可以说,毛泽东既是学业大成的光辉榜样,又是学习革命的伟大先驱。”^①这是毛泽东成就奇勋伟业的根本原因吗?应该说是。毛泽东的确“实现了真正的学习革命,获得了学习的最大效益”。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王小平只看到了毛泽东实现学习革命的一些现象,并没有看到毛泽东实现学习革命的本质,也就是说,她把毛泽东的“学习革命”归结为“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学”三大层次的变革,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像登堂入室一样,她的一只脚踏过了门槛,可另一只脚仍在门外,就停滞不前了,因此,她并没有看到“殿堂”内的核心东西。王小平只是给人一个惊喜,惊喜过后,留给人们的还是一个关于毛泽东成功的“谜”。

为什么这样说?

史沫特莱曾说:“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

^① 《本领恐慌》,海南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6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泽东……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毛泽东的这一个特征——思想理论家加革命实践家——并非简单地由“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学”来铸成的。

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中，当时“实现了‘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学’三大层次的大变革”的，不止毛泽东一人，还有陈独秀、王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

当然，陈独秀、王明在“为何学”、“学什么”问题上，最初与毛泽东并无本质差异，毛泽东还是陈独秀的“学生”哩，只是在“怎么学”上渐渐地大相径庭，这可能是后来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的根本依据吧！但仅凭此就下结论说，毛泽东“从而实现了真正的学习革命，获得了学习的最大效益！”是否有点太轻率？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在“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学”问题上，与毛泽东是很相近的，要不然为什么经过十几年的革命风雨洗礼和大浪淘沙，历史会选择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位居毛泽东左右呢？只是，与朱德相比，毛泽东更具有理论上的优势；与刘少奇、周恩来相比，毛泽东更具有胆识和魄力、更长于考虑战略和策略问题。但绝不能凭此就下结论说，毛泽东“从而实现了真正的学习革命，获得了学习的最大效益！”难道刘、周、朱没有实现真正的学习革命，没有获得学习的最大效益？这，于情，于理，似乎都说不过去。

我们这样说，无意于否定毛泽东实现了真正的学习革命，而是要更加肯定这一点。但是，无论从内容讲，还是从形式讲，毛泽东所进行并实现的真正的学习革命，并非表现在“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学”这样“三大层次的大变革”上，而是有更深的层次和更为丰富、更为科学的内涵。毛泽东进行和实现了真正的学习革命，是从改变人们关于学习的本质的传统观念入手的，回答了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在革命和社会发展中的作

用及学习的规律和范畴这样一些核心问题,从而创造性地建立起一套新颖的、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体系。因为,任何意义上的革命,不管是社会革命、文化革命,还是科学技术革命,只要是称得上革命,就要表现出同传统的(某种)制度关系实行彻底的决裂的勇气;毫不奇怪,他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这种“决裂”并不是不分良莠地全盘地否定历史,而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批判地继承传统的东西。没有这样两种“决裂”,就不能称其为革命,充其量只能称其为“改良”。毛泽东所进行的真正的学习革命,正是表现在与中国有史以来的传统的学习制度和传统的学习观念——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学习制度和传统学习观念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从而建立起一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制度和学习观念上。

首先谈学习的本质。自从孔子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命题,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学习”的涵义的认识和理解一直囿于“从阅读、听讲、研究、实践中获得知识或技能”上。特别是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所谓学习,就是“阅读、听讲、研究、实践”儒家的“四书五经”,这是千古不变的“知识”,谁敢越雷池半步,轻则冠之“离经叛道”,口诛笔伐;重则打入牢狱,株连九族。自从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事情发生了大的变化。毛泽东从自学和革命实践中感悟到:学习并非只是读书,更并非只是读典诵经。这正如他在《讲堂录》中所说的:“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踏遍青山人未老”的游学是毛泽东学习的重要途径。的确,毛泽东,一个山里长大的普通农家子弟,没喝过一滴洋墨水,何以能够一跃而成为震惊世界的伟人呢?没进过一天军校的师范生,虽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杂”书,何以能统帅三军,运筹于帷幄之内,决胜于千里之外,“横扫千军如卷席”,不仅打败力量比之强大百倍千倍的蒋介石,而且敢于跟世界上的头号帝国主义——用原子弹武装起来的美帝国主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义者较量？毛泽东曾说过，他开始不会打仗，他只当过半年兵，后在国民革命军里当过宣传部长，讲过打仗，秋收起义到了井冈山以后，开始打了一次胜仗、两次败仗。在实践斗争中逐步学会打仗，搞出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战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后来，毛泽东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系列军事理论著作。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这段话，从文字看，讲的是学习方法，而从实质看，揭示的却是学习的特征和学习的本质。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这就是说，学习不仅是一种意识活动，更重要的是一种实践活动。实践出真知。实践活动本身也包含意识活动。这说明，学习活动具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实践特征，二是意识特征。毛泽东对学习特征的揭示，从根本上否定了关于学习就是读书，读书就是学习的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学习观念，而确立了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观念。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特别强调指出：“使用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更重要”在哪里呢？更重要在“使用”，是人们在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关系中获取知识和技能。以“使用”为特征的学习，必然是以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从而充分显示人的自觉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即主体性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这就是毛泽东所揭示的学习的本质。

其次谈知识、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的作用。关于什么是知识，古今中外的传统观念一致认为：写在纸上、载于书本的东西才是知识。当然，一般来说，这种知识都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结。这是指“真知”。但是，载于书本的东西也并非都是真知，也有假知与荒诞不经的东西。这就难怪孟子所

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毛泽东认为,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反映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变化、发展的规律的“认识和经验”的理论才能称为知识。毛泽东是这样表述的:“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和。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①读书,只能获取片面的、间接的知识,实践才能获取完全的、直接的、真正的知识。

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传统观念认为: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往往以学历为资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以此来看,一个人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应称其为知识分子了?毛泽东以为很难。为什么?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的人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还不能称其为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应是一个既具有渊博的书本知识,又有丰富的实际工作和生活经验的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15~816、817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不是“纸上谈兵”的人,而是在社会实践中从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从而能够生产、创造知识产品的人。知识分子应当是在生产的、社会的、科学研究的和学习的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把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的劳动者;脱离实际斗争,好谈空洞理论、坐而论道的清谈家,不能算是完全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和主张。早在1939年12月1日,他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就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942年2月1日,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毛泽东又强调说:“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建国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说:“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他还批评了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他指出:“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

毛泽东之所以尊重知识,那是因为知识一旦与人的脑力和体力相结合,就会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产生无比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生产力要素中的最核心的部分。毛泽东之所以尊重知识分子,是因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关系到革命的成败、事业的盛衰,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发展及国家的兴亡。尊重知识

分子,就其实质来说,是崇尚科学、扫除愚昧、鞭挞落后,促进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由此可以推断:在农业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农民;在工业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是工人;而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为科学技术是由知识分子发明和创造的,所以知识分子则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仅如此,知识分子还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精神生产力的代表者。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其客观规律,毛泽东的学习活动也有其规律。由于毛泽东不断地学习并能巧妙地驾驭辩证法的规律,因此,他也能够深刻地认识、掌握和运用学习规律于学习实践活动的一切领域。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就说过:“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清醒地认识到:要成为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既要虚心好学,独立思考,又要好问,拜人为师,与人交谈、讨论。毛泽东的老师,不只是学校里的老师,而是泛指社会上的一切人,只要他请教过的人,不管是干部、农民、秀才,还是狱吏、商人、钱粮师爷,都是他的“可敬爱的先生”。他说:“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毛泽东认为:以社会为学校,拜人民群众为师,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开创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新局面,就是在中国社会这个大学校里学会的。这就是毛泽东学习的师承规律。如果毛泽东不按师承规律学习,那就不称其为毛泽东,他可能是陈独秀、王明、博古或者张国焘。从某种意义上说,学习的师承规律成就了毛泽东。除此之外,毛泽东的学习活动还遵循了学习的意向规律和学习的认知规律,在这里就不必一一叙说了。不过,需要指出的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是,学习的“师承规律”、“意向规律”和“认知规律”是有区别的。师承规律是学习的主客体、主客观对立统一的规律,而意向规律、认知规律则是学习主体自身的理想与现实、认识与实践对立统一的规律。它们在学习主体身上密切联系在一起,共同左右人的学习活动。只要违背了其中的一条学习规律,就等于违背了所有的学习规律。学习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只能发现它、运用它,而绝不能嬉戏它、违背它。谁若违背学习规律,就必然受到规律的严厉惩罚,并且一定要付出某种代价。

关于学习的范畴。研究学习的范畴的开山之作,是刘典平与于云才合著的《学习学》。学习范畴是区别学习活动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学习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或者说,学习范畴是学习规律的具体化。纵观毛泽东一生的学习活动,可以看到有三对学习范畴须臾不离其身。这就是“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模仿与创造”。从幼年起,毛泽东就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学习的主体;进入青年时期,毛泽东就是一个非常自觉的、自为的、自由的学习主体。其主要表征有三点:一、他从来不做书本的奴隶;二、他的学习从不受人左右、被人牵着鼻子走,其中包括他的所有业师;三、外部世界的一切都是与他对立统一的学习客体,其中包括他的敌人,如蒋介石等。毛泽东是“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大发明家。这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无须多说。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理论”是属于意识范畴,是主观的东西,而实践属于物质范畴,是客观的东西,两者均不会轻易地相结合,而必须有一个中介或中间环节。这个“中介”,不是随意取之的事物,而必须是意识主体兼实践主体的主体思想,即自觉性、自主性、能动性与创造性。学习主体——毛泽东的主体性来自于学习实践,又回到学习实践之中去。这样,理论与实践才能真正地结合起来。惟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使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知识才有力量,知识分子才能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代表者。毛泽东

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还是一位语言大师、演说大师、大诗人、大书法家。他不仅在中国是一位空前的了不起的伟人,而且也是赫赫有名的世界伟人。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在其所著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列榜》中,将毛泽东排在第20位,竟排在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之前,并且,“大大超前于拿破仑、亚历山大大帝”,足见其影响已超越国界,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这都是因为毛泽东善于学习,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在模仿中创造的缘故。创造、创造、再创造,是毛泽东最具价值的个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善于模仿是毛泽东学会学习的直接原因,从两岁开始,他就到其舅父的蒙馆里旁听、模仿他人识字、诵经……而善于创造,又是毛泽东善于学习的最终硕果。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来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成功,那么,我们不是陷入客观唯心主义的泥潭,就是滑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深渊,结果,都不会得出科学的、正确的结论。

有史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学习思想与实践,经过梳理可以构成一部体系完备、内容丰富、具有科学学科形态的“学习学”。这本《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也可以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学习学》,完全是以毛泽东的学习思想及实践活动中的生动、有趣的故事、实例构架起来的。融思想性、理论性、知识性、可读性和可操作性于一体,是这本书最基本的、也是最显著的特征。它不仅适合于青少年阅读,而且适合各种年龄、各种职业、各种阶层的人们阅读。将此书奉献于社会、奉献于读者,是笔者最大的心愿,同时也是对毛泽东最好的怀念。

本《序》开头说过,在国内外,毛泽东研究的专家、学者成千上万,毛泽东研究的著述不计其数,虽有不少人已研究或正在研究毛泽东的学习生活,如:已正式出版的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求学的故事》等,但至今尚未听说和发现有谁在研究毛泽东的学习思想和实践。因此,将毛泽东的学习思想和实践作为特殊的“学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学习”研究的惟一对象,在国内还是空白。我缘何要研究并撰写《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呢?我本不是“毛泽东研究”的专家、学者,但我是一个高校的教授兼学校管理者,20多年的教学与管理经验使我深深体会到:进入信息时代的我国高校的教师和管理者,只沉迷于研究教学和教育是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的,是满足不了社会发展需求的。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无处不在研究学习问题,无处不在创建学习型单位、城市、乡村,而从事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却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漠然处之,那不是耻笑于天下人吗?本来,教与学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自古就有教学相长之说,一个学校怎么可只研究教而不研究学呢?当然,研究学习者,自古有之,并不乏其著述,但这些著述多囿于学习目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及读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鲜有人把人类的学习活动领域作为某种科学研究的惟一对象,从而创造出一部“学习学”来。前面说过,刘典平、于云才两位先生已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这是值得称赞的。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春色满园。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开垦这块富饶而美丽的处女地,使其到处鲜花怒放,春意盎然。于云才是青岛大学(退休)的副教授,在他的启迪和鞭策下,我注意搜集这方面的研究资料,进而又做选题、着手进行研究,方写出了这部拙著。由于个人水平所限,研究经验不足,再加上毛泽东学习思想之博大精深,其学习实践活动又历久广泛,内容、形式丰富多彩,甚至带有“神话”般的色彩,本拙著对其很难予以全面的、客观的、恰到好处的描述和反映,其缺漏和遗憾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也可能有错误之处。笔者只想尽抛砖引玉之力,哪怕做一块铺路的石子,让他人踩着前进,抑或做一架人梯,让人踏在肩上攀登,也深感不胜荣幸之至。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26年了,毛泽东也早已走下了神坛。但是勿庸讳忌的是,在毛泽东身上仍然有一个令人难以猜破的“司芬克斯”之谜:

自序

他是人，不是神。他是从一个小山村里成长起来的农家子弟，没上过大学、没留过洋，没进过军校，他何以如此奇伟——能够成就一个普通人难以想像的伟业，而成为古今中外数一数二的巨人、伟人？难道这不是一个奇迹，难道这不是一个尚未被猜破的谜吗？

读者朋友们，你有兴趣猜这个谜吗？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请读这本书吧，因为毛泽东之谜的“谜底”就在这本书内。

胡小林

2002年9月9日

毛泽东逝世二十六周年纪念日于枣庄师范专科学校

第一章

毛泽东的学习生活与著述

——兼论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毛泽东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其次才是一位学者。但是,作为学者的毛泽东并不逊色于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我们研究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是把毛泽东视为一位千古仅有的学者来研究的;同时,也不能不涉及革命家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因为二者是不可能分割的。

树有根,水有源。毛泽东的学习思想萌芽于青少年时代,毛泽东的学习实践活动是从家庭开始的。因此,研究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不能不从他的家世和幼年入手。

一 “红日”出韶山

歌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鸦片战争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湖湘人才蔚起,至毛泽东而称极盛。毛氏的《沁园春·

雪》咏叹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敢于睥睨古人，吐纳中外，其器识固不同凡俗，就客观方面而言，他的学习思想和实践发祥于 20 世纪初叶之湖湘，得天时地利之嘉惠，绝非偶然。

(一) 韶峰看“日出”

九嶷山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九嶷山又名苍梧山，在湖南省南部宁远县城南 60 里。《水经注·湘水》：“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得一溪，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曰九嶷山。”九嶷山支脉北延数百里，有一座巍巍韶峰，位于湖南中部湘潭、湘乡、宁乡三县的交汇处。相传，舜帝南巡，见这里山川秀美，遂奏九天韶乐，引凤来仪，百鸟和鸣，韶峰由此得名。钟灵毓秀的韶峰，孕育了一代天骄、千古伟人。公元 1893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就诞生在韶峰东麓韶山冲上屋场的一户普通农家里。毛家这个男孩，取名泽东，字咏芝（后改为润之）。

韶山毛氏原籍江西，在韶山落地生根已有 500 年历史。元朝末年，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反元。江西青州府龙城县，有个叫毛太华的青年农民揭竿而起，参加了朱元璋的起义队伍。待到朱元璋开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灭群雄，建立明朝，毛太华已被提升为“百夫长”，又随傅友德将军远征云南澜沧江（今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在那里立下战功，并娶妻安家，生下四个儿子，取名为清一、清二、清三、清四。后来毛太华告老还乡，他没有返回原籍，而是落户到因战乱致人烟稀少的湖南。他带着两个儿子定居于湘乡县城北门外的绯柴桥，有几十亩田产。10年后，清一和清四又移居到更为偏僻的湘乡七都七甲，即今日的韶山市韶山冲。这里地处湘江中游西岸40公里，群山环抱，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从此，毛氏宗族在这里垦荒务农，到毛泽东这一辈，已传20代。

毛泽东的父亲（1870～1920年）名字叫貽昌，字顺生，号良弼。他读过几年私塾，虽然同祖上一样务农，但他为人精明能干，17岁开始当家理事，后来因为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长了不少见识，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还乡后，赎回父亲毛恩普典出去的土地。他和家人终年辛勤劳作，自耕15亩耕地，年收入稻谷60担。他将每年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25担谷子加工出售，做起了米生意。同时，他还兼贩耕牛和猪，家业渐渐兴旺。至1904年，他的家产增至22亩，年收入谷子84担。毛泽东后来回忆他的家庭情况时说：“我家具有‘富’农的地位了。”^①之后，毛貽昌将大部分时间放在谷米和猪牛的买卖上。他雇了一名长工干农活，农忙时雇零工，同时还让妻子和孩子到地里干活。

毛貽昌一心想聚财发家，曾典进别人的一些土地。他虽然没有开店做生意，但他与湘乡、湘潭等地的一些店铺却有商务往来，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还印制了“毛义顺堂”的纸票用以流通周转。毛貽昌治家颇严，生活十分俭朴。他住的还是父亲在1878年盖的泥墙草顶房子，直至他去世前两年，才将屋顶由茅草换成青瓦。

^①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版，第14页。

毛泽东的母亲文氏(1867~1919年)是一个普通农家女子,没读过书,连名字也没有,在文家排行第七,家庭及邻里呢称其“七妹”。她13岁到毛家做“黄花媳妇”,正式结婚时是18岁,共生五男二女,但其中二男二女夭折了,只剩下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

文氏中等身材,圆脸庞,宽前额,有一双聪慧的眼睛,长得清秀、端庄。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母亲是一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①在韶山冲一带,至今还流传着她救济别人的动人故事。母亲的优良品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毛泽东的品行中烙下了母亲的痕迹。

毛泽东对母亲很有感情。1918年,文氏在娘家养病,毛泽东十分挂念病中的母亲,赴京前夕,亲自请人开了一个药方,寄给舅父。1919年春,他刚从北京返回长沙,就将母亲接去就医。10月5日,文氏不幸病逝,毛泽东日夜兼程,从长沙返回韶山为母亲守灵。面对暗淡的油灯,回想起慈母的桩桩往事,他悲伤地不能自禁,席地而就,写了《祭母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萃萃,乃其大端……病时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养育深恩,春晖朝露。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殒,灵则万古。

①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版,第16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毛泽东还在灵联中表示了自己对母亲的无限热爱和怀念：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毛泽东对自己的父母一直怀着赤子之深情。1959年6月25日，他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在旧居里，他久久地凝望着父母的照片，伤感地对身旁的人说，父母得的都不是难医的病，却都过早地去世了，要是现在，他们都不会死的。次日清晨，他踩着露水来到父母的坟前，深深地鞠躬，默哀良久，并对身旁的人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回到住处后，他又对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二）人生驿站

韶峰偏北，有一脉与之一比高低的龙头山，主峰海拔440米，为韶山境内第三高峰。龙头山、黄峰山、虎歇坪三山一脉相连，自东、南、西三面紧紧环抱滴水洞山谷。大自然神奇的造化，使这里的山水既险峻峭拔又秀丽幽深。山谷盆地中，有1966年夏天毛泽东回韶山时住过的雅致别墅——被毛泽东称其为“西方那个山洞”——滴水洞一号楼。沿别墅陡峭的山路蜿蜒而下，西面山苍岩岌，巍巍雄奇；东面绿水粼粼，空明澄碧。别墅后山有一条茅封草长的小道，直上龙头山。当年毛泽东在滴水洞山谷散步时，曾指着龙头山对工作人员回忆说：翻过这道山，就是黄田坳。以黄田坳为界，山那面属湘乡，山这边是韶山，属湘潭县。所以黄田坳又叫湘

潭坳。毛泽东还指着山沟里那条羊肠小道说：“小时候，我到外婆家，就是沿着这条山沟过湘潭坳的哩……”

是的，毛泽东永远也忘不了这山涧小道，忘不了山道那边的小村庄。幼儿时的毛泽东，曾挎在父亲的肩臂上，沿着滴水洞的山路，经滑油坳，翻八斗田坳，过七斗坑、龙潭塅，直达外婆家——湘乡县大坪乡唐家塅。

唐家塅，又名棠佳阁，与韶山一山之隔，约10多华里。毛泽东的曾外祖父文作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贫苦农民，由于家庭生活极度贫困，劳动艰辛，刚过27岁就染病去世了。曾外祖母贺氏，含辛茹苦，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受尽了人间的各种苦难与折磨，终于把孩子带大成人。贺氏勤俭持家，节衣缩食，人极能干，又肯吃苦，她长年累月给富人家做饭、洗衣服，还让三个儿子到湘乡城去卖工挣钱。靠她的里外操持，慢慢地家里竟有些节余，后来居然置些田产，并买下了唐家塅房屋一栋。直至19世纪初，文家已经发展为有20多口人、拥有144亩田地的大户人家了。

毛泽东的外祖父文芝仪，行二，字绵薰，是一个毕生耕种、勤劳朴实、品端行洁的农民。外祖母贺氏，一生孝慈淑慎，生育三子、三女。毛母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故称“七妹”。文家因每年要到韶山瞻扫祖坟，想在韶山找个落脚点，便将七妹许配给了毛貽昌为妻。在毛泽东之前，文氏生过两男，都不幸夭折。毛泽东出世后，她自然看得极为娇贵。毛泽东还只有两个多月时，她就偕夫毛貽昌将儿子抱到外祖母家“过路”。外公、外婆和舅舅、舅妈看见眉清目秀、方面大耳的毛泽东，一个个都甚是喜爱。特别是外祖母，把小外孙看得更是金贵，硬要女儿把孩子放在她身边抚养，说是韶山南岸屋场不发人，女婿毛貽昌的八字命又太硬，把小外孙寄养在人丁兴旺的唐家塅可以消灾免祸，长大成人。一向敬神信佛的文七妹虽然听信母亲的话，但正因为相继痛失二子，再怎么也舍不得让毛泽东离开她。为了不辞老人的好意，答应十天半月常带儿子来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外婆家小住。外婆见留不住小外孙,也只好作罢,但定要给他取个乳名。湘乡这个地方有种风俗,要把命根子带大成人,往往用家禽家畜取乳名,因为这些生命“贱”,越“贱”就越容易养。于是,有的叫“狗伢子”,有的叫“猪妹子”。外婆不喜欢这类乳名,她看中了龙头山南麓那块平地拔起的大石头。这是一尊高达20米青色石灰岩石,岩石大小两块紧密相连,作搂抱状,恰如婴儿亲昵地偎依在母亲的怀抱里。岩石底下有一股清泉,无论天怎么干旱,总是终年流水不竭。传说这地方出个山妖,经常兴妖作怪。观音菩萨为民除害,施展法术降了妖怪,这块巨石便是她的化身,山妖被她踩在脚下永世不得翻身。由此,人们把这块神石称作“观音岩”,把它当成大神顶礼膜拜。于是,外婆和文七妹把毛泽东带到观音岩前,备了菜饌酒饭,香烛纸钱,烧香磕头,让外孙拜石头为干娘,又因他排行老三,便取乳名叫石三,唤作“石三伢子”。

后来,似乎应验了外婆的话,毛泽东虽然取了一个很硬的乳名,又拜观音岩为干娘,可仍长得不顺当,总是病病怏怏的。文七妹记起母亲的话来,想到这韶山南岸屋场单家独户、冷冷清清的,孩子连个玩耍的伴也没有,整天形影相吊的,长此以往怕影响孩子的成长。于是,她通过和丈夫毛貽昌商量,便在1896年春,也就是在她即将生产第四个孩子毛泽民之前,便把毛泽东送到了娘家——唐家塅。

寄居唐家塅是毛泽东人生的第一站。据有关文史资料记载:毛泽东从两岁开始直到1902年春进南岸私塾读书,一直是寄养在外婆家,他幼年大部分时光是在唐家塅这个小山村渡过的。

(三)英萌蒙馆

毛泽东的八舅文正莹,颇有文才,在家里办了一个蒙馆。这是一种旧式的学堂,是专门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场所,一般只有一位先生,招收一二十名七八岁乃至十来岁的孩提入蒙。

那时,毛泽东只有二三岁,远不到上学的年龄。每天,当表哥们去上学后,他就常常独自一人跑到门前的小溪里去玩水,到屋后的田野草丛里去捉蚂蚱。外婆怕心爱的小外孙出什么意外,便让文正莹的三儿子,比毛泽东大三岁的文南松,把毛泽东带到文正莹的蒙馆里去玩。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个稚童竟能安然地坐下来听八舅讲课,跟着学子们一起念书。久而久之,耳濡目染,他居然也能把《三字经》、《百家姓》等课文背下来。看到毛泽东读书如此有天赋,文正莹心里特别高兴,充满爱意地称小外甥为“小小陪读郎”。

文正莹虽然是一个没有求得任何功名的“布衣”学者,但却有着远大的抱负。他常自叹命运不济,此生壮志未酬,故而把满腔的热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常教导子侄外甥们从小要树雄心,立壮志,学得真才实学,将来建功立业。因此,他对天资聪颖的毛泽东抱的希望尤大,在教其读书识字的同时,还经常给他讲述古今中外英雄豪杰们的故事,像“韩信智胜楚霸王”、“梁红玉击鼓退金兵”、“岳飞大破金兀术”、“林则徐虎门烧鸦片”等名篇,不知讲了多少遍。故而,韩信、梁红玉、岳飞、林则徐等英雄豪杰的高大形象,深深地铭刻在毛泽东的幼小心田里。

文正莹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他对当时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卖国求荣的行径十分不满,常在讲坛上向学子们讲述国耻民难,以激励孩子们的爱国救民之志。文正莹还教导小外甥要好好读书,读好书,将来如能考得功名,毋忘做个好官,像历代民族英雄那样扬我国威,振兴家邦。文正莹是一位为人正直、注重节操的乡中儒雅之士,他虽知识不薄,资财不菲,但平素最看不惯那些狗仗人势欺压穷苦百姓的人。有一年,当地一个为富不仁的财东要送自己的儿子到文正莹的蒙馆里读书,被他以面试不合格为由拒之门外。当时,年幼的毛泽东对八舅这一举动大惑不解:为什么唐家壤好多佃户的伢子都可免费到八舅的蒙馆里读书,而却把这个富贵之子拒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之门外呢？文正莹事后告诉毛泽东，这个人先前也通些文墨，后来利用知识挣了不少钱，回过头来又去专门欺侮四乡八村里那些没有文化、没有钱的种田人，赚他们的昧心钱。他由此告诫毛泽东：文化知识是帮助人干正事、走正道、成大器的，如若不然，有文化的人变坏则比没有文化的人更坏。

为了教育毛泽东等子侄外甥们学着“干正事，走正道，成大器”，文正莹曾手抄《家范箴言》一卷，以课学子。《家范箴言》主要内容为文氏家戒和家训。“家戒”有六条，即“一戒游荡，二戒赌博，三戒争论，四戒攘窃，五戒符法，六戒酗酒”。“家训”共有十则：“一、培植心田，二、品行端正，三、孝养父母，四、友爱兄弟，五、和睦乡邻，六、教训子孙，七、矜怜孤寡，八、婚姻随宜，九、奋志耘窗，十、勤劳本业。”其形式和作用与今天的乡规民约有些类似。

据文正莹之子文运昌回忆，其家父结合课堂教学，始是教弟弟文南松和毛泽东等学童诵读《家范箴言》，继而要求他们熟记，并引以为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文老先生认为：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在一定意义上，《家范箴言》规范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文氏后嗣们的思想、伦理、道德、行为及人生追求等。特别是悟性极高的毛泽东，自打幼年时期熟读了八舅文正莹编撰的《家范箴言》起，一个人应当“干正事，走正道，成大器”，“做一个像八舅一样的好人”等朦胧的思想意识，便开始在他脑海中萌生。

二 钟灵毓秀

自宋代朱熹在岳麓设书院始，又经明代王夫之等先贤奋笔耕耘，逐渐形成了湖湘之文化育人传统。据《毛氏族谱》之描写毛氏故里的自然风光：“一沟流水一拳山，虎踞龙盘在此间。灵秀聚钟

人莫识,石桥如锁几重关。”自鸦片战争以来,湘军诸将创立的基业,转化为下一代“修学诸能”的有利条件。他们一旦羽毛丰满,便会乘时御风,与祖辈分道扬镳,成为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急先锋。维新运动的首倡者是南海康氏有为,而激进派代表则是湖南浏阳人谭氏嗣同、唐氏才常。辛亥革命的首领孙中山是广东香山人,而继起者则有湖南的黄兴、陈天华和宋教仁等。五四运动的主帅是陈独秀、李大钊,而湖南的毛泽东则是后起之秀……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心情激荡,思绪万千……他才思泉涌,情致酣畅,铺开宣纸,饮蘸浓墨,笔走龙蛇,吟成一首《七律·到韶山》: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这一节,就从“故园”蒙圣说起。

(一)故园蒙圣

古时,老师的地位列于至尊,与天地君亲分享祀典。其所以致此,按照韩愈的说法,则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愚夫之成为智者,凡夫之成为俊才,或谓收功于老师的教育点化,并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非过分。正如古人所云：“蒙以养正，圣之功也。”

1902年春，年仅8岁的毛泽东在结束了唐家塍的寄养生活，告别八舅文正莹和外婆家的诸位亲人回到韶山冲后，遂开始正式拜师求学了。

毛泽东后来回忆那段经历时说：“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里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我的国文老师是一个对学生要求苛刻的人。他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10岁时曾经逃离学校。我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县城的大致方向走去，以为县城就在什么地方山谷里。我流浪了三天，最后还是被我家的人找到。我这才知道我这次旅行只是在兜圈子，走了那么久，离我家大概才8里路。”^①

毛泽东在回忆中说的“小学”，实际是当地的“私塾”，他先后在韶山南岸私塾师从邹春培读《三字经》、《论语》、《孟子》等。那位“粗暴严厉，常常打学生的人”就是指邹春培。毛泽东对体罚很反感。某天邹先生打了他，他十分气恼，于是便发生了毛泽东离家出走的事。回到家里，出乎意料之外，严厉的父亲并没有打骂他，邹先生也显得比往日温和。对这次的经历，毛泽东自我感觉也很好。几十年以后，他向一位国际友人谈起它时，称之为“一次胜利的罢课”，他说：“我的抗议行动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②

1904年秋，毛泽东转入公关桥私塾读书，塾师毛润生。1905年春，又就读于桥头湾私塾，塾师周少稀。在这两处塾馆，他继续攻读四书五经。虽然塾师不讲经义，只是要死记呆背，但毛泽东对书中的内容，还是领悟不少。在塾馆读书时他已经对书法感兴趣，

①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版，第15页。

② 《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06页。

初学欧阳洵,后改学钱南园;成年以后,兼采各家笔法,尤得力于怀素的狂草,终于笔走龙蛇,自成一家。1906年秋,毛泽东读井湾里私塾,老师是毛宇居,读的是《春秋》、《左传》。从此,他开始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与日俱增,至老未衰。

毛泽东与毛宇居是同辈弟兄,只不过小宇居六岁而已。1959年毛泽东返回韶山时,在松山招待所设宴招待各位父老乡亲。席间,毛泽东一面招呼大家吃菜,一面举杯把盏,他端起酒杯向毛宇居敬酒,白发飘逸的老人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连声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边扶老人坐下,边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他还贴到毛宇居的耳边说道:“我过去是个调皮学生,还造过你的反哩。你还记得吗?”毛宇居笑着说:“记得记得,你也是个高材生,那时你很爱看杂书,我还故意给你点《左传》,你都能应付裕如哩!”^①

1906年,毛泽东因与父亲发生冲突,曾辍学两年多,在家务农。1909年,他在克服了父亲的阻挠以后,又先后到乌龟井和东茅塘私塾读书,为时一年。乌龟井的塾师毛岱钟毕业于政法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8月的一天,毛泽东怀着好奇的心情,生平第一次听毛岱钟老师讲授那神圣的“王法”。毛岱钟博闻强记,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侃侃而谈,把本来枯燥生涩的法律基本概念问题,同文字训诂糅合在一起,讲得高深而不失流畅,准确而又极富概括,使毛泽东这个从来也没有见过“王法”的塾生,在不知不觉中既接受了古文功力的训练,又懂得了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从这一天起,毛泽东这位山里娃便跟着“法科生”,接受了为期半年的法学启蒙教育。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这是毛泽东在学习生涯中首次正规地接受法律教育。拿今天的尺度来衡量,毛岱钟所授的知识,无疑是浅显而有历史局限性的,但它使毛泽东粗知了一些法学常识,在他稚嫩的心田里萌发了依法治国的幼芽,开始懂得了

^① 《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75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依法建国、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其实,它的意义还不只如此,而在于自此以后“法制”二字在他的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在后来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的理论与实践,逐渐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毛泽东法律思想”。以其为指导思想,他亲手制定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井冈山土地法》、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条例》、解放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和建国初期起草的有国家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等一系列法律文书,从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1910年春,毛泽东离开了乌龟井私塾,转学到东茅塘毛麓钟先生门下读书。《毛泽东年谱》这部国内外首次详细记述毛泽东生平业绩的编年体的史书,是这样记载少年毛泽东在东茅塘的读书生活的:“(1910)春,到韶山东茅塘一位秀才毛麓钟(在蔡锷部下供过职)家里读书。选读《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古籍,还读一些时论和新书。”^①

毛麓钟与毛贻昌是未出五服的堂兄弟。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毛麓钟以他特有的眼光认定:自己的这个学生加侄儿极有发展前途,将来在自己所教的学生中,最有出息的当非他莫属;毛氏家族中兴的希望,也将寄托在他身上。上述发现令毛麓钟喜出望外,大概就是从这时起,毛先生抱定一个心愿:精心教育培养毛泽东,用全部的心血和汗水,去浇灌这棵幼苗,使他长成参天大树;用全部的知识与智慧,去雕琢这块“璞石”,使之成为价值连城的“美玉”。

在东茅塘私塾读书时期的毛泽东,经过两年多辍学劳动的磨炼,有感于乡间生活的贫乏和读书求知之不易,因而在就学会失而复得之后,学习开始由不自觉转向自觉,由天资聪明转向天分加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8页。

勤奋。在这段求学的日子里,他每天起五更,睡半夜,手不释卷,格外刻苦用功。对此,毛先生一一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为了使这种自觉和勤勉能够持久下去,他除经常向毛泽东讲述古人立志成才、以图报效国家民族的大道理外,还以他特有的思维定势,把“大道理”与“小道理”结合起来,不时向毛泽东讲述毛氏家族的兴衰史,希望毛泽东始终保持旺盛的学习热情,为振兴家族而发愤读书。

像许多旧知识分子一样,毛麓钟也是个宗族观念很强的人,他认为一个家族的兴旺发达应该成为全体家族成员的奋斗目标,正是靠这种力量,才能使家族的成员们一代一代地不懈努力奋斗下去。他觉得毛泽东是个悟性极高的毛氏后生,应该让他明白这个道理。于是,他打破惯例,虽然毛泽东尚未成年,却让他阅览《毛氏族谱》,使之了解毛姓家族的缘起和发展状况,借以激发他为振兴族门而好好学习的热情。

毛泽东饶有兴味地阅读了由毛麓钟保存的那部本房的《毛氏族谱》,从这部编修于清乾隆二年的族谱中,他了解了毛氏的历史渊源:

吾姓系出周姬文王毛伯郑之后,世为周卿,因国为氏。自毛享、毛苌注诗训诂,西河遗源,固深且远矣。汉、晋、唐、宋迄明,莫不代有伟人,光炳青史。考其根源,历历可据,承其年代,派衍如珠之串,如蝉之联,不惟震惊一时,实足赫耀千古矣!^①

关于韶山毛氏家族的缘起与发展史略,二修《毛氏族谱》上也有详尽记载:

^① 《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8 月版,第 122 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始祖太华,元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年),避乱由江西吉州龙城(今江西吉水县)迁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娶王氏,生子八。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庚申,以军功拨入楚省。惟长子清一、四子清四与之偕行,解组侨居湘乡北门外排柴桥。十余年歿,葬五里牌道士山(距今湘乡市城关五里的城郊)。后清一、清四二公,卜居湘潭三十九都,今之七都七甲焉,开种族铁陂、乌塘、东塔等处(均为韶山境内小地名),共田四百余亩,编为一甲民籍。自此,我毛氏世居韶山,子姓繁衍,近达数千,大开韶山一族。

知道了毛氏家族的历史后,毛泽东这才明白,老师为什么让自己看那发黄的族谱。他显然悟出:家庭和宗室同是人生的两个支撑点,有家才有族,有族才有民族和国家。只有全家人团结和睦,家庭才能兴旺;只有全体族人齐心协力,家族才能昌隆,像毛姓这样华夏最古老的氏族,才能经千百年而不绝;只有全民族人民的共同奋斗,民族才能够振兴,国家才能够繁荣富强!

当然,毛麓钟花费心血最多的,还是毛泽东的学习与进步。他除了在讲坛上教好每一节课,还十分重视抓好毛泽东的课外学习,悉心指导毛泽东阅读大量古籍。《史记》是毛先生给毛泽东点读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毛泽东后来在《讲堂录》中写道:“(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① 历来人们都认为,司马迁将其游览四方所得山川浩瀚之气,一以发为文章,故气势奔放,雄视百世。毛泽东嗜读《史记》,司马迁的文章及行动,都使他深为倾服。

由于毛麓钟的严格训练,毛泽东对诗词歌赋的学习进步也很快,他不仅熟读了几百首古诗,即使是生僻的诗句,竟然也能稔熟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87页。

于心,倒背如流。从屈原的“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到贾谊的“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从陈宽的“危楼还望……”到林则徐的“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他都能即兴吟唱,信口背诵,毫无差池。据闻,他的这种熟读古诗的兴趣和超常的记忆力到老不衰,一直伴他度过一生。

韶光易逝,日月如流。过了桃红柳绿的早春二月,过了杜鹃漫山竞妍的清明时节,又到了芙蓉出水的六月炎天……半年的时光瞬息即逝。经过短暂半年时间的相处,毛麓钟先生深感韶山冲这个小小的山村,已藏不住即将展翅的雄鹰,东茅塘这区区的斗室,已容不下毛泽东那伟岸的身躯。他想推荐毛泽东到外面的“洋学堂”去读书。

总起来看,毛泽东在韶山几处私塾,先后上了六年学。1964年8月18日他在北戴河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他还追忆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很好,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的经典,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绝对的权威,任何人都动摇不得,奈何不得。毛泽东虽是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少年,但也不能摆脱这种统治思想和绝对权威的支配。

(二)东山情钟康梁

1910年秋日里的一天,年仅17岁的毛泽东,告别父老和乡亲,离开了韶山冲,前往50里外的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谭嗣同在《浏阳兴算记》中提到:“湘乡改东山书院之举,又继之以起,趋向亦变矣。”这说明,湘乡改东山书院为学堂是步“浏阳兴算”之后尘,成为戊戌以前最早兴办起来的新式学堂之一。

东山学堂在湘乡县对河的东台山下,校舍像是一座很大的寺庙,显得古朴庄重。周围有一道很长的圆形青砖高墙,墙头花树掩映,竹木扶疏。院墙外面紧紧环绕着一个七八尺宽的园池,园池两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岸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一座装有矮栏杆的小木桥横跨在园池上面，成为进出学堂的必由之路。黄昏时，圆锥形的东台山和山上尖尖的宝塔，倒映在环绕学堂的园池里，显得格外美丽而幽静。富丽堂皇的学堂建筑围抱在清澈的园池之内，好似出水芙蓉，在银色的水面上摇曳。难怪有人称这里为“莲花屋场”，真是名不虚传。

毛泽东的入学颇费周折。他不是湘乡人，再说对于一个小学堂来说，招收这么一个高大魁梧十七、八岁的学生也不合宜。但他碰上了一个好校长——李元圃，他是个维新派，思想比较开明，热心教育事业，在湘乡学界很有名气。他让毛泽东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言志》。毛泽东面对《言志》试题，聚精会神地思索着。忽然，他脑际中闪现出离开家乡时给父亲题诗立誓的情景。是的，好男儿志在四方，大丈夫以身报国……想到这里，毛泽东不禁豪气顿生，挥笔抒发了自己求学以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李元圃接到毛泽东的试卷后，先是被那工整清秀的蝇头小楷所吸引，进而被那高远深邃的立论、华美典雅的词章、纵横捭阖的笔法而折服。他捋着八字胡，大感惊异，兴奋地说：“今天，我们学堂里录取了一名建国的栋梁材！”

当时，东山学堂除了仍旧课读“经书”以外，还设有被称之为“新学”的国文、算术、经学、修身、历史、地理、物理以及音乐、体操、图画等十几门课。在这些学科当中，毛泽东尤其喜欢国文、历史和地理。通过对祖国历史和地理的学习，毛泽东大大地打开了眼界，他感到自己胸怀开阔起来了。他深为祖国有辽阔的疆域和悠久的历史而自豪，又深为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曾经使祖国威震寰宇的人物而振奋。但同时，也深为鸦片战争后国家积弱积贫、内忧外患而痛心疾首。所有这些，都促使他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奋发学习。

由于在学习上的自觉和勤勉，毛泽东的各科学业在全校学生中鹤立鸡群，特别是国文成绩更是拔尖。他的作文，如《言志》、《宋

襄公论》、《救国图存论》等都被老师赞扬为“视似君身有仙骨，寰寰宇气，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的好文章。1955年谭咏春的儿子去北京时，毛泽东在与其谈到这些文章时，说：“你老馆子有点眼光，那个时候我的个性与人家不同，只有他同意我的。”

东山学堂有一个藏书楼，收藏着许多中外书刊，毛泽东很快地就成了这里的常客。这时，他最爱读的是《新民丛报》，最喜欢康、梁的文章。

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这是康、梁维新变法时期的进步思想。但是，它这时早已失去了原有的进步意义，孙中山倡导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已成为当时的主要潮流。然而刚从偏僻山村出来的毛泽东，对康、梁知之甚少，对孙中山就更不了解了。因此，当他一接触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就感到特别新鲜，从而康、梁也就成为他心目中崇拜的人物。他从康、梁的文章中，从《新民丛报》及其他维新书刊中，吸收了资产阶级的文化，这对于他幼年学过的孔孟之道是一个否定；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对于他原有的“皇权至尊”的思想观念，也是一个否定；康、梁变法图强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他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启蒙，也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因此，毛泽东由崇拜孔夫子到崇拜康、梁，这是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巨大进步。

康有为、梁启超对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而其中最突出的又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主“变”哲学。康有为概括《周易》的“变易之义”，强调“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他认为，事物总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天道，后起者胜于先起也；人道，后人逸于前人也。”同时，他还注意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因，初步提出了“物必有两”、“有对争而后能进”的辩证观念。这尖锐地批判了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念。梁启超发挥了康有为的主“变”哲学，热情地歌颂创新，反对泥古守旧。他

说,“俗论动曰,非古人之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此奴隶根性之言也。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我有官体,我有脑筋,不自用之,而以古人之官体为官体,以古人之脑筋为脑筋,是我不过一有机无灵之土木偶”。^①梁启超反对作古人之奴隶,提倡独立思考,对青年毛泽东有着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从“五四”前期留下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来看,《体育之研究》提出“天地盖惟能动而已”,《〈伦理学〉批注》强调“抵抗”是发展的动力;《第三札》倡导“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所有这些,都同康、梁主“变”哲学的影响有继承性的联系。

二是,大同世界的理想。康有为写了一本《大同书》,借用《春秋公羊传》的“三世”说,把社会发展过程划分为三大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同时,他又融合《礼记·礼运》中关于“小康”、“大同”的说法,以“太平世”附会“大同”,作为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实际上,康有为是把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现实糅合在一起,用以“托古改制”,对儒家“大同”理想作了新的阐释。

怎样实现大同呢?康有为提出了去国界、去级界、去种界、去产界等主张。他认为私有财产是一切祸乱之源。欲去乱源,必从“去家界”做起。一旦消失了家庭关系,“无有夫妇、父子之私”,私有财产也就自然消亡了。为此,他主张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届期须易人;婚姻乃“交好之约,不得有夫妇旧名”。在取消家庭以后,妇女怀孕则入胎教院;婴儿出生后入育婴院;幼儿入怀幼院;童子按年龄入蒙养院及大、中、小各级学校;成年之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至老迈则进养老院。为了解决人民生活的困难,还设有养病院、恤贫院、公共宿舍、公共食堂等。康有为的这一设计当然纯粹是一种主观幻想。最初,青年毛泽东并不欣赏“大

^① 汪澍白:《传统下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45页。

同”说,1917年至1918年上半年,他在读《伦理学原理》时,还曾就大同说作了密密麻麻的批注,并斥之为谬误之理想。

三是,革命精神与“变化民质”的思想。1902~1903年,梁启超写了《新民说》。他认为近代中国的“积弱”,主要原因在于“国民”的愚昧落后、“道德败坏”和缺乏“国家思想”、“权利观念”、“自治能力”等等。他强调“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只有造就了新型的国民,才能革新政府、改造国家,达到变封建主义中国为资本主义中国的政治目的。当时,梁启超认为清王朝之所以能维持其腐朽政治统治于不坠,则是因为人民群众缺乏文化素养和政治思想觉悟。这比仅仅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又深入了一层。于是,梁启超进一步认为,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人心道德”,提高“国民”素质与觉悟。这种重视思想启蒙的思想、观点,是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的。但是,梁启超看不到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制度的反动性,而把一切归结于“人心道德”,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精神领域的革命,这无疑在另一方面贬低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这就是说,梁启超既然没有找到,没有看准中国“积弱”的病根,那他开出的“药方”就很难对症,因而就无法“治病”、“救中国”。梁启超的这一套理论,无论其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都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其早期思想中烙下了极深的印痕。

直至五四前夕,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仍然认为,中国积贫积弱,根本原因是“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因此,其根本的解决途径和办法,是“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① 这种观点与《新民说》几乎完全一致。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创立学会,确定以“新民”为会名。他在为新民学会起草会章时,提出以“革新学术,砥砺品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6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也正是这种观点的具体化。

1955年春夏之交,在东山学堂的老师谭咏春的儿子谭世英应邀赴京时,两人讲起“康梁体”的文章,毛泽东爽朗地大笑起来:“那时候,我这‘土包子’对康有为、梁启超可以说是崇拜得很哟!山沟沟里的娃子懂什么?连孙中山都没有听说过呢!人的思想嘛,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就跟小孩子学走路一样,都有一个摸索的过程……真要感谢李元甫先生,还有你父亲谭老先生,是他们教我学起步的啊!”^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康、梁思想的启蒙,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发展,的确构成了其思想链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起到了由初步接受民主主义启蒙教育走向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媒介作用。如果没有这一环节,毛泽东就不能成为后来的毛泽东。

(三)峥嵘岁月

1911年春的一天,毛泽东在难以抑制的向往的驱使下,告别了幽静迷人的东山学堂,告别了令他可尊敬敬的诸位先生们,挤进了一艘湘江小客轮的三等舱里,踏上了通往长沙的路程。

湘江的水滚滚向北奔流,“漫江碧透,百舸争流”。乘着银色的波涛,毛泽东步入了现代中国汹涌的历史大潮中……

带毛泽东去长沙的,是他的老师贺岚岗先生。贺岚岗告诉毛泽东说:

长沙,是一座有着20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相传,远古时代大禹治水曾在这里拖过船;楚国屈原就在这里出生,唐朝大诗人杜甫曾浪迹云游至此;南宋大词人辛弃疾也曾在这里设“飞虎营”,屯兵练武……这里,还有岳麓书院、船山学社、爱晚亭、橘子洲等名胜……

^① 《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他还说：

长沙，在太平天国时，这里是农民军和地主武装湘军搏斗、厮杀的重要战场；戊戌变法时，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志士，曾在这里创办“时务学堂”，编辑《湘新学报》、《湘报》，宣传维新变法主张；随后，革命党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于1904年在这里建立华兴会，后来成为同盟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多次策划反清的武装起义，特别是1906年春萍乡、浏阳、醴陵地区的武装暴动，曾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因此，长沙就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从事反清斗争的一个极活跃的地方……

贺岚岗的话，把毛泽东的心一下子带到了那个他想像中的古老而神秘的长沙，带到了那个早已让他心驰而神往、而今正风云激荡的长沙。

到长沙后，毛泽东想到湘乡驻省中学就读。但这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学校，他几乎不敢抱什么希望。出乎意料的是，他被顺利地录取了。今后摆在自己面前的人生之路是漫长而又艰险的，到底怎样走下去？这的确是他来到长沙后要交的第一张考卷！忽然，他脑海里冒出屈原那首著名的诗句：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此时，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夜。当毛泽东初到繁华大都市的热情尚未消退而仍为其嘈杂而诧异时，各种规模的反清秘密起义正此起彼伏，一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正在筹划之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呼声日趋高亢。一个风云激荡的长沙，向毛泽东张开了巨臂，欢迎这位海燕般勇敢的“弄潮儿”，投身于率领民众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时代洪流之中。

长沙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民族，正处在新与旧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两个时代的分界点！历史，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

国家步入了改朝换代、政权更迭的“非常时期”，毛泽东个人经历也同样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因为，从这时起，毛泽东这个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的大龄私塾生，已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中学生，他将由此而开始接受系统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教育，把文化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新的高度，这是他日后政治生命的养料。不仅如此，他所处的那个非常的历史时期，还将他这个不太懂政治的年轻人，用他自己的说话，“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之间的区别”的年轻人卷进了政治漩涡之中，从此，他的学习兴趣由对“纯文化知识”的追求，一下子上升为有目标的政治追求。

学校，历来是传播新思想的神圣领地，湘乡驻省中学自然也不例外。在这里，毛泽东后来追忆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个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这个起义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我深为这个故事所感动，并且还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个报纸是于佑任主编的，此人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著名的头头。这个时候，我也听人谈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① 他不仅阅读《民立报》，而且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当时，“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毛泽东恨不得立即投身于反清斗争之中，充当革命的马前卒。

经过一个时期对政治问题的深入钻研，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社会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他为此而异常兴奋和激动，便奋笔直书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打倒清王朝》，公开张贴在学校门口的墙壁上。在这篇充满火药味的文章中，他大胆地发表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亮出了个人的政治观点，这就是：推翻腐朽的清王

^①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版，第25～26页。

朝,组建民国新政府,“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学校引起很大的轰动。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发表政见”,而且是一个中学生的“政见”!这也是毛泽东到长沙不久,向学校交的“第一张考卷”!

后来,毛泽东曾就自己的这一举动解释说:“可见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他也不清楚孙中山与康、梁之间的区别。但是,由主张君主立宪、拥护清朝皇帝到主张“打倒清王朝”,废除帝制和建立共和制,表明毛泽东的思想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革命浪潮在不断地涌动着,冲击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后,毛泽东投笔从戎,到湖南新军服役半年。这次军旅生活虽然短暂,但在毛泽东青年时代乃至一生中都具有一定的意义。它不仅为毛泽东提供了一次参加“改朝换代”的大革命的机会,给他传奇的生活履历添上重要的一笔,同时,它也是毛泽东接触军事的开始,自此,他粗知了一些军事知识,是他日后数十年戎马生涯的最初尝试。此外,他在军队中接触了大量下层官兵,了解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掌握了他们的思想脉络,同他们建立了较深的战斗友情,并赢得了他们的喜爱和敬重,为他日后改造旧军队、创建新型的革命军队,以及统率和指挥千军万马积累了初步的却是极为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退役后,决心继续求学,他所考取的是湖南省立第一高级中学。值得庆幸的是,在入学考试中,他取得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入学后,由校长符定一作主,又加演了一场面试新生的插曲。面试的题目是,要求毛泽东限时作文,校长亲自监考、面试。毛泽东不知底里,看到先生如此重视自己,决心全力考好。写文章是毛泽东的“拿手戏”,只见他坐定略一思忖,便顷刻文思泉涌,一篇文章洋洋洒洒,一挥而就。面试的结果证明,毛泽东这次所写的文章,比入学考试的文章还要好。符定一执教十余年来,还是头一次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看到一个中学生写出如此文采斐然、妙语连珠的漂亮文章，阅卷时他禁不住拍案叫绝！他欣喜若狂地对国文老师说：“了不得，了不得！我执教以来还尚未碰到文章写得这样好的学生呢。我们省一中可取了一个栋梁之材呀！”

于是，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深得国文老师柳潜的钟爱。老师指导他参加全校作文比赛，题目叫做《商鞅徙木立信论》。商鞅“徙木立信”的典故，见于《史记·商君列传》，记述的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大政治家商鞅取信于民，推行改革的故事。毛泽东在文章中，就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大发感慨，直抒胸臆。

他在文章的开头，以高屋建瓴之势，直言了读该文的体会：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①

看来，关于救国之道，他继续沿着梁任公开启民智、塑造新民的路子在思考。这是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保存下来的第一篇完整的作文。全文仅 600 字，老师的批语却长达 150 字，说作者“才气过人，前途无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还批给其同学“传观”。

不久，柳潜借给他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这是一部自上古至明代的中国历史编年史，共 116 卷。卷首是乾隆皇帝书写的“序言”。这是一部极难得的好书。毛泽东读得很认真，该书进一步激起他对历史的兴趣。

在省一中，毛泽东是高材生。读了半年之后，他觉得课程太浅，内容又太陈旧，校规又太繁琐，尤在读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①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版，第 12 页。

后,愈觉得在学校里读书不如自学更有益。毛泽东对他认定了的事,是敢于采取哪怕惊世骇俗的行动的。于是,在1912年冬天,他毅然决然地从湖南省立高级中学退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从1912年冬到1913年春,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极有价值”的半年自学生活。

走进图书馆时,毛泽东见到各种中外书籍和报刊杂志,惊喜异常,一时不知从何下手。他首先了解馆藏情况,然后确定自学计划。

为了充分利用开馆时间,每天,毛泽东总是第一个进馆,图书馆关门时他又是最后一个离馆。只是在中午的时候,他才休息片刻,到街上买两个烧饼或两块米糕充饥。暑往寒来,日复一日,早去晚归,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强烈的求知欲,驱使毛泽东贪婪地读书,每读一本书,他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这段自学生活时,他曾饶有风趣地说:那时进了图书馆,“我贪婪地读,拼命地读,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样”。^①

这期间,毛泽东广泛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他回忆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故事。”^②不过,他主要还是集中精力认真读了大量反映19世纪西方资产阶

① 《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227页。

②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版,第31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著作,以及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他获得了许多新知识,也得到了许多新的启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开始在他的脑子里生根、发芽,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不断在胸中升腾。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了一幅世界大地图,并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了它。19岁的他,从看世界地图知道世界之大,也引出了他的遐思:世界既大,人就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

毛泽东在后来说道:“我由此想到,我们青年人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时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力量。”^①

正当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兴致勃勃地过着自学读书生活的时候,新的问题又发生了:一是毛泽东的父亲认为毛泽东既不谋业,又不进学校,是不务正业,不肯供给他学费了;二是毛泽东寄居的湘乡会馆已被军队占用,因而失去了栖身之所。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再进学校继续读书。

这时,于民国初年创办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一则招生广告吸引了他:

“学校不收学费,膳食费低廉”;“教育乃立国之本,学生毕业之后为教育服务……”

这引起了他的兴趣,随即决定投考,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被第四师范录取了。这样,1913年春,毛泽东再一次地跨进了校门。次年春,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毛泽东随之就读于第一师范,从而开始了他在第一师范求学的岁月,直至1918年暑假毕业,为期五年半。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坐落在长沙城南门外妙高峰下。它

^① 周世钊:《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新苗》1958年第9期。

面临湖南最大的河流湘江,与岳麓山隔江相望,东面紧靠京广铁路,东南丘陵参差环列,北边楼房鳞次栉比。这里风景优美,滔滔江水碧透,百舸争流,铁路线上,车来车往,使整个校园充满了时代气息。尽管如此,崇尚自修的毛泽东进入一师后,曾几次想退学,但考虑到总的来说一师在当时还算办得比较好、比较认真的一所学校,学术研究之风高涨,教育内容不断创新,学校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阅报室,有一批德高望重、思想开明、诲人不倦的教师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再加上杨昌济、徐特立等人的劝说,毛泽东最终还是决定留下了。

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经受了各方面的锻炼,为其后来的革命生涯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他充分利用有利的学习环境,刻苦学习,探索为学之道,专心打好学问的基础。

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一书中记述: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学校里有一位国文老师,学生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袁大胡子’”。^①真名叫袁仲谦,在毛泽东早期学习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同寻常的。

毛泽东入学后,曾有过两次顶“袁大胡子”的事发生:一次是写作文,题目叫《评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毛泽东在作文中,对范仲淹的说法不以为然,提出了与袁先生相左的解释,并在作文的后面写了句“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第一次作文”。袁先生阅后心中大为不悦,把作文退还毛泽东,要他重抄一遍。可是,毛泽东没有理会。袁先生认为,这是学生对师长的“不敬”,因而很是恼怒,便气冲冲地将毛泽东的作文本撕了。先生的过火行为触发了毛泽东的反抗意识,他质问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并要同袁先生一道到校长那里去评理,弄得袁先生下不了台。最后,再抄一遍时,毛泽东

^① 《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 12 月版,第 107 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仍加上了关于写作日期这句话。袁对毛泽东这个倔犟的学生无可奈何,也就不了了之。第二次是:一天,一位工友不小心打破了学校庭院里的一只大花盆,袁先生知道后,大骂了工友一顿。恰好这时,毛泽东打这里路过,深为这位工友鸣不平。他不顾师生礼仪,怒斥道:“哪里这样恶,要这样骂人?有事可以好好说嘛!”袁只好住口,悻悻地回办公室去了。虽然发生了两次顶撞先生的事,可他学习国文的兴趣却丝毫未受影响。相反,在学校开设的二十多门课程中,毛泽东最喜欢的是国文和与之相关的历史、地理,在这些课上面花的力气、下的功夫也最大。袁先生看在眼里,喜在心中。老师在审视学生,学生也在观察老师。终于有一天,他们感到彼此之间的成见消失了。更令袁先生欣慰的是,毛泽东具备一种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文化知识的浓厚兴趣。他对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十分用心,从先秦诸子百家之说,到宋明理学;从楚辞汉赋,到唐宋古文;从二十四史,到省志、县志,他都有过一番认真地阅读和研究。他也十分喜欢诗词,能背诵上千首。对于中国的书法,他也很感兴趣,天天坚持练碑帖,获得了可喜的成绩,他的“兰亭体”是全校闻名的。他对于外语也很重视,认为外国语是“中国人看世界之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他重视探讨历史,特别是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对新出版的史地书和杂志上的史地资料,也多方搜集。对于哲学,他不仅上课认真听讲,认真作笔记,深入思考,而且还利用课余和自修时间深入钻研,或找老师请教,或与同学研讨。他求知欲极强,读书面甚广,由于囊中羞涩,买不起书,就常常到旧书店去买折价书。他还常向老师和同学借书,见其喜爱的内容,便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抄录下来。他有一个冠名《讲堂录》的读书笔记本,里面就手抄了古代大诗人屈原的《离骚》和《九歌》,由此可见其爱好之广、知识之深,功底之坚实。

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不仅探索为学之道,专心打好学问的

底子,他还密切联系社会实际,探求人生的价值和救国的根本道路。

1913年,毛泽东在四师和一师读书时所在的班级,有一位颇有名气、年龄仅比毛泽东大3岁的历史老师——黎锦熙。黎先生在治学和做人方面,曾给早期的毛泽东以重大的影响。毛泽东于1920年6月7日给黎的信中称赞他“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就是兼指这位良师的品行、才学和思想见解而言的。对于毛泽东来讲,黎锦熙不仅是他的良师,还是一位难得的益友。他不但在才学上敬佩这位跟自己年纪不相上下的老师,而且在思想见解上也佩服他;他不但在课堂上向黎先生求学问道,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黎的住处释义解惑,共同切磋学术见解,交换对政治形势的看法,探索人生与救国的大道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在一师学到的文化知识越来越多,他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也越来越清晰明了。也就是在这期间,他愈来愈悟出这样一个道理:要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必须是具有远大理想、高深学问和健壮体魄的人,才能当此重任。他在1916年12月9日给黎先生的信中,阐述了自己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以及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重要意义,以期与先生求得共识。他写道: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用。^①

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青年就要有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而要实现这一志向,就应当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9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宙”这样的大本大源问题,从根本上改造现实社会。1917年8月23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而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面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千竖立、枝叶扶疏之妙……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①

毛泽东在信中还批评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立志说:“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羨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②这些都算不上真正立志,只有把立志与探讨宇宙的真理结合起来,把认识真理和实现真理联系起来,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立志。

毛泽东向黎先生进一步直抒己见:“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4~86页。

② 同上,第86页。

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他进而得出这样的推论:立志是件不容易的事,“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他将探究宇宙真理作为自己奋斗的理想,勉励自己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对哲学、伦理学下苦功夫,日新月异,才能不盲从他人,而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主张。

当时,黎锦熙已调至北京大学任教。1917年8月31日,黎先生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写道:“下午……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他尤其赞赏毛泽东关于“立志”一说,深感毛泽东“不愧为是大器量之人”。他想:虎豹之子未成纹,而有食牛之气;鸿鹄之雏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只有干大事业的人才胸有大志。毛泽东已立下凌云之志,似这等英才、伟器,焉有不成功之理!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学习生活是丰富多彩、极富创造性的。除了以上所述,他还积极从事社会实践,开展广泛的社会活动;组织同学反对旧的教学制度,驱逐校长张干,领导学生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率领同学智缴北洋军阀一混成旅的枪支,主办学友会和工人夜校,团结一批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新民学会;刻苦顽强地进行各种形式的体育锻炼,磨炼坚忍不拔的斗争意志。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在一师的经历,为他后来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本章本节篇幅所限,在此不再赘述,留到以后数章中去一一讨论和研究。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说:“我在师范学校当了5年学生,并且抵住了后来所有广告的引诱。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经历了不少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最早的社会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① 1949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当年的老同学时,又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国外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②

毛泽东非常怀念在一师的那段“峥嵘岁月”,1925年,当他回想起自己在一师那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时,曾满怀激情地写下了《沁园春·长沙》一词: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
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我们在本节里,只是从几个侧面、几个局部小事例,概括毛泽东学生时代的学习生活,真是挂一而漏万。若说毛泽东一生的学习生活,怕是几部书也写不全面,且也不是我等之辈能担纲、完成的。但是,既然要研究“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就不能不全面研究毛泽东的学习生活。在此只好借用毛泽东自己的两段话来概括之。

1964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什么北大、人大,我就不是大学生。我是小学教员、中学教员,绿林大学,过去读孔夫子书,读六年,想信他。读资产阶级书读七年,学资本主义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想信康德二元论,过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过书。后来才搞革命,参加了党。只知道要

①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版,第32页。

② 周世钊:《第一师范时代的毛泽东》,载《新观察》第2卷第2期。

革命,革什么,怎么革法不懂。学了十三年学了点文化,反帝以后才了解的……”

毛泽东在《自述》中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指导作用。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三 毛泽东的著述及学习思想

毛泽东受其老师徐特立“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之法”影响至深至久,终生坚持不辍,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著述系列及蕴含其中的学习思想。现就我们掌握的资料,来概述毛泽东的著述及学习思想如下。

(一) 毛泽东的著述

毛泽东在进一师求学之前,他的文章就写得很棒,例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提到的《言志》、《商鞅徙木立信论》、《评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体育之研究》等等。他在老师的严格督导之下,从不敢稍有懈怠,而是坚持勤学苦练,精益求精。他十分重视每周一次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的作文课,每次都按先生的规定,在两小时内写好交卷,从不拖到课外。他利用课外时间,仔细研读《韩昌黎全集》、《昭明文选》、《诗经》、《楚辞》、《全唐诗》、《全宋词》等,也深钻过孔融、陈同甫、叶水心等人的文集,从中国历代诗文巨将那里探寻文章的奥秘,因而,无论是短文、长文、古文、白话文,都很讲究文法、章法、词法及语言、逻辑,都写得很好,议论性文章尤其写得出色。他的文章,议论纵横,气势磅礴,被誉为“立试万言,倚马可待”,往往被老师批上“传阅”,被同学们争相阅读。他也很喜欢古体诗词,能背诵上千首古代诗词。他填词赋诗的功力非同一般,但不轻易写作,偶一命笔,即成佳句。例如在一师时写的《挽易昌陶》、《送纵宇一郎东行》的“五古”、“七古”诗,就调高意厚,颇现功力,像“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咏游泳联”;“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的“学习对联”;还有“与其苟且偷生,生无足道;非为奋斗而死,死有余哀”,“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煎,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殁,奇花初茁,待因君去尚非时”的“挽同学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的联语;以及此期在“游学”过程中与萧瑜的联诗:“翻山渡水之名郡(毛),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萧),沾衣晨露饿浸身。(毛)”与夏默庵的“联语应对”:“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夏);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毛)”这些作品脍炙人口,堪称上乘之作,曾被一师的师生传抄吟咏,一直流传至今。

多写苦练,使毛泽东成为一代杰出的诗人和伟大的理论家、学者。毛泽东一生中到底写过多少诗词和文章,已无法精确统计出它的真实数目,因为在革命战争年代,戎马倥偬,有许多诗文已散失了。人们只知道:日后已成为国家首脑的他,坚决反对“秘书干政”,提倡领导干部自己动手写文件。他带头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大到治党、治国、治军的方针大计,小到关于党、政、军、民、工、农、学、商、文、体、科、卫、东、西、南、北、中、外等工作的指示、批示、电

文,他都要起草,甚至“新华通讯社”的一些新闻稿以及“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重要“社论”也都由他来写。他善于运用浅显明了的语言和完善的文字形式和成语典故及寓言、神话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并能根据不同的读者对象,采取不同的风格——或通俗,或典雅,或幽默,或辛辣,或轻松活泼,或庄重严肃,写出大量说理透辟、气势磅礴,融古代语言于白话文之中,具有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来。毛泽东一生著述等身,公开出版的代表作就有《毛泽东选集》1~5卷;另外还有:《毛泽东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诗词集》、《毛泽东论教育》、《毛泽东论文艺》、《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外交文选》、《老一代革命家书选》、《毛泽东自传》、《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等等。他的许多著作不仅在國內一版再版,而且先后译成英、俄、德、法、日、印度、希腊等数十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而在诗坛、文坛和学术上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可以说前无古人,毛泽东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古今独步”。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有两篇文章值得特别嘉许,这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这虽是两部哲学著作,但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学习学”著作。因为,这两部著作从头至尾谈的都是学习与学习问题。

(二)《实践论》与《矛盾论》的由来及其他

毛泽东在1920年初步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自认为颇得益于读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三本书。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义,之后,起义队伍转移到井冈山打游击,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所能读到的只有1932年打漳州时,在漳州中学图书馆里找到的《资本论》、《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几本书。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经常以在莫斯科拜师读经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其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而鄙薄从硝烟烈火中磨炼出来的毛泽东为“狭隘经验论”者,并予以打击、迫害。

早在1930年春,毛泽东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①《反对本本主义》的写成,反映出毛泽东在学习过程中,认识出现了一个“飞跃”。这个“飞跃”,确实是他“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后”才产生的,反过来又可以使他更自觉地用来指导此后的实践。后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操纵中央领导权,毛泽东被撤去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他说:“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特别是1937年1月进驻延安以后,局势相对稳定。于是,毛泽东又“发愤读书”,而尤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11~112页。

② 《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401、402页。

究心于哲学。对当时译成中文的马列原著以及 30 年代苏联红色教授和中国左翼哲学工作者(如艾思奇等)编写的哲学教程、讲话他都找来研读,在学习过程中还认真作了笔记。1993 年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集了毛泽东对 10 本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10 本书中有 8 本是在保安和延安时批读的。1936 年至 1939 年批读的,又占了其中的 6 本,可见他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末期这一时段攻读哲学著作之勤奋。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有这样的描述:“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来几本哲学新书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什么都不管了。”当时,从外面带进革命根据地的哲学新书数量有限,而渴望读到它的人又很多,因而不得不采取传阅的办法。据石仲泉考证,从毛泽东读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上就发现“有几种不同的批判和批注的笔迹”。^①毛泽东之所以为读哲学新书而暂时中断与斯诺的谈话,很可能就是要抓紧在有限时间以内读完这几本书,再传给其他人。

1936 年 8 月在保安时,毛泽东就已读过《辩证法唯物论教程》^② 第三版。1937 年 1 月进驻延安凤凰山以后,毛泽东在 1941 年 3 月至 9 月间,在繁忙的工作中又抽出时间读了第四版,许多章节批读了三遍,有的可能是四遍,前后批注达一万两千余字。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③ 和《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④ 的时间稍晚一些,批注的重点,前者着重于“知与行”的关系;后者

① 石仲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导论》,第 2 页。

② 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合译,笔耕堂出版。

③ 河上肇著,李达等人译,昆仑书库出版。

④ 米汀著,沈志远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主要是有关认识论与辩证规律的几节。可以看出,读这些书,他是更直接地为撰著“两论”做准备的。

1937年七八月份,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他讲课的记录稿整理出来,经他同意,打印了若干份。以后,毛泽东把他的讲课稿,即《辩证法唯物论提纲》中最重要的两节,经过整理,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经验所做的一次极为深刻、极为系统的哲学总结,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对曾经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思想的有力批判。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毛泽东于日理万机之际,仍坚持自学、著述和授课。现在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油印讲义中,末尾注明:“论矛盾统一律完。一九三七,七、八。”时间恰恰在芦沟桥“七七事变”爆发一个月之后。8月上旬,国共两党谈判红军改编问题;8月下旬,中共中央又在洛川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至此,哲学课讲授被中断。因此,辩证法的其他规律都未能讲完和整理成文。

毛泽东在撰写和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提纲》时,自谦地说:“我这个讲义也是不好的,因为我自己还在开始研究辩证法,还没有可能写出一本好书,也许将来有此可能,我也有这个志愿,但要看研究的情况才能决定。”^①虽然他自己对“讲义”很不满意,但群众的反映却很积极而热烈。和培元是当年崭露头角的青年哲学家,他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的哲学讲座,迄今犹脍炙人口。他的讲授提纲——特别是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之所以那么爽朗、生动、有力,这不仅是由于他的文字流畅易读,

^① 《传统下的毛泽东》,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96页。

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活的中国革命经验,这就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①和培元的评论可谓识得此中三昧。

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之类的有字之书,可能在数量上不及躲在书斋里“饱学”的留学生与专家学者,但那些留学生与专家学者却远不及毛泽东“读无字之书”之广之深,这就是说,毛泽东过人之处,就是他曾经长期参加和领导革命的实际斗争(如果从他在一师领导学生“驱逐张干”和“反袁”开始算起,到1937年,已是22年;如果从1921年去安源路矿考察算起,到1937年,也是18年了),特别是在中央苏区“围剿”的艰苦斗争环境中,原已读过那本客观辩证法的“无字之书”及四本“有字之书”,一经勘破,往往能“由此及彼”,豁然贯通,发而为讲义和文章,便具有厚积薄发、深入浅出的特色,令留学生和学者专家之流自愧弗如,望尘莫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撰写《辩证法唯物论提纲》和“两论”之所以大获成功,既得益于他苦读“马列”和苏联、日本三十年代哲学著作的“有字之书”,更得益于他数十年革命实践的“无字之书”。“两论”所阐述的“无字之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知识、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当然也是毛泽东学习思想的精髓和灵魂。下文将就此作一些具体的探讨与阐述。

(三)毛泽东的学习思想理论体系

1950年,《实践论》公开发表时,毛泽东又特地加上了一个副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清楚地表达了全文的主题思想。《实践论》系统地阐明人(类)的学习,即认识在实践

^① 《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见《中国文化》第2卷第2~3期合刊,1946年8月20日出版。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的基础上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最后做了一个小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这一实践型的学习思想,早在湖南一师求学时就萌芽了,并且开始指导他的学习活动了。我们可以从他的《讲堂录》和《〈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找到例证。

毛泽东在其《讲堂录》中写道: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川大山,而其襟怀乃益广。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穡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他在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五章《义务及良心》部分,批注:

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

从这里不难看出,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已从自己的学习生活中初步悟出了:学习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以后的岁月里,他

不断地探索学习和学习问题。1936年12月,当他在全面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时,便十分明确的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① 这标志着,毛泽东的学习思想已形成并臻于成熟。经过“两论”到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文章,毛泽东不仅丰富、发展了自己的学习思想,而且形成了系统、完备、科学的学习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没有写出“学习学”专著,但只要我们将其学习思想予以研究,稍加归纳和整理,就是一部崭新的、实践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学。这部学习学,既是对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中的学习思想的继承,又是一种完全的创新,是一部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学习学”。

我们这本《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思想学习学”,是研究毛泽东学习思想和实践的一本专著,更具体地说,它是研究毛泽东关于学习的本质、特征、作用、规律、原则、范畴、方法和途径的思想理论,及毛泽东个人对学习的继承、创造及其学习实践活动的形式和规律的一部学习学著作。

在我国,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著作成千上万,已经正式出版的“研究成果”——专著有几千种。这些著作,都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不同角度涉及到毛泽东的学习和学习思想理论,但是,还没有哪一部著作把毛泽东的学习及其学习思想理论与实践作为自己独一无二的研究对象。而我们这本书,是把毛泽东的学习活动领域及其学习思想理论和实践作为自己惟一的研究对象,因此,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8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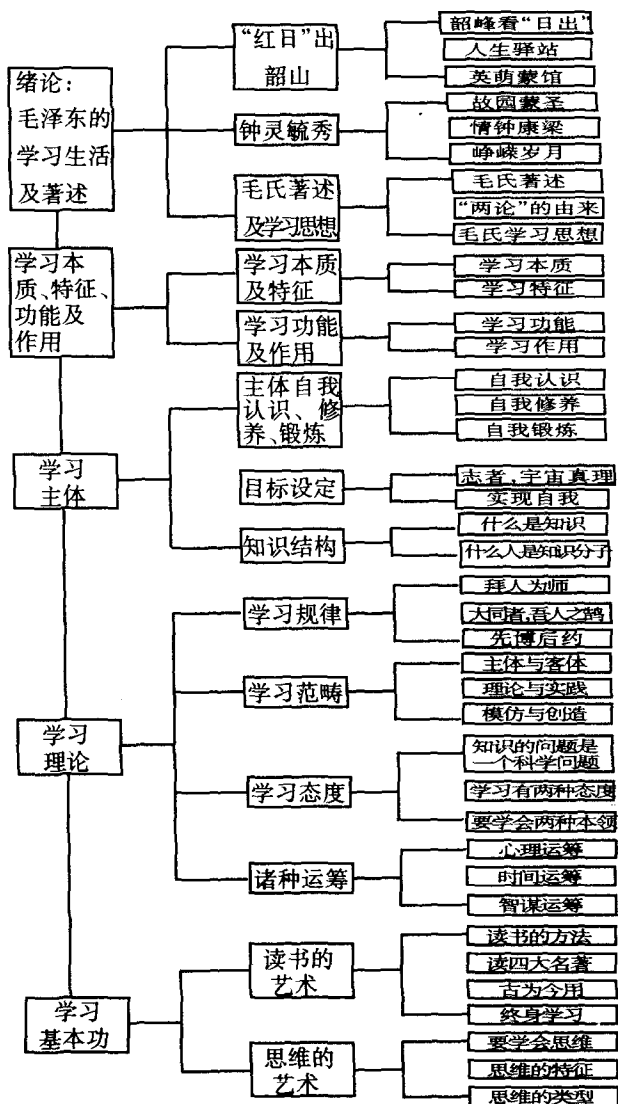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这部书在本质上就有别于其他著作。因此,我们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只凭自己的研究来确定其内容体系。

我们根据搜集到的有关研究毛泽东学习思想和实践活动的资料、毛泽东的一系列原著,以及亲自到韶山、长沙、井冈山和延安实地考察、采访掌握的资料,确定本书的内容体系如下:

章 节	内 容
1	绪论:毛泽东的学习生活与著述
2	毛泽东关于学习的本质和特征的思想
3	毛泽东关于学习的功能和作用的思想
4	毛泽东在学习活动中之自我认识、修养和锻炼的思想与实践
5	毛泽东关于学习目标设定的思想和实践
6	毛泽东关于知识与知识分子的思想 and 实践
7	毛泽东关于学习的规律的思想及其实践
8	毛泽东关于学习的范畴的思想及其实践
9	毛泽东关于学习的态度的思想及其实践
10	毛泽东关于学习的心理、时间和智谋的思想及其运筹
11	毛泽东关于读书方法的思想及其实践
12	毛泽东关于思维与思维方法的思想及其实践

我们认为,毛泽东的学习思想和实践的内容基本上包括五部分:



第二章

学习的本质与特征

学习的本质是什么？学习的特征又是什么？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学习就是识字、念书；还有人说，学习就是从阅读、听讲、研究、实践中获得知识或技能……不能说一点也不对。对是对，但有片面性。至于说学习的特征，那更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观点都有。惟独毛泽东既因袭古人的旧说，又有自己的科学见解。他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这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揭示出了学习的本质与特征。

一 学习的本质

毛泽东曾说过，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现象是看得见的，能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据此，我们可以说：学习

的本质,就是学习活动中实践与认识的矛盾,这是学习活动中的一对主要矛盾,而矛盾主要方面是实践,实践的水平和质量决定学习的水平和质量。

(一)“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

这个话,是毛泽东于1970年8月31日,在庐山会议上同林彪、陈伯达等马列主义骗子们作斗争时,在《我的一点意见》中的一段话。

当时,陈伯达伙同叶群于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会议期间连夜选编了一个材料,即《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这个语录,散发给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与会者。他们散发这个语录的政治企图是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造舆论的。本书不谈这个问题。笔者在此所要提的是,人的知识来源问题,即毛主席说的:“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① 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了学习的本质问题。

陈伯达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回答说:“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按: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②

其实,人的知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问题,早在1963年,毛泽东就从认识论的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在《人的正确

^①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946页。

^② 同上,第949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①。

毛泽东讲得很清楚:认识与实践这一对矛盾,实践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认识决定于实践,实践出真知。这也说明,人们的一切真

^①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人民出版社1963年5月版,第1~2页。

知,是在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及在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获得的。生活、实践是一切知识的惟一源泉,远离生活 and 实践,就等于远离了知识的源泉。这个问题,可以用“狼孩”的事例,从反面给予印证。

1920年(还有人说是1936年),印度人辛格一次在狼窝里发现两个小女孩,小的约2岁,很快就死去了。大的约8岁,取名卡玛拉。卡玛拉用四肢行走,用双手和膝盖着地歇息,她舔食流质的东西,只吃扔在地板上的肉,从不吃人手里拿着的肉。她害怕强光,夜间视觉敏锐,每到深夜就嚎叫。她怕火,也怕水,从不让人给洗澡。白天蜷伏在墙角里以腰臂部着地睡觉,即使天气寒冷她也撕掉给她御寒的衣服和毯子。经过辛格的悉心照料和教育(对卡玛拉来说,是学习——笔者注),她两年学会了站立,四年学会了六个单词,六年学会直立行走,七年学会了45个词,同时学会了用手拿食物吃饭,用杯子盛水喝,到17岁死时具有相当于4岁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和学习水平。卡玛拉失去了社会生活 and 实践条件,没有语言交际,没有劳动工具,从而失去了通过语言交际或制作、运用生产工具进行生产劳动以及其他社会实践以获取人类知识经验和技能的可能性。因此,尽管她是人生的孩子,也具备产生人的心理和学习的先天物质条件——人的脑,但她只是生存在动物生存的纯自然环境里,远离了人类的社会生活,无法学习,她就不能产生人的心理和行为;她回到人类社会的怀抱里,经过人的多年的教育和训练亦即学习,17岁的卡玛拉虽然只有相当于4岁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和学习水平,但她毕竟是学习了。^①

可见,人的知识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才有的。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学习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产生起决定性作用。没有人的社会生活 and 实践,即使具备产生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物质前提——

^① 《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2月版,第24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人脑,也不可能获得这样或那样的知识或技能。这充分证明:学习的本质,乃是人们在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关系中获得知识或技能,以确定人的主体地位,充分显示人的主体性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二)“先行后知,知难行易”

毛泽东这两句名言,是读河上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时留下的批注。河上肇(1879~1946)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曾在日本翻译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主要著作有《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学大纲》等。1930年6月,李达等人翻译的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由昆仑书店出版。毛泽东大约在抗战爆发之后,读了此书。该书上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该书在说明社会意识同社会存在的关系时,引证了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安朵拉托斯基(现译阿多拉茨基)著的《列宁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一段论述。新的译文是:

思维是由存在决定的……应当善于按照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本来面目来研究它们,而不要把这些关系同人们对它们的想象、同人的观念混淆起来。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一事实即使从下面一点也显然可以看出:在历史上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当社会关系在现实中正在成熟起来并且实际上存在着的时候,可以还不存在关于这些关系的意识,人们还不了解他们自身所作的这一切的全部详细情形。关系最先成熟,然后产生意识,人们才开始理解这些关系。^①

毛泽东在读这段论述时,则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考

^① 《阿多拉茨基选集》,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07页。

虑观念与存在(客观事物)、观念与实践(行)的关系,写下“先行后知”,“知难行易”的话。

今天,我们可以从学习学的角度来理解毛泽东这两句批注所揭示出的学习的本质。

知行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哲学史和学习思想史上,自先秦的孔、墨开始,许多思想家都提出过自己的知行学说。特别是宋明理学,对这一问题曾经反复辩难。朱熹主张“知先行后”说,知是行的前提和依据,行来源于知;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认为知与行同时产生,相辅相成;王船山(夫之)批判朱熹“先知以废行”、王阳明“离行以为知”,而提倡“行先知后”、“知行相资”说,颜习斋继承船山哲学,更强调“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的习行哲学。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研读过一些宋明理学家的著作,对朱熹和王阳明尤为钦服。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一方面强调“行动”和“奋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新知识之指导而活动者也”。^①这就与朱熹的“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观点相当接近。同时,陆象山、王阳明强调主体实践(道德行为)的能动性,对他也有相当影响。《讲堂录》记下了“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伦理学原理〉批注》极口称颂“主观之道德律”和“精神之个人主义”。《第三札》突出地强调主观立志,都是把主体实践的能动性作为向封建传统挑战的精神武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认为知行本是一回事。“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其哲学体系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但他提出行是知的尺度却蕴含着合理的因素,对青年毛泽东确立“重在行事”的观点和发挥主体实践的能动性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近代,孙中山从革命需要出发来探讨知行问题,并且把自己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27页。

阐述知行学说的著作称为“孙文学说”，这对于唤起青年毛泽东注意研究知行关系问题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孙中山在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认为传统思想中“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说法不对，应是“知难行易”。他主张知来源于行。孙中山对行的理解不仅具有个人的道德实践的意义，而且具有学习实践的意义。也就是说，孙中山的思想已接近揭示出学习的本质。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① 这还有点唯心的杂质。

五四运动以后，青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开始从思辨的领域转而面向实际。他积极参加了湖南的“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并强调说：“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② 他主张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他所领导的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真心求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在后来的发展中，更进一步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奋斗的目标。事实表明，他那时在理论和运动、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上，已逐渐把重点转移到“行”或“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上来了，但他们显然是心物二元论者。

在1920~1921年，青年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积极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在以后的长期斗争中，他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反对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倾向。1937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为了揭露、批判教条主义的理论基础，他确定以认识论为讲课的重点。备课时，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28页。

② 同上，第517页。

问题,研读了《船山遗书》。前面说的两句批注,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两句话,来表明他对观念与存在、知识与实践的关系的理解,赋予这两句话以新的内容,即如同存在先于观念一样,人们的社会实践决定人们的知识;人们的社会实践决定人们的认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才能获得认识;人们获得了科学的知识,对于进一步指导社会实践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因而,从学习的本质角度看,不是意识活动先于实践活动,而是实践活动先于意识活动。从1920年开始,毛泽东就确立了实践第一的观念了,即行先知后的学习观。

因此,从本质看,学习是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三)“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说过,毛泽东不是天才,他自己也不承认是天才,更不是神。他不是神,这是事实给予我们的答案。请看毛泽东在一师上学时的一次考试成绩:文、史两科极佳,几乎无人能与其相媲美,但他不喜欢学、没下功夫学的科目则学得极糟。如数学、物理、英语、静物写生等课程都得过零分或接近零分,连一般同学都不如。毛泽东于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时,已20岁;次年秋天四师合并于一师重读预科时,已21岁,毕业时都25岁了,此后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毛泽东回忆说:“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1919年4月,由上海回长沙,任修业小学历史课教员,同时从事政治宣传活动,后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毛泽东的学历、资历、地位和社会影响,都远远不及陈独秀、王明、博古等许多人。他在遵义会议之前,一直都是备受排挤。他的军事才能,也并非天生具有的。他曾说过:我们开始不会打仗,我在国民革命军里当过宣传部长,讲过打仗,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到了井冈山以后,开始打了一次胜仗,两次败仗。实践斗争中逐步学会打仗,搞出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战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些还应当感谢蒋介石,感谢我们党内那些百分之百完美的布尔什维克。我写的那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凯丰说我是在抄《孙子兵法》,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的确看了不少书,但是就是没有看《孙子兵法》。“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①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使用”、“干”,指的都是实践。他是第一个明确地揭示出“学习的本质”就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人。

毛泽东还说过,我本来也没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对它们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我们以红军在长征路上“四渡赤水”为例,看毛泽东是如何“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

可以这样说,整个长征路上,都是敌我对峙、拼杀的战场。在战场上,能够隐真示假,声东击西,牵制敌人,而不被敌人所牵制,是很有学问的。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是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后,毛泽东重新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四渡赤水,就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一连串声东击西的战斗。

遵义会议后,红军继续北上。1935年1月下旬,红军在川黔边境的土城、元厚一带第一次渡赤水河,进入川南的叙永,积极准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81页。

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蒋军看到红一方面军离长江只有几十公里,急忙集结中央军和各路军阀,重兵封锁长江,阻止一方面军入川,同时对红军形成包围。由于敌情发生变化,继续北上对红军不利。根据对敌、我双方情势的分析、判断,毛泽东决定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挥师向东,部队随即进入云南的扎西地区,把敌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蒋介石发现红一方面军在扎西休整,又连忙调兵遣将,追赶而来。毛泽东没等蒋军赶到,便乘贵州境内敌人空虚之际,出其不意地突然从扎西挥师东指,2月中旬在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二渡赤水河,再度进入贵州。

红军进入贵州后,直取娄山关。娄山关是桐梓至遵义的必经关口,地势险峻,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红军奋勇战斗,夺娄山关后直抵遵义城内。敌军加上从桐梓、娄山关退下来的残兵败将,遵义城内一共有八个团,被英勇善战的红军一举歼灭,遵义再次回到红军手中。

红军回师的巨大胜利,大大地震惊了蒋介石,他急急忙忙调来两个师夺遵义,结果被红军打退。遵义大捷之后,蒋介石亲自到重庆“督剿”。他企图用第五次“围剿”的办法把红军围歼在遵义地区。毛泽东依势而决,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迷惑并诱使敌人前来围剿。蒋氏误以为围歼时机已到,于是命令其部队火速向遵义逼进。为了进一步迷惑、调动敌人,毛泽东又率领红军突然北上,在茅台一带三渡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装出要北渡长江的姿态。

蒋在遵义扑了空,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赶紧调集大军堵截,并在云、贵、川边境大修碉堡工事,构筑封锁线,目的是围歼红军。不料,红军没有北上,等到把敌军的兵力吸引到川南与黔北一带后,毛泽东又挥师突然掉头东进,从川南重返贵州,在二郎滩、太平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避开了敌人的碉堡工事,再一次把敌人远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远地抛在了后面。

“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西南地区复杂的地形、河流等因素使毛泽东的声东击西战术更是显得出神入化。红军终于跳出了敌人重兵围追堵截的圈子，从而成功地甩掉了追兵，一步步到达胜利的目的地——陕北。

毛泽东“隐真示假”、“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绝不是从“兵书”中学来的，而是在长征途中，边打边学，“从战争中学习”的。12年之后，即1937年，他在《实践论》中，把学习的本质（虽然他当时没有这个概念，并不影响我们今天的研究——笔者注）提高到了哲学的角度来认识。他强调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并运用墨子的哲学范畴，指出：“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

二 学习的特征

毛泽东学习的特征，是由其对学习的本质的认识和把握决定的。因此，毛泽东的学习，除了具有人类学习活动的普遍性即共性之外，则更具有其特殊性，即个性。这也就是作为毛泽东生命个体学习活动特点的征象和标志。

毛泽东的学习活动是社会的产物，是历史的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个体学习活动，具有其可行（实践）性、需要性和目的（意识）性特征。因此，我们研究毛泽东的学习特征，就不能静止地、孤立地研究和探讨，必须将其放到当时中国社会的大背景

中,做变化的、发展的研究和探讨。

(一)“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造福人类。但是,如果你选择的课题是社会不需要的,或者关系不大的;如果你选择的学习内容是你的课题不需要的,或者关系不密切的,那么,花费大气力去学习就不值得了。这是你在学习战略上的失策。

少年毛泽东在学习问题上,尚无明确的目的,像普通孩子一样,任其家长安排什么内容,就学习什么内容,待其渐渐长大,特别是有独立意识之后,他就从当时社会的需要出发,也从自己的需要出发选择学习的内容了。

据有关材料介绍,毛泽东两岁时被送到唐家塅的外婆家寄养,外婆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家丁十分兴旺。在一大群孙子孙女中“根基不稳”的他得到外婆的格外宠爱。每天,他总与表兄弟们一道在宁静秀丽的大自然中无忧无虑地嬉戏。从6岁那年开始,他便像当地的农家孩子一样,开始放牛、打猪草、拾粪、砍柴,日子过得很开心,乐不思家。每次韶山来人,他总是躲起来,生怕接他回去。

毛泽东从小聪颖,有不同寻常的理解力和记忆力。他寄居外婆家时,常常在舅舅办的蒙馆里“旁听”,看样子虽是漫不经心,却能背诵蒙馆中点教的课文,还能写字,深得舅舅的欢心。

1902年,父母将毛泽东领回韶山发蒙。他先就读于离家很近的南岸私塾,启蒙老师邹春培,是一位50多岁的老先生。邹先生把毛泽东引到东墙下的神龛说:“这是孔夫子的牌位,从今以后,你每天早上进学堂,都要对神龛叩拜。日后,保管你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①

^① 《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28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这所私塾和当时大多数旧式学屋一样,奉行的是封建“正统”教育,“四书五经”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容有丝毫异端邪说。因此,童年毛泽东在这里是从读《三字经》开始的,继而点读《论语》、《孟子》、《诗经》等儒家经典。先生的教学方法是让学生死记硬背,不作讲解。这样的教学方法自然遭到后人抨击,也令童年毛泽东生厌。50多年后,他在北戴河作的《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追忆起当年这种“读死书”的情况时曾说:“我过去读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但毛泽东厚实的古代文化知识和古汉语基础正是在私塾里打下的。

在私塾里,童年毛泽东虽被先生排在顽皮的学生之列,但他会读书也是出了名的。一次背诵时,先生正襟危坐,道貌岸然,学生背着先生站着,在那样紧张的气氛下,往往吓得忘记了已熟读的课文。轮到毛泽东第一次背书时,他不按规矩肃立,依然端坐在自己的课桌前。邹春培问他为什么不站起来,他回答道:“你是坐着的,我也要坐着背。”邹先生将这番对话告诉了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毛顺生说:“他兴许是背不出来。”邹先生却说毛泽东的记忆力极好,读几遍便能记住。毛顺生将信将疑,晚上课问孩子,果然背诵如流,自然心中暗喜。

1904年秋,毛泽东转读于韶山关公桥私塾,从师毛咏生。1905年春至1906年夏,他又先后转到桥头湾、钟家湾私塾读书,从师周少希。1906年秋,转学到韶山井湾里私塾,从师毛宇居,并就读寄宿。

据毛泽东私塾里的同学回忆,少年毛泽东很有大人风度,特别聪明,记忆力也很强,过目不忘,老师出“破题文章”要大家作,他总是交头卷,还时常帮助别人作。

那时,先生给学生讲授《春秋》、《左传》等经书。毛泽东与毛宇居为同辈弟兄,由于这种特殊的亲情关系,毛宇居对毛泽东这个堂弟自然特殊看待,对他的管束、教育也比其他学生严厉得多。尽

管这样,少年毛泽东还是经常违反课堂规矩,给堂兄“捣蛋”。比如,他不愿读四书、五经,就和小同学串通起来,反对背书;让他在教室里好好温习功课,可等先生一离开,他便组织小朋友排队打仗由他当“元帅”,指挥其他学生冲锋,把个教室弄得一塌糊涂。

有一次,毛宇居要外出,临行前规定学生在课堂预习课文,不得随意走动闲谈。毛泽东却提出:如果今天不讲授新课,他将到山上树林找一个僻静而空气新鲜的地方,在那里读书记性更好。先生没有答应。可是,毛宇居刚走,毛泽东就背着书包爬到了屋后山上。两个时辰过去了,毛泽东躺在青石板上背熟了课文,又爬上树摘了一书包毛栗子。回到教室,他先给每个同学分几个,然后也“孝敬”大哥一份。毛宇居回来看见了,却不领情,他责问道:“石三,谁叫你到处乱跑?”“闷在屋里头昏脑胀,死记硬背也是空的。”毛泽东辩解。“放肆”!毛宇居很是生气,脸涨得通红。

下午,毛宇居仍然不依不饶,他要毛泽东站在教室门外,不让进屋。约过了个把时辰,毛宇居指着天井说:“你有本事不服管教,就以天井作首诗来,作不出我先打你的屁股,再告诉你爹!”毛泽东不愿挨打,只得认罚。他绕着天井转了两圈,思忖着这诗怎么做。他看见:天井中有一口井,调皮的学生从小溪里捉了些鱼虾放在里面养着。井水很浅,不时有三、五尾小鱼儿把头探出水面,小嘴一张一合,似乎感到井中很沉闷,要呼吸井外的新鲜空气。这一景观,给了少年毛泽东以灵感——他想,大哥管得也太紧了,自己就像井中的小鱼,没有半点自由!想着想着,他随口吟道: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围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少年毛泽东轻易“过了关”。虽说毛宇居当时不解气,但却不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得不承认堂弟是个奇才。这敏捷的才思和深刻的讽喻,给毛宇居留下了终生不忘的印象。五六十年以后,他还常向前来韶山参观的人们谈起此事,称赞毛泽东的才华和反抗精神。

从学于毛宇居时,毛泽东已12岁。那时,《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记》、《左传》之类的儒家经典已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了,他开始偷偷地读中国古典小说。当时,私塾里将小说视为杂书、邪书,不准塾生读,少年毛泽东便将“正经书”放在上面作遮掩,偷偷地阅读,有时被毛宇居发现了,他便多点书罚毛泽东背,但他总能背出来。

1936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私塾读书时,说:“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戒,读了《岳飞传》(《精忠传》)、《水浒传》、《反唐》(《隋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他们害人。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老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我的同学大多也如此。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出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关于这类故事,我们较本村的老年人还知道得多。他们也欢喜故事,我们便交换地讲听。我想我也许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①

毛泽东从小具有造反精神,并由此而接受马列主义,走向革命道路,恐怕与读这些旧小说不无关系。1939年12月21日,在《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中,还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作为一个学生,上学、

^① 《毛泽东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7~8页。

读书,读什么样的书,一定要顺乎时代的发展潮流、社会进步的潮流,即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以及个人兴趣、爱好的需要,否则,读了白读,毫无用处。

由此可见,需要性是毛泽东学习的基本特征之一。

(二)“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我们的目的在于改造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

如果说,少年毛泽东“熟读经书”,但“不欢喜那些东西”,还是处于一种自在需要的话,那么,青年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我们的目的在于改造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则是出于自为的目的性的要求。因而,学习的目的(意识)性是毛泽东学习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崇尚自修的毛泽东对束缚学生意志的旧式学校深恶而痛绝。1915年11月9日,快22岁的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① 1915年,比毛泽东大3岁的黎锦熙,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到北京担任教科书特约编审员。黎接信后,立即回信劝毛泽东留在一师继续学习,并告诉他:主要是利用学校的各种有利条件,自己发愤读书,以自修为主,借以弥补学校之不足。这样,毛泽东继续留在一师学习。

在到一师求学之前,毛泽东曾自修过半年,那是因为他“不喜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0~31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读了《御批通鉴辑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①在自修期间,毛泽东读了许多书,他获得了许多新知识,也得到了许多新的启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开始在他的脑子里生根,民族的责任感不断地升腾。大约在此前后,他在《新民丛报》第4号《论说》部分关于国家问题处,批写道: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毛泽东在省立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他每天进馆阅览时,总是站在大地图前仔细地看,并认真考虑,严肃地思索。他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人民的疾苦,深深感到青年人改造社会的责任之艰巨。直至40年后,即1951年秋天,几个在北京学习的湖南老同学去看望他时,他还能十分清晰地回忆起当年研究世界大地图的情形——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称为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了,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①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31页。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①

世界大地图向青年毛泽东昭示了世界的巨大,也引出了他的无限遐思。19岁的他,从看世界地图联想到社会制度,联想到世界上千千万万受剥削、受压迫的人的痛苦,并决心为全中国、全世界受痛苦的人求解放而发愤学习,奋斗终生。这是多么明确的学习目的,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坚定的决心!如何通达目的,实现伟大的抱负呢?青年毛泽东继续在书山中进行着艰苦地攀登,在

^① 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载《新苗》1958年第9期。

学海里进行着卓绝地探寻。

(三)“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① 这样的学习，对一般学习者来说，或许是可望而不可及，难以成行，但对毛泽东来说，却是可行（可以实践）的。因为，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就熟读经书，从古人的著述中得知：人心有三大要素：知、情、意。学问知识乃心性修养、自我完善的一大要件。孔子曾提出“学、思、行”、“修德三法”，孔子的学生子夏则主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论语·子张》）。孔子还指出不为学有“愚、荡、贼、狡、乱、狂”六大弊害。

青年毛泽东对学识的推崇不亚于先师。他认为，知识对人心的运动有重大影响：“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亦半，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② 若运动身外之物，就更少不得知识学问。要成事，特别是成大事，就必须“拿得定，见得透”。“惟明而后可断，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为了探得“天下应以何道而动之”的“外观之识”，毛泽东向自己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然而，“谨言慎行即是学”；“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③

不过，对于学什么、怎样学、如何行，毛泽东却自有一番不同于先哲的看法。他认为，人的才、学、识不单来自书本，“才有从学问一方得者，有从阅历一方得者”。“闭门求学，其学无用”。应该“从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587 页。

② 同上，第 227 页。

③ 同上，第 588、581、586、587 页。

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字尚已”。从这里不难看出，毛泽东为什么提出“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问题？同时，也不难看出，他强调“使用也是学习”，“实践出真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等主张的深刻内涵！

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除了投身于改造社会的实践，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汗漫九垓，遍游四字”，即进行“游学”。

毛泽东非常欣赏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做法。他在《讲堂录》中说：“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渤)之海，启瞬江湖失；(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①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指出：北宋大改革家王安石托古改制，“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但他的变法为什么最终不能逃脱失败的命运？毛泽东认为，王安石“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② 毛泽东认识到学校与社会相隔相疑，“犹鸿沟之分东西”这种现实社会存在的弊端后，他决心走向社会这所永久的大学校，了解社会，读懂社会。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常与同学出游。据罗章龙回忆：每次出发前，毛泽东都要和大家讨论游学的目的，首先是求书本以外的知识，到社会大学读书；其次是做社会调查，了解农村各种情况；还可以访朋友，发现有志青年。对青年毛泽东来说，“汗漫九垓，遍游四字”是养心养气、丰富才学的好方式。

当时，青年毛泽东游遍了湖南的名胜古迹，如远古时代大禹拖过船的禹王碑，南宋词人辛弃疾练过兵的飞虎营，太平天国名将萧朝贵打过仗的妙高峰，岳麓山上杜甫流浪过的崇德寺，祝融峰下韩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第2版，第587页。

② 同上，第22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愈题过诗的南岳庙,还有贾谊祠、屈原故居、王夫之家乡等等。

1917年一个教员给毛泽东看旧《民报》,他十分高兴地读它。后来,毛泽东对斯诺说:“一天读《民报》,看到一篇记述两个中国学生漫游中国的文章,并说他们已达(西藏边的)打箭炉。这使我大为感动。我要学他们的榜样,不过没有钱,我想还是先游历湖南。”^①,又说,“次年夏,我开始以步行游湘省,走了五个县城。有一个同学叫萧瑜,陪伴着我。我们一文不名地走了这五个县,乡下人给我们吃饭和睡觉的地方。不论我们到达什么地方,总是受到欢迎和善遇”。^②他们跋山涉水,走村串户,结识各色人等,体察风土人情,了解历史掌故,真把社会当作一部大书来读。他们在密印寺与老方丈讨论佛经,在安化县与夏默庵交换诗文,在梅城游览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还到东华山观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

从青年时代的山川游趣,到井冈山时期的绿林游击;从万里长征到转战陕北;从“白浪滔天”的北戴河到“万里长江横渡”,毛泽东一生离不开一个“游”字。他那双穿着草鞋、布鞋,踏遍祖国名山大川的大脚,沉重地敲击着中华民族的自然、历史和文化。“他游历的所有的地方,最终都成为历史的坐标,构成一条布满弹洞和惊叹号的鲜红鲜红的路线,从韶山那座不太起眼的农舍伸向北京城红墙里的菊香书屋。”^③可见,实践性是毛泽东学习活动最显著和最重要的特征。

① 《毛泽东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7页。

② 同上。

③ 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转引自萧诗美:《毛泽东谋略》,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页。

第三章

学习的功能与作用

学习活动的功能与作用,是由学习的本质及其特征决定的。

学习活动的功能是开发学习者的智力。这是独一无二的功能。人,通过学习变得更加睿智、更加聪明,从而提高人的文明程度,由自在的人变为自为的人,充分显示人的自主性、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学习活动的作用是:通过学习提高学习者的智力水平和文明程度,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人的全面发展而实现人的自我完善,推动人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现在,我们来探讨和研究毛泽东关于学习的功能与作用的思想 and 实践。

一 学习的功能

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对学习的功能的理解就比较深刻而科学。这与其少年受老师“读书所以明理,明理所以适用”的教育不无关系。他在湖南省第一中学求学时的经学教师胡汝霖曾指出:“书,作为一种知识的传载体,只要能给你某种启示,能引起你的感情共鸣,能开发心智,这便是好的。”^①毛泽东一生牢记老师的教诲。

(一)“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与帮助”

1950年9月下旬,周世钊(毛在一师求学时的同学——笔者注)应毛泽东邀请去北京之前,第一师范同学杨韶华将20年代初在长沙清水塘借阅的一本《伦理学原理》,托他归还毛泽东。杨在扉页上写了一段话,说:“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世钊)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1950年9月15日杨韶华识。”据周世钊回忆,当他将此书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接过《伦理学原

^① 《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1年8月版,第226页。

理》，对周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①

青年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之前，其思想沉淀来自传统文化，主要是孔孟儒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还有主张平等、博爱的佛学。《盛世危言》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近代思潮的书。此后，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他的思想历程几乎是自改良派以来近代中国社会思想演变的浓缩。这一思想历程，由于现实条件的局限，是在交叉和相互作用中完成的。当他在早期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冯桂芬的著作中乐而忘返的同时，又沉浸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中；当他在崇拜康梁时，他也开始赞成孙中山的政治主张。这在他于1912年在湖南省第一高中上学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政见中可见一斑。他在公开张贴在学校门口墙壁上的文章——《打倒清王朝》中，大胆地发表了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亮出了个人的政治观点，这就是：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出任大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他曾在辛亥革命浪潮冲击下，投笔从戎，在起义的湖南新军中服役半年。后又弃学自修，在定王台下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触了西方思想。当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时期思想家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掀起思想解放的运动时，毛泽东与那个时代的每一个热血青年一样，马上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和拥护者。

到一师毕业前，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虽还没有系统性，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已具有一定的特色。这从他对《伦理学原理》一书的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第2版，第276页。

批注中可以看到。

《伦理学原理》为一师本科四年级的修身课教程。在这本《伦理学原理》上面,留下了毛泽东早期主张个性解放、注重实践的充满辩证思维的思想,其读书生活及方法也可从中窥知一斑。

《伦理学原理》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其哲学观点是心物即精神与物质二元论,伦理思想的特点是调和直觉与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与欲望。杨昌济在一师教授伦理学,采用的课本便是这本《伦理学原理》。当时,多数学生对哲学不感兴趣,听课很不专注。惟有毛泽东等少数学生,用心听讲,勤作笔记。他极爱读这本书,曾根据其中一些论点加以批判和发挥,写过一篇《心之力》的文章,被杨先生大加赞赏,打了100分。杨昌济用这本书作教材,只讲了该书的一部分。全书共约10万字。毛泽东仔细通读,在上面一共写了12100余字的批注。全书还逐句用墨笔加以圈、点,画上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注用工整的行楷写在天地空头处及行间,小者如七号铅字,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楚。批注的内容,绝大部分是青年毛泽东抒发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的批判与引申;小部分是对原著的简要赞同和章段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观点的地方,不论唯物或唯心,必浓圈密点,眉批则往往有“切论”、“此语甚精”、“此语甚切”、“此语与吾大合”等语。对原著的否定与怀疑之处很多,常见这类批注有“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此处又使余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圆满”,等等。其中许多地方联系到中国的历史,墨子、孔子、孟子、宋明理学、王船山、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诸多思想家,以及五四运动前夜的国事及思潮。总之,处处充满着追求真理、真知和改造国家、社会,重塑人心道德的精神。

毛泽东读这本书是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当时,他还不曾接触马克思主义,所以他的有些批注,现在来看“也不

那么正确”。他那时的思想,还没有脱离唯心主义的范畴。因此,他很注重从改造人心入手寻求救国之道,习惯于用抽象思辨的方法来思考问题。但他那时的思想毕竟处于新时代来临前夕的转型期。因此,正像他后来说的那样:“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伦理学原理》心物二元论的调和基调,恰恰吻合了毛泽东那个时期的思想特征。这就是他当时如此下功夫阅读这本书的思想基础。

建国后,毛泽东曾对人说:“我当时喜欢这本书,有什么意见和感想就随时写在书上,现在看来,这些话有好些不正确了。”

毛泽东指出:“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曰现实主义。”这无疑受了泡尔生思想的启迪产生出的观点。主张个性解放,重视个人的地位和价值,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对个性的压抑和对个人的摧残,是五四时期思想家的一个共同特色,也是人类进入近代社会的一种共同的思想潮流。

毛泽东认为“崇尚个性,泡尔生之主张也”。他认为,“个人”在宇宙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位置,“吾人苟放大眼光,而曰人类一大我也,而曰生类一大我也,而曰宇宙一大我也,亦何必讳言自利哉?亦何自利之非佳哉”?正因为“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既然“个人”有这么重要的地位,“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也”。^①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和陆九渊“吾心即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的主观唯心主义及近代注重“个体”的思潮对他的影响。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第 2 版,第 141~142、231、153 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如果说,这种将“个人”的地位和价值无限扩展是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话,那么,青年毛泽东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闪烁着个性解放的光辉。他说:“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神以外尚有所谓神乎?”^①更为重要的是,他从注重“个人”的地位和价值出发,发出了“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②

这种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及资本对人性的束缚的思想,无疑富有当时时代的特征。

与此相应,青年毛泽东还主张尊重和充分发挥个人的价值,肯定人为自己谋利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高扬“个性发达”的思想,即使在上个世纪50年代大搞“一大二公”的时候,他也曾说过:“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③

主张个性解放,重视人的地位和价值,并以此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性的束缚和禁锢,无疑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因而也是进步的。但是将“个人”提高到本位的地位,显然是唯心主义。也不可否认,在提倡“个人主义”时,其思想观中蕴含着一些极端的成分,诸如“吾人不能跳出自我以外之世界”,“吾人有时兼利他之手段,仍以达到自利之目的”等观点^④。这是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典型的资产阶级“合理利己主义”的翻版。如果说,主张个性解放,注重人的地位和价值,是“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的话,那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第2版,第230页。

② 同上,第151~152页。

③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603页。

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第2版,第240页。

么,他从《伦理学原理》得到的另一启发,从而形成自己的另一主张,注重实践,主张“现实主义”,表明了青年毛泽东的学习思想的鲜明特色。他在批注中说:“一曰现实主义。以时间论,只见过去、未来,本不见有现在。实现非此之谓,乃指吾之一生所团结之精神、物质在宇宙中之经历,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① 尽管他所主张的现实主义仍受他所主张的个人主义的影响,如他所说“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②,但仍掩盖不了这一主张在青年毛泽东思想历程中的重要作用。正因为他主张现实主义,注重社会实践活动,他才能在不断的认识社会的过程中扬弃自己思想中不合理的因素。也只有坚持现实主义,才使他积极投身到改造社会的实践中去,在不断的实践中,找到了单独的个性解放与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之间、单独的个人自由和解放与广大的人民群众之间自由和解放的结合点。从青年毛泽东主张现实主义、注重实践中,我们不仅看出他的学习思想与实践的本质,也可以看出他与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中的陈独秀等人的学习思想和实践有本质的区别,也可以看出他与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中的胡适、蔡元培们的学习思想和实践也有根本不同,那是一条颇具特色的现实的学习思想与实践结合之路。正是因为他坚持了现实主义,注重了社会实践,毛泽东才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开创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当然,历史地看,事物的发展总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即对立统一的过程,任何人都不会在青年时期一下子形成正确的、科学的学习思想,青年毛泽东也是如此。当时毛泽东所主张的现实主义还没有蕴含如此丰富的内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第 2 版,第 203~204 页。

② 同上。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涵,正如他自己在批注中所说的:“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即以发达吾人心身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这时,他对自己规定的一切实践的内容,其实是具有自强不息的儒者的“内圣”之规范,但其潜在的功能是极大的。这种功能就是开启人的智力闸门。

(二)“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在母亲的影响下,毛泽东小时候曾经迷信神佛。他在《自述》中说:“我父亲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可是我母亲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向自己的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曾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9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当时和以后,我们试用过很多办法让他信佛,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咒骂我们,我们被他的攻击所压倒,只好退让,另想新的办法。但他总是不愿信神。”^① 据传,为了给病愈后的母亲还愿,毛泽东还专程到南岳衡山去朝拜进香。同当地农民一样,他也为皇帝祝寿,还经常在家祭天地,祭祖宗,依时依节,从不间断。1959年他重返韶山时,曾指着堂屋里摆过神龛的地方,风趣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我小的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指出:“毛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也曾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过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敢于承认旧的过去。”^② 周恩来在这里所说的“觉悟”和“承认旧的过去”,就是通过学习,特别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启迪了智慧和开发了智力。这就是学习的功能。

①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19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34页。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①从毛泽东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没有正确和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必然导致错误的认识。认识的错误，是愚蠢的一种表现形态。而治愈这种愚蠢，惟一的和科学的方法，那就是努力学习先进的文化科学知识，以及参加社会实践，进行调查研究，从而得出合乎实际的正确的结论。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尤其是神权，是一切愚蠢思想和行为的最大根源。毛泽东在湖南乡里从事农民运动的时候，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他用地道的韶山方言，说：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9～40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么？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发现，党内的诸种错误思想和愚蠢行为，例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都是由不懂马克思主义，不学习马克思主义，文化水平低所致。又经过十几年的革命斗争实践，毛泽东总结了党和军队的文化工作，得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①

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说：

“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同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即愚昧、落后的习惯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11页。

作斗争,当时,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办了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逐步办起了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有了新式学校,而且还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有了话剧,例如:《兄妹开荒》、《小放牛》和《白毛女》等,而且有了秦腔和秧歌剧。不但有了新秦腔、新秧歌,而且利用了旧戏班,利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予以了改造。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联合一切可以团结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同时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

毛泽东在讲演中,最后说:“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①这段话,毛泽东是从正面讲文化教育的功能,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则是一种学习的功能。因为,只有学习,群众才会觉悟,只有学习,才能下决心,只有学习,才能自觉实行改革,只有学习,才能打倒头脑中的敌人,最终根除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

学习的巨大功能是开发人的智力,而人的智力是一种心理特征,它是指人认识、理解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经验等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记忆、观察、想像、思考、辨析、判断、发明和创造等等。人们都夸毛泽东从小“天资聪颖”、“智力超人”。大凡看过电影或电视剧《四渡赤水》、《长征》、《巍巍昆仑》和《大决战》的人,无不认为毛泽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之神”。毛泽东运用灵活机动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12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战略战术,足智、多谋、善断,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总是在那里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终使红军、八路军或解放军取得了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胜利,这简直是整个人类军事史上的千古绝唱。此时此刻,观众对毛泽东智力过人、智慧超群的崇敬心情能不油然而生?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中智力过人,智谋超群,并不是吃了什么神奇的“智慧果”,而是不断学习、经常学习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与他从幼年起,勤奋好学、酷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是分不开的。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说,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从古代的到近、现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历史、军事、文学、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就哲学来说,他不但读基本原理,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还读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等。毛泽东知识渊博,但他又总觉得自己知识不够用。他碰到不懂的东西从不放过,不是读一些有关的通俗的小册子,就是请教专家,或者查阅工具书。在读书学习上,毛泽东无止境地追求着,一步一步地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他说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的。

为了战胜有形或无形的敌人,为了同愚昧、无知、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

(三)“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

究新问题。”^① 读着毛泽东这句话,使人想起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意思是说,河水的水是流动的,你这次踏进河,水流走了,你下次再踏进时,又流来了新的水。河水川流不息,所以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赫拉克立特说的是自然现象,毛泽东说的是社会现象,虽然两者有所区别,但作为物质世界来说,其变化、发展的道理是一样的,那就是“万物皆动”、“万物皆流”。

毛泽东的这段话和赫拉克利特的这个名言,都说明了客观事物是永恒地运动着、变化着的这样一个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赫拉克利特“这个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② 赫拉克利特还说:“在我们身上,生和死,醒和睡,少和老,都是同一的东西。后者变化了,就成为前者,前者再变化,又成为后者。”“冷变热,热变冷,湿变干,干变湿。”他还断言:“我们走下而又没有走下同一条河流。我们存在而又不存在。”类似的话,毛泽东也说过:“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个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③ 两者所不同的是,赫拉克利的著名论点,从自发的辩证法出发猜测到了任何事物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毛泽东的观点已是发展成熟了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毛泽东的辩证思维方式,早在青年时期的《〈伦理学原理〉批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303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注》中就突出地反映出来了。青年毛泽东的辩证思维方式来源于传统的老庄哲学和宋明理学,来源于谭嗣同的《仁学》及李大钊等五四时期思想家们的辩证思维方式,同时受到尚动、尚变进化论思想影响,更主要的是他思考人生、观察社会的结果。他首先认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任何事物都由矛盾、差异和比较而依存。他说:

“道德之本质,本一人因其适用之方面,而有公私、大小乃至善恶之分。不仅道德为然,凡宇宙一切之差别,皆不过其发显之方面不同,与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有异而已,其本质只一个形状也,如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之类皆是。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①

他进而指出:“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秒即清,男即女,厚即簿。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② 他将辩证的思维方式用于解剖自己时,说:“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③ 用于分析社会历史时则理智地指出,“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 有之,其惟仙境”。“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第 2 版,第 244~245 页。

② 同上,第 269 页。

③ 同上,第 270 页。

然。”^① 运用到自然现象时,指出:“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② 并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他还以此分析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动机与效果、是与非、善与恶之间的关系,得出切近的结论。尤其当他分析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时,终于跳出了唯心主义的圈子,得出“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的正确结论。当在论及英雄豪杰时,他起先认为,“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之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③ 但当他以辩证思维分析这一问题时,又回到唯物论:“由一人而论,从幼少之时,即童而习之,似为构成于先天者。从历史观之,则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直觉也。”^④ 进而批判圣人生而知之、不虑而中、不思而得的儒家的先知先觉论,进而他还在批注中反映出“人人皆可为尧舜”的民本思想。他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还明确指出:“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注重人民群众的作用,这是毛泽东不同于当时许多思想家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里可以看出,辩证思维对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在分析问题和观察人生、社会的学习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许多极端的观点都在辩证的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克服了,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与他的现实主义主张及注重实践相结合,其实已昭示了毛泽东以后学习思想和实践历程的必然性。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天体运行不已,社会不断变化、发展,沧海变桑田,大地换人间。万物变动不居,人的思想岂能常驻不变? 人的智力和智慧岂能常驻不变? 一个人,自哇哇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第2版,第184,200~201页。

② 同上,第180~181页。

③ 同上,第218页。

④ 同上,第221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坠地起,由稚气天真的童年到血气方刚的少年,再由风华正茂的青年到年富力强的壮年,最后进到老态龙钟的晚年,而结束自己的一生。这生命的旅程上,无论在生理上、心理上还是思想上、智力上、智慧上都在不断地变化。为适应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我们不仅对一个人的看法要有变化发展的观点,而且观察任何事物,处理一切工作,从思想方法到工作方法都应体现这种观点。乃至指导我们行动的理论、方针、政策,有一些也不能不依据实际情况作相应的变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如果我们仍按“老皇历”办事,用旧眼光看新事物,就会使自己的思想、智力和智慧陷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就有掉队的危险。而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要不断地学习,学会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

二 学习的作用

学习的作用是被学习的功能所规定的了。既然学习可以开发人的智力,使人在生活中真正获得力量之源泉,摘取“智慧之果”,那么,通过学习,就一定能够提高人的智力水平和文明程度,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人(类)掌握外部世界的手段,提高人的素质,壮大人的力量,实现人的自身完善,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起,就极为重视学习的作用,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学习生涯中积累、形成了极为丰富的关于学习的作用的思想。现仅就其中的三个观点予以探讨和研究。

(一)“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是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教育的客体是学生,即学习者,从学习者的视角来看,学习是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是学习活动的基本作用。

毛泽东在1916年12月9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①他把古与今,三达德与三育联系了起来。1917年4月又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德、智、体三育全面发展的思想。“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以此耳”。“道德亦诚可贵矣,所以立群道平人己者此耳”。“体者,载知识之车寓道之舍也”。为了实现三育并重,他认为通过学习可以获取知识与技能,养成发达的智力;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可以“训练”学生之道德,养成优良的品性;通过体育卫生等活动,可以“养护”学生之身体,增强其体质。根据年龄长幼和文化程度高低之不同,进行教育应掌握重点。“儿童及年入小学,小学之时,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宜以养护为主,而以教授训练为辅”。“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②这里的文字表述是“教育”,实际上是毛泽东个人的学习原则。他在以上引言之后,说:“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于吾人研究之中,宜视为重要之部。‘学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早在1934年1月,当时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的毛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第2版,第59页。

② 同上,第67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泽东,就代表党和政府为红色根据地的人民和青少年的学习作了明确的规划: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结合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① 这里,字里行间闪耀着学习使人德、智、体、劳全面发展的光辉思想。

建国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变化,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为了确保年青一代健康成长,毛泽东于1953年6月30日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谈话时,指出: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做到“身体好、工作好、学习好”。这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半个世纪以来,在各级各类学校中,“身体好、工作好、学习好”简称“三好”评比活动持久不衰,成为学生们全面发展的行为规范。

因为,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们身上。中国的前途是属于青年们的。为此,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报告时,强调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教育目标,也是学生学习发展的目标,简称“德、智、体、劳”全面发展。近50年来,在党和学校的培养与教育下,一代又一代青年学生自觉地按照毛泽东提出来的“学习目标”,严格要求自己,精心塑造自己,沿着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道路奋勇前进,成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战线上的有用人才。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情况大致是:

关于德育。杨昌济在一师任教时,以讲授伦理学为主课。毛泽东在杨昌济的思想熏陶下,也十分重视通过德育以达到改造伦

^①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5页。

理思想、变化民质的目的。他说：“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① 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指出，改造哲学和伦理学是变换全国思想的关键。他曾将杨老师翻译的《西洋伦理史》书稿，工工整整地抄了七大本，对杨老师所讲授的《伦理学原理》更是精心研读，作了将近一万二千字的《批注》。前一节已谈到，在此就不赘述了。

当然，青年毛泽东除了专心攻读《伦理学原理》之外，还广泛涉猎有关德育的书籍，例如：中国儒家的经典、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和五四前夜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们的文章，以及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代表作，等等。这些著作对于形成毛泽东早期的进化论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毛泽东的德育观和政治思想并没有固守于哪一种思想或思潮，而是合着时代的脉搏和社会进步、发展的潮流不断地吐故纳新，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也就是说，青年毛泽东学习德育的基本倾向，就是要针对旧思想和旧道德，发动一场思想和道德领域的革命，以“实现自我”、“精神之个人主义”等资产的个性解放来否定封建的“三纲五常”，努力把人们从传统的道德观念中解放出来，而后再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奔跑，这恰恰反映了五四前后的时代要求。

关于智育。毛泽东认为，青年是“修学储能”的时代，要认真读书，力求“积文成学”。而成学又有道，“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②

那么，如何做到由普通而进入专门，由博而返约呢？青年毛泽东强调：“积之之道，在有条理。”^③ 他还指出：“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 3 月第 2 版，第 86 页。

② 同上，第 7 页。

③ 同上，第 82 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于一科之中,复剖分为界、为门、为纲、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今而有志于学,不遵斯道焉,固未可以剿(蕲)其精矣。”^①

在智育的各门课程中,青年毛泽东特别重视国学和历史、地理。论及读书内容,袁仲谦先生指出,毛泽东读书虽多,但内容庞杂,良莠并蓄,不利于消化、吸收。他列举国学(经、史、子、集)中的“集”为例,说明中国古代诗文浩繁,难以尽阅。他说:“集”源远流长,从《文选》算起也有 1300 多年的历史。在这一漫长的时期内,历代都编纂了不少的“集”,有务求全备的“集”,有采摘精华的“集”,真是数不胜数。在这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读书人往往无从入手,不得要领。怎么办?在 1915 年 9 月 6 日给萧子升的信中,毛泽东极力推荐斯宾塞《群学肄言》中的《缮性篇》,认为此篇深得“为学之道”,“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②他在同一封信中发挥黎锦熙先生治学要旨,在阐述专通之先后、诸科之研法及《群学肄言·缮性篇》的要点(“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以后,着重提出“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以郑重之意云尔。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③又说:“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82~83 页。

② 同上,第 23 页。

③ 同上,第 24 页。

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①在这里,他把曾文正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奉为国学津梁。

在谈到历史、地理时,他说:“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②在一师求学时,毛泽东从罗元鲲先生处借到一部“二十四史”,计划用两个学期的课余时间读完。为了按期归还借阅的书籍,他不得不通宵达旦地不停地读书,连数九寒天也不例外。毛泽东对这套内容浩繁的“二十四史”一直情有独钟。据悉,直到建国后,这部书仍被毛泽东列为最喜欢阅读的书目之一。在中南海故居的藏书里,就有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这部史书,他生前反复看过多遍,许多册的封面和边角都磨破了,作了许多批注、圈点和勾画。他在读《新唐书》中的《姚崇传》时,看到姚崇向皇帝阐述关于怎样治国的一番话,非常赞赏,提笔批注:“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其中一些内容,对我们今天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书中不少地方,毛泽东还写下关于战略战术的许多批语。他不仅自己读,还将书中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文章推荐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如《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等名篇,就是由于他的评价和推荐而广为传播。文中关于“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等警句,曾为党内同志引为箴规之言。

“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4页。

② 同上,第22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①

毛泽东对于国学、历史、地理及报章杂志特别重视，主要是为了谙悉中国国情。他在这方面所作的艰苦努力，对他后来思想和事业的发展确有深远影响。

关于体育。青年毛泽东不仅是体育运动的爱好者，而且他还总结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以“二十八画生”署名，于1917年4月在《新青年》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国力恭（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②他对国家和学校不重视体育、人民体质孱弱，深怀隐忧。当时的许多学校课程设置繁多，学生负担过重，而又不注意体育锻炼，以至于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是“倭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痊”。^③这样的文弱书生，即令像“故有颜子而短命，有贾生而早夭，王勃、卢照邻，或幼伤，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也，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之而隳矣”。^④他所极力称颂的是尚武的先贤：“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⑤此外，他还引据儒、佛、基督、伊斯兰诸教主作为典范：“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释迦往来传道，死年亦高；邪苏（耶稣）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穆罕默德），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2～23页。

② 同上，第65页。

③ 同上，第68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也。”^①他号召大家学习这些圣哲们的榜样,确认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

在一师时,毛泽东参加锻炼的体育项目很多,主要有远足、爬山、冷水浴及雨浴、日光浴、风浴、露宿、游泳、六段操运动,等等。从“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到“万里长江横渡”,坚持游泳长达70多年而不辍。他年轻时还充满激情地写道:“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总之,毛泽东一贯主张并坚持“三育并举”、“身心并完”,正因如此,天“降大任于是人”时,才显示出他那战略家的精深、哲学家的睿智和伟大学者的才情。

(二)“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得到自由”

尽管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不喜欢自然科学,数理化的考试成绩往往只够个“及格”,甚至落在了全班的最后,他在老师的心目中成了一个有争议的学生,但并不等于他对自然科学的巨大作用没有正确的认识。这从他一位被称为“假洋鬼子”的萧老师的谈话中可以得到一些证明。

“假洋鬼子”是从东洋留学回国的青年教师,他对当时日本的富强的原因是有所认识的。他说:“日本明治天皇执政以来,非常认真地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从事经济建设,使国家日益强盛起来。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他们造枪炮,修海船,提高了这个岛上小国的军事实力。正是仗着坚船利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0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炮,它才打败了中、俄两个大国。眼下,不要说中、俄奈何它不得,就是一些西洋国家也被它赶上和超过了。可是我们中国人至今还在做梦,一边在挨打、割地赔款,另一边还要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自居,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甚至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看成是‘奇技淫巧’,予以一概排斥。那个前年驾崩的‘老佛爷’,把火车都看成妖怪,要推到大海里去,岂不可笑之极!”

听了“假洋鬼子”这番话,毛泽东深深地点了点头。他心中铭记老师这番话。不过他对数理化仍不感兴趣。因为,从十六七岁开始,他已初步树立起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志向,并为自己取了“子任”的别名,深感要唤醒民众,改造社会,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必须学好社会科学知识,而自然科学知识只是教人以谋生的技能,则不必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去钻研,因此,学校开设的数理化等“格致”课,他只学了一点皮毛。

后来,毛泽东遇到了一位教数学的老师——王立庵。他在同王老师谈话时,王老师说:“润之!你想过没有,现在已进入20世纪了,这是科学的时代,是蒸汽机和来复枪的时代。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不懂自然科学,也是不行呀!听说你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你看,他们研究的是社会改革,可是又非常精通生物的进化……”这次谈话,对毛泽东一生的意义非常之大。他立即请王老师为自己补上数学课。

这次补课,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以致终生念念不忘。虽然,这以后由于他的经历、他的环境和他所承担的使命使然,他终没有很系统地学过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但观其一生,作为一个求知者,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毛泽东对涉猎自然科学是颇为注意的。对某些问题,他表现了浓烈的兴趣,在有的方面还发表过一些深刻的见解,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譬如,在1921年“新民学会”成员举行的新年大会上,毛泽东就曾订下过“三十岁以内设法补足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

基础科学的知识”的自学计划；1940年2月5日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时，说：“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

“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①

1941年1月31日，给远在莫斯科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毛泽东特别叮嘱：“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②

1963年，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一文在我国翻译发表，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赞赏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不可分的观点，并引申到宇宙的无限：宇宙从大的方面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也是无限的。

1964年，他在多年来对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进行精深钻研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69～270页。

② 见《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23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为中国和世界物理学领域探索基本粒子的深层次结构,“找到了开门的钥匙”。鉴于这一杰出贡献,1977年,毛泽东辞世已近一年之际,在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格拉肖提议,会议决定“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层次的统一”。虽然这个建议并不是对粒子命名的具体建议,但它充分表示了一个“世界级”科学家,对一个政治家的深刻见解及其对自然科学的巨大贡献,所表示的崇高敬意。

“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这是毛泽东终生不变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然后才是一个哲学家和伟大学者。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他就为探寻革命道路而研究哲学。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潮流的推动下,他开始从思辨的领域转而面向实际。在实现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中,他终于用革命的辩证法突破了“宇宙真理”的唯心主义体系,也清除了相对主义的思想杂质。在此以后,又紧密结合中国的革命实践,把他长期积累和自发地形成的辩证法思想同从西方学来的马克思主义融为一体,写成了《矛盾论》以及一系列军事辩证法著作。同时,他还写成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文学、伦理等社会科学著作。这是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和人民改造中国社会,进行社会革命的有力武装。

(三)“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识之指导而活动者也”

这是毛泽东在阅读《伦理学原理》第五章 义务及良心》时写下的批注。

在这里,泡尔生只是肯定了良心对人生的作用,并没有谈及知识对人生的作用。因此,毛泽东批曰:“泡尔生此说诚哉其然。然

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则非,知识固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亦半,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① 毛泽东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学习可以提高人的素质,使人成为有智慧、有力量的人,这是人们常识范围内的事情,自不必多说。我们看一看毛泽东学生时代获取新知识,从而促使其思想和行为发生变化,就窥一斑而知全豹了。

毛泽东在私塾里度过了6年的时光。6年中,他所读的书多为儒家书,知识陈旧,令人不思进取。这对于一个具有强烈的反抗、叛逆性格的人来说,虽这些经典也使他获益颇丰,但他并不喜欢。当他一旦离开私塾之后,虽然渴望读书,但又不愿再回到陈旧的私塾。

从1907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辍学在家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同时坚持自学,借阅了包括《盛世危言》在内的许多书。

《盛世危言》是当时毛泽东最爱读的一本书,此书由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积30年精力写成。作者在书中指出,中国的富强之道在于开矿山,筑铁路,繁商业,办报馆,办教育,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他在“自序”中写道:“治乱之源,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力;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薄税敛,使物尽其流……育才于学校,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戊戌变法的失败早已宣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不可行性。但书中洋溢的爱国主义激情和改造中国社会的设想,令处于偏僻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感动不已。《盛世危言》大大地拓宽了他的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27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视野,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读了冯桂芬的《校庐抗议》。该书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并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清初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顾炎武的《日知录》,也令他十分激动。在读了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书后,毛泽东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他在《自述》中回忆说:“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①

这些爱国主义书籍激起了毛泽东复学欲望。他觉得只有在学更多知识后,才能真正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他又读了一年私塾后,便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

在东山,他看过的书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全传》、《隋唐演义》、《封神演义》……这些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历史小说和神话故事,他都爱不释手。一天,他向老师李漱清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李先生,我看了这些小说和故事书,所有的人物为什么都是文官、武将、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呢?”李老师一时回答不上来。其实,毛泽东早有主见,他继续说道:“对这个问题,我以往搞不清楚,现在开始明白了。我发现,书中颂扬的这些文官、武将和书生们,他们是百姓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自然有佃户交租子养活他们。而那些写书的人,也多半是出身高贵人家,他们没有种过田,没有受过人生艰苦,他们怎么会去写种田的人的书呢?”这一发现在少年毛泽东的心里涌起了巨大的波澜,成为他为广大劳动群众的解放和幸福

^①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22页。

而奋斗的最初的朴素的思想基础。

在东山,他从萧三那里借阅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该书记述了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华盛顿、叶卡捷琳娜等世界名人事迹。毛泽东读得非常认真,许多处都用笔圈点过。当他还书时,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战争之后,才取得胜利,建立了美国,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①。

就读东山小学是毛泽东早年的一大转折,不仅使他长了知识,并且使他在与闭塞的韶山冲的对比中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正是在这些新知识之指导和对其向往的驱使下,他才一步一步投身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洪流中去。

^①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 1 月版,第 25~26 页。

第四章

学习主体的自我认识、修养与锻炼

这里的“学习主体”，是指从事学习活动的毛泽东。他是我们这本书研究的惟一的学习主体。

学习活动中，主体的自我认识、自我修养和自我锻炼，是能够进行学习，并能如愿以偿的学习的前提条件。有了这个“前提条件”不一定能学习和学习得好，若是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则是一定不能学，即便学，也难以学习好的。因此，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非常注意自我认识、自我修养和自我锻炼。这也是他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主观因素之一。所以，研究毛泽东的学习思想和实践，不能不研究毛泽东在学习活动中的自我认识、自我修养和自我锻炼。

一 学习主体自我认识

认识自我，这是千百年来人们追求不息的目标，这对毛泽东来

说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比一般人更具有这种自觉和清醒的意识。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自我认识。

(一)“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

为了“改造中国和世界”、“救国救民”,青年毛泽东给自己确定的首要任务是:探索“宇宙之真理”。宇宙是造化甩给人类的一个大谜。它无边无际,无始无终,令人难以捉摸。人们不知宇宙是什么,只知宇宙就是它自身,故曰之无限,故曰之永恒。“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①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每一个人,就他自己而言,在宇宙这个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时空系统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位置?或者说,“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他作为宇宙中的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尚能活在宇宙之中,活在人世上,究竟应该以什么作为他的人生支点或起点?

宇宙无限,人生有限,宇宙无始无终,人生有始有终。一个有限的人生,要想活得明明白白,活得有点意义,不枉此生,总得有那么一个由此及彼的出发点。否则,他会觉得“不知今夕是何年”,或不知吾身在何处,不知道自己为何“物”,为什么要活着。

生活在20世纪初,栖息在宇宙中的一粒大尘埃上的一个叫做韶山的角落里的一粒小小的尘埃的毛泽东,则认识到:人生“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② 这即是为自己找到了人生的两个支撑点:“贵我”、“通今”。

为了找到这两个支点,他颇费了好几年思索,还借鉴了前人,参照了西人,经历过业师杨昌济的点化。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01页。

^② 同上,第601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人生何须“贵我”？答曰：“横尽虚空，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①

由此出发，毛泽东认为：“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②

“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③“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那么，“我”以外的“神”该不该服从？毛泽东回答：“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神以外尚有所谓神乎？”^④

只服从自我，那么，把他人放在什么位置？毛泽东对这一人已关系中的难题自有独特的解决方式：利他同样以我为起点。例如：“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需完成之，如未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⑤ 他的结论是：“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⑥ 又说：“利他由我而起点，利他与我有关系也。谓毫无己意纯以利他为心不可也，世无从他而起点者也，世无绝然与我无关而我贸然利之者也。”^⑦

这种以我立说，由我出发的人生哲学，绝不可等同于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极端利己主义，也绝不等同于西方的“合理利己主义”。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持粹然之利己主义者，亦但为理论，在此多数个体杂然活动之世界中，决不能实现。”^⑧ 毛泽东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601 页。

② 同上，第 231 页。

③ 同上，第 141 页。

④ 同上，第 230 页。

⑤ 同上，第 235 页。

⑥ 同上，第 144 页。

⑦ 同上，第 141 页。

⑧ 同上，第 240 页。

由我出发,所张扬的是一种积极有为、乐观奋进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生存面世,就能做到不为外物所累,不为他人所烦。相反,可以在利他人、利天下的过程中,“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①

人生为什么需“通今”?答曰:“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通今)。”^②

从这点出发,毛泽东主张“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③

有人说,人活着建功立业是为了死后青史留名。毛泽东则不以为然。他说:我死之后成为历史,后人见我确有所成就,“亦自加吾以芳名”。然而此“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历史前之事亦然。吾取历史其足以资吾发展现实之具足生活也”。^④这是一种非常明智的人生慧见。人生活在前古后今之中,只是眼下这一段现实生活是属于自己的。“以时间论,不见过去、未来,本不见有现在。”因为现在即来即去,有如白驹过隙。但是另一方面,“时间之有去来,今人强分之耳,实则一也。”“吾意时间观念之发生,乃存在于客观界一种物理机械之转变,即地球之绕日而成昼夜是也。设但有白昼或但有长夜,即可不生时间之观念,此可证明无所谓时间。地球之绕日,但为空间之运动也”。^⑤吾人生活在这连成一片的时间之中,自然“处处皆现实”,不仅目前是现实的,而且过去和未来对我来说也是现实的。

因此,“有目前乃有终身”。以往之事追悔无益,未来之事难以预测,惟一可能的是好好把握目前。把握了目前,也就把握了过去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235 页。

② 同上,第 601~602 页。

③ 同上,第 204 页。

④ 同上,第 205 页。

⑤ 同上,第 267 页。

和未来。如果放弃目前,蹉跎岁月,必将一事无成。毛泽东注重“目前”,与那种“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以及“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它明日春或秋”的悲观主义、庸人哲学不可同日而语。他从“通今”为中心来贯穿过去和未来,所强调的只是一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无往而不乐的人生态度。以这种态度面世,则“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过去的事用不着过多地追悔,其实追悔也无多少益处,未来的事用不着多少地幻想,其实幻想也无用,只要脚踏实地抓住目前——这就足够了。

总之,毛泽东在这里的自我认识,不是一般人、一般意义上的自我认识,而是将担“大任”的人从哲学,即时空的两维角度进行的自我认识。“贵我”是毛泽东从空间角度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通今”则是他从时间角度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支点。时空是人生存在、运动的形式。没有时间,亦即没有空间;没有空间,亦即没有时间,两者统一,合而为一,就是一个“此时的我”。努力抓住“此时”,积极从“我”开始——这就是毛泽东安身立命、最初自我认识的出发点。

(二)“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从青年时期开始,毛泽东就用辩证思维的方法认识自己,对自己总是一分为二。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曾自我评价,说:“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① 他的自我评价,既非政治的,也非道德的,更非日常流俗的,而是一种哲学的。他认为,人的各种精神生活都是以各种差别相构成的,没有差别,也就不能构成人的历史生活了。他进而指出:“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270 页。

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大即小,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①事物之存在、变化和发展,没有单极的,都是对立统一的,他毛泽东也概莫能外。毛泽东始终坚持对自己“一分为二”,至逝世前夕,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

这里值得特别重视和研究的是,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中的一段话:“我是自信而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据说,当时正值“文革”初期,信中又有“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之话语,所以,在党内传达时,谁也弄不明白这两段话的意思。《毛泽东传》的作者,R·特里尔[美]说:延安时期的“毛,在外表上也显露出他的足智多谋——对另一些见过他的人来说是城府很深——正是这种足智多谋把他推至最高地位。他的行为举止也变得老练深沉,他的目光和微笑可以让人捉摸不透”。^②R·特里尔发觉,毛泽东生命中的平衡,来自一种对立面的冲突。在他身上,交替地表现出冷酷无情的一面和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者的一面。尼克松似乎不同意这种平衡说,他觉得毛泽东不像周恩来那样,毛泽东没有把他个性的各条经纬编织成一个整体,却让每条线索把他拉向不同的方向。如果毛泽东身上的猴气被某种幻想所占有,他身上的虎气就要在实现这种幻想时震撼中国乃至世界。虽说在毛泽东“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但他身上的“猴气”一旦占了上风,也不得了。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喜欢读《西游记》,尤喜欢孙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69页。

^② [美]R·特里尔著,刘新路等译:《毛泽东传》(修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193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悟空“大闹天宫”的造反精神。他在1961年11月17日写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的诗中，赞曰：“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R·特里尔在《毛泽东传》有这样一段记述：1966年7月，当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之时，他到西方的一个山洞——滴水洞里去了。

“离开北京期间，毛又重读了《西游记》。这本书的主人公是红屁股的孙猴子，它创立了许多伟大的功绩。

“孙悟空在玉帝的御花园内偷吃了长生不老的仙桃，为了在生死簿上抹掉他的名字，他敲开了地狱的大门。他一个筋斗就翻出十万八千里，到达天边的擎天柱上。有一次，他还在柱子上撒了一泡尿以示他的自由精神。

“敢于和命运挑战的孙猴王有一个应付困难的法术。他从身上拔下一撮毛（中文的“毛”字恰好是毛的姓），将毛咬啐、吐出，然后再说声“变”，每一根都变成一个小‘孙悟空’，由此就有了很多支持者。

“毛在1966年3月对政治局的一位同事说：‘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各地都有孙悟空大闹天宫。

“毛——以及北京——在年底之前就变出了这些小‘孙悟空’们。

“毛在早年总是将猴子当作反面形象来用的，例如，将其比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西斯分子。但到了五十年代末，他又把它当成了正面人物形象。美猴王孙悟空的大胆、顽皮、傲视一切和伟大的抱负正适合毛的心态。”

“虎气”和“猴气”只是一种形象说法，其实，类似《周易》中的阴阳二气，可以作多种不同的理解。事实上，在毛泽东的个性结构中，远不只包含一对矛盾，而是多种矛盾的统一体。R·特里尔说：延安时期，“按照规定，所有的人都只能留短发。但是毛却让自己

的头发任意地长,直到看上去像一位音乐家。抽烟和不按时起床被认为是违反纪律的表现,但是,毛抽起烟来就像烟囱,而且正午之前很少起床。尽管统率着军队,他敬起礼来总是心不在焉地比划一下。他走起路来拖沓的步子像一位农夫。”韩素音也有类似的描述:他既是一个通晓古今的学者,又像农民一样平易近人;他讲究卫生,却经常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十分幽默风趣,可又非常严肃认真;既坦率,又精明;既老实朴素,又决不会上当受骗;既单纯,又复杂;既细致周到,明察秋毫,可又衣着随便,不修边幅;他具有成就大业的耐性,而一但需要当机立断时,他决不坐失一分一秒。

这些相互对立的个性线索,并不像尼克松所说的那样,仅仅伸向不同的方向。它们在不同的方向上被拉向极端以后,又被毛泽东收拢来,编织成一个比周恩来更严密的整体。不过,这个整体的内涵远比一般人博大,博大到可以同时吞纳好几种不同的人格类型。就像周恩来所说:“在毛泽东的工作作风中,也可以说,在毛泽东的个性结构中,同时包含着: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动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① 这些不同的作风和个性特征很难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就在于他同时具有这些极不相同的作风和个性。缺少其中的哪一种,都不是现实中的毛泽东。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神——人——鬼”的三分结构,颇像但丁《神曲》中的“天堂——炼狱——地狱”。神在人之上,鬼在人之下,人居神和鬼之间。因此好人会变成神,坏人会变成鬼。人格高于常人的常被神化,低于常人的常被鬼化。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就分别遭受过“神”和“鬼”这两种不同的命运。在现代造神和造鬼运动结束后,一个真正的人——陈云站出来说了一句公道的话: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刘少奇是人不是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2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鬼,“四人帮”是鬼不是人。至此,毛泽东从“神坛”走了下来,有关他的所有神话算是被破除了。但是,他仍然给人们留下一个难猜的谜:他是人,但他为什么这样奇伟,能够成就一个普通人难以想像的奇勋伟业?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本书就是为揭破这个谜的“谜底”而撰写的。另外,下一节:“自我修养”,也可以帮助读者探得他成为伟人、成就伟业的人格之源。

(三)“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

一个人,能自我认识不是目的,而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一个人,通过自我认识,有了自知之明,能扬长避短,战胜自己,从而自励自强,向着既定的人生目标前进,这才是目的。因此,自知、自胜、自强是学习主体自我认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三个内在的环节。

中国人历来有自知之明的文化传统。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就曾说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①毛泽东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早在青年时代就认识到自知的重要性,他于1917年8月23日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评论五四前夕各项改革的流弊时说:“今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面言”,则是“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使然。而本身本领之不足,“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②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大本领,就要谈变革社会之事,那岂不是“蚂蚁缘槐”、“蚍蜉撼树”,可笑不自量。中共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屡屡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其可笑之处也在于缺少自知之明。

① 《老子·三十三章》。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4页。

但是,人要做到自知之明,说者容易,做者难。《贞观政要》中就记有所谓“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的古训。自知比知人更难,难就难在它不仅需要理智,而且更需要勇气:敢于以挑剔的目光面对自己的不足。这常常是与自尊心和自信心冲突的。毛泽东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他多次引用鲁迅的话:“人贵有自知之明”以自鉴。他还经常谈起明代杨椒山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有一次,他对秘书梅白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这几十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察颜观色,而是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众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尽管“虚怀”、“自知”有些两难,毛泽东还是做到了一个伟人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告诫全党和全军,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有一次,他在跟人面谈说这句话的时候,还特地在后面加上一句:“包括我自己”。对于他自己,他历来是有自知之明的。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轻易地把彭德怀的“意见书”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可是后来的事实使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未必是正确的。结果,他终于对彭德怀说出了这样的话:“也许真理在你手上”。也许是有感于此吧,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曾叹着气对卫士张仙明说:“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曾与毛泽东有一次历史性会晤,事后,尼克松回忆道:“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主席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主席说,‘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即使在林彪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大搞个人崇拜的年代,他也是清醒的。他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灵丹妙药表示不满。他在1966年给江青的信中,写道:“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

知道自己不足,还得有勇气改变自己。古人称此为“自胜”、“自制”或“自新”。这是一项更难的自我认识功夫。自知者,又能自胜,才是真正的强者。古人深明此理,并留下许多有益的格言。如:“自知者英,自胜者雄”,“胜人者先自胜”;“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这正如老子所说的:“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①毛泽东也懂得圣人之所以明智,就在于他把昏庸视作一种病,所以他才不昏庸而明智,懂得这个胜人与自胜的关系。青年时代,他经常以梁启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的口号来刻苦自励。他还提出要以“明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来不断更新自我。1937年9月17日,他写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历数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予以猛烈抨击。1942年,在“延安整风”时,他又就《反对党八股》作过演讲,历数了党八股的八条“罪状”,认为其“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1965年9月15日,他在中共八大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告诫全党:“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自胜意味着在理智的指导下,对自我的某些习惯性的东西进行有意识的克制。毛泽东在年轻时候承认自己是个“性不好束缚”的人。他从来不愿事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个性。正如他的书法一样,信笔写来,不拘俗套,洋洋洒洒,飘逸豪放,自成风格。他曾自嘲地对萧子升说:“你一个小格子里能写两个字,而我写两个字得写三个格子。”但是,在需要约束自己的时候,毛泽东的自制力同样大得惊人。他本来嗜烟如命,总是手执一缕,绵绵不绝,从

^① 《老子·七十一章》。

不听医生劝告而有所节制。可是,1945年9月在重庆谈判期间,他先后十次与蒋介石面谈,竟能做到一支烟不吸。蒋介石就此事对陈布雷大发感慨:“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据说他每天要抽一听(50支)烟,但他知道我不抽烟后竟一支不吸。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蒋介石当然也知道能自胜者必胜人的道理。苏轼曾说:“所成就者大,则必有所忍。”毛泽东的“忍劲”足以使他的敌人叹服。为了成就大业,他有时可以忍耐和等待许多年,直到最后达到目的。毛泽东知道自己从小有好动感情、好发脾气之弱点,因此,在当上领袖之后,就很注意这方面的克制。师哲在毛泽东身边先后呆了18年,据他说,他从未见到毛泽东发过大脾气。有一次,他问毛:“主席,我很佩服你的沉着、冷静、有涵养,不发大脾气。”毛说:“我不是不生气,有时几乎气炸了肺。但我知道应该尽量克制容忍,勿现于辞色。”能使快气炸了肺的怒火不溢于言表,绝非一般的忍耐涵养功夫。

自知和自胜,都是为了达到自强、强化、强大自己的生命力和意志力,以使能够扼住和支配自己的命运的咽喉,在人生的搏击中,能够独立自恃而不倚仗于人。毛泽东继承了《周易》中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这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他在《讲堂录》中写下了这样的话:“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挟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①1935年12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刚刚到达陕北不久,毛泽东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讲话,在文章最后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09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林的能力。”^① 14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像一轮鲜红的朝阳升起在世界的东方,这一切都由“气概”、“决心”和“能力”而转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二 学习主体自我修养

自我修养,修养自我,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毛泽东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这一优良传统。毛泽东知道,要成就大业,必须“修其心”“养其性”而“不为浮誉所惑”,“制其气”而“不与流俗相竞”。

毛泽东早年的人生自我修养的方法,特别是他在业师杨昌济门下研习的两门课程——修身课和伦理课,可以帮我们探得他成为伟人、成就伟业的人格之源。

(一)“即使世界止(只)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

人创造了社会,社会也创造了人。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单个人脱离社会关系的独居的事情,几乎是非常罕见的。尽管老子曾幻想一种“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境域,但这种社会至今也未出现过,将来也不可能出现。既然人生活于社会关系之中,就总免不了要尽这样或那样的义务和责任。一般人常常为此而生出诸多的烦恼;他人之事,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未免于心不忍;若管起事来,又怕抓不住狐狸,反而沾一身臊,觉得自己吃了亏,于己不利。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61页。

毛泽东痛快淋漓地解决了这一烦恼：“尽吾之性，完吾之心。”由我出发，像墨子那样“兼爱系互助，并非弃吾重大之利益而供他人之小利，乃损己利人而果有利于人也。”^① 是他在研习杨昌济先生教授的“修身课”和“伦理课”过程中确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这一人生观、价值观出发，毛泽东认为“义务”不是对他人的，而是对自己的。“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② “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即以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即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③ “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者，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④ 对他人之义务是由客体发生，是他人认为“应该如此”，所以我才如此。对自己之义务则由主体发生，是我自己认为“应该如此”，所以我才如此。如果我认为“应该如此”而我又不如如此，那就未能“尽吾之性，完吾之心”，充分发达自己身心之能力，就于我的“具足生活有缺”。

“尽吾之性，完吾之心”是一种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由此而规定的一种自利而不是利己的原则，因为这种自利主旨在于利自己的精神，而利精神在于利情、意，而非物质利益。毛泽东举了许多例子，例如：“救人危难之事，即所以慰安吾心，而充分发展吾人精神之能力也。”“济人之急，成人之美”等等，也都是因为“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⑤ 舍身救人更是如此，为“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浹，吾意始畅”。^⑥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148、252 页。

② 同上，第 235 页。

③ 同上，第 238 页。

④ 同上，第 235 页。

⑤ 同上，第 236 页。

⑥ 同上，第 147 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毛泽东认为,“互助”即为“人己两利之道”。这种“人己两利都是”是由我而发的,是我以利他而达到“遂其生活之目的”。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利他),于是我去做了。这种做,在客观上是利了他也利了我,在主观上也是利了他更利了我,因为这样做,遂了我的心愿,也实现了我的意志。所以说“互助”也是为了“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为了说明这一点,毛泽东还做了假设:“即使世界上止(只)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处非以为人也,乃以为己也。”^①从最后一句“非以为人,乃以为己也”看,似乎主、客观“乃以为己”,“非以为人”,这是因为“世界止(只)有吾一人”使然。有人将此理解为毛泽东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因为这不符合毛泽东的人格。

“尽吾之性,完吾之心”的理想生活,在历史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圣贤豪杰精神,圣贤豪杰是自我完善的典型。毛泽东认为:“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除之。此种之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②我们不能排除青年毛泽东这种认识中有“先验论”的因素,但他认为,圣贤豪杰之所以成为圣贤豪杰,从一定的意义上讲,却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和身体的能力发达到了“至伟至大”的程度。毛泽东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圣人。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毛泽东的成就,毛泽东的伟业,不似历史上的圣贤豪杰,却胜似历史上的圣贤豪杰,这是因为他的精神和身体的能力发达到了“至伟至大”的程度。而“此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148 页。

^② 同上,第 218 页。

应以为期向者也。”^① 圣贤豪杰与普通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圣贤豪杰独可为舍身救人之事，而普通人可以不为，是谓圣贤豪杰之身心能力发达最高，而普通人不必如是也。”^② 如果这样认识问题，那是不合乎道理的。这就是说，任何人，不论他本人之于天的身心能力是大是小，只要他按照“尽吾之性，完吾之心”的原则去生活，都可以成为圣贤豪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是也。

毛泽东“尽吾之性，完吾之心”的思想，到了上个世纪 30 年代末发展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和“对技术精益求精”，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思想。^③ 到了上个世纪 40 年代，又发展为“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思想。^④，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和“老愚公精神”。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尽吾之性，完吾之心”的人格榜样。只要像白求恩、张思德、老愚公那样去做，便能把内心的心性完善和外在的事业成功统一起来，把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即便是死了，也“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二)“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与流俗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

中国自古有“重义轻利”之说，尤其是儒家将“修身以寡欲为要”推向极致。孔子有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之观点。朱熹则有“货色两关不打破，其人不足道也”的说法。这种“不患贫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237 页。

^② 同上，第 237 页。

^③ 见《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659～660 页。

^④ 同上，第 1004、1101 页。

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的重义轻利,重理想轻物欲的价值观,对青年毛泽东的人生修养影响至深至远。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就具有“鹜高远而卑流俗”的气概,用一师同学的话说,他真是有“咬菜根”的精神,不讲吃,不讲穿,心里想的,口里谈的,都是怎样改造国家和社会的大事。有一次,他与同学张昆弟畅谈人生,有意无意地感慨道:“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① 衣食住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② 这就是说,虽然人生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但人生又不能仅仅以此三者为满足,而应有更高层次的追求。所以,毛泽东主张:“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③

毛泽东承认,乐利乃是人之共性,但不同的人格有不同的乐利观和追求。他在《讲堂录》中写道:“乐利者,人所共也,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即世俗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故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④ 毛泽东非常赏识“颜回之乐”,颜回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认为:“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簞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簞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不亦难乎。”^⑤ 这只是一种“自得其乐”。毛泽东更为欣赏的是那种有利于他人、有功于社会的乐。如他所说:“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乃至爱国、爱世界、爱主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63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74 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638 页。

④ 同上,第 591 页。

⑤ 同上,第 612 页。

义,“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为此吾情始浹,吾意始畅”。

毛泽东之所以在理想和物欲之间作出这样的选择,那是因为过分地追求感官享受,必然冲漠革命理想,丧失革命气节。因此,要想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举大义、成大业的人,就必须“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与流俗相竞,则所以制其力者重。”^①为此,就要能安贫乐道,以苦为乐,并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吃苦精神。吃苦耐劳乃是成就大业的先决条件。自古有“贫家出孝子,纨绔子弟少伟男”之说。用孟子的话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毛泽东将孟子的话熟记于心,践之于行。他很懂得“天将与之,必先苦之”的道理。《讲堂录》记下了许多这样的警句,如“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懒惰万恶之渊藪”、“淫为万恶之本”,“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立身行事,始须以“艰苦”二字为先。他在东山书院与省立一中上学时,同学都称他是“土包子”。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期间,从来不乱花一分钱,总共用了160块钱,其中三分之一是花在订报上,其余的钱也多是买了书籍和杂志。在长沙五年半的师范生活中,他从来没有坐过人力车,没有进过戏院,也没有下过饭馆,惟一例外的就是到长沙火宫殿买过臭豆腐吃。初入师范时,学校里发了一套青色呢制服,他一直穿到毕业。衣袖裤管磨破了,颜色褪了,他还是缝缝补补,穿了又穿。他的被褥是湖南一般农民用的蓝棉大布套被,没有枕头,则以书代枕。他惟一比较体面的衣服是一件褪了色的灰色长衫,一年四季常穿,不同的是冬季穿时,里面加些旧衣裤,夏天穿时则把它减去。因此,一些同学跟他开玩笑说:“毛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10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润之的‘算术’学得好——冬天用加法，夏天用减法。”^① 据毛泽东在一师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回忆：当时有的同学喜欢在寝室里谈论个人和家庭生活琐事，有的同学喜欢谈论男女之间的事，还有的同学在言谈中羡慕升官发财的人。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和同学订下“君子协定”，相约做到“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他所创立的新民学会和中国共产党都具有一种斯巴达克式的精神。在组织新民学会时，他特意把“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等戒条写入会章。毛泽东在《自述》中回忆说：学会的人“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认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没有时间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在这种年龄的男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姿色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不但不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② 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他议定的五条入党条件，其中有三条与勤苦有关，即“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

《淮南子》中有这样两句话：“非淡泊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淡泊”，在毛泽东的人生词汇中占有突出位置，他极力奉行，毕生未改；“宁静”，在毛泽东的人生词汇中找不到这个“词”，他拒之门外，从不收录这样的词。他一生简朴过人，令人吃惊。我们且不说他在“井冈山”、“长征”和“延安”时代的生活，因为那时即便想“怎么样”，也没有物质条件。1949年进京“建国”并坐上国家主席的交椅，总该“可以了”罢？可他不。他还是简朴过人。他身上的衣裤一直是补丁擦补丁，脚上穿的鞋比工作人员的还要旧，一双皮

① 《毛泽东成长的道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79页。

②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35页。

鞋伴他几十年。他的饭食只要有辣椒就算是美餐;当用脑过度时,他最高的奢望也不过是吃上一碗红烧肉。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挨饿,他也同样挨饿。这期间,他对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也格外严厉,不允许有丝毫特殊化。他以身作则,实行三不吃: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他的手从不摸钱,在井冈山、长征、延安时不摸钱,转战陕北不摸钱,这可能是实行供给制之故,而进城之后实行薪金制,他的手还是不摸钱。他的人生格言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艰苦朴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所经历的战争生活,例如长征,其艰苦程度毫不亚于、甚至比颜回的簞食瓢饮的陋巷生活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最优秀的诗篇恰恰产生于这样的时期。即使在进城以后,他仍然对战争年代那种马背上的生活留恋不舍。毛泽东于1957年3月19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①在国家建设时期,他反复教育党员干部,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

在毛泽东看来,穷和苦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好就好在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画最好最美的画图,可以增加有益的知识。他非常赞赏泡尔生的幸福观:“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认为这是“至真之理,至澈之言。”^②当泡尔生说“最高尚之道德,非际遇至大之艰苦,殆未有能完成者”,他批注道:“振聋发聩之言。”^③他特别欣赏司马迁的那段话,毛泽东于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党的高级干部们说:“升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0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82页。

^③ 同上,第258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就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违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在毛泽东看来,艰苦环境,逆境磨难,是造就圣贤豪杰的一所伟大的学校。一个人,要想成才,建功立业,不可不经过艰苦生活的锻炼。

(三)“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

自古以来,多少帝王将相为了根除死之烦恼,到处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可又有哪个能“万寿无疆”、“长生不老”呢?

死亡,是人生的极限。人生观的终极关注是对身后之事即死亡的态度。只要对死亡视若如常,那一切都不成问题了。因此,自我修养,归结到一点上,那就是怎样看待死亡。

毛泽东之所以伟大,就伟大在他以一种超越自我的博大胸怀来看待死亡问题。他在青年时代就认为,世界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生即死,死即生;成即毁,毁即成。人的生死,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自然变化。“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①以自然现象成毁之法则解释之,则“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②

青年毛泽东把生死成毁理解为变化之后,又进一步将生死与成毁作了区分。他认为:“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成毁问题乃空间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194 页。

② 同上。

问题。”^①而时间观念的发生,在他看来,“乃存在于客观世界一种物理机械之转变,即地球之绕日而成昼夜是也。设旦有白昼或旦有长夜,即可不生时间之观念,此可证明无所谓时间”。^②因而他得出结论:“世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③毛泽东由此引申,得出一个别开生面之世界,即“吾人试设想除去时间但有空间,觉一片浩渺无边、广博宏伟之大域,置身其中,既无现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④他认为在这种“别开生面之世界”,“身体精神两俱不灭之说”,“乃可成立。”^⑤

在此基础上,青年毛泽东对人的生死进行了一番形而上的体验。他认为死并不一定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人们不可能有真正死的经验,当他感受到死时,事实上他已经死了。怎么知道死的痛苦呢?这与马克思的看法基本一致。马克思曾对库格曼说:“死亡对死者并非不幸,只是对活着的人才是一个大不幸或不大幸。”毛泽东认为,生与死为两大界,由生界到死界是一个至渐至微的过程。老人安然寿终正寝,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其事必当如此,有何痛苦?他推测,人之所以畏死,不是畏痛苦,而是因为变化太剧烈。人由生界忽入死界,并且不知道这巨变之后的归宿即身后之事将会怎样,觉得宇宙浩茫,无所凭据,所以极易动人生之悲哀。然而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人类者生而有好奇之心,何独于此而不然?吾人不常遇各种之奇事而好之乎?死也者,亦吾有生以来一未尝经验之奇事也,何独不之好乎?无论其无痛苦,即有痛苦,此痛苦诚亦奇境,虽前途黑暗不可知,此黑暗不可知之世界,不诚又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266 页。

② 同上,第 267 页。

③ 同上,第 266 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 267 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一奇境。”^①人,由生忽而入死,这么奇特的巨变是在人生的世界中无法际遇的,能以一死而遇之,“岂不重可贵乎”?如果“人生不死,长住于此老旧之世界,无论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之生活,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即曰能之,永远经验一种之生活,有何意义乎!”^②毛泽东以诗人特有的气质正视死亡:

大风卷海,
波澜纵横,
登舟者引以为壮,
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

既然死不足畏,那么生还有什么可悲可叹的呢?因此,毛泽东主张“无往而不乐”,“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可也,即死亦可也。”^③

中国人有“红白喜事”的说法,认为生和死都是可贺之事。这种超然态度很合毛泽东的胃口,因此他称赞中国人懂得生与死的辩证法。有了这种辩证法,毛泽东从不讳言“死”字。他曾对人说,他若某年某月某日死了,那是自然辩证法的胜利。应该庆贺!到了晚年,即1972年2月21日在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他曾对尼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请柬”。他还在1966年8月给江青的信中说过:“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在他看来,人活在世上,有能力有办法改变许多事情,就是人的死亡,是任何人都不能违抗的自然规律。看到了死亡的不可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

② 同上,第195页。

③ 同上。

避免性,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泰然处之。

不过,人之死亡包括自然死亡和人为死亡两种情势。自然死亡,乃人生发展之必然趋势,人力无法抗拒,故只有泰然处之为上。人为死亡,又有两种情势,一是自杀,一是他杀,因而,两者的价值又有高下之分。人本来是以求生为目的的,不应反其意而求死。但当求生不得时,供选择的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奋斗或捣蛋而被杀死,一是因故自杀而死。在这两者之间,毛泽东蔑视捣蛋而被杀,主张与其自杀而死,不如奋斗被杀而死。因捣蛋而被杀者,都是一些历史的尘渣,其活着对人民、对社会无益而有害,理应将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无可惋惜。人生奋斗的目的,在于争取有人格的生存与生活,若争取不到,最后宁可玉碎,不求瓦全,其价值当然要比自杀大。因为,因故自杀只是对于不得而生的环境的一种消极反抗,而没有积极的奋争,这样的死,顶多只在人格保全的意义上才有相对的价值。青年毛泽东曾在《非自杀》一文中,将生死价值档次列成一个表:

有人格的得生第一。

奋斗被杀第二。

自杀第三。

屈服第四。^①

这一价值顺序既表明了青年毛泽东的生存观,也表现了他的死亡观。人都有一生,但价值各不相同。人生最有价值的是积极奋斗,最无价值的是苟且偷生。苟且偷生,贱就贱在一个“偷”字上,这样的生,不如死。同样,死也有两种价值。毛泽东在为追悼张思德而作的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33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死的意义不同……‘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为人民的利益而死，那么这样的死，对自己来说死而无憾，对他人来说，虽死犹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毛泽东于1946年7月29日为关向应烈士题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①他于1957年为刘胡兰烈士陵园重写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②1957年4月，毛泽东还写了“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死难烈士万岁！”的题词。^③还是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赞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

总之，人要壮丽地生，壮烈地死。生，要生得有意义；死，要死得有价值。无论对生还是对死，都要视若如斯，都要泰然处之。

三 学习主体自我锻炼

为了强大自己，充实自我，实现其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人生理想，毛泽东不仅注重自我认识、自我心性修养，而且从小就注意锻炼自己的体魄和意志。他的锻炼不是盲目的，是有思想理论作指导的；他的锻炼又是不拘一格、五花八门的；他崇尚“天地盖惟有动而已”。“惟有动”是他自我锻炼“哲学”的灵魂。

（一）“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

1917年4月1日，当时还是湖南一师学生的毛泽东，他以“二

① 见《解放日报》1946年7月29日。

② 见《人民日报》1957年1月12日。

③ 见《人民日报》1957年4月6日。

十八画生”之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它是毛泽东学生时代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它的历史价值不独是学术上的,还在于思想观念上的。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改造国民性是自康梁以来文人学者奔走呼号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如何改造国民性问题亦是五四运动前后思想家探索的焦点之一。鲁迅以深刻的自我解剖和对人类劣根性的剖析,让人性中一切恶的、鄙陋的、愚昧的东西生动形象地摆在人们的面前,让人们去沉思,在沉思中惊醒,惊醒之后,去寻一条思想履行的道路。胡适等人则竭力主张向西方学习。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既像又不像鲁迅那样的“剖析”,又像又不像胡适那样眼睛注视着西方,而是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救民之路。毛泽东呢?作为一个远离新文化运动中心的湖南青年学生,他却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呼吁国人对体育的重视上着手,以改变国民的体质和精神面貌。他探索问题的角度,无疑是独特而又切实的,且富有自己的特色。《体育之研究》固然是一篇研究体育运动的文章,但仅仅把它看成是一篇体育论文是远远不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写照,它与《〈伦理学原理〉批注》、《讲堂录》共同构成了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框架。从文章中,我们不仅看出毛泽东尚动、尚变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以及尚实事,不尚空谈,一切唯实求是的思想风格。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日后的人生道路——它促使毛泽东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广大人民群众解放,从每一件实事做起,由小到大,由近到远,由此及彼,持之以恒,终生奋斗,直至最终达到目的。

文章的《导言》指出:“国力恭(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①

全文的中心思想是提倡“三育并重”、“身心并完”。他认为,一个好学生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还要有强健的身体,这样才能在将来担负起改造国家和社会的重任。也就是说,只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才能担当重任。因此,他非常重视进行体格意志的锻炼,并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为其锻炼的准则。^②

建国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见他在一师的老同学时说:“你们都是干教育工作的,应该把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必须记住:有志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必须锻炼身体,使身体强健、精力充沛,才能担负艰巨复杂的工作。”他还说,我们不要像《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那样的公子哥儿和小姐,“我们今天需要的青年是有活力、有热情、有干劲的革命青年!”“我们的青少年要像树木一样的坚强,不要像花草一样的脆弱!”

为此,毛泽东于1952年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③这一题词,至今仍是我国一切体育工作和体育活动的指导方针。

总之,人有了健康的身体,就可“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也如舍”。这就奠定了人生发展的基础,为建功立业准备了本钱!

(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当年,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礼堂门口赫然立着四个大字:德、智、军、美。这是民国之初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教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5页。

② 同上,第70页。

③ 见《人民日报》1952年6月22日。

育方针。德、智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宗旨,所谓传道授业解惑是也。军育是鉴于近代中国兵疲国弱受人欺辱而从自己的敌人——德国和日本学来的。蔡元培的独创是美育,他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设想。

就在美育和军育哪个重要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萧子升之间发生过一场争论。这从1915年7月至1916年7月两人往来信件中看得很清楚。萧很欣赏美育,毛则认为“军育更为重要”。毛泽东说:“如果国家软弱,谈论美育有什么用途?首要的是打败侵略我们的敌人!这和美育又有什么关系呢?”萧申辩,美育能促进德性的完美。毛反驳:“如果民族软弱,完美德性又有什么用?最重要的事情是强盛起来。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战胜敌人才能显示德性。”

这场争论发生在那个国力茶弱的年代并不奇怪。当时的人曾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口号。毛泽东很赞成这个口号。他说:“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其精神随之。”^①这是毛泽东对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独到见解。那时的精神文明也包括两项:学问和道德。在毛泽东看来,学问、道德诚然重要,但二者都必须以健全的体魄为基础。“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②“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因此,他认为“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③

为了达到强身健体之目的,他参加体育锻炼的项目很多。主要有:登山,远足,露宿,冷水浴,风浴,雨浴,日光浴,“六段操”和游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0页。

② 同上,第71页。

③ 同上,第67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泳运动。青年毛泽东的自我锻炼,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又体现在“蛮拙”二字上。

登山,是青年毛泽东经常从事的体育活动。与一师隔江遥望的岳麓山,古树参天,挺拔秀丽,林木葱茂,群峦叠翠,山上留下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无数的足迹。除岳麓山外,一师附近几乎所有的山,毛泽东都去攀登过。每当深秋季节,枫叶经霜之后,“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这便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登山的最佳时节。毛泽东一生似乎与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毛泽东一生登了多少山,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在崎岖的山路上不断地攀登,凡70年如一日,直至到达最光辉的顶点,这就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

远足,也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体育运动之一。毛泽东认为,这一活动既可以了解沿途的风土人情和百姓生活状况,又可以培养身体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因此,他经常与同学们一道长途跋涉到郊外、农村游学。

青年毛泽东还有意地选择野外或校园露宿,以锻炼自己的身体和胆量。他经常利用节假日邀请一些同学到学校山后的君子亭、湘江中的桔子洲头、岳麓山的爱晚亭和白鹤泉等处露宿。当夜幕降临,游人尽散之时,他们围坐在一起谈人生,谈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相互交流学习心得。直到夜深人静时,他们才各自散去。这种露宿活动,他们每年一直坚持到霜降时节。

冷水浴是杨昌济先生天天坚持的锻炼项目,得到一师许多学生的效仿,毛泽东就是最坚决的仿行者。毛泽东进行冷水浴是从1915年暑期开始的。在一师的几年里,他几乎一年四季坚持不懈。每天天刚亮,毛泽东便一个人悄悄来到学校东北隅浴室旁的一眼水井边,脱光上衣,吊上一桶又一桶冰凉浸骨的水往身上浇,然后用浴巾摩擦全身。就这样淋了擦,擦了又淋,直到全身皮肤发红发热时为止。时令由夏到秋,由秋到冬,再由冬到春,由春到夏,他进行冷水浴的锻炼从未间断过,即使在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隆

冬季节,他仍天天坚持,从未挂过一次“免战牌”。毛泽东进行冷水浴的习惯,一直保持了几十年。建国后,他的年岁大了,不适合做冷水浴,但每天洗澡仍然坚持不用热水,只用微温水。

毛泽东还坚持风浴、雨浴、雪浴和日光浴,这是他通过冷水浴的体验,自己独创的体育锻炼方法。这些在常人看来不可理喻的行动,他却进行得十分认真、十分投入。夏日狂风暴雨大作时,他常一个人在操场上脱去外衣,让倾盆大雨淋个痛快,还大声呼喊,说是“天雨浴”。有一次,在一个电闪雷鸣暴风骤雨之夜,他独自一人登上岳麓山峰,然后又从山上跑下来,全身湿淋淋地来到好友蔡和森的家中。蔡母问他是怎么回事,他笑着说,是为了体验《诗经》中“纳入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句诗的意境,并借以考验一下自己的胆量和身体。夏天,炎炎烈日当空,他打着赤膊在太阳底下走来走去;游泳后,也要躺在沙滩上让太阳照射。他把这叫做“日光浴”。冬天,大雪纷飞,寒风刺骨,他跑到空旷的地方脱去棉衣,迎风搏击,说是“风浴”、“雪浴”。这样的锻炼,他也坚持了数十年。

六段操运动是毛泽东融各种运动之长,在实践中创造的一套体操运动项目。它包括手、足、头部、躯干、拳击与跳跃等动作,共六段二十七节。当时,中国还没有这样的运动项目。每天清晨,做完冷水浴后,他做一遍,晚上临睡前,再做一遍,天天如此,终年不绝。

游泳,可以说是毛泽东最喜欢、最擅长、坚持时间最久的体育运动项目了。他很小的时候就时常在房前的池塘里游泳。到长沙后,一师前面的湘江成了他畅游的好地方。毛泽东的游技好,胆量大,耐力强,不仅能自如地横渡湘江,还能从猴子石游到十多华里远的牌楼口;不仅在夏日里游,还冒着北风呼啸的严寒,毅然去江中游泳。毛泽东还经常邀集蔡和森、张昆弟、陈绍休等同学到桔子洲头游泳,畅谈,赋诗言志:“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桔子洲头……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到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他还满怀激情地写了一幅泳联：“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到江河里畅游。1956年夏，毛泽东在武汉第一次提出游长江，但遭到许多人反对。他很不高兴。他派人去调查，回来说，“不敢游，游涡太多。”毛泽东沉下脸问：“你下水了吗？”那人说：“没下。”毛泽东发怒道：“没有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毛泽东又派他的副卫士长去调查，回来报告说可以游，毛泽东才转怒为喜：“谁说长江不能游？你不是游了么？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吃梨子怎么能知道梨子的滋味？”这是他第一次游长江。完全如词中所写：“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1966年7月16日，73岁高龄的他又一次横渡长江，历时75分钟，游程30华里。这在全世界的政界首脑中，是前所未有的。它又一次说明了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即使进入迟暮之年，他的身体不可避免地会走向衰老，但他的精神，他的过人胆识和丰富经验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宝贵财富。上岸后，毛泽东还向记者发表了谈话：“游泳是同大自然斗争的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河中去锻炼。”他还幽默地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从20世纪50年代算起，毛泽东16次畅游长江，到其他江河湖海中游泳大约有百八十次，最后一次是在81岁高龄时。

古人称周文王“外文明而内柔顺”，毛泽东认为这只是对古贤君子风度的形容，而不是对运动而言的。“运动宜蛮拙”，如“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之札”，决不是什么纤巧之事，“其道盖存乎蛮拙。”“蛮则气力雄，筋骨劲”。^①

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对“力量”的注重。他知道，“道”与“力”是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5页。

实力的较量。今天所说的“科技竞争”、“人才竞争”，也还是“实力竞争”。仅有“道”而无“力”是不足以胜人的。得道多助，再加上“实力”就无敌于天下。他曾对张昆弟说：“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但心力与体力比较起来，还是体力更重要。“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①

（三）“愚拙之见，天地盖惟动而已”

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主静”，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主动”。宇宙有动有静，而毛泽东认为，动是绝对的、不变的；静是相对的、可变的。这一以动为本的认识论，早在他成为伟人之前就已形成了。他在《体育之研究·体育之效》中写道：“愚拙之见，天地盖惟动而已。”^②

天地惟动，那么人呢？他说：“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那么，动对人有何益呢？他回答：“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③他还举了朱熹主静、陆九渊主静的例子。他认为：“静，释迦牟尼务求寂静。静坐之法，为朱、陆之徒者咸尊之。近有因是子——蒋维乔，司静坐数十年，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之也。”^④毛泽东主张“动”，人只有在动中才能达到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全真境界。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638 页。

② 同上，第 69 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从这种宇宙“惟动”、人更“尚动”的认识论出发,毛泽东主动不主静。他终生致力于“天下能以何道而动之”。他一生的生命足迹,是由一连串的运动组成的。只要把对立面置于运动之中,他准赢。从学生时代驱逐校长张干、领导学生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率领同学智缴北洋军阀一混成旅的枪支,到指挥一系列战斗、战争和战役,他最大最显著的特点是在动中取胜。解放后,他还不时要到全国各处走动走动。“他是一个在离群独处的时候也静不下来的人”。^①

事业上的各种运动是毛泽东人生的组成部分。他的革命生涯是从1920年8月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开始的。当时的活动首先是办工人夜校。尔后是,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一大后,又返回湖南,创立湖南自修大学。1921年冬,当长沙的工人运动有了头绪之后,他和李立三等徒步来到安源,于1922年9月14日,点燃了“安源路矿一万七千名工人举行大罢工”的烈火。此后,他更为剧烈的活动是从1925年春天开始,到韶山指导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② 1927年9月,“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从1927年9月9日,他领导“秋收起义”开始,一直到1949年3月23日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京),他没有一天不在进行军事斗争——麻雀战、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都是在动中取胜。随着全国解放的到来,毛泽东已很少露面。他似乎已厌倦抛头露面。他运筹帷幄,其筹策主要是围绕怎样和以什么样的程序去摘取悬在他头上的果实。建国后,从“土改”、

① 朱莉·尼克松语,见《毛泽东谋略》,湖南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5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镇反”和“抗美援朝”到最后的“文化革命”，他又是在一系列运动——政治的而不是军事运动——中渡过的。除了军事的、政治的运动之外，他最推崇的体育运动项目是游泳。毛泽东认为：凡事不冒险，就不能成功。我们在前面说过，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其时年届七十有三，以如此高龄横渡万里长江的壮举决不仅仅是为了体验一下大自然的情趣。他要考验一下自己是否还有青年时代那种“浪遏飞舟”的勇气和力量。果然，当他的力量和勇气在大自然的风浪中得到证实后，他立即回北京，于1966年8月18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小将”挥动军帽，一下子就“搅得周天寒彻”。

毛泽东认为：“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矛盾论》）毛泽东崇尚的“动”，并非与己无关的身外之“动”，而是自我即在其中的“动”。自我成了运动中的一个首要的能动要素。因此，运动即意味着主体对身外环境的抵抗、斗争。他在青年时代就说过：“吾知一人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①而“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②

毛泽东既尚动，又喜斗。他在学生时代的日记中写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斗了一生，“其乐无穷”了一生。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85页。

② 同上，第183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①他把生灭成毁看做宇宙的自然进化,“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②

到了晚年,在他离见马克思只有半年的时间时,即1976年2月23日,他还对来访的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说:“除斗争是肯定的外,其他都是不肯定的。”说话间,他还使劲用两手的食指相撞来强调这种斗争。朱莉·尼克松感到,这位经过82年艰苦斗争的主席尽管已经衰老,但是他的头脑都比中国的年轻一代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他反复向年轻一代提醒斗争的必要性,并预计党内的斗争、阶级间的斗争可能还要进行二三百年的。

在毛泽东看来,整个人类历史都是由一连串对立面的斗争组成的。从他开始的中国现代史更是一个接一个的“革命战争”的历史。他对战争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战争对他来说就像一首诗,他的诗词创作的鼎盛时期正是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1955年,毛泽东对法国前总理富尔说:“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的。有时我回忆那些日子,还觉得很留恋。”当斯诺问毛泽东,在比较安定的“国家元首”生活和战斗的“流浪者生活”两者之间,他更喜欢哪一种生活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更喜欢战斗生活。”

同敌人面对面的斗争,这种生活对毛泽东来说,不仅“其乐无穷”,而且能够像湖南辣椒那样,舒适他的肠胃,健全他的生理功能。他患有慢性便秘,但只要一打仗,他的大便就正常了。他对斯诺说,他在长沙战斗期间肠胃消化再好不过了。跟随毛泽东18年的师哲记得很清楚:1945年底,毛泽东患了重病,有时他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夜不成眠,医护人员不知如何是好。可是,到了次年,即1946年6月国民党30万军队分四路大举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86页。

② 同上,第201页。

向陕北进攻时,毛泽东的病不治就好了。

体育运动之效仅在养生乐心,完善自我。与天、地、人斗,不仅有强固自我之妙,还能改变身外的生存环境,从而建功立业,实现自我价值于社会历史之中。这种身心并完,何乐而不为?

一般人多为人间斗争所累,故常取消极逃避态度。结果是,越逃越累,终致大江东去浪淘尽,使自我消失在历史的漩涡里。毛泽东不为其累,反以为乐,乐此不疲。这样,他便以主体的身份,以自主、能动、创造性的精神去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并依靠他的谋略智慧在斗争中取胜。

第五章

学习目标设定

人是有意识、有思想的社会动物,人在每一行动之前,总要对自己行动的过程、行动的结果,有一个大体的打算或预测,这就叫人的行动的目的性。学习活动是毛泽东人生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他在行动之前,特别是他在16~17岁之后的学习活动,其目的性是十分明确的。他对自己学习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有了一个大体的预测,即确立起了比较明确的学习目标。俗话说,预则立,不预则废。又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说明了目标设定的重要性。

设定学习目标,一是要根据社会的需要,二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两者密切结合,缺一不可。社会需要是一个人成才的温床、发明创造的母亲;自己的实际情况是一个人成才的内在根据,因此,设定学习目标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要根据社会的需要,同时也要考虑自己的条件与可能,使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也可以说是在学习过程中遵循客观规律性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结合,是知彼与知己的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学习活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才能学有所成,达到预期的目的。

毛泽东在学习目标设定中,很好地做到了“两者”的结合,因而,他的学习活动,目标始终如一,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

一 志者,宇宙之真理

学习目标,也就是一个人的远大志向,即理想。它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对于未来的一种向往和追求。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置身于现实生活之中,但他对现实生活非常不满,尤其对当时中国的现状有切肤之痛,他发誓要救国救民,于是,他为自己设定了探索“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这样的大本大源问题为学习的目标。

(一)“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1910年秋天,年仅16岁的毛泽东,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离别家乡韶山,来到湘乡东山小学堂求学。临行前,他手抄了日本西乡隆盛的一首言志诗,夹在账簿里,留赠父母: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东山小学堂坐落在湘乡县城对河的东岸坪,学舍是用砖墙砌成的像一座城堡似的圆形建筑,背靠巍峨苍翠的东台山,面临清澈明净的涟水河,左右是一脉平展的稻田,环境秀美、幽静。东山小学的前身叫东山书院,是旧时士人讲学诵经的地方,后在维新思潮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的推动下,改为“洋学堂”。

毛泽东的入学颇费周折。因为他不是湘乡人,再说,对于一个小学学堂来说,接收这么一个高大魁梧的学生也不合宜。但毛泽东入学时,按常规命题作文,写了一篇《言志》,以抒发自己求学以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他出手不凡,校长李园圃阅后十分欣赏他的才思敏捷,惊异兴奋地宣称:“今天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才”。稍后,他又写过《救亡图存论》、《宋襄公论》等论文,国文教师阅后加批:“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视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在东山小学堂,毛泽东大开眼界。学堂里,除了仍旧课读儒家经典之外,还设有国文、算术、经学、修身、历史、地理、物理以及音乐、体操、图画等十多门课程,并有一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教音乐和英语课。这两门课都是毛泽东的弱项。但是,他从这个外号为“假洋鬼子”的老师那里却能听到一些有关日本奋发图强战胜俄国的故事,毛泽东感到很兴奋。另外,学堂里有个藏书的楼阁,毛泽东常去查阅。这时,他最爱阅读的一是《新民丛报》,再是历史书和人物传记。《新民丛报》于1902年创刊于日本横滨,由梁启超主编,初期连载过梁的《新民说》。其宗旨为,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自然科学和学术文化知识,宣扬维新,抨击封建顽固守旧派,在当时思想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1903年后,因坚持立宪保皇,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受到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批判。1907年停刊。毛泽东刚刚接触到这一类文字,从内容到文体都感到十分新鲜,尤其是梁启超笔端凝结的那一腔救国救民的热情令毛泽东十分感动。他爱不释手,捧读了一遍又一遍,许多字句都能背诵,并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毛泽东读历史和人物传记,传说中的唐尧虞舜和武功赫赫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从这时起就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国文教师贺岚岗看到他对历史有兴趣,特地买了一部《了凡纲鉴》送给他。

在东山,毛泽东还结识了萧三。

有一天,毛泽东见萧三手里拿着一本书,迎上去问道:“你拿的是什么书?”

“《世界英雄豪杰传》。”

“借给我读一读吧!”

该书记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英雄人物。毛泽东立即为书中人物所吸引,特别是读到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迦德邻女皇、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林肯等人的传记时,他情不自禁地在书上浓圈密点,表示赞赏。当他将书还给萧三时说:“对不起,我把你的书弄脏了。”接着激动地说: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究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的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战争之后,才取得胜利,建立了美国,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①

这席话表明,毛泽东少年时代就有了救国救民的宏伟志向。我们联系他嗜读的书籍来看,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他倾向于崇拜武功卓著的英雄,诸如中国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欧美的拿破仑、彼得大帝、华盛顿、林肯等皆是。正如斯图尔特·斯拉姆所论述的:“尚武,无疑是毛泽东个性性格中一个根本特征。这个特征,我们在毛泽东一生每个转折关头都能看到。”② 毛

①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0 年 1 月版,第 25~26 页。

② 斯图尔特·斯拉姆:《毛泽东》,中译本,第 7 页。

泽东离开东山以前,曾给自己取名子任。对这个别名,人们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其二是他读过梁任公(梁启超号)的《新民丛报》以后,决心沿着梁任公所指引的道路前进。

就读东山小学是毛泽东早年的一大转折,不仅使他长了知识,并且使他在与闭塞的韶山冲的对比中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正是在这种向往的驱使下,他投身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洪流中去。

(二)“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

毛泽东立的是什么志呢?

1917年8月23日,当时正在湖南一师求学的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说:“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羨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①这里的“志”,是毛泽东给自己确定的学习目的,即是探索“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这样大本大源问题。

早在上私塾时,毛泽东就不满足于经书而偷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禁”书、“杂书”。到长沙后,在湘乡中学仅就读半年,他就发现自学对自己更有好处,便毅然决定到定王台下过了半年的自学生涯。他不断地探索为学之道,进一师后的几年里,在不断的借鉴和探索中,他终于找到了一条最适合自己的为学之道。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青年就要有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而要实现这一志向,就应当探索“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6页。

质,世界,宇宙”这样大本大源问题,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他在给黎锦熙的同一封信中,写道:

“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①

毛泽东认为,求得宇宙的真理才算是真正的立志,真正的有志者,是“以其所得真理,奉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②

(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虽然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已经确立了“救国救民”的宏伟志向,但他仍认为立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他将探索真理作为自己的奋斗理想,勉励自己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③

要探求宇宙的真理,改造社会,实现自己的志向,就必须刻苦学习,求得真本领,不断地充实自己。毛泽东非常明智地认识到这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85~86 页。

② 同上,第 86 页。

③ 同上,第 87 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一点：“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面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以橐籥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①

为了认识真理，追求真理，为了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他哲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画粥”的精神，坚持勤学苦练，到处寻找思想上的导师。毛泽东当时首先找到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康有为和梁启超是 1898 年戊戌维新运动的首倡者。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等人一面主张提倡西学、开议会；一面又认为这些都并非“道”、“本”。惟有“性命之原，天人之故”，才是千古不易之“道”。康有为了解这个“道器”、“本末”之间的矛盾，他披着今文经学的外衣，通过宣扬孔子托古改制之说，来揭示自己的变法主张。在他看来，民权平等的资产阶级学说，皆合于孔孟的“圣人之道”，要挽救危局，必须抓住这个“道”和“本”。他还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当今为“据今世”；经过变法维新，可进入“升平世”（小康）；而“太平世”（大同）则为未来之理想，可望而不可及。康有为的这套学说为维新运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武器和舆论准备。

康、梁对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广泛和深刻的，而其中最突出的又表现为主“变”哲学；大同世界的理想和精神革命与“变化民质”的思想。

康有为根据《周易》的“变易之义”，强调“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梁启超发挥了康有为的主“变”哲学，热情地歌颂创新，反对泥古守旧。康、梁的主“变”哲学，对青年毛泽东有着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从五四前期留下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来看，《体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84～85 页。

育之研究》提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伦理学原理〉批注》强调“抵抗”是发展的动力；《第三札》倡言“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所有这些，都同康、梁主“变”哲学的影响有继承性关系。

康有为写了一本《大同书》，借用《春秋公羊传》中的“三世”说，把社会进化进程划分为三大阶段，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同时，他又融合《礼记·礼运》中关于“小康”、“大同”的说法，以“太平世”附会“大同”，悬为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实际上，康有为是把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现实糅合在一起，用以“托古改制”，对儒家“大同”理想作了新的解释。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当然纯粹是一种幻想，但它对向往“大同”理想的青年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青年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① 1919年，他在“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的影响下，进一步将这种“大同”理想化为具体的“新村”计划。在发表于《湖南教育月刊》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他提出要建立一种学校、家庭与社会结合为一体的“新村”，比康有为《大同书》中的设计更为周详。这些都是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具体表现。追根溯源，不能忽视《大同书》对他的深远影响。

1902~1903年，梁启超写了《新民说》，提出了精神革命与“变化民质”的思想。梁启超认为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人心道德”，提高国民觉悟。这种重视思想启蒙的倾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梁启超把一切归结于“人心道德”，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精神领域的革命，这就难免在另一方面贬低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梁启超的这一套理论，无论其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都在毛泽东早期思想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直到五四前夕，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仍然认为：中国积贫积弱，根本原因是“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因此，根本的解决办法还在于从改变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9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人心道德”、“变化民质”入手。这种观点与《新民说》基本一致。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创立新民学会,确定以“新民”为会名。在为新民学会起草会章时,毛泽东提出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也正是这种观点的具体化。

从1910年开始,毛泽东一直在立大志,探索“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道路。

二 实现自我

学习目标的设定是重要的,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就等于人生没有方向。但是,比学习目标设定更为重要的是学习目标的实现。如果学习目标仅仅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喊在嘴上,并不去真正实现,那岂不等于没有目标。俗话说,一步实际行动,胜过所有的口号。

谁设定的学习目标,就由谁来实现。因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人要创造自由、幸福的生活,全靠自己。对此,毛泽东在湖南省立一中求学时,就已认识清楚了,他说:“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但他并没有停止在这样一个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水平上,而是随其学习实践活动深入发展,其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和升华,最终把自己融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洪流中去,真正实现自我。

(一)“人类的目的是实现自我”

《讲堂录》是毛泽东在湖南四师求学期的“课堂笔记”。《讲堂录》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汉光武帝刘秀登基后,邀请昔日的同窗好友严光一道临朝执政。但严光不爱仕途,讨厌功名,竟然拒绝了

光武帝的美意。宋人敬仰严光不为浮誉所动的高风亮节,立祠以志纪念,并请当朝宰相范仲淹题写了一篇碑文。范在文中亦盛赞严光的气节,谓严不爱权力的俗名,殊为难得。据说毛泽东的“修身”课老师杨昌济先生曾要求学生们就此事展开讨论,看严光该不该出任宰相。大多数学生认为不该,毛泽东的看法则与众不同,他认为,刘秀登基后,严光应该当宰相,就像比他早 200 年前人张良辅佐汉高祖刘邦那样。^①

不巧,毛泽东于 1949 年 10 月执政后也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情:1950 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昔日的友人梁漱溟应邀来到北京。毛泽东向梁发出邀请:“梁先生这一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然而梁却说:“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梁的答复出乎毛泽东的意外,毛当即显出不悦的神色。

以上两件事说明同一个问题:毛泽东不喜欢逃避社会责任的清高遁世的人。

毛泽东认为“人类的目的是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应凭借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因此,他强调“已有高尚之德智”的君子,不能“只顾自己”,“离群索居”,而应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以其跻圣域”^②。这就是说,君子固然应有高尚之道德,但洁身自好并不是真正的君子所为。要作为一名真君子,必须尽力于斯世,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义,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

从这种积极入世的学习志向出发,青年毛泽东曾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之天下;国家者,我们之国家;社会者,我们之社会。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592 页。

② 同上,第 89 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① 他还在橘子洲头“问苍茫大地”到底该由“谁主沉浮”。及至晚年,他仍以同样的价值标准激励青年一代:“世界是你们的”,“你们应该关心国家大事”……

毛泽东的学习志向是将个人价值融入社会责任之中,趋而实现自我。那么,如果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发生冲突,不能两全,又该怎么办?《讲堂录》用“壮士断腕,以全其身”的古喻作了回答:“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已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② 很显然,毛泽东赞同这种断腕全身、以大局为重的精神,也非常欣赏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学习境界。

(二)“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欺”

从《讲堂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极为赞赏孟子关于“豪杰”与“大丈夫”的观点。他写道:“孟子所谓豪杰,近于圣贤。”孟子对人之豪杰——“大丈夫”作了如下描述: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自孟子之后,中国这样的大丈夫可以举出很多,尤其在中国的近代史上这样的大丈夫有很多,但哪一个也比不上毛泽东。

毛泽东8岁时,从外婆家回到韶山进私塾,取了个学名咏芝(以后毛泽东经常把它写成润之)。虽然毛泽东学习刻苦,又十分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90页。

^② 同上,第590页。

勤劳,但是他父亲并不感到满意。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他还说父亲:“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给我们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对雇工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可是从来没有肉。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①

毛泽东13岁以后,父亲让他辍学参加田间劳动。毛泽东到16岁时,即1909年的秋天,父亲又决定送他到湘潭县城里一家米店去当学徒,培养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但是,毛泽东并没有走上父亲为他所安排的生活、学习的道路。他从小与父亲有对立情绪。家里其他人对毛贻昌也不满,自然而然地形成反对毛贻昌的统一战线。毛泽东曾风趣地对斯诺说:“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②毛泽东家里的“辩证法斗争不断地发展着”。他从斗争中总结出一条重要规律:“当我用公开的反抗来维护我的权利时,我父亲就会软下来;我要是逆来顺受,他就会变本加厉地打我。”

一个人的性格是在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形成的。除了后天所接受的广泛社会影响外,由父母通过遗传基因传递给后代的先天因子,也不容忽视。从外貌来说,毛泽东曾经说过,泽民弟肖父,脸型有点像印度人;他自己则肖母,也是圆圆的脸庞,高高的前额,一双清亮的眼睛。

从性格来讲,他也同母亲更接近。文七妹勤劳俭朴,心地善良,乐于救助朋友与穷苦人以行善积德。1919年病逝时,毛泽东在《祭母文》中写道:“吾母风高,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①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06~107页。

② 同上,第107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恺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① 1936年同斯谈话时,又说:“我的母亲是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荒年有人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饭吃。”^②

慈母仪范也比严父的教训对他有更深的影响。毛泽东也同母亲一样,从小怜悯弱者,同情和资助穷苦人。但父亲却缺乏同情心,他在钱财上分毫不让,甚至六亲不认。堂弟菊生,穷困潦倒,不得已将七亩田产出卖。毛貽昌(顺生)急于要买进它。毛泽东和母亲都觉得应该设法周济菊生渡过难关,而不能买他的田产。毛貽昌却说:“管他兄弟不兄弟,我是用钱买田。”这件事典型地反映“父党”与“母党”的严重分歧。解放后,毛泽东还多次与堂弟泽连(菊生之子)谈及此事。他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③

毛泽东对压迫个性的强权深恶痛疾。五四时期他喊出“以奋斗反对强权”的口号,把当时的各种改革归结为一句话:“由强权得自由。”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主张反对一切强权,“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④ 越是强权,他越蔑视反对。比如反对孔子,他说莫说还有许多别的理由,单就他独霸中国,使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乎做了两千年儒家的奴隶这一点,也是不能不反的。毛泽东可谓真正的“红辣椒”,当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410 页。

② 《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 12 月版,第 107 页。

③ 汪树白:《毛泽东早年心路历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第 25 页。

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292 页。

年湖南太上皇赵恒惕深深尝到过他的辣头,赵曾说,这个姓毛的很厉害,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脚了。不仅赵恒惕,蒋介石、斯大林、杜鲁门、杜勒斯,这些更大的权威,也先后尝了毛泽东的辣头。赫鲁晓夫也不例外,他回忆道:“自我第一次认识毛泽东起,我就认定并告诉我的同志,他决不会听从国际共运内部超过他自己的党之上的任何别的共产党……要是斯大林多活几年,我们和中国的争吵还会早些时候出现。”据李银桥回忆:1959年9月底,10月初赫鲁晓夫来华访问,在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会谈时,挥动着双手,口气咄咄逼人,很有些“老子党”的架势,可以体会到他的话是充满威胁和压力的。毛泽东将手放在沙发扶手上轻轻一拍,奋然起身,胸膛微挺,头高傲地扬起来:谁也休想让我低头弯腰!事后,毛泽东曾说:“没有骨气的国家是不敢顶的。”作为领袖人物,不遇挑战是难以充分表现英雄本色的。毛泽东一生发生过不少失误。即使有失误,由于他那与生俱来又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锤炼而就的个性、气质、决心和意志力,在历史上仍然会产生出一种巨大力量,他一生总是强者。

毛泽东一生不知向多少权威、大人物发起过挑战,可在普通小百姓面前,他却十分和蔼可亲。罗章龙亲眼见过这样的事:有一次和毛一起从长沙回韶山,在路上见到一位老农在茅屋打草鞋,便走上去和他一起啦家常。边谈边帮老人理草、搓绳、编织,织好鞋后又帮他把鞋整平。

蔑视、反对强权的另一方面,是对弱者的深切同情和怜悯。就像他的慈母一样,毛泽东对受苦人有一副菩萨心肠。少年时代,他曾多方面周济贫穷和受苦的乡邻。1913年湖南发生大饥荒,饿死了不少人。20年后,他向斯诺讲起在那场饥荒中死去的人时,眼睛里还是湿润的。在陕北时,毛泽东曾讲过:“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

不得他们离开。三是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①。中国历代士人都把社会分成“君子”和“小人”两种人,但作这种区分的君子们总是对人抱鄙夷态度。毛泽东也曾使用过这种分法,但是他认为“小人”大都可怜,力主君子对小人“宜为一援手”,“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

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极卑是指他终究“一毫跳不出我以外之世界”。与此相应的,毛泽东又有一句十分著名的口号,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一生反对“大人物”压制“小人物”,始终相信小人物胜过大人物。但,毛泽东又认为,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不能脱离现实去追求虚幻的理想和价值,要争取在有限的的时间里“实现自我”。他说:“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②一方面,他反对空谈,“凡吾思想之所及,吾皆有实行之义务”^③;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道德行为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反对盲目动作。他非常喜欢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坚信,除了沙漠之外,凡有人群的地方,总分左、中、右,一万年以后也是这样。他要永远当左派,永远做人民的牛,但他又从不向“大人物”屈服,几乎没有哪一个“大人物”喜欢他。

毛泽东就是在威武不屈、贫贱不欺的精神指导下,确立学习志向,一步一步地“实现自我”的。

(三)“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毛泽东看来,昔日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要么略

① 权延赤:《领袖泪》,求实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第3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04页。

③ 同上,第235页。

输文采,要么稍逊风骚,要么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对“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的作法嗤之以鼻。甚至像拿破仑那样的盖世英豪,他也不以为然。他所崇拜的理想人物,不是那种虽有大功大名但却欠于品德的豪杰或帝王,而是德业俱全、万世师表的圣贤。《讲堂录》中用王船山和杨昌济的两句诗表达了毛泽东“实现自我”的学习志向。王船山说:“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① 杨昌济说得更明白:“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② 帝王的能耐无论怎么强大,也只能建功业于当代,死后难保江山易主。圣贤则可以依靠其精神主宰千秋万代,死后自然是万世师表。

青年毛泽东的认识是清楚的,他在《讲堂录》中写道:“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仲淹),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③

是的,帝王说到底还是“办事之人”,只有功业,没有主义。圣贤属于“传教之人”,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去)圣继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传教之人的理想事业。当然还有第三类人:办事兼传教。这是毛泽东终生最为理想的事业。只办事不传教,其事难以持久;只传教不办事,其教难以广远。

宋代人将韩琦(北宋大臣)与范仲淹并称,清代人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并称。但在毛泽东看来,韩、左不过是办事之人。范、曾则是传教之人。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信》与黎议论时人袁世凯、孙中山、康有为、曾国藩等名流时,说:“今之论人者,称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89页。

② 同上,第591页。

③ 同上,第591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他得出结论是：“惟学如基础，令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圯。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国藩）。”^①为什么独服曾文正？曾文正处世为人有“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②这就是说，因为曾氏既会办事，又善传教，达到了所谓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境界。

这种君师合一、德业俱全的人生（学习）志向，支配着毛泽东的一生。早在青少年时期，他针对中国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的积弊，提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暝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③

后来，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他又痛切地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便有了一切，没有政权，纵有大气量、好主义，仍然推广不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于是，他开始领兵打仗，一步步夺取全国政权，并在夺取政权的实践中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这样，他就成为既有大气量的圣贤，又有大功业的豪杰了。

在毛泽东看来，当把阻碍他的主张实现的旧政权推翻以后，剩下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从哲学、伦理学履行中获得的新主张加以推广、实行。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过程同样不顺利。直到晚年，他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便重新塑造人的灵魂，以便全面推行他的思想，一劳永逸地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85 页。

② 同上，第 593 页。

③ 同上，第 86 页。

解决后世问题。(但,同样他万万没有想到:“文革”对中华民族来说,竟是一场灾难)。“文革”中,林彪曾在他的名字前加上“四个定语”,毛泽东对此不感兴趣,只有“伟大的导师”除外。确实,“导师”一词最恰当地表达他的身份角色。他从教师开始其革命生涯,又以“导师”终结其历史使命。

第六章

知识与知识分子

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知识分子？这是毛泽东学习思想和实践中一对密不可分的核心问题。其他问题，都是由这两个问题产生，并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因此，研究毛泽东学习思想和实践，如果不研究毛泽东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思想 and 实践问题，那就是舍本逐末，那就毫无意义和价值。

一 什么是知识

什么是知识？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常识范围内的问题，似乎不屑置辩，其实不然。关于什么是“知识”，在中国学习思想史上一直是个模糊概念，几乎没有人能说得清楚。青年毛泽东关于“知识”的观点，不仅是模糊的，甚至也可以说是片面的、错误的。他后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才对“知识”有了正确和科学的看法。

(一)“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

什么是知识的问题,要从辞书中找答案并不困难。《辞海》中关于“知”的条目是这样阐释的:“知识或认识能力。荀子提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解蔽》)认为人有认识客观事物之理的能力。后期墨家认为知识在于人能正确反映所见的客观之物,并对知识作了分类:‘知、闻、说、亲。’(《经上》)北宋张载将知识分为‘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承认一般的感性知识来源于‘物交’,但否认‘见闻’为‘理性’(德性)知识的基础。南宋朱熹把知识作为对事‘所当然的道理或规律的认识’:‘知,谓说其事物之所当然。’(《四书章句集注》)明王守仁认为知识是主观自生的东西,‘心之灵明是知’。(《传习录》上)近代魏源则提出‘及之而后知’,对知识的性质和来源作了唯物主义的理解。”从先秦诸子到近代的学者,尽管他们的学术观点、流派有别,但他们对“知识”的见解,大致是类似的,即知识就是人的认识能力。《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知识,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这种解释,与《辞海》中的解释有本质不同。《辞海》中的解释,从语汇角度看,是模糊不清的,从哲学角度看,是一种“心”与“物”二元论。而《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基本上是正确的。

青年毛泽东对“知识”的见解,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他并没有跳出“知识即人的认识能力”的圈子。他在《体育之研究·体育之效》中写到:“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很明显,青年毛泽东的知识观与古代贤哲们,尤其是与宋明理学家们的观点,是一脉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相承的。青年毛泽东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还鲜明地表现在知行关系上。《〈伦理学原理〉批注》写道:“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当时,他从唯心主义先验论出发,基本上赞同“知先行后”,同中国哲学史和学习思想史上朱熹的观点十分接近。他强调一个人要确立信仰和志向时,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求得“真知”。为此,他决心以全副精力“向大本大源探讨”。以为“探讨既得”,就可以“权此以对付百纷”,解决一切矛盾。舍此莫由,势必陷于盲目。他认为,如果没有“真知”,没有探得宇宙之“大本大源”,即令自己确定某种求真求美之志向,也不过是“盲从之志”,而非“真志”;发为某种行为,诸如“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也“无非盲目的动作”。

青年毛泽东还接受陆(九渊)、王(阳明)的影响,特别强调主体实践(道德行为)的能动性。《讲堂录》记下了“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的象山语录。《〈伦理学原理〉批注》极口称赞“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第三扎》突出强调主观立志,都是把主体实践的能动性作为向封建传统挑战的精神武器。

(二)“其知也,亦系经验而知之”

在知识论方面,青年毛泽东的学习思路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当时的确接受了宋明理学唯心主义向内追求的知识路线;另一方面,我们在他的读书笔记和早期著作中,又可以发现许多唯物主义的知识论见解。例如:《〈伦理学原理〉批注》指出:“有无价值人为之事也,是否真理天然之事也。学者固当于天然本质中求真理,其有无价值抑其次也。”^①又指出:“种种著述皆不过勾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158 页。

画其实际之情状,叙述其自然之条理。”^①这完全符合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原理。他接着又说:“吾人之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实体。”^②对“实体”可以作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不同解释。联系上述前后文来看,他似乎是把实体看成某种“终古在同状之中”的精神本原。“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既不灭何有生乎,但有变化而已”。^③由此看,这对青年毛泽东来说,当时还是一个难以克服的矛盾。

在知识的来源问题上,青年毛泽东倾向于经验论。“其知也,亦系经验而知之”。^④他在《伦理学原理·序论》部分的《批注》中,多次阐述“经验”问题。例如:“此言研究伦理学由经验”、“此言道德起于道德哲学之先,故道德哲学之成,成于经验”,“以上论伦理学之研究法系经验的,非直觉的”,等等。这就是肯定直接经验是人们获得知识的根本途径。肯定直接经验并不等于排除间接经验的意义,如语言文字记载了许多经验:“此种语言在其起源确已合于客观界之事实,乃由种种之经验而来者也。由一人而论,从幼少之时,即童而习之,似为构成于先天者。从历史观之,则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直觉也。”^⑤在这里,毛泽东对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即直接知识与间接知识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比较正确的阐述。

青年毛泽东这种唯心主义的知识论倾向,一方面是接受了近代英国经验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继承了我国明清时期的“实学”传统。严复比较系统地译介了培根等英国经验派哲学家所提倡的逻辑归纳、实验印证的科学方法,强调从经验中获得第一手材料,并对唯心主义的“心学”“理学”和八股制艺展开了尖锐的批判。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217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第 222 页。

⑤ 同上,第 221 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书馆自学时,通过阅读严复的译著,对此已有初步了解。

但对他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实学”。早在湖南四师求学时,他在《讲堂录》中就摘抄了潘耒为《日知录》所作的序言,对顾炎武所从事的考察,“足迹半天下”、“留心当世之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的治学态度,表示衷心钦服。^① 1917年,毛泽东撰写《体育之研究》时,又标举“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② 颜习斋最重视直接经验,反对空谈心性,主张到实际中去锻炼。颜习斋的这种观点,对毛泽东后来学习思想的发展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特别可贵的是,毛泽东不止于坐而论道,还能身体力行。我们在前几章谈过他的“游学”,以后几章还要介绍他在一师求学期间,曾多次与蔡和森、萧子升、陈绍休、易礼容等深入各地农村了解民间疾苦,以后还在岳麓山作过建立“新村”的试验,以及尝试实行半工半读等。在他身上,隐约可以看到“经世致用”和“习行哲学”的影子。五四运动以后,他的这种倾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终于形成了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读书与应用相结合的学习路线与学习作风。

(三)“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

人在幼年读书,能背得,但不懂,更不会用,一用就错,即使这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599 页。

② 同上,第 68 页。

样,还经常在成人面前买弄自己的“学问”。成人则笑曰:“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孩童哉!”中国共产党在其初创期,在其幼年期,也是这种情形。从1921年到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如陈独秀、李立三、王明(陈绍禹)等人,虽然学了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王明,还亲自到莫斯科去取“经”,但是在其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能说一无是处,毫无成绩,如陈独秀,在建党伊始,也取得了伟大成绩,但从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开始,他就不识蒋介石的“庐山真面目”了,于是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后来的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等人接二连三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把好好的中国共产党,好好的中国工农红军,好好的中国革命,搞得一团糟,一塌糊涂。他们的所作所为,使“白区”党的组织百分之百遭到破坏,苏区党的组织也十分之九被破坏,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这其中给党和军队带来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

当时王明路线的执行人之一博古后来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①

王稼祥说:“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

^①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632页。

隘经验主义者。”^①

因为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而一意孤行兜弄书本知识,或者因缺乏书本知识,而盲目贩卖狭隘经验,居然能危及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生存、前途和命运,居然能危及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前途和命运。“知识”能有如此巨大的能量和作用,虽然过去闻所未闻,但眼下却是铁和血的事实,谁能否认得了?

其实,“教条主义”的书本知识和“狭隘经验主义”局部经验性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完全的知识,而是片面的、不完全的知识。因为是片面的、不完全的知识,所以用作行动的“指南”时,才导致一系列的错误!

这里,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样的知识,才算得上真正的、完全的知识?什么样的知识,才能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为这个问题,毛泽东苦苦思索、研究了许多年,早在1932年,他就想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这个问题。但当时,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办法解决。为什么?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②

遵义会议以后恢复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因西安事变后局势相对比较稳定,毛泽东便着手总结历史经验。他先从总结军事斗争经验入手,先后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抗

①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632页。

② 同上,第323页。

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这期间,于1937年7月、8月,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他在《实践论》中已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阐明了知识的本质:“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①虽然毛泽东没有明确使用“知识”这一概念,但他所阐明的却是知识的来源和知识的本质问题。还是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强调说:

“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②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作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除了继续强调“反对主观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96~297页。

② 同上,第287~288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以外,就是明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知识分子?”的问题。

什么是知识?毛泽东回答说: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我们现在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

到此,毛泽东才给“知识”以正确而科学的释义。

二 什么是知识分子

什么样的人 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处于什么地位，有什么作用？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如何对待知识分子？这也是毛泽东学习思想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既承认，“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又认为，“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些”。“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因而，对知识分子要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使他们的工作“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

我国已进入历史新时期，现在的情况与以往不大相同，或者大不相同了，但是，以史为镜，研究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还是很有意义的。

（一）“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939年5月，毛泽东在为延安的报纸写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论文中指出：“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5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时，又说：“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国知识分子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几百万的军队”,不是指狭义的“中国工农红军”,即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这是有武装的人民军队,而是指广义的“军队”,即不在编的、未经武装的、群众化的“军队”。近20年革命斗争的实践使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他十分明确地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

为了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毛泽东于1939年12月1日,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决定”指出:“三年以来,我党我军在吸收知识分子方面,已经尽了相当的努力……但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②

“决定”下达不久,随着大城市中人们对国民党越来越失望,学生、作家、艺术家和其他知识分子涌向延安。延安也好像一块磁铁,吸引着他们。他们寻找新的角色。充满活力和爱国气氛的延安为他们提供了活动的场所。如:茅盾、丁玲、艾青、草明、肖军及江青等,都是那个时期先后到延安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18页。

② 同上,第611~612页。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谈到知识分子时,说:“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里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肖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中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我们中国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①

建国前夕,毛泽东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后,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1949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毛泽东乘车由香山来到北平城内,拜访北平师范大学代校长汤躁真、文学学院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他们有的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或同学,有的是北平九三学社的成员。都是知名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和他们畅叙旧情后,黎锦熙对毛泽东说: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新中国将要诞生,北平九三学社人数不多,这个团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毛泽东听后,诚恳地对他们说: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革命胜利了,国家建设更需要知识分子。国内原国统区的许多知名知识分子,在国民党溃退至台湾时,都没有逃离大陆,有的在原地继续工作,有的到了北平(京),如柳亚子、梁漱溟等人。在海外的华侨、华人中的知识分子和留学生,则千方百计,想尽一切

^① 《党的文献》1993年6期。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办法回到祖国的怀抱,为祖国建设,为发展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献身、出力。例如:钱学森、李四光等一大批科学家就是于1955年前后回国的。

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①毛泽东关于“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的思想,是真诚的、始终如一的。

(二)“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

毛泽东欢迎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和建设,只要他们是革命的,又是自愿参加的一律持欢迎和尊重的态度;同时,他又认为“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②毛泽东的话,不是随意讲的,而是有其根据的。

在毛泽东看来,一个人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拿到了毕业文凭,算有知识了。但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不能。

有人对毛泽东的说法,不以为然,并质问道:“照你这样解释,那么,马克思也算不得知识分子了。”毛泽东反驳说:“不对。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实际创造。他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6页。

^② 同上,第815页。

社会的经济结构。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地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和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有根本的区别。”^①

马克思和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区别在哪里呢?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可是,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又是怎样做的呢?毛泽东从三个方面举例予以证明“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然对于国内和国外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外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知半解……”这能算是有知识吗?这能算是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吗?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16~817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也不能算完全的知识分子,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怎样才能使读书人获得比较完全的知识,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呢?毛泽东给指示的途径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他在《五四运动》一文里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标准,而且是惟一的标准:“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他还用希特勒也讲过“社会主义”,墨索里尼在早年时曾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陈独秀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张国焘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最后呢?前两人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而陈则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为自己的观点佐证。

毛泽东不只要求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走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而且,对他的儿子——毛岸英也不例外。1943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毛泽东慈祥地对岸英说:“岸英,你在苏联长大,国内的生活你不熟悉。你在苏联大学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

在劳动大学里,毛岸英学会了驮粪、刨地、犁地、播种这些庄稼活儿,还利用业余时间组织村里的青年人学政治、学文化。上山劳动回来,还总要捎回一捆柴,送给烈军属。在“劳动大学”里,毛岸英初步了解了中国农村的现状、农民的感情和生活方式,懂得了土地、劳动、收获对于生命的意义。他忽然感到自己长大了许多。

1947年,毛岸英参加过土改工作团;1949年1月31日,即北平和平解放的第二天,他又陪同两个扫雷专家扫雷;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受父命,又随彭老总赴朝参战,去经受战火的考验。

建国后,为了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为我们党制定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讲话时,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毛泽东对其多年来形成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

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在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对来访的外国客人说: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是不行的。……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去了解犯罪情形,法律是学不好的……就是在课堂里讲课,讲哲学就是书本上的哲学,不到社会上、人民中间去学哲学,不到自然界去学哲学,那种哲学学出来没有用处,仅仅懂得点概念而已……

总之,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

(三)“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

毛泽东作为一个谋略家,其谋略智慧集中体现在他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中。他曾说,中国共产党拥有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而统一战线就是其中的第一大法宝,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又是这一法宝的重要组成部分。

什么是统一战线?说白了,就是一种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高超技巧。毛泽东并不讳言这一点,他在论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曾说道:“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他们能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是好分子)跑过来。”

统一战线之所以必要,是基于敌强我弱这一基本事实。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基本上是从零开始的。中国革命有两条战线,一条叫“武化战线”,是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开始建立起来的;另一条是“文化战线”,这条“线”,还只是一些零星的“点”,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线,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革命势力小于、弱于敌人势力。因此,要战胜强敌,就必须尽可能多地争取同盟军。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就是争取同盟军、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有力措施。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拉过来。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毛泽东在关于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特别指出: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大胆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是由于他们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同我们拼命地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尤其是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

因此,毛泽东认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是我们的事业争取胜利的 necessary 保证。

毛泽东主张“五湖四海”和“千军万马”。青年时代他最著名的口号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比较十月革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发觉只有民众的联合和团结知识分子才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晚年,他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也是这样的话:“问题在于是否能够联合大众”;“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①

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叫做政策也好,叫做方针也好,其实是一样,它是一个整体,不能分割开,孤立地看。团结是一种愿望,也是一种目的,但不是手段,手段是“教育”、“改造”。没有团结的愿望,就不可能教育、改造知识分子,不经过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就达不到团结的目的。对此,毛泽东总结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即教育、改造),最终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公式。

知识分子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是教育者,为什么还要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6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进行教育呢？问题正是出在知识分子是教育者身上。马克思有一句名言：“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①

毛泽东以文艺界的知识分子为例，证明对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教育和思想改造。我们的文艺是为工农兵的，是为人民大众的，可是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并没有这样去做。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和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尚若描写，也衣服是劳动人民的，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上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萌芽状态的文艺。有时候就公开地鄙弃他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不光是初到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没有彻底解决的。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

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①

女作家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遭到不少人的批评,毛泽东诚恳地对她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深受启发,她后来说:“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② 毛泽东亲自做知名知识分子的教育工作,是经常的事情。

1949年建国前夕,柳亚子先生应邀赴京参加新中国的筹建工作。他一方面赞颂毛泽东等革命家缔造新中国的丰功伟绩,一方面又对自己的处境表示不满,于是作了一首《七律·感事呈毛主席》赠送毛泽东。柳诗是:“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骥。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柳亚子(1887~1958),是清末“南社”发起人和主要诗人之一。早年参加旧民主革命,后又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物,与毛泽东交往甚深。柳写赠毛的诗篇中显露出惯常的自负,有的甚至近于狂妄,但毛并不介意。为了团结、教育柳,毛不久作了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赠送柳:“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柳毛唱和所涉及的“牢骚”,关键并不在于柳的“牢骚”,毛以“牢骚太盛防肠断”相规劝,也非误解相知甚深的老友。这种唱和实为诗人兼政治家与具有热烈革命情怀的诗人之间的一次艺术对话。

像柳亚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朋友,毛泽东还有很多很多,如章士钊、张澜、沈均儒等。毛泽东都定期不定期地与他们见面、交心。

1981年,陈云说毛泽东一生有五大贡献,其中第一大贡献就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57页。

② 《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2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是教育、培养了整整一代人。他说：“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批干部。”其实，毛泽东也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延安时期到上个世纪 50～60 年代，从大中学校走向工作岗位的学生们，尽管其中有人曾在“反右”中挨整，甚至被整得很惨，但心中都不同程度的怀有一种“毛泽东情结”。

从 1942 年到 1957 年，毛泽东曾先后三次以“整风运动”的形式对知识进行大规模的、集中的教育和改造。1942 年的“延安整风”和 1955 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都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57 年 2～3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谈到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还批评“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当然，他更多的是谈知识分子中存在的立场、观点等严重问题以及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谁知，党内整风运动刚发动起来不久，立即转入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反右斗争”。本来，知识分子中的问题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认识问题，结果却错误地定为敌我矛盾的立场问题。毛泽东于 1957 年 7 月 9 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说：“右派只有极少数，像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①当时，全国有五百万知识分子，五百万的十分之一就是五十万。就是说，从推算的数字来看，全国有五十万的知识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41 页。

分子被“打成右派”，并集中起来进行改造。“文革”十年，知识分子也遭遇厄运，但那不只是知识分子的遭遇，而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遭遇了。“文革”中，知识分子被“四人帮”定为“臭老九”，前八者，即“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第九便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成为被“四人帮”专政的对象。当毛泽东听说要“赶走臭老九”的时候，他借用《智取威虎山》中座山雕对杨子荣说的话：“老九不能走！”^① 这样除少数知识分子未能避免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避免了一场灾难。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的结果，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过错。

话说回来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毛泽东的是非功过，中共中央已作了结论，在此不必悉数了。

三 知识结构

知识、知识分子和知识结构，三者是有区别的，又是密不可分的对立统一体。一个人，只有具备渊博的书本知识，又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称其为知识分子；而一个知识分子只有建立起合理的知识结构，并且学以致用，知行统一，才能创造物质的或精神的财富，奉献于社会，实现其自我价值，才不愧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因此，建立合理的知识结构，就成为知识分子人生课题中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这就是说，他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走农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道路,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研究了中国的现状,研究了中国的历史,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毛泽东就成为代表中华民族最高智慧,同时也成为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建立起了属于个人的,又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知识结构及其思想理论。继承他这份宝贵遗产,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先进的文化,不仅有现实意义,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毛泽东从上东山小学开始,就非常注意建立自己的知识结构,之后,逐渐形成了一些关于知识结构的思想理论。这对于他的成长、成才,以至于在革命实践中建功立业,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大有意义和作用的。

毛泽东有一个“救国救民”的抱负,因此,他在东山上学时,广泛涉猎国文、算术、经学、修身、历史、地理、音乐、自然、图画等各科知识。在这些学科中,他尤其喜欢国文、历史和地理。通过对祖国历史和地理的学习,毛泽东大大地打开了眼界,他感到自己的胸怀开阔起来。在省立图书馆自学期间,他涉猎知识面则更深更广。例如,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示》、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等。

当时,人们把《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石头记》视为闲

书,把《金瓶梅》视为大禁书。毛泽东则不以为然。他指出:书,作为一种知识的传载体,只要能给你某种启示,能引起你的感情共鸣,能开发心智,这便是好的。因此,读者只要是求知而读书必定是开卷有益的。所以,他认为,以上书同四书、五经、《史记》和唐诗、宋词、元曲等,在书林共领风骚,无可不学。

在一师上学期间,除了课堂学习之外,课余时间他则以研究哲学、伦理学为主,同时兼顾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各种学说、著作。从这时起,他便与同学探讨、研究知识结构问题。

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同的知识分类方案,它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在我国春秋末期,孔子以六艺,即诗、书、礼、易、乐、御六门课程来教育学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知识结构分类。但这些知识在今天来看都属于社会科学,或其中杂以自然科学的知识,仍以社会科学为主,还不能说是自然科学。在当时的中国,自然科学不进学校,不进课堂,统治者也不允许自然科学进课堂。只是从上世纪初开始,一些睁了眼睛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才偷偷地、悄悄地将从西方传进来的自然科学引入课堂。湖南东山小学堂便是一例。

毛泽东说:“读古坟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体操、图画、音乐、手工者,技能的而美术的也,君子假之,而得为学、养生之道焉。”^①这里,他将知识分为两大类,即地理知识与养生知识。这种分类法未免偏颇,也显得幼稚。

毛泽东引用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缮性篇》中的知识分类,与萧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3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子升讨论：“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学、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① 斯宾塞尔这种知识结构分类也未必合理，且都属于自然科学。不过，从斯宾塞尔的知识分类可以看出，在 18 世纪，尤其是 19 世纪，西方自然科学已相当发达了，并十分重视学习自然科学了。这时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化学，还仅是一些名词概念而已。这不能不是近代中国人的一种悲哀。

1917 年 11 月，毛泽东的《夜学日志首卷》中记录了在夜学中设置的“课程表”，从“课程表”中可以看出他的知识分类思想。

日 班 时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一点半	国	国	算	算	国	国
	国	国	算	算	国	国
半点	(地常)	(地常)	(历常)	(历常)	(地常)	(地常)

《表》中的国，即国文课；算，即算术课。

他对常识课是这样分类的：历史、地理、理科、修身、卫生、实业、政法、经济、教育。可能对这些课的内容不系统讲，只讲一些“常识”性的东西。

1942 年 2 月 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报告时，首次系统地、完整地阐明他关于人类知识结构的思想：“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 页。

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①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关于人类的知识结构问题,其中也谈到了知识的来源、知识的性质和知识的领域等问题。他的观点对不对?基本上对,但不全面,有的“表述”也不太科学。例如:他把社会科学叫做“阶级斗争知识”,就不太科学。在阶级社会中的社会科学不乏阶级斗争的知识,但并非社会科学都是关于阶级斗争的知识。例如:语言学、形式逻辑学,它属于哪个阶级的知识?文字学、考古学,又属于哪个阶级的知识?这是其一。其二,人学、人生学、人类学等算不算知识?说不算,那是讲不过去的,说算,那它们该算哪门科学?是属于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领域?还有文学艺术,算不算知识,又该属于哪门科学领域?他说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再“没有了”其他门类的科学,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有人已提出把“人学”、“人生学”、“人类学”、“文学艺术”等归于第三科学领域,名其曰“人文科学”,我以为是有道理的。“人文”一词,不仅在西方流行数百年,在中国亦早已出现。我国最古老的文化典籍《易·贲·彖辞》就有记载:“文明以上,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后汉书·公孙瓒传》亦曰:“舍诸天运,征乎人文。”因此,我们应当对毛泽东“知识结构”的思想加以补充,那就比较全面而科学了。

哲学	{	自然观↔自然科学
		人文观↔人文科学
		社会观↔社会科学
		美学观↔美科学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将来可能会产生新的科学,后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15~816页。

人也可能对知识结构有新的分类方法,那是将来的事情了。

(二)“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毛泽东喜欢读书,在私塾读书时,老师让买的书,父亲毫不吝啬。塾师们都夸赞毛泽东“绝顶聪明”,“是块读书的好材料”。在东山学堂,毛泽东除了学好学校的各门功课外,还喜欢阅读中外的历史、地理及其他各种新书。他会读书是出了名的。老师每每逢人,便欣喜地说:“润之将来必成大器,小小年纪,学问已非吾辈所能及矣!”这时,毛泽东已读完了我国古代的经、史、子、集四大类书:经部,包括历代儒家的经典,如《诗经》、《论语》、《孟子》等,以及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部,包括各种历史、地理、传记等书;子部,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和科技著作,像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集部,包括文字的总集和专集等。在湘乡驻省中学,毛泽东除了继续学学校开设的国文、历史、地理、自然、算学等各门功课外,还养成了注意研究政治形势和观察社会问题的习惯。他读了一些讨论“社会主义”的报刊文章,“社会主义”这一名词,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同期,他曾有半年时间的军旅生活,粗知了一些军事知识。退出军旅后,毛泽东又考入湖南省立高级中学。在这里,老师们夸他“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此时,毛泽东产生了一种新念头,即变学习各科基础知识为专门研究中国历史,变课堂读书为自由读书,研究“大学问”。于是,他自动退学,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了半年。在这里,他好像老牛进了菜园,口口都是好料,老虎啃天——不知从哪里下口。他读了一些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学者关于社会政治学说、古典经济学、哲学以及进化论方面的名著。1913年春,20岁的毛泽东又考入湖南省立四师后并入一师,至1918年毕业。此

间他除了学校方开设的各门功课外,还在老师的影响和帮助下,认真阅读了谭嗣同的《仁学》、曾国藩的家书,以及康德和王船山的哲学著作,还有《韩昌黎全集》、《昭明文选》、《楚辞》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等,他还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与此同时,他还采取“游学”形式与萧子升作社会调查。这期间,毛泽东留下了《讲堂录》和《〈伦理学原理〉批注》等读书、学习笔记和大量文章及信稿。毛泽东常说,“学问”二字组成一个词是很有道理的,要成为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便既要虚心好学,独立思考;又要好问,拜人为师。他在一师确实遇到了一些好老师,最使他难忘的是杨昌济、徐特立和黎锦熙三位老师。

毛泽东到底有多少知识?恐怕谁也说不清,甚至永远是个谜。仅就五大卷《毛泽东选集》等中的文章粗略归类的话,是如下一种结构:

哲学类:《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社会学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

预测学类:《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

政治学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

经济学类:《我们的经济政策》、《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关于工商业政策》、《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由之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等;

军事学类:《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等等;

青年学类:《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青年团的工作要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照顾青年的特点》等；

新闻学类：《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

伦理学类：《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

学习学类：《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和时局》等；

管理学类：《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

关系学类：《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战争而斗争》、《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论十大关系》等；

历史学类：《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

民族学类：《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批判大汉族主义》等；

文艺学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等；

外交学类：《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等；

法学类：《论政策》、《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毛泽东的知识，除了以上我们列举的几类知识外，他还有大量的关于“党建”、“语言”、“逻辑”、“修辞”、“体育”、“卫生”方面的理论，以及“诗词”、“书法”等等。将其所有的知识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他不能说没有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但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比起来，那就很少了，甚至

少得可怜。他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可以说学富五车,才倾八斗,不仅令“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稍逊风骚”的唐宗宋祖和“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们自愧弗如,就是那些学界泰斗们也不能不甘败下风。郭沫若在1958年就曾自嘲说:“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然而,毛泽东就是毛泽东,他很有自知之明,他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有个客观的自我评价。毛泽东于1962年1月31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一点,但是也是比较地懂,还是懂的不多……到现在为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的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在大革命时期,李立三、瞿秋白和王明们所犯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错误,在和平建设时期,又发生在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身上。从1957年以后到“文革”的一系列决策的失误,都是因为不懂或缺乏经济建设的真正知识。这又一次告诉我们:科学知识,不仅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命运前途,而且也关系到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命运前途。如果还有什么人对获取科学知识和技能不以为然,掉以轻心,甚至鼓吹“知识无用论”,那么,他不妨重温中国共产党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和五六十年代前后,这两段历史,同时,再对比看一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无知、盲从,迷信,无异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而尊重科学知识,按科学规律办事,就像从黑夜走过来迎接日出,越走越光明!

(三)“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非常注重学习社会科学,而对自然科学没有兴趣,甚至不学,考试交白卷。毛泽东对学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老师和同学对他褒贬不一的品评引起了他的数学老师王立庵的沉思。一师的老师们都知道:毛泽东已有凌云壮志,他思虑的不是一己的出路,而是天下万民的出路;他要学的不是一技之长,而是要探索中国、世界、宇宙的大本大源,对这样的特殊学生,不能拿寻常的教学模式限制他,而应该因势利导,因人施教。否则,便扼杀了一个人才。王先生多次找毛泽东谈心,说:无论求学或办事,都必须打好基础,盖房子要挖很深的基脚,做学问要汲取各家之长,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流长。如今已进入20世纪,这是科学昌明的世纪,各种学科的相互关联越来越精密细致了,只靠某一门类的知识,是无法掌握全局的,一件大事要靠群众来做,不能孤军奋斗,不能单枪匹马。王安石变法,本是一件好事,可只凭一己之意,不设法联合各方势力,结果还是失败了。知识是联系同志、集合群体的纽带,对于某种知识的共同兴趣,可以导致感情的联结、思想的共鸣。隔行如隔山,干大事业的人如果知识单一,往往会因此而失去方方面面的朋友。因此,科学文化知识上的全面发展,实际上是事业的基础——思想的基础、智能的基础、团体的基础。

王先生的教育、开导,给青年毛泽东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以致终生念念不忘。虽然这以后由于他的经历、他的环境和他所承担的使命使然,他终没有很系统地学过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在这方面也说不上是个有很深素养的人。但观其一生,作为一个求知者,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毛泽东对涉猎自然科学是颇为注意的。对某些问题,他表现了浓烈的兴趣,在有的方面还发表过一些深刻的见解,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譬如,1921年,新民学会在长沙开新年大会,会议在讨论会友个人的学习计划时,毛泽东发言说:“我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方设法补足。”这反映出他当时对自然科学的渴求。

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远在苏联莫斯科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了一封长信,对他们的学习和发展方向提出了见解。他说: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①

在为儿子指导人生方向时,毛泽东的价值取向是明确的:在政治与科学两者之间,搞政治要以学科学为基础;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选择上,先以学自然科学为主,然后再学社会科学。

毛泽东不是不想学,也不是不愿学自然科学,是他的理想使命使然,使他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学。然而毛泽东仍尽可能挤出时间从书籍报纸中了解一点世界自然科学思想。他曾对旧友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允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他抽空钻研过农业、机械、化学、水文、气象、地质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尤其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都表示过兴趣。他曾向李烛尘请教过化学;同李四光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交谈了三四个钟头。1963年,就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① 《毛泽东的儿女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12月出版,第27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并得到国际物理学会的赞誉和肯定。1973年夏会见杨振宁时,毛泽东又十分有兴趣地同他讨论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这让杨振宁感到很惊讶。到了晚年,毛泽东还雄心勃勃地计划骑马去黄河源头考察。可惜,因体力不支未能如愿。

总之,当一个阶级、一个政党取得政权之后,首要的任务是巩固政权。巩固政权的办法、途径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经济建设的核心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尊重知识,尊重自然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

第七章

学 习 的 规 律

毛泽东,从一个不谙世事而又顽皮的稚童,成长为一代伟人,他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学习。他的学习活动像一般人一样,又胜过一般人,胜过一般人的地方在于,他是按照学习活动的规律去学习的,而不是想当然从事的。他曾这样说过:“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①。

幼年的毛泽东,从不大爱读“经书”,甚至还玩点小把戏“蒙”老师——在《论语》下面藏一本“杂书”,偷偷地看,到老师给他指一条最合适的为学之道——以“大同者,吾人之鹄”为导向,去研究“宇宙,人生,社会之真理”为学习目的,“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一步一步走到他生命的终点。当人们步其后尘,沿着他走过的为学之道行进时,不无惊讶地发现:这竟是不容违背的学习的“三大规律”:拜人为师,即师承规律;理想导向即志向规律;循序渐进即认知规律。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71页。

一 拜人为师

为学之人,都熟记唐朝韩愈的一句话:“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人在学生时代,受其老师的影响是巨大的,教师的知识、思想、品格和行为,“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般给学生以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深刻的,也可能是久远的。毛泽东生前就曾多次说到:在他的青年时代,老师对他“有很深的影响”,“我的知识,我的学问,都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他在1959年6月25日回到阔别了32年的韶山时,曾对罗瑞卿说过:“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

老师,对毛泽东进行过思想上的启蒙,老师给指点过迷津,老师驾驭着知识的航船,载着他,乘风破浪,从小小的韶山冲驶向了中国革命的大舞台。

毛泽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有学必有问,有问必有答。这一节就从“学问”二字讲起。

(一) 毛泽东常说,“学问”二字组成一词是很有道理的,要成为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便既要虚心好学,独立思索,又要好问,拜人为师,与人交谈,讨论

据许多研究毛泽东青年时期学习生活的人考证,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先后同三位老师交往最为密切,他们是杨昌济、徐特立和黎锦熙。而在这一时期,根据毛泽东的学习兴趣所在,学校的课程设置和老师的工作变迁等情形,又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与

三人中的某位老师关系最好。大致情况是这样的：第一阶段——1913年春到1915年离开长沙赴京，毛泽东同黎锦熙过从甚密；第二阶段——1915年至1917年秋徐辞去一师教职，毛泽东与徐特立交往特深；第三阶段——1917年至1918年春杨赴北大任教，毛泽东与杨昌济感情最好。

在这里，我们先说说毛泽东与黎锦熙的师生之谊。

1913年，大学刚毕业，仅比毛泽东长三岁的黎锦熙受聘到湖南省立四师担任历史课教师，他在毛泽东所在的班级——预科第一班教历史课。在这里，他受到了毛泽东等学生的尊崇。不久，毛泽东也因勤奋好学、成绩卓著受到黎老师的青睐。

在治学上，黎先生平生最服膺两个字，一是勤，一是恒。而两字中“恒”字更重要。他常对毛泽东说，世人多是“勤于始而怠于终”，所以无所成。他从青年时代就认定，这两个字，缺一不可，并且身体力行。写日记，他一写就是70多年，从未间断；搞语言研究，一搞又是70多年，全力以赴；从教更是这样，21岁开始登三尺讲坛，一登又是近70年，至1978年3月27日辞别人世，享年89岁。恒心、毅力加上科学精神，和注重实践与不断前进，是他有所成就、有所贡献的几个重要因素。在这方面，毛泽东深受其感染。在一师读书时，他就写过“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的著名对联，以此提倡“持之以恒”的学风。

正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刻苦学习精神，使他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功底，而丰富的知识正是他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重要基础。

毛泽东善于汲取他人之长。他常说：“学问”二字组成一词是很有道理的，要成为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便既要虚心好学，独立思考，又要好问，拜人为师，与人交谈、讨论。因此，毛泽东有特别好问的习惯，即虚心向他人求教的习惯。无论是读书听课，还是看报刊杂志，凡是不太明白的地方，从术语、名词、典故，到理论逻辑和思想内容，都要记下来，以便随时随地向他人请教求解。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对于毛泽东来说,黎先生不仅是他的良师,还是一位难得的益友。他不但在才学上敬佩这位跟自己年龄不相上下的老师,而且在思想见解上也服膺于他;他不仅在课堂上向黎先生求学问道,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黎先生的宿舍去释疑解惑,共同切磋学术见解,交换对政治形势的看法,探求人生与救国的大道理。因此,在一个时期内他们两人几乎到了形影不离的亲密程度。对此,黎锦熙在他1915年4月至8月所记的日记中及建国后其所撰写的《毛主席六札纪事》一文中,作了翔实的记载:

辛亥革命后,我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历史教师,毛主席于1913年考入预科,又升入本科……那时我组织“宏文图书编译社”,办《公言》杂志,又组织哲学研究组,共有杨昌济、徐特立等二十余人。大家都搬到一起住。毛主席每逢星期日常偕同学来参加学习讨论。见于我1915年日记,如:

1915年4月4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读日记,告以读书方法。

4月11日,星期日。上午一师学生萧子升、润之及焜甫(熊光楚)至,讲读书方法。

4月18日,星期日。润之、少青及执钦相继至,共话社事。

4月25日,星期日。上午游园(即“李氏芋园”),润之至,告以在校研究科学学术。

5月9日,星期日。润之至,稍谈读书事。

为什么是“稍谈”呢?黎先生追述道:“查我上一天即8日日记:‘日本已于昨日即5月7日下袁的敦书矣!’故9日对读书只是稍谈。对于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二十一条条件的消息是详谈的。当天下午日记云:‘公报号外,北京电,交涉已和平解决矣’,48

小时届满,无耻地屈服了。于是群情大愤’。毛主席写了‘5月7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于他所读的书页上。”

5月30日,星期日。上午焜甫、润之至,又晤季苑,久谈改造社会事。

7月11日,星期日。上午章甫同润之来,问“小学”(即语言文字学的旧称)功夫做法,余谓宜读《说文段注》。

7月13日,星期二。夜归,与润之、章甫读史法(时放暑假,两人都离校住宿《公言》杂志社中)。

7月15日,星期四。上午读《群学肄言》“教辟”章。与润之说研究法。

7月19日,星期一。上午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

7月20日,星期二。收拾《公言》杂志社编辑室。上午坐门间,阅《群学肄言》《缮性》篇,竟甚爽适,润之亦移坐此室。

7月21日,星期六。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精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

……

时正组办湖南《大公报》,9月1日创刊,同时我动身来北京……^①

从4月4日到8月29日,毛泽东共去拜访黎锦熙近20次,交谈内容甚广,包括读书方法、学术研究方法、改造社会的方法等,他们在一起还相互勉励、互阅日记。

毛泽东甚得黎先生赏识。黎在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力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1917年8月31日,黎锦熙在北京大学接到毛

^① 见《湖南第一师范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版,第103~104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泽东的信后写道：“下午，……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在这些求教及相互交谈过程中，他们既是师生，又是挚友，推心置腹，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毛泽东深有所获。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幸垂察焉。”“甚愿日日趋前请教。”就在这封长达两万一千多字的信中，“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事”，探究“宇宙之真理”、“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样的大本大源及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树雄心、立大志等问题。毛泽东于1918年、1919年两次赴京均前往黎府拜访求教。建国之初，毛泽东多次宴请黎先生，并邀其参加了开国大典，日后也不断邀见。

自1913年春毛泽东求学于湖南四师起到1976年逝世止，黎锦熙和毛泽东之间的交往保持了60多年。60多年间，他们的交往历尽了生与死、贫与富、贵与贱的种种考验，却愈发显得深厚。“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这句毛泽东最欣赏的太史公对于友情的精辟之论，用在他俩的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

（二）“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1937年2月1日，是“延安五老”之一徐特立60岁的生日。1月30日，在延安各界为徐特立举行60寿辰庆祝大会的前一天，正忙于制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毛泽东，怀着对师长的尊敬心情，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信给徐特立，为他祝寿。信中说：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

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

徐特立是毛泽东在一师时关系最密切的老师之一。在湖南一师,徐特立是位与众不同的老师。一是,他在生活上与众不同。他虽当选过省议会副议长,又担任长沙师范校长,是全省有名的教育家,生活却极简朴,穿着也极普通。一年到头,布衣布鞋,活像个乡下人;二是在教学上与众不同。他讲课时,声音洪亮,富于表情,常以手势助说话,很有感染力。他授课方法,生动具体,深入浅出,内容既丰富又扎实,深受学生欢迎;三是,他接人待物与众不同。他虽然为人严谨,执教认真,但对学生亲善随和,人称“徐二外婆”。

徐特立不仅品德和学识堪称一流,还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一套良好的学习方法。而后者,对于求知若渴的毛泽东,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影响。例如,他结合自己长期积累的“读书以少为主,以彻底消化为主”的经验,提出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之法”,就给毛泽东以巨大影响。毛泽东的《讲堂录》和《〈伦理学原理〉批注》,都是运用徐氏“读书之法”的成果。经过徐特立几年的熏陶,及至一师学习后期,毛泽东已把“不动笔墨不看书”当作读书的习惯定势,坚持不辍。他听课写有“讲堂录”,课后读书有读书笔记和批注,阅报写读报摘记或札记。同时,还有选抄全篇文章的选抄本,以及摘录精要的摘录本。例如,杨昌济先生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尚未成书,毛泽东就把书稿借来,一字不漏地全部抄了下来,然后进行阅读。此外,毛泽东还坚持每天写日记。从一师时期起,毛泽东养成的无笔不读书的良好习惯,他至逝世之前坚持不废。

1918年,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不久,就投身于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大革命之中。1925年,毛泽东回湖南,在拜访老师徐特立以后,便深入农村考察农民运动,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告》，反击了国民党右派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的奇谈怪论，高度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使湖南农民运动更加蓬勃发展。

1927年春，徐特立回到离别近半年的家乡，展现在他眼前的乡村面貌是全新的——恶霸地主的威风被打下去了，流氓、烟、赌也不见了。混乱黑暗的社会经农民运动一冲洗，顿时呈现出一片光明。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切，都深深地触动了徐特立。透过这些变化，他看到了火山般爆发的农民运动的力量，更感到共产党人的作用无比巨大，也体察到他的学生将改造社会的抱负化作了行动、潜心从事农民运动的远见卓识。于是，他毅然决然参加了农民协会，并担任教育科长，兼任湖南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在50岁上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当毛泽东得知此消息后，大加赞赏说：真是疾风知劲草，岁寒知松柏啊！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徐特立和全体红军将士一样，有着一一种绝处逢生的欣喜和庆幸。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感到由衷的叹服。联想到韩愈所讲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感到应好好地向自己过去的学生毛泽东学习，更加自觉地接受他的领导。这期间，当人们提起他曾是毛泽东的先生时，他总是真心诚意地说：“从前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当过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那只是一日之师，而毛主席是我的终身之师——是他带我这个老朽走上了革命道路。泽东同志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特别是他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此外在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各方面都有很深厚的造诣。他的知识是多方面的，非常渊博。他的最大特点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自以为是。”言语中，充满了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与尊敬。

毛泽东从老师徐特立身上也学到了许多在有字之书上的根本学

不到的东西。徐特立得到毛泽东那样的高度评价、那样的殊荣,也是“货有所值”。建国之初,毛泽东尽管党务、政务和军务十分繁忙,仍忘不了他和徐特立的师生情谊。一次,毛泽东特地派人来到徐特立的住地,邀请他到中南海家中吃饭。席上,还专备了几样家乡风味的菜肴招待老师——一碗湘笋、一盘青椒,这是两人都爱吃的。毛泽东抱歉地说:“徐老,请你来,没有好菜吃。”徐老笑着说:“人意好,水也甜嘛!”上桌前,徐特立谦和地对毛泽东说:“你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应该坐上席。”毛泽东马上说:“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更应该坐上席。”硬是让徐老坐上了上席。

1968年11月28日,在那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徐特立——这位革命老人,带着许许多多的忧虑,带着对他未竟事业的无限牵挂,在北京辞世,享年91岁。毛泽东在送给他的花圈的缎带上写着:“平凡伟大马列真,一代师表启后昆。道德文章垂万世,堪称革命一完人。”

(三)“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

杨昌济,字华生,1871年4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隐储山下的板仓冲,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喜读孔孟之书,尤喜程、朱之学,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1903年留学日本,改名怀中,意即身在异邦,心系中土。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就读三年,并短期考察,游历德国、瑞士,西学知识大增,尤其对西方的哲学、伦理学思想有较深厚的造诣。归国后,他数次拒官而从教,进湖南第一师范,以教育为天职,以育才为己任,“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长天”。1919年赴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1920年长逝于京郊西山,享年49岁。对杨昌济一生,当时曾有人评价说:“君于三十以前,既已博究儒先之说,十余年来,又益研英日学者之说,意量之渊远,大有得于时代精神。其意气似纯出于和平,而其心光湛然,力抗流俗,而浩物有自得于己……君,寒士也,诚乐乎道,而不一穷饿动其心,此其学之所以日进不已也。”^① 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期的伦理学老师。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追忆起那段经历,说:“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100分。”^②

在一师任教期间,杨昌济的学生数以百计千计,但却惟独对毛泽东特别欣赏。在1915年4月的日记中,他对毛泽东的出身、经历,专门作过一段详尽的记载: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

① 李肖聃:《杨怀中先生逝世再志》,载1920年1月20日长沙《大公报》。

②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版,第33页。

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①

一位颇有名望的老师，专门就一个普通学生的家世和履历写下一篇日记，实属少有；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的评价，出自一向严谨的杨昌济之笔下，则更为鲜见。从中，人们不难看出：杨先生对出身农家的学子毛泽东，是何等的看重！

杨昌济如此喜欢毛泽东，而当时的毛泽东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老师呢？在后来给已赴北京大学任教的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曾写道：“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杨先生“弘通广大，最为佩服。”^②

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是思想文化的，又是人格的，在当时一师的教师之中，论口才，杨先生并不很好，但他既博学多才，即在精通中学的基础上，又较系统地了解 and 掌握了西方的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真正做到了学贯古今中西，但总的来说，他是中体西用论者，他恪守中学，特别是以宋明理学为主的新儒学，辅之以西学。但他的思想体系仍然囿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文化的框架；他的人格则是以传统儒学的忠、孝、信、义、悌、礼、智、诚、廉和宋明的主敬、静等为特色的儒雅者人格；他又很注重实际，他所选择的人生之路则是以修身为本，以教育为天职，通过培育长天之材，达到治国之目的。所以，他的课还是很受欢迎的。加之他与一师的一些资深教师，如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王季范、易培基等人过从甚密，这样，自然而然地就吸引了一批“尖子”学生聚集在他身边。大家对他心悦诚服，听讲非常用心，并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到杨昌济家中请教。

^① 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6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78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毛泽东的同学、新民学会基本会员之一的张昆弟,在他 1917 年的日记中,如实记载了毛泽东等一师学生到“板仓杨寓”聆听教诲的情况,他写道:

8 月 22 日,晚餐后至板仓杨寓,先生谓读书之要,在反复细读,抄其大要;不在求速求多,反毫无心得也。又谓向吾之理想生活进行,文章誉望,听之后人。又曰,不计较于现在之社会。又曰,势力不灭。又曰,渐蓄其力而乍用之。

9 月 8 日。去年杨师谓余曰:克己之功夫多,存养之功夫太少;须从存养多下功夫,则可免克己之苦矣。

9 月 13 日。晚饭后至板仓杨寓,杨师为余辈讲“达化斋读书录”。后又谈及英国人之做事务实。^①

另据杨昌济的儿子杨开智回忆:

1916 年暑假,怀中先生在板仓家中度假,暑假期间的一天,毛泽东从长沙城出发,步行了一百二十华里,来到我们家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板仓。毛泽东在板仓期间,曾以很大的兴趣浏览了我父亲的藏书,特别是新订的书报刊,和我父亲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②

对于毛泽东而言,他从杨昌济那里得到的最大收获,莫过于理想、志向和抱负。杨昌济常对毛泽东讲,“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要臻此完美地步,就必须立志,必须经受住

① 见《湖南第一师范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9 页。

② 见《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青少年时期革命实践的片断》,杨开智,载 1977 年 9 月 7 日《文汇报》。

意志的磨练。他在解释孔子“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时，说：“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所谓意志坚强者，是指“对于己身抑制情欲之模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故“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而“不可夺之志”，就是确定自己的坚定信仰，不可随便抛弃自己的主义。他说：“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曰，人属于一社会，则当其为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自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①由此可见，尽管杨昌济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但他所倡导的人生观却是积极向上的。

杨昌济的这些见解，给毛泽东以很大影响。他在《讲堂录》中写下了自己的感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高尚其理想”^②“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③这表明，毛泽东开始懂得“高尚其理想”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并已经作好为实现理想而不惜牺牲自己身家性命的精神准备。

1918年6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举家迁往北京。临别之前，毛泽东等去火车站为老师送行。在火车即将启动时，杨昌济再三叮嘱：“润之，你们要抓紧学习，力争顺利毕业。记住：多写信，常联系，有了困难请告诉我，我是不会忘记做老师的责任的！”

从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和多数同学并不急于谋职，都想趁年轻

① 杨昌济：《论语类钞》，长沙宏文编辑社1913年出版。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89页。

③ 同上，第590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继续升学深造,可又苦于无钱,连自学的栖身之地也没有,处于彷徨状态之中。这期间,毛泽东给杨昌济写了一封信,谈了他和同学们眼下的窘境,请老师给指路。

不久,蔡和森从北京写信给毛泽东,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希望他“到北京来,一面主持勤工俭学事宜,一面入北京大学学习”。毛泽东等20余人,于9月上旬抵京。

毛泽东在京期间,作为父亲般的仁慈长者,杨昌济精心照料了毛泽东的生活,关怀着他的个人婚娶大事;而作为老师,杨昌济更注重毛泽东知识的长进、学问的更新。不久,毛泽东成了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并在李大钊的指导之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与此同期,毛泽东与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相知相恋。

1920年1月17日,病魔永远夺去了杨昌济——这位勤奋学者宝贵的生命。毛泽东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为先生守灵,以尽人子和学子之孝。

就在杨昌济辞世的这年冬天,毛泽东和老师的爱女杨开慧自由结合了。从此,毛杨“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

二 大同者,吾人之鹄

毛泽东,一生为追求真理,为实现其“大同”理想而不懈奋斗——他信仰过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受过胡适、列夫·托尔斯泰的影响,他还信仰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等等,然而当他把这些人物、思想和主义放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这个伟大理想的天平上加以衡量之后,如发现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便毅然摒弃,继续探索

新的真理,树立新的理想。正是在理想的导向之下,“只要有规律,有方法”,又凭着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支撑他的学习生活经过一条崎岖不平的探索道路之后,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家、理论家和学者。

(一)“大同者,吾人之鹄也”

青年毛泽东曾憧憬过“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并以此作为自己学习活动的向导。

大同思想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礼记·礼运》早就揭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鰥、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的思想。到了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康有为著《大同书》,倡言“近者自由主义,实为太平之基”,若“全世界人类尽为平等,则太平之效渐著也”。这就使“大同世界”具有了资产阶级理想王国的性质,同时也杂糅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毛泽东早在少年时代就是康有为的崇拜者,辛亥革命以后,康有为“从枝节入手”的变法维新主张虽早已褪色,但大同世界的思想却仍然具有相当魅力。所以,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仍然念念不忘“大同者,吾人之鹄也”。该信对在封建专制统治下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愚人”、“小人”充满深切的同情,对未来的“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的“大同”的美好理想表现出由衷的向往,并“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①

天人合一论是一种以“有机整体”为基调的宇宙观,也是我国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9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传统哲学思想的特色之一。庄子曾经幻想过绝对自由的“逍遥游”，他放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生死无终始者为友”，把自己寄托于超出形骸之外的精神活动，其实质是要通过取消主观能动性，使人完全顺从自然的命运。孟子也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与天地同流。”同庄子的倾向性恰恰相反，他是夸大主观能动性，通过培养和发展唯心主义的“浩然之气”来达到“与天地同流”的境界。青年毛泽东的理想王国也融入了“天人合一”的色调。他所憧憬的“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是把“天”与“人”看成一个息息相通的有机整体。不过，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他既不像庄子那样消极地顺应自然，也不像孟子那样潜心于养气，而是更重其自身的理性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在于“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因此，他企望有圣贤出世，通过“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便是实现“世界大同”、“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张昆弟 1917 年 9 月 22 日的日记中，记述了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交谈的一段话，具体地揭示了他通过改造哲学、伦理学来改造现实世界的思想：“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人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①俄罗斯 19 世纪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曾经在写给中国人民的一封信中指出，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和俄罗斯以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639 页。

及东方国家的形势有相同之处,“所有这些国家的人民都已面临这样一个时期,即他们已不可能更长久地停留在如像以往对待自己的统治者的关系之中”。青年毛泽东所崇拜的正是这种不安现状、决心立志变革的精神,至于国人,他和蔡和森、张昆弟多对谭嗣同和陈独秀表示钦服。这两个人,一是戊戌维新“冲决网罗”的先驱;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树此两人作为楷模,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等人所倾心仰慕的,正是在探求“宇宙之真理”的过程中思想最解放、斗争最勇敢、不怕砍头、不怕牺牲的先进人物。他所坚持的“改造国家,改造社会”、“大同者,吾人之鹄”的方向是正确的,只是过高地估计了圣贤(“大气量人”)的作用,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同时,他的“改造哲学”、“改造伦理”的路,也不是很正确。

事实上,青年毛泽东的历史观本身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尊崇圣贤而低估民众,把民众称为“不得大本”的“愚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人心中都有部分真理,只要开智蓄德,可以“跻于圣域”。正是在这种“圣”、“愚”可以转化的认识上,他发出了“倡学”和“普及哲学”的号召。他说:“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心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褪匿。”他认为,通过普及哲学,“愚人”可以转化为“圣人”。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开始确定“民族联合的力量最强”的唯物史观,但他仍十分重视“倡学”的作用。“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数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他认为“学者”通过“倡学”把哲学交给了民众,民众就会成为“改造国家,改造社会”,实现“大同世界”的积极力量。青年毛泽东“怀此理想”,“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他就是这样在理想的导向下,而“有志于学”的。

(二)“钢刀快不快,要试一试才晓得。我看,这个‘新村主义’倒不妨试一试”

青年毛泽东的“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的理想,不只停留在与老师、与同学的书信来往,或相聚一块的口头探索上,他还借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曾就大同之说作了密密麻麻的批注,起初,他还 将“大同”之说斥之为谬误之理论。下面这段话是他由衷而发的:

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乎?①

毛泽东还分析了大同之说产生与存在的心理基础,断言它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一样,是种莫须有的虚幻之境。他甚至断言:人们将来不堪大同之境况,并否定了自己曾有过的“大同者,吾人之鹄”的梦境。他批注到:

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

吾尝梦想人智(皆)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184 页。

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①

但是，这一理想之境毕竟太迷人、诱人了，时时会闯入青年毛泽东的脑海里，令他遐想不已。那么，对于崇尚实践、富有浪漫精神、立志改造社会的毛泽东来说，他能就此否定“过去”而滞步不前吗？不会的，他决不会的。

1918年夏，毛泽东从湖南一师范毕业后，便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寄居在湖南大学筹备处——岳麓书院半学斋，一面自学，一面从事社会实践——游学及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与探索。

一天，毛泽东对蔡和森说：“最近我从一份报纸上看到，日本有位自然主义作家，叫武者小路实笃。他很不满意现存的社会制度，主张建立一种‘新村’，消灭那些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提倡‘新村主义’。在‘新村’里，一切财产都是公有的，人人平等，个个自由，公共劳动，一起生活，简直是一个无比美妙的仙境，如果真要实现了，那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

毛泽东联想到他在省立图书馆自学时读过的欧洲人——莫尔、康帕内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那样一些矢志不渝的追求者和奔走呼号者，欧文那样的真诚实验者以及康有为对“大同”之境的详尽设计者，他越想越不能自己，越想越浮想联翩，激动地说：“钢刀快不快，要试一试才晓得。我看，这个‘新村主义’倒不妨试一试。”

蔡和森听后，表示赞同。于是，他们便集合了十几位对此具有浓厚兴趣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岳麓山上“实验自己的新生活。”因不久毛泽东赴北京筹划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新村”实验也就暂中止了。

1919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从北京回到湖南，因在北京接触一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84～186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些新思潮,并且听到了“社会主义”这一新名词,觉得新鲜,又与“新村主义”有某种相似之处,于是仍想继续实验“新村”生活,筹划“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①是年冬,他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具体描绘了这一计划。

他首先设想了他的新学校以及新教育。这种学校教授之时间,宜力求减少,使学生多自动研究及工作。学校每天的时间应划分为六部分即:“睡眠二分;游息一分;读书二分;工作一分;而读书二分中,自习占一分,教授占一分。”若以实际时数分配,即:“睡眠八小时;游息四小时;自习四小时;教授四小时;工作四小时。”他强调指出:“上列之工作四小时,乃实行工读主义所必具之一个要素。”^②

毛泽东还专门谈了工作的性质和内容。他认为“新村”里的所有工作事项全部属于农村、农业劳动性质。其劳动的具体内容,可分为六大种类:一是种园,其中以花木、蔬菜为主;二是种田,其中以棉、稻及其他为主;三是种林;四是畜牧;五是种桑;六是鸡鱼。在新村里没有工业,也没有商业。那么,怎样才能使这些传统的农业项目成为“新村”生活的一部分呢?毛泽东说:“所举田园树畜各项,皆旧日农圃所为,不为新生活,以新精神经营之,则为新生活矣。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号称士大夫有知识一流,多营逐于市场与官场,而农村新鲜之空气不之吸,优美之景色不之赏,吾人改而吸赏此新鲜之空气与优美之景色,则为新生活矣。”^③

毛泽东指出:“工作须为生产的,与实际生活的。”这样做,可以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449 页。

② 同上,第 449~450 页。

③ 同上,第 455 页。

消除两大弊病：即现行教育中，“学生在校所习，与社会之实际不一致，结果学生则不熟谙社会内情，社会亦嫌恶学生”。如果实行工读主义即可克服此弊病。这是其一。其二是，现行教育，“学生毕业之后，多鹜都市不乐田园”，结果造成“农村无学生，则地方自治缺乏中坚之人，有不能美满推行为患。又于政治亦有关系，现代政治，为代议政治，而代议政治之基础筑于选举之上。民国成立以来，两次选举，殊非真正民意。而地方初选，劣绅恶棍武举投票，乡民之多数，竟不知选举是甚么一回事，尤无民意可言。推其原因，则在缺乏有政治常识之人参与之故。有学生指导监督，则放弃选举权一事，可逐渐减少矣。”^①

毛泽东还对工作的性质做了严格的规定：“第一，须有一种经济的工作，可使之直接生产，其能力之使用，不论大小多寡，皆有成效可观。第二，此种工作之成品，必为现今社会普通之需要。第三，此种工作之场所，必在农村之中；此种之工作，必为农村之工作。”^② 这也就是说，在这里，所以使之直接生产，所以使之合于农村及农业之实际生活；其目的还在于养成乐于农村生活之习惯。

毛泽东还详尽论述了“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其关系”，“真欲使家庭社会分步者，不可徒言改良其旧，必以‘创造其新’为志而后有济也”。“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因为，“劳动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会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弟子欲求完全之人格独立，非在家庭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③

“新教育中，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51 页。

② 同上，第 451～452 页。

③ 同上，第 454 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多”。由此，他推论说：“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把学生工作的改革与整个社会的改革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认为，这种宏大的改革计划，不是区区“改良其旧”云云所能奏效的，必须在“创造其新村”之后才能实行。他还十分具体地指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①

毛泽东这一“改造社会”理想的出现，是有国际经验之可借鉴的。“夫论政治革命之著明（名）者，称法兰西；论社会革命之著明（名）者，称俄罗斯，所谓‘模范国’是也”。“俄罗斯之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日本之青年，近来盛行所谓‘新村运动’。美国及其属地斐（菲）律宾，亦有‘工读主义’之流行。吾国留学生效之，在美则有‘工读会’，在法则有‘勤工俭学会’。故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造也”。^②

指导这一新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是：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

这种美妙的“新村”蓝图一直浮现在青年毛泽东的脑海里。在第二次去北京时，他还兴趣十足地参观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并立即就此写信告诉给同学陶毅：“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认为能否成功，由“工读互助团”里成员的能力和道德所决定。他并没有意识到“新村主义”是一种远离现实的空想。

一个月后，即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写信给同学周世钊时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同上，第454～455页。

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①毛泽东从北京去了上海。在上海,他还和陈独秀、王光祈、彭璜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工读互助团”。

毛泽东关于“新村”的设想,虽然其实质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东西,其失败是必然的,但其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理想,并未因此而破灭,反而随着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滋养和社会实践的步步深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成熟,终于使其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理想,由梦想、幻想和空想而变成为一种科学、一种现实的东西。因为,理想一旦成为事实,就不再是理想,这时,人们会有更新的理想。

(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理想之所以为理想,是因为它源于生活,又理想于生活。现实生活,不乏真善美的事物,故人们热爱现实生活,而现实生活又到处是假恶丑的东西,故人们又不满足于现实生活,想改造生活,并企望创造一种理想的生活。所以,理想便对人们有种号召力、吸引力,对人的学习,对人生起一种导向的作用。人,就是这样一种有理想、有追求的动物,哪怕在追求中碰得头破血流,付出这样那样的代价,做出这样那样的牺牲,也从不反悔,还是要继续追求下去。

远的不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75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习。可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学日本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下去,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

这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他在1918年至1919年两次北京之行,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之前,中国近代史——60年情况的概括和回顾。

在1918~1919年这两年中,毛泽东开始接触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潮,但他的政治立场基本上仍然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在1919年7月21日发表于《湘江评论》上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他说:“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惯,非死人不加议论,著

述不引入今人的言论,恰成一反比例。我们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是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老先生最不喜欢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①这说明,第一次北京之行,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他在北京求得了新知识,结识了新朋友,增加了新的社会活动经验,开阔了视野,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开始接触了同他思想、精神方向最为吻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直接置身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腹地,使青年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正在走上中国现代历史的舞台,即将站到时代潮流的最前列。但他毕竟还没有走上中国现代史的舞台,也还没有站到时代潮流的最前列,因而思想中仍然还保留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杂质。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第二次北京之行,使他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年以前,为了筹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首次来到北京。在京期间,他通过《新青年》和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及有限的材料,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接触与了解,但同时仍“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这时,他的思想“还是混乱的”,处于“正在寻找出路”的阶段。而时代在巨变,形势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待毛泽东这次到北京时,北京的政治空气已十分活跃,五四运动已爆发,十月革命的影响更加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也日趋广泛。1919年7月,苏俄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声明废除沙俄时代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1920年2月,苏俄政府又发表了同中国政府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通告。这些宣言和通告,都突破了当时中国反动政府的严密封锁,公布了出来。各界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68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人士对此反映十分强烈。全国三十一个社会团体发了热情洋溢的谢电,《天问》周刊发表文章,明确提出中国人民应“和俄国农民、工人阶级、红军相提携,为自由而奋战,先竭力打破国内军阀的强权,再竭力打破各国的强权”。报纸杂志上,介绍俄国革命和宣传、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日益增多,有些进步报刊还摘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部分章节,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简要传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以及一些介绍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与此同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相继成立,从而形成了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热潮。这些都使毛泽东有更多的机会,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

有了这些良好的客观条件,毛泽东在北京的几个月时间里,便尽力搜索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图书报刊、文章,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思索着。据黎锦熙回忆:1920年1月4日下午,他去“平民通信社”社址会晤毛泽东时,看见毛泽东正在读《共产党宣言》,案头上还放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各种有关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及报刊。^①

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给予毛泽东以极大的影响。他在后来回忆这时的情形时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党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②

在第二次北京之行期间,同李大钊的频繁接触,对毛泽东“能

① 黎锦熙:《在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载1977年9月14日《光明日报》。

②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45页。

很快的发展,走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路上”,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49年3月下旬,当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时,毛泽东曾无限感慨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京赴沪。临行前,李大钊对他说:“你不妨再找一下陈独秀先生,他现在上海,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俄国革命也颇有研究,对中国的现状和前途有独到的见解。”毛泽东后来回忆说:“1920年我第二次前往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我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他又回忆说:“我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

1920年6月14日,上海《申报》发表了毛泽东与彭璜草拟的《湖南改造促进会发起宣言》和《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这两篇文章“特将军务、财政、教育、自治,人民自由权利,交通各大端,列成条件,征求各地湘人公意”,并勾画了未来湖南的蓝图,提出湖南未来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革命政府、军队、警察和严密的政府机构,要有法律制度,各种群众团体,人民要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等。所有这些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不能认可的。现在毛泽东提出这样的改造湖南纲领,表明他在对各种主义、学派的比较研究中,对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动摇进一步加剧,并开始抛弃无政府共产主义。

^①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2版,第43、46页。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进一步接触和对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抛弃,为毛泽东最终选择走俄国人的道路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三 先博而后约

从1902年夏天进韶山南岸私塾读经书开始,到1918年夏天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除其中有两年半耕半读和半年投笔从戎外,其余时间或在学校读书,或者自学。在前后16年的光阴中,他的知识的积累,走的是一条启蒙——知之甚少——博而后约,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样一条认知路线。

1917年夏,毛泽东在《〈一切入一〉序》中说:“予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蕃衍,势有不可究诘者。惟文化进矣,人之智慧亦随而进,则所以究诘者,仍自有道也。”^②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涂”和“道”就是指学习认知、积累知识的规律。任何人,要想获取真正的知识,在遵循其他规律的同时,也必须遵循学习的认知规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0~1471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律,先博而后约,如果违背这一规律,是不可能学习得好的。

(一)“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

自古以来,我国儒家学派一直认为,人的学习过程是有顺序的,人的智力是有发展顺序的,知识系统的构成是有顺序的,因而,在治学方法上儒家特别强调循序渐进。最早提及循序渐进的要算孟子。他认为,学习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就像流水一样。“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孟子·离娄下》)意思是说:有源头的泉水昼夜不停地流,等到灌满了沿途的坑坑洼洼,再继续前进,最终流到大海,如果它不先把沿途的坑坑洼洼注满,就不能向前流入大海。如果在学习过程中不遵循这一规律,急躁前进,其结果必然是“其进锐者其退速”。(《孟子·尽心上》)也就是说,学习上前进得太猛,气力容易衰竭,后退也必然会很迅速。

荀子也认为,一个人要想获得更多的知识,必定是通过不断积累而成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取。用他的话说,就是“骐驎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意思是说,千里马一跃,不能超过十步远;劣马跑十天,也可以达千里之遥,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不停顿地前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学习过程中不能随意冒进,而应循序渐进的道理。对于熟读“经书”的毛泽东来说,他是深谙学习应循序渐进的道理的。

毛泽东自幼年起,在学习上就刻苦攻读,持之以恒。到了青年时代,他便认识到:人格的完善和学问的长进,都有赖于“积累”,他看重“现在”,强调以“久”制胜。在《讲堂录》里,他写道:

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蓄，则终身不得矣。

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①

1917年夏天，应同学萧子升的邀请，毛泽东为萧子升的《一切人一》读书笔记写《序》道：

予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蕃衍，势有不可究诘者。惟文化进矣，人之知慧亦随而进，则所以究诘之者，仍有自道也。顾究诘也同，而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等积矣，又有大小偏全之别，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此与夫执一先生之言而姝姝自悦者，区以别矣。虽然，台积而高，学积而博，可以为至矣，而未也。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以异乎无台与学也。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积之之道，在有条理。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于一科之中，复剖分为界、为门、为纲、为属、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今而有志于学，不遵斯道焉，固未可以薊（蕲）其精矣。虽然，犹未也。博与精，非旦暮所能成就，必也有恒乎？曰，日行不怕千万里。将适千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601 页。

里,及门而复,虽矻矻决不可及,恒不恒之分也。君之为此本也,意果存乎是,而欲尽其力以致之欤!此本之将以为积,审矣。搜罗万有,以博其心胸,抑又无疑。惟是札□兼收,小大毕聚,虽美于目,而未必可悦于心,则宜有以条理之,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焉。又持之以久远,不中涂而辍。诚若是,则固百丈之台之基矣,而予又奚疑!①。

这篇“序”字,无疑是他自己治学经验的总结,也是一篇自勉。

青年毛泽东,在求学过程中,由于不懂学习的认知规律,曾走过弯路,费力而不得真谛。幸被老师发现,给予指正,给予教诲,才少走了许多弯路。这事发生在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

一天,一位叫袁仲谦的国文老师,在与毛泽东交谈时,指出了他在学习上存在的不足之处,谈了他从几十年教学实践中体验出来的真知灼见。

谈到学习态度,袁仲谦认为毛泽东苦读和巧读结合还远远不够。他提醒说:从早到晚读书不停,不过是苦读而已。青年正是长身体的时期,长此以往,必将难以为继;脑瓜灵活,会读书,不过是凭天分而已,不刻苦钻研,长期积累,必将安逸而畏劳苦,终使学业荒废。所以,古人有“椎鲁朴钝,非学者之患;聪明绝异,学者之深患”一说。只有把聪明与勤奋联在一起,就如同禾苗既得农人辛勤耕耘,又赖阳光雨露滋润一样,方可茁壮成长,蒸蒸日上。谈到读书规律,袁先生对毛泽东说:“书犹如药,善读可以医愚,不善读,则愚上加愚,岂不更愚!”所谓“善读”,就是要寻出一条为学之道来,学习的路找对了,岂能学不好?那么,怎样才算“善读”呢?袁仲谦的理解是:从宏观上讲(亦即总体的书),一要博,二要精。博,就是泛读各类书籍,好比鲸鱼张开大口,把小鱼、小虾,甚至是海藻泥巴都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2~83 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吃了下去,只求吃饱肚子;精,就是重点研读书中精品,好比牛吃草料,吃了以后再吐出来,慢慢地反刍、消化,为的是吸收养分。从微观上讲(亦即具体的某本书),要求悉心“详玩”。读书之法,在于循序渐进,熟读而精思。比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欲速是读书第一大病。功夫只在绵密不间断,不在速度。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往来接应不暇,如看场中美景,一眼却过,于学无益。所以,读书要力求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书上,则眼就看不仔细,心和眼既然不能做到专一,口中却只知漫不经心地诵读,那么就定然不能记住内容,记住的也不能长久。“三到”之中,心到最重要,心既到,眼和口自然会到。总而言之,既要博览群书,又择选精华,使“博”与“约”结合起来。对于重要的、有价值的书,要钻深读懂,反复研读,切忌贪多求快,囫囵吞枣,不讲效果,违背认知规律读书。惟其如此,方能日新、月异、岁益。

为了指导毛泽东有规律的读书学习,袁仲谦还给他开列了一份“必读之书”的清单。这使毛泽东受益匪浅。上面说的那篇“序”文,就是由于袁先生海之有所悟,才写出来的。20年之后,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他还回忆说:“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辞。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①由此,毛泽东从袁先生那里受益是多方面的。

1920年6月7日,毛泽东于一师毕业之后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谈到学习时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

^①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33页。

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①

1937年,毛泽东在撰写《实践论》的时候,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概括和总结出了学习的认知规律:“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②

(二)“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

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中庸》提出的关于学习认知规律的重要命题。目的在于强调人学习书本知识,必须通过广学深思、辨别真伪、且付诸行动才能获取有用的知识,因此要自觉地遵循这样一条认知路线。1915年正在湖南省立一师求学的毛泽东,恰处于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的时期,读了《中庸》,之后,非常推崇其所言的治学之道。于是,在1915年9月6日写信给同学萧子升,说:“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以宜遵循。”^③

这封信里所说的“朱子补《大学》”诸语,是指南宋大儒朱熹《大学章句》里“释格物致知之义”一段。《大学》里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7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92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1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齐家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一段。“格物致知”是儒家学习思想的一个认识论命题,历来解释颇多分歧。简而言之,就是即物穷理,通过实践(格物)来获得知识(致知)。青年毛泽东在信中引用朱子这段话的大意,也是强调在学习研究过程中,要自觉地遵循认知规律,求得深刻道理,辨别事物表里精粗,提高心性修养水平。因此,博学不仅仅是为了求知,也是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所说的:“为学奚假乎是?是须有条理有秩序,紊之则无以为条理秩序,以媵吾心而缮吾性,为学之道孰大焉。”^①毛泽东接下来所引的孔子“博学于文”,出自《论语·雍也》:“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意思是说,君子只要广泛地学习古代的文化典籍,并用周礼来约束自己,就不会背离君子之道了。信中引的孟子“博学而详说”之语,出自《孟子·离娄下》:“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意思是说,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解说,在融会贯通后,回到简略地述说大义的地步。毛泽东认为,学习中先博而后约的认知规律,是天经地义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能认识它、遵循它,而绝不能违背它。

为了说明“博学”之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古代圣人贤哲们遵循“博学”认知规律的历史传统性,青年毛泽东把《中庸》、《大学》、《论语》、《孟子》及朱子所补《大学》中有关“博学”的论述都引述了。这一方面,说明他确实熟读过“四书”,很是“背得”,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孔孟的信仰程度——以圣人之言为学习活动的准则。

与此同时,在这封信中,青年毛泽东还依循“博学”这一认知规律,总结自己的感悟,进一步提出了“通识”的命题。所谓“通识”,就是在“观古今之群籍”的基础上,将原来零散的、互不联系的知识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3页。

贯通为一个整体的知识。例如：“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在毛泽东看来，无通识或缺少通识的人，做起事来很容易犯错误及至遭致失败。他以王安石“变法”为例，因其无通识，所以“错此则必败”。他在信中说：“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当之策也。”毛泽东认为，这样的历史教训在于其不循学习规律，值得引以为戒。因此，毛泽东表示，自己要“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也”。^①

(三)“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的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几亿农民都要写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

遵循认知规律，按规律学习，是学有所成的必由之路。如果不按认知规律，或者违背认知规律，那将是怎样一种情景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有一个人人头脑发热，热到几乎100℃的时代，那就是所谓“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1958年。那时什么事情都搞“大跃进”，连学习写诗也搞“大跃进”。这种“跃进”，并非历史的必然，并非合乎规律，那是中央领导人，尤其是毛主席发动的。这一年，中国出现了一个民歌运动。这个运动的出现，同毛主席的倡导有关。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工作会议上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指毛泽东亲自挑选和批示印发的唐、宋、明三代诗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2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引者注)。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几张纸,写写民歌,这个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民歌。”在同年4月的武汉会议上的一次插话中,毛泽东又提出:各省搞民歌,发动学生们写,军队从士兵们中搜集。

收集民歌,在古代叫采风,目的是“观风俗而知得失”。民歌的内容也多是“怨刺上政”。例如,《诗经》中的《风》一类诗歌,即是。风是各地方的乐调,“国风”就是各国土乐的意思。民歌的采集方法,先秦书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汉朝人却作过一些说明。《汉书·食货志》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天子。”这是说周朝负责采诗的人是“行人”之官。《公羊传》却说:“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民间采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这是说,国家为了采集歌谣还养了大批的人。在新社会,采风能辨时代的脉搏,观人民的心理,振奋民族精神,发扬革命志气。因为民歌的内容是对新生活,对自我力量的热情真诚的歌唱。这大概是在这段时期毛泽东注重民歌收集的一个重要原因。周扬发表在1958年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上的《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中说得很清楚:“解放了的人民在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的或文字的创作上表现出来。不表现是不可能的。”于是,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倡导,全国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搜集民歌的运动。”

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在题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中,曾做过这样的概括:“在农业合作化以后的大规模的生产斗争中,农民认识到劳动的伟大,集体力量的伟大,亲身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就能够高瞻远瞩,大胆幻想,热情奔放,歌唱出这样富于想像力的、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杰作。”于

是,农民的形象在这些作品中早已不是呼天抢地的杨白劳了,而是足智多谋的“鲁班仙”,打闹天宫的孙悟空,英姿飒爽的花木兰、穆桂英,以及治水的圣人“大禹王”。它们否定了曾经世代代压在他们头上的“玉皇大帝”和“海龙王”,而自豪地说:“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他们深信自己能够使“万水千山听调动”,使自己家乡的粮食增产的水平迅速地“跨黄河,过长江”。总之,人们摔掉了压在他们头脑中的一切旧东西,抬起头来蔑视一切因袭势力,不再迷信鬼和神,相信自己就是神,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克服任何困难,他们不再盲目地在自然力面前屈居奴隶的地位,而要做自然界的主人,向自然界发号施令了。这种精神,这种自信,这种思想解放的景象,不正是毛泽东倡导并十分乐于看到的吗?

“大跃进”初期的民歌主要是表现人们在生产斗争中神话般的力量气概。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展开,民歌的主题又转向对新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风貌的神话般的颂扬。于是,天上的神仙们也耐不住人世间的诱惑,主动要参加人民公社了:“神仙来到大公社,个个申请当社员。牛郎耕地自带牛,织女纺布会种棉。王母娘娘爱儿女,参加公社幼儿园。玉皇没有啥技术,食堂来当炊事员。九天仙女下了界,可打腰鼓作宣传。”

大跃进中产生的民歌,想像是极其浪漫的,但内容则多为空泛、浮夸的口号。就连郭沫若此期的诗作也无不如此。例如在《太阳问答》组诗中的《合唱:》“感谢党呵感谢党,党是不落的红太阳。东风压得西风倒,社会主义放光芒。鼓足干劲争上游,多快好省建天堂。红旗插遍全世界,红旗插在头顶上。”艺术也自有艺术的规律。就其艺术形式而言,当时由郭沫若、周扬选编的《红旗歌谣》,收入其中的300多首歌谣,被编选者在序言里称为“形象鲜明,气韵生动,音调和谐,形式妥帖……成为不朽的典型”的作品,毛泽东看后也认为“水分太多”,并对周扬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还是旧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民歌好”。为什么？旧民歌是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积累才涌现大量佳作的，并已将许多味同嚼蜡的作品淘汰了。本来，民歌的形成和发展，是循于自然的，有规律的，但一旦搞起“运动”来，就打破了常规，不那么自然了，而纯乎是人为的了。而“大跃进”民歌，由于采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创作，自然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诗意无多，有的甚至连韵句都不齐，沦为标语口号。收入《红旗歌谣》的便有这样的作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好像四十颗太阳当头照，太阳也比不上它温暖，处处地方它都照到……没闭住的嘴巴笑出了声，咱社员们有了指路的大明灯。”

民歌运动开展一年后，毛泽东在1959年3月郑州会议上对其弊端作了分析：“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的发展。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几亿农民都要写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故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这实际上是对他在上年成都会议上谈“民歌”观点的一次否定。这次会议之后，报纸上文章一发，放诗歌卫星，随之取消了。

第八章

学 习 的 范 畴

毛泽东很少使用“范畴”概念,也没有对“范畴”下什么定义,但从他关于学习的思想理论中,仍可以找出许多关于学习范畴的一些见解。当然,我们这样做,一是根据列宁的一些论述:“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①人自觉地把自已同自然界区分开来,也就是把认识主体同被认识的客体区分开来,把实践主体同被实践客体区分开来,把人的内心世界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区分开来,自觉地把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以及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作为认识的对象、实践的对象。学习的范畴,一般是反映主体对客体的关系范畴。二是根据毛泽东在学习活动中认识和处理学习主体对学习客体关系的一些思想和具体做法,进行科学的抽象而得出的结论。例如,主体对客体的关系,等等。这里的“主体对客体”是学习活动中或指与学习活动相近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90页。

的,有关毛泽东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看做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里的“理论与实践(际)”、“模仿与创造”,也是指学习主体——毛泽东本身的学习活动过程中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一章研究的学习范畴是指毛泽东在学习活动过程中,其作为学习主体与学习客体之间,以及其作为学习主体本身的学习活动过程中有关学习关系的一些重要阶段——学习中各种关系之网的网上纽结。

一 主体与客体

这里的主体,是指学习活动的发起者——毛泽东,这里的客体是指主体学习活动的受动者——毛泽东的老师和其他人。

主体与客体是毛泽东学习思想中第一对范畴,也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范畴。在毛泽东的学习活动中,主体与客体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并且是一对首要的与经常性的学习关系。但是,纵观毛泽东一生的学习活动,其在学习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身份,既十分明显,又不很清晰;在毛泽东的学习活动中,有的时候,我们对其“主体”与“客体”的身份很难界定。因为,在毛泽东的学习活动中时常出现主体对主体、客体对客体,即“主体 $\Rightarrow$ 主体”、“客体 $\Rightarrow$ 客体”的双向学习关系和学习要求。因此,主体与客体不仅是体现毛泽东对他人的学习关系的重要环节,也是体现他人对毛泽东的学习关系的重要环节。

(一)“吾人种种之智识、社交,均为父母若朋友等外界势力所酿成”

主体是什么?马克思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据此,我们也可以说,在实践和认识活动的范围内,主体是实践和认识活动

的发起者、行为者、操纵者,是主动的主导的一方;客体是实践和认识活动的承受者、受动者,是被动的、受支配的一方。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的这句批语:“吾人种种之智(知)识、社交,均为父母若朋友等外界势力所酿成。”^①,这实际上揭示出了毛泽东是其学习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主体,并且是惟一的主体;他的一切知识,不是天赋神授的,是从其学习实践和认识活动的承受者、受动者,即从客体那里得来的。客体,除了学习者——毛泽东之外,是在毛泽东的学习实践和认识范围之内的一切外部事物,如父母、朋友、老师,以及自然界、社会等都是客体。

在现实世界中,惟有主体能够扼住命运的咽喉,是主宰自己命运的一支物质力量。在学习实践和认识活动中,主体的出现昭示“谁学”?而客体的出现,则昭示主体“学什么”?以及“怎样学”?在学习的实践与认识活动中,像在其他实践和认识活动中一样,活动的发起者、行为者,如果不是主导的、支配的一方,而是受支配、受人左右,就不是学习的主体,或者说,只是形式上的主体,而不是事实上的主体。这样的“主体”没有把自己同外部世界区分开来,是不自主、不自觉、不自由、缺乏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主体”,实际上仍然是客体。我们看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他在自己学习的实践和认识活动范围内,一直处于主体的地位,即使是在对其学习很不利,甚至“无奈”的环境下他也不被人左右,不管是父母、老师或者其他什么人。他要自己“主”自己的“沉浮”。

例如,毛泽东 12 岁从师毛居宇读私塾时,四书、五经之类的经书已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了,他就偷偷地读中国古典小说。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造反的故事……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273 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些。”

当时,韶山一带的书被借读过后,他便来回步行 20 多里山路,到外婆家去借。可是,他的父亲毛贻昌让儿子上学的目的是极有限的,他只是要培养一个能记账、会引用经书去赢得官司的“财东”。在毛泽东读了 5 年的私塾后,毛贻昌便不让他再上学。毛泽东很无奈,只得辍学。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屈从于“命运”。他回忆说:“白天干一个整劳动力的活,晚上替我父亲记账。尽管这样,我还是能够继续学习,贪婪地阅读我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籍。”

据毛泽东在一师时的校友萧子升回忆:

毛泽东天天都把书带到田地里去,一得空便坐到一座古坟后的一棵老树下看书,看得心醉神迷。毛贻昌开始发现儿子经常溜号,不由得着急起来。一天,他终于当场“捉”住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看得津津有味,两只空粪桶安安稳稳地放在他身边。父亲立刻火冒三丈,两人便争吵起来。风波过后,父子俩回家吃午饭,到下午五点左右,毛泽东又不见了。这一次,父亲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他。两人又争吵起来:

“你真的鬼迷心窍,中了这破书的魔了?我要你一门心思扑在田里,规规矩矩地干活,别再看这些闲书。”毛贻昌气愤地说。

“我会规规矩矩地干活,但我也要看书。我保证先干活后看书。你要我挑的十五担肥我都挑完了,要是不信,自己到田里数数去。搞清楚了你再来。现在你还是让我清静一点吧,我要看书了。”毛泽东平静地回答道。

毛贻昌慢慢地踱到田里,数了数,足足 15 担,这令他目瞪口呆,心想: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半天挑了 15 担粪可真够辛苦

了。^①

毛泽东就这样主宰自我,见缝插针地读书学习,渐渐地在他的思想里出现了某种升华。他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后来,“我父亲决定送我到湘潭县一家同他有往来的米店里去当学徒。起先我并不反对,觉得这也许是有意思的事。可是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新式学校,于是决心不顾父亲的反对,到那里去上学。”

这所学校就是东山高等小学堂。

1910年,年仅16岁的毛泽东被破格录取为东山学堂的学生,编在戊班,也就是第五班学生。

随即,毛泽东缴了1400个铜元,作为5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正式成为这所新式学堂里的一员。“最后,我父亲也同意我进这个学校了,因为朋友们对他说道,这种‘先进的’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门达50里远。”

从以上也可以看出:主、客体两者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主体把客体作为自己的活动对象,操纵、支配着;另一方面,客体也以自己存在的规律制约和影响主体的活动,使主体不能为所欲为。

^① 见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5~6页。

(二)“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

我们在前面说过,人应该是学习的主体,但并非每一个人都是主体。因为客体并非完全是自然界,在人的学习活动中,客体也包括人在内。主体和客体是构成学习实践和认识关系的两个基本的实体因素。因此,一方面,它们都是客观的,它们的存在和所构成的关系都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它们又是相对的,它们的属性又具有相对性。这种在一定的活动关系中获得的主体的内在的规定性就是主体性和客体性。只有具有主体性的学习者才成为学习的主体;虽然有的人也在学习,也处于学习“主体”之地位,但他缺乏或者尚不具备主体性,这样的学习者,就不能称其为学习的主体。毛泽东曾这样说过:“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①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根据”就是“主体”与“客体”内在的规定性。这种内在的规定性,就分别表现为“主体性”和“客体性”。

例如,同样是学生,又同在一个学校一个班级中,接受同样的教师的教育,但他们学习的情形和结果却极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毛泽东总是学习的尖子,成绩名列前茅,并且以“探讨宇宙之真理”、“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最终选择了“走俄国人的路”。而有的人则置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于不顾,一味地想升官发财,最终跑到人民的敌人的营垒里去干了许多反对人民的勾当,落了个身败名裂。毛泽东是“鸡蛋”而后者是“石头蛋”;毛泽东是一个具有学习主体性的人,后者则相反。

人的主体性,譬如毛泽东作为学习主体的主体性,有哪些表现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02页。

形态呢？只要对青少年毛泽东的学习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稍加观察、研究，就可以看出他的主体性，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的学习主体性是其作为学习主体的能动性。毛泽东之所以为学习主体，就在于它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具有自觉的能动性”。这是毛泽东与其他学习者最基本的区别。

毛泽东的能动性，表现在学习活动中，不是自在的、盲目的，而是自为的、有目的的，也就是说，他作为学习的主体，对自己的存在和与客体的关系有着明晰的意识，因而它的学习——“为什么学”、“学什么”及“怎样学”，都有明确的目的和方向，他并不是单纯受制于外部世界或他人作用的被动存在。他的这一“能动性”贯穿其一生，而不只是表现在一件或两件事上。例如，十六七岁的毛泽东已初步树立起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志向，并为自己取了“子任”的别号，深感要唤醒民众、改造社会、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必须学好社会科学知识，而自然科学知识只是教人谋生的技能，则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因此，小学开设的数理化等“格致”课，他只学了一点皮毛。上中学后，他对社会科学课程更显得特别喜爱，每门功课都订有学习计划，学习也很刻苦。对一般课程只是听听讲，并不去钻研，对他感到肤浅和浪费时光的课程，则常以“病假”为由开小差，或者进了课堂也是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籍。

其次，毛泽东的学习主体性还表现在他作为学习主体的创造性上。当然，毛泽东并不是一出生就具有创造性，也不是他一上学就具有创造性。但他有“不愿做奴隶”的天性。他的创造性是从模仿他人开始的，慢慢地就形成自己的风格，具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例如，毛泽东的作文，不管是小学、中学，还是一师的老师、校长无人不说他具有创造性。我们在前几章中曾提到过：毛泽东写的《评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的作文，袁仲谦在批改作文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毛泽东那初具特色的小楷字，他笔画粗重，似乎是受不了小方格的束缚，要“挣”出框框之外，两个字竟占了三个格子！“这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个毛泽东,看来是颇具个性的!”袁先生暗自思忖道。及至阅批正文时,他立时被毛泽东在文章中表现出的那娴熟的章法、通达的文笔所吸引,他挥笔写下了眉批:“大有孔融笔意。”当看到毛泽东打破传统看法,跳出先生提示的思路,独树一帜另立新意时,袁先生心中虽有一丝不快,但他对于这个学生敢于超越前人、大胆创新的学习精神,却是极为赞赏的。他又批道:“似有创见!”

毛泽东正是具有学习主体的创造性,所以他从不墨守成规,从不循规蹈矩,其思想才不断地升华,从一个进化论者成长为民主主义者,又从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并在思想理论和事业上超越古今中外的一切圣人贤达和帝王将相。

再次,毛泽东的学习主体性又表现为他作为学习主体的自主性上。主体者,其本身就含有自主、主动的意思。他表现在毛泽东从自己的目的和愿望出发,主动地与客体发生关系和相互作用,通过支配和改造客体,使客体朝着有利于自己需要的方向发展;他自觉自愿地采取一定的活动方式和手段,独立地对自己的活动后果负责。这样的事例也不胜枚举,但最具典型意义的是他领导同学驱赶校长张干。

1915 年上学期末,省议会颁发一项新规定,秋季伊始,每个师范学生要交纳 10 块钱的学杂费。这对大多数穷学生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有人传说,这一规定是校长张干为了讨好当局而建议的,由于四师并入一师后许多同学对要多读半年书就有不满情绪,于是很快发生了一场驱赶张干的学潮。在九班同学的发动下,全校实行罢课,并四处散发传单,揭露张干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毛泽东认为这没有击中要害,说我们是反对他对上阿谀逢迎,对下专横跋扈,办学无方,贻误青年。于是,毛泽东在一师后山君子亭起草了传单,并派人连夜印刷,清晨在学校里广为散发。省教育司派督学来校调处,要求学生复课,学生们不同意,并在校发动继续罢课,重申自己的誓言:“张干一日不出一师校门,我们一日不复课!”

张干为此十分恼火,要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 17 名带头“闹事”的学生。但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张干为了平息事态,恢复教学秩序,终于做出了让步:同意不开除毛泽东等“闹事”学生。但是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还是给了毛泽东一个处分:记大过一次。

第一师范的学潮总算平息了。可是校长张干却怏怏不乐,一口气憋不下。想到自己在一师任教多年,为了 10 元钱学杂费,竟要被学生撵走! 历来,在学校只有校长开除学生,哪有学生“开除”校长的? 这真是闻所未闻! 张干越想越不是滋味,感到在一师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便主动向省教育司递交了辞呈,卷起行囊,离开了工作 6 年之久的一师,到别的学校谋事去了。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自主性是主体本质力量的表现和主体地位的确定。没有自主性,就没有人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因而也不可能成为主体。自主性说明对于影响和制约着他的存在和发展的主客观因素有了独立、自由、自决和自己支配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必要和可能。

(三)“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

在人类诞生之前,宇宙空间本无所谓主体与客体,就是在人类诞生后的若干年之内,当本能的人、野蛮人还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之时,也没有主体与客体的区别。主体是明确意识到了的自我。人只有将自己与自然、与他人区分开之后,才能成为主体。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世界上也没有绝对的主体。主体与客体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主体与客体是相互统一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有三种情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三是人与自己的关系。毛泽东说,这三种不同的情形,都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是“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的。^①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的主体性展开的最原始、最根本的方面。因为人首先要生存,要生存就要解决衣食住行等物质的需要。人的这一需要是构成人与自然关系的起始因素,是形成人与自然间对象性活动的最初动因。这一对象性活动的实质是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科学的发展和自然的进化是人对自然主体性的确证。

毛泽东像所有人一样,他首先是一个“自然存在物”,然后才是“社会存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毛泽东生于自然,长于自然,起初也只是一个可亲又可爱的“小东西”,对他来说,无所谓“主体”与“客体”。待他渐渐长大之后,同山村的农家子弟一样,毛泽东边读书边参加劳动——农业生产——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他这才将自己与自然界区分开来,并喊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待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已形成很明显、很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从他作的《咏蛙》小诗里可以看出:“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声敢做声。”这时的毛泽东,作为主体,他是与客体即自然相对立而存在的,又是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相统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实践这一中间环节作为桥梁,主体与客体(特定的自然)不会有任何关系,因而也不可能统一起来。

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主客体关系,无论是社会、集体或他人,都是人的一种存在形态或组织形式,都有自己的内在需求和含目的性的活动,因而都具有主体与客体的双重属性,都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这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于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关系的特殊内容和要求。这里的客体是有着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的客体,因而他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就不完全是自在的、受动的,而是有所作为的。在这里,既可能是对主体活动的有

^① 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7页。

意干扰、阻挠或破坏,也可能是对主体活动的自觉配合、协助或投契。客体的这一特殊性,必然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主体活动的目标和手段。毛泽东“游学”活动就真实而生动的体现了“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

1917年7月中旬,毛泽东邀请同学萧子升和准备回安化老家度暑假的同学萧蔚然一道,决定分文不带游学农村。他们只带一把雨伞和一个装有换洗衣服、笔记本、毛巾、毛笔和墨盒的布包,从长沙小西门渡湘江,换上草鞋,经白若铺,一直步行到宁乡县城。他们在一个同班同学家里住了两宵,走访了当地的劝学所、玉潭高小及香山寺,还到宋家潭找农民了解生产、生活状况。当他们又累又饿时,便写了一首诗送到当地一位老翰林的府上。诗曰:

翻山渡水之名郡,
竹杖草履谒学尊。
途见白云如晶海,
沾衣晨露浸饿身。

婉转表达自己的窘境和对老学者的尊重。他们还与老翰林一起讨论了经书。后来老翰林送给他们四十枚铜元,帮助他们解决了困境。在那里,毛泽东还给和尚送了一副对联,替一些店铺写了门头字号,还到黄材镇了解当时农村小集镇的贸易情况。

有一天,毛泽东一行来到梅城,毛泽东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山观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并就地调查了清代黄国旭领导的农民起义,走访了一家贫困农民。还到安化县劝学所拜访了安化饱学先生、劝学所所长夏默庵。夏早年毕业于清代两湖学院,学识渊博,专治经、史之学,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喜吟诗作对,性情高傲,一向拒游学先生于门外。毛泽东两次求见,均遭拒绝,但他并不灰心,第三次再登门造访。夏先生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只得开门相见,并挥毛笔写了“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原对放在桌上,以试测来人学问的深浅。毛泽东见后便以“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平,为私乎”相续。夏先生看罢,大吃一惊,觉得对方胜过自己,还蕴含火辣辣的批评味,自感有愧,连声称赞,并留餐宿,昼夜长谈。毛泽东临行前,夏先生还赠送银洋捌圆。

这次游学,历时一个多月,途径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乡,步行一千余里,写下了许多笔记和心得,是毛泽东早期学习生活中一次极具重要意义的活动。它使毛泽东更深入广泛地了解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的现实情况。使他深深体会到:一切真知都来源于“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

人与自己的关系是一种更为特殊的主客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人集主体与客体于一身。对象性活动的内容是对自己的认识与改造。人对自身的认识和改造也是通过实践来实现的。青年毛泽东认识自我和改造自我,体现其集主体与客体于一身的事例,莫过于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的经历。毛泽东在自学活动中,这种时空中的自我,即是学习活动的发起者、操纵者、实践者和认识者,即学习活动行为者自身,是主体,又是自我教育、自我认识、自我改造的承受者,是主体活动的对象,即客体。这就是青年毛泽东通过自学这种实践活动形式,使主客体在“自我”身上得到了辩证法的统一。就是在自学期间,毛泽东获得了许多新知识,也得到了许多新的启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开始在他的脑子里生根,民族的责任感不断的升腾。我们在前一章中曾说过: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一副世界地图,并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了它。这幅地图向他昭示了世界的巨大,也引出了他无限的遐思,世界既大,人就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

毛泽东后来说道:“我由此想到,我们青年人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时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力量。”并对老同

学说,这半年的自学生活是自己学习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

从这时起,青年毛泽东放弃了对孔孟的信仰,动摇了对康梁的崇拜,这无疑是对现实中的“我”,既定的“我”的否定、扬弃和更新。正因为毛泽东能够自觉地自我认识、自我改造和自我“否定”,所以他才获得了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也才真正获得了主体的地位和资格。

毛泽东后来在《实践论》中写道:“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这就成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关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经典表述。

二 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历来非常重视学习活动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就此写过许多文章,作过多次演讲并题词,只不过他是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学习活动的重要原则。其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学习的范畴。因为,原则是指对言论和行动的理論规定,在社会生活中,原则常被作为人们言行的准则。在具体科学中,原则又含有公理性质的意思。在哲学上,原则则指反映事物发展一般规律的命题或基本原理,并常常被作为推理依据。无论从何种角度理解,“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都不应视为学习活动的基本原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它所反映的是学习主体在其学习过程中,如何正确认识和处埋书本知识与经验知识、知与行、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使有书本知识的人不至于成为一个教条主义者、书呆子;使有经验的人不至于成为一个狭隘经验主义者、盲动者,防止人们的言行走向极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端。它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学习之网的网上纽结,因此,它是学习的范畴,而不是原则。

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思想,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其中,既有书本知识与经验知识的关系问题,又有知与行的关系问题,更有物质变精神与精神变物质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它是整个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更是毛泽东学习思想活的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学习思想的全部价值和生命力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些问题是学习活动中随时随地都能碰上的,并且是大量出现的问题。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与否,直接关系到学习的成败。因此,研究毛泽东学习思想中的理论与实践范畴同研究主体与客体范畴一样,是研究“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的一个重要任务。

(一)“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

什么是理论?这里所说的理论,是指人们在实践中,借助一系列概念、判断、推理表达出来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知识体系,俗称书本知识。或者说,理论是人们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社会、人文和美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这里所说的实践,是指人们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这里所说的实际,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即客观事实。毛泽东认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

论。”^①这是对理论的惟一科学的界定。

一般来说,人的学习,尤其是青少年的学习,多数理论知识是来源于书籍。因为,“书籍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奇迹。它概括了世界生活的全部知识,表现了世界理性成长的过程,以及全球人民的文明史和全部的经验。因而,书籍是进一步发展人类精神力量的最有利的工具。”(高尔基语)毛泽东说:“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何况现在学的不是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②这是说,书籍中的知识只是前人经验的总结,由于受时代的限制、知识能力的局限、科学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其经验是有偏差的,书籍中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自然科学书籍,还是社会科学书籍,或者是人文科学书籍,概莫例外,即使是圣人贤哲、伟大人物的经典著作,其错误也是难以避免的。从书本中所学得的知识必须到实践中去检验,去修正。再说,学习书本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在应用中又可获得书本中所没有的知识和技能。这叫学以致用。如果不这样正确认识和处理读书与使用的关系,那就势必走向两个极端:要么“纸上谈兵”,唯本本主义;要么“以干代学”,唯经验主义。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

因此,毛泽东说:“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③但是,许多学习书本知识的人却把书本当成了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发展。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17页。

② 同上,第818页。

③ 同上,第817页。

展,害了自己,也害了他人。

(二)“还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论和实际联系’,在许多同志中间也是一个糊涂观念”

“理论和实际联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思想,并非毛泽东首先倡导和坚持的,而是古已有之。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学而时习之”的思想,这也可以说是“理论和实际联系”学习范畴的萌芽吧!孔子所说的“学”,其内容主要是指:《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古代文化典籍,也可以说是各种理论知识;他所说的“习”,则是指践行、演练、操作《诗》、《书》、《礼》、《易》、《乐》、《春秋》。他强调学习的知识要付诸实践,理论要与实际相联系。从孔子之后,历代儒家学者几乎都效仿孔子倡导“知与行”结合起来。

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大概是最早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他曾说过:“事业是理论和实践的生动统一。”在古罗马末期的哲学家西塞罗也说过:“光懂得深奥的道理是不够的,还应当善于运用它。”

古代的圣人贤哲们都比较注意学以致用,强调践行的重要性,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以往的学者多半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口说要知行统一,实际光说不做。最终还是以自己的行动否定了自己说的话。例如,孔子的学生问孔子会不会种田,会不会种菜的事,孔子不会,就老老实实地说不会就得了,可是,当学生离去时,竟骂学生是“小人”。这比照孔子“学而时习之”的话,显得多虚伪、多迂腐。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或理论和实际联系,作为一个学习范畴的提出并付之实行,是马克思主义问世之后的事情,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时确立的一个学习范畴(当时不称“范畴”,是称“原则”)。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提出了“理论和

实际联系”的思想。他说：

“除了对于‘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存在着糊涂观念之外，还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论和实际联系’，在许多同志中间也是一个糊涂观念。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的，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① 毛泽东所讲的“理论和实际联系”，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具有普遍而永恒的意义，他不仅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的联系，在所有的学习领域里，都有一个理论和实际联系的问题。在此后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运用这一学习范畴思想，处理学习中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受益匪浅，获益无穷。

毛泽东不仅是首倡“理论和实际联系”这一学习范畴的人，而且也是论述这一学习范畴最全面、终生身体力行、坚持不懈的人。他提出“理论和实际联系”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即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他在《矛盾论》中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19～820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辩证唯物论。”理论属于精神范畴、意识范畴,实际与实践属于物质范畴、存在范畴,理论和实际联系的过程实际是精神反作用于物质,意识反作用于存在的过程。如此循环往复,物质能变精神,精神亦能变物质。能推动历史前进、社会发展的理论就是正确的理论,反之,则是错误的、不正确的理论。

毛泽东提出“理论和实际联系”的实践依据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至1942年长达20余年的革命实践。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革命斗争,好像冶炼理论、真理的一座大熔炉,不管什么样的理论,只要经得住“熔炉”冶炼,出炉时没有变成废渣,仍然是金光闪烁的金子,这就是正确的理论。他这20余年的革命生涯,一刻也没有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他走的是一条“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一位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的青年——摄影家吴印咸回忆道:

深厚坚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①

深入实际,到人民群众中去,久而久之,感情起了变化,心与人民群众的心相连,就想人民之所想,做人民之所盼的事,理论与实

①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22页。

际就容易联系了。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敞开心扉谈自己感情发生变化的经历,很值得我们仿效。他说:

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在生活实践中,感情、思想意识如何,是能否以及如何使“理论和实际联系”的关键。有些人并非不想理论和实际联系,他也深入群众、深入生产斗争、社会斗争的第一线,因在感情上与人民群众格格不入,心猿意马,所以理论和实际总是脱离。这样的人,十之八九是书呆子、书虫豸。

毛泽东提出“理论和实际联系”的历史依据,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对他的影响。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二章中曾详谈过,在此不再赘述了。

总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一对非常重要的学习范畴。希望自己学有所成的人们,不可不将此放在心上,落实到行动中去。

(三)“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

理论和实际联系的惟一办法,是“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①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毛泽东极为突出的特点。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出对事情总不满足于枝枝节节的解决,而是力求从大本大源上去探索。投身革命以后,特别是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的斗争,再到开辟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不管局势怎样严峻和险恶,他从不放松对周围环境的现状和历史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行动方针,并且十分注意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修正或充实原有的想法。这是他所以不断提出创见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之所以重视社会调查研究,一是他从青年时代就形成的一种习惯、一种思维定势,认为:从事社会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解决问题的惟一途径;二是在井冈山时期,党内各种争议经常发生,有时甚至相当尖锐,严重地妨碍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这种争议,有的发生在红四军内部,有的发生在他同上级领导机关(包括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这种争议集中在中国革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的问题上,争议多次地反复地出现,自然引起他要从更深的层次上,即本质上进行思考。

当时,党内的认识几乎没有办法取得一致。但这个认识过程,对于毛泽东来说,正如他以后在《实践论》中所总结的:“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他看来,认识开始于实践,认识又有待于深化。“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91页。

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这样就达到理性认识的阶段。这个飞跃很重要:“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

毛泽东正是从“反复了多次”的实践中看到:这些争议背后潜藏着的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导致中国革命走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种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走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另一种是根本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实际,只是从主观愿望或某些书本上的现成结论出发,机械地模仿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从这两种不同的思路出发,可以对同一事物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和决策——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革命道路——当然就得到两种不同的结果。因此,要解决各种具体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必须从这个根本问题上着手。

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更引起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他认为“八月失败”,是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察当时的环境”,“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因而招致边界与湘南两方面的失败”。^①这是唯心主义、形式主义导致的失败。

同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相对立的,便是毛泽东一向倡导的重视调查研究,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情况是极其复杂的,不能“钦差大臣”满天飞,不能“下车伊始”哇喇哇喇地发议论,而应周密而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写道:“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0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①

1930年5月,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环境比较安定。毛泽东利用红四军正分散在安远、寻乌、平远发动群众的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占柏的协助下,接连开了10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这是他以前没有进行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调查的目的性很明确。毛泽东说:“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盘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据毛泽东后来说,到会的人,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共11人。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寻乌这个县,正介于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处,明白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大。

毛泽东把这次调查的结果,整理成《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八万多字。这个调查,对寻乌县的地理环境、交通、经济、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考察分析。不仅调查农村,还调查了城镇,尤其调查了城镇的商业和手工业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经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懂得了城市商业状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89~790页。

况,为制订正确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

在这之前,毛泽东还进行过“湖南调查”、江西“兴国调查”以及“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他说,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

与寻乌调查同一个月,毛泽东写出了他的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是《调查工作》,20世纪60年代公开发表时改成这个名字)。这是毛泽东多年来从事调查研究的理论总结。文章劈头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他倡导要到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毛泽东用了一个生动而形象地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①

他在文章中表示,坚决“反对本本主义”。他指出:“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着这种心理。”他尖锐地批评党内讨论问题时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强调必须把上级所作的决议、指示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毛泽东接着又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9、110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阐述了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们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①

1941年3月17日，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一书的《序》中表示：“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②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是他善于在社会实践中学习，从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情相结合，这是他惟一的法宝。舍此，便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

三 模仿与创造

模仿与创造，是毛泽东学习思想的又一对范畴。幼年乃至少年、青年时代毛泽东的学习，像一般人一样是从模仿他人开始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11～112页。

② 同上，第3卷，第791～792页。

可以说,模仿是毛泽东学习活动的起始阶段。但是,从小悟性极高的毛泽东,刚上私塾,就因会读书而出了名;上东山小学时,校长夸奖他“是珍奇瑰异之才,为三代以下仅见之选”;在中学,老师们称赞他“才气过人”;在一师求学,他的书法、诗作就显示出了一种独特的创造精神和风格。毛泽东一生的学习活动,总是在模仿的基础上创造、创造、再创造!

模仿与创造,是毛泽东学习思想体系之网的重要纽结。有了这对范畴,毛泽东的实践活动才成为不似一般人,又胜似一般人的真实的存在。没有这对范畴,也就是说,没有模仿与创造这一对范畴,那毛泽东的学习活动就变成了既无意义,又无具体内容的空话,什么主体与客体,什么理论与实践,也就都变成了脱离其学习思想体系之网的“死纽结”。因此,研究毛泽东学习思想之范畴,不能不研究毛泽东学习实践活动关系中的重要关系——模仿与创造。

(一)“小孩子……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喇哇喇跟别人吵架,再大一点就会用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

模仿,是指人们按照某种现成的样子学着去做。例如,人用口哨模仿布谷鸟的叫声。毛泽东于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说,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7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3岁哇喇哇喇跟别人吵架,再大一点就会用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人刚出生,像动物一样是一个自在的“自然存在物”,除了依靠本能吸奶和哭叫外,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后来,在父母的教育和扶持下,慢慢地学会发音、说话、走路……其实,这些都是模仿大人。没有模仿,就没有他(她)后来的一切。

模仿是人的基本智能,任何人在发育、成长过程中,都不可能跃过模仿阶段,即使像毛泽东那样的伟大人物也概莫能外。不经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过模仿、重复的训练和锻炼,他是绝不会一步登天,成为伟人的。毛泽东也是一岁多至两岁学说话,3岁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在外婆家模仿表哥背诵《论语》中的一些章句,稍大一点,就用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上私塾后,除跟塾师学咏四书、五经,临摹书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所学的一切大部分是模仿性的。

模仿康、梁笔法。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校长李元甫曾经当众表扬他的文章深得康、梁笔意,号召大家向他学习。他的习作《言志》、《救亡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一时为全校师生所传诵。以后,他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和湖南全省高等中学(省立一中的前身)上学,都以作文优异著称。

康有为、梁启超都善属文。他们不屑于恪守古文“义法”,不满足于雕章琢句,而注重落笔自然,辞以达意。他们通过办报纸,设学会,著书立说,上书言事而干预政治,影响相当深远。特别是梁启超,他早期所宣传的虽大多是康有为的思想和主张,但文章却独具魅力。梁氏自称:“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①因为少年毛泽东曾一度崇拜康、梁,故也仿效康、梁的笔法。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四师(后合并入一师)学习。国文老师袁仲谦(告六)先生是前清举人,最重古文教学,很欣赏毛泽东的才气纵横、笔力雄健,但又嫌他的文章太像梁启超的“野狐笔”。他评价梁启超说,梁写文章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一生有点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7月版,第88页。

变法。他写的《变法通义》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被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可惜他后来成了拥护“君主立宪”的保皇派。袁先生还批评梁启超,说他写政论恰如其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袁先生对梁有褒有贬,可见对梁的生平比较熟悉,对其著作也有研究。但他还是表明:他看不起梁启超,说梁启超是个半通不通的文人。他限令毛泽东改变文风,摒弃“康、梁体”,下决心钻研韩愈的文章,学写桐城派的古文。为此,毛泽东曾经下功夫熟读《昭明文选》和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他还从玉泉山旧书店买回一套二十多册的《韩昌黎全集》,将袁老师批注过的善本借来校正其中讹错。经过反复研读,揣摩其笔法,他终于能写出一手人格的古文来。袁仲谦在评语中,甚至称赞毛泽东的文章“深得孔融笔意”。现在我们从他写的《祭母文》、《〈一切入一〉序》及一些书信中,还可以略见当年文采。不过,这种古体并不适合于反映变化的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因此,五四以后,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时,便改用白话写作,终于崇实黜华,使文风与学风、形式与内容臻于统一。

当时,袁先生还向毛泽东讲述了自己治学、习作的“秘诀”:治学,要坚持“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读书,要做到“好书不厌百遍读”;作文,记住“文章妙来无过熟”。自此,毛泽东牢牢记住老师这寥寥数字的“真言”,抱着“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远大志向,坚持勤学苦练,最终成为一代“文章大家”。

(二)“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在学习活动中,模仿甚至重复学习者,按照既定的方法、形式、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规范去从事学习活动,模拟原先已有的事物或者再现先前发生过的情形、状态或动作。例如,毛泽东在17岁那年外出求学时写给他父亲的一首诗,基本是上模仿日本人西乡隆盛的,只是为了适应自己的情况,稍加变动,将原诗的“男儿”改成“孩儿”,“学不成名死不还”的“死”字改为“誓”字,其他没有改动,说是模仿也可以,说是抄写而不说成改写也可。它陈述了青年毛泽东的远大志向,抒发了青年毛泽东的宽阔胸怀,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真实写照。

附:

西乡的诗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死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的诗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1957年,前苏联发射载人卫星成功,加加林安全返回地球,成为人类史上第一位太空人。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广州为自己所作的诗词进行批注,感事而作。

毛泽东在有关自注的文中曾说:“鲁迅1927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前记中说道:‘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从那时起,到今年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蚊子灭得差不多了,当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唤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诗曰。”

七绝 仿陆放翁

(1958年12月21日)

陆放翁诗《示儿》

人类今天上太空，	死去原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五洲同。	但悲不见九州同。
愚公扫尽餐蚊日，	王师北定中原日，
公祭无忘告马翁。	家祭无忘告乃翁。

毛泽东的诗《仿陆放翁》是模仿陆游的《示儿》诗，但其模仿中有新意，并非照抄照写。

如果模仿就是依葫芦画瓢，这对初学者是允许的。因为，模仿、重复是主体的活动所不可或缺的方面，是人的学习活动无法逾越的阶段。但是，如果一辈子模仿、重复他人，那就没有出息了。轻则，令世人嗤笑，重则要犯“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错误，那就得不偿失了。

我们说，模仿、重复是为了创造。要上升为创造，人需要模仿、重复，但更需要创造。所谓创造，就是在已有经验信息的基础上，推倒偏见和成见，对新的事物和情况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筛选、加工、制作，产生出新的有社会价值的事物或思想的实践活动，其中，主要的是学习实践活动。例如：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与陆游的《卜算子·咏梅》相比照，看似毛泽东仿效陆游，实际上，是毛泽东“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是一种创造。

卜算子·咏梅

毛泽东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卜算子·咏梅

陆游

驿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
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

陆游是我国南宋著名爱国诗人。他出生的第二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覆亡。陆游一生积极主张抵抗金人的南侵，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反对南宋统治者苟安江南，因而受到投降派的排斥和打击。他的许多诗词，抒发了抗敌情怀和不为时用的感慨。他写过百首以上的咏梅诗词，《卜算子·咏梅》是他的名作之一。这首词表现了他孤芳自赏、凄凉抑郁、永矢坚贞、至死不与投降派同流合污的人格。清人姚莹诗云：“平生壮志无人识，却向梅花觅放翁。”可见陆游的人格和豪气及他的诗篇，是如何受到后代知识分子的景仰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对陆游的这首词是赏识的。1961年12月，毛泽东在广州读陆游的《卜算子·咏梅》，用陆游的词调、词题和托物咏志的手法，“反其意而用之”，写出了一首现代的全新的《咏梅》词。“反其意”者，一是反其孤芳自赏而为与群芳同春；二是反其消极无奈而为积极斗争。严有翼《艺苑雌黄》云：“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意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

其意而用之者，非学业高人，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然蹈袭前人遗迹者，何以臻此。”^①“不规规然蹈袭前人遗迹”，就是一种创新，创造前人没有而又超过前人的东西。毛泽东距陆游的时代已远，人间已换，他的全新的世界观和他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他深厚的古典诗词修养，是他能够“反其意”——创新，写出如此气魄恢宏、别开生面、调高意远的《咏梅》词的基本原因。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虽是针对特定的历史现象写的，但由于词作所创造的崇高壮美的艺术形象具有极高的典型概括性，能使读者产生诸多美好的联想和共鸣，因而尽管时光流逝了数十年，甚至再流逝多少年、多少世纪，这首词会仍然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特别是词人崇高而悲壮的一生，与他在《咏梅》中塑造的崇高而壮美的艺术形象，可谓交相辉映、互为表里。人们不仅是在读词，也同时是在读作者的为人。具有创造性、永恒魅力的作品，这二者往往是缺一不可的。

毛泽东的创造性，不只是表现在诗词、文章方面，我们不过是以此为例说明而已。“毛主席创建人民军队方面的成就，他在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在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经济上的一些文章，在文化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哲学上的创造，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等等，多得很。毛主席的成就不仅广，而且专，而且精……”（周恩来语）他，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成功地把马列主义引进中国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他没有恪守教条；“宜将剩勇追穷寇”，他断然拒绝了斯大林的告诫。他就是他，他的思想源于马列，但又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他有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他有他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艺术，他有他自己的创造性。创造，再创造，就是毛泽东作为学习主体的本质属性。

^① 《毛泽东诗词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293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毛泽东对创造有着不同寻常的认识和理解,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①

创造,应当成为学习者永恒的话题;一旦人们停止了创造,那学习也就随之停止了,人的生命虽然存在,实际上,已没有多少存在的意义了。

(三)“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

在毛泽东看来,创造精神、创造力,是属于青年人的。毛泽东于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时说:从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这些发明家在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个普遍规律?不能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的。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① 见《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还从古今中外,举了许多例子来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 23 岁才开始努力,耶稣有什么学问? 释迦牟尼十几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 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 30 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在开始著书时只有二十几岁。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都是一些当时的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列宁也是 31 岁(1903 年)创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在科技上:

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后来成了传记作家、政治家、科学家;

英国达尔文,大发明家,也是个年轻人。研究生物学,到处跑,南北美洲,亚洲都跑到了,就是没到过上海。

最近的那个李政道、杨振宁是年青人。他俩分别在 30 岁和 34 岁时,一举推翻了 30 多年来被物理学家奉为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被世界公认为“可以和爱因斯坦打破牛顿力学万有引力理论相媲美”。

在文学上:

唐初四杰之一,王勃 14 岁写出流传千古的奇才作品《滕王阁序》。

唐朝诗人李贺,也是年轻人,死时才 27 岁。

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

在军事上:

项羽起兵的时候只有 24 岁,三年到咸阳,霸王别姬的时候,应当还是年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只有 30 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

“胯下之辱”。

晋朝的荀灌娘是个 13 岁的女孩子,顶多不过是“初中程度”,她到襄阳去搬救兵,你看她有多大的本事?

唐太宗李世民起兵的时候只有 18 岁,做皇帝的时候只有 24 岁。

宋朝的名将岳飞 24 岁建立了“威镇三关”的岳家军,抗金兵,御外侮,屡建功勋,死的时候才 38 岁。

在政治上:

战国时候,秦国有个甘罗,甘罗 12 岁为丞相,他才是个“红领巾”,他的祖父甘茂没有主意,他却有主意,他到赵国解决了一个大问题。

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了去,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做《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学家。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论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的时候只有 33 岁。

在学术上:

颜渊是孔夫子的徒弟,他算个“二等圣人”,他死的时候,也只有 32 岁。

晋朝的王弼,做《庄子》和《易经》的注解,他 10 岁时就是哲学家,他死的时候才 24 岁。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康有为也是如此,刘师培成名时还不到 20 岁,死时才 30 岁。

.....

郝建秀,全国人大代表,她在 18 岁的时候创造了先进的纺纱的办法。

作国歌的大音乐家聂耳,也是年轻人。

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

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当时,不少人有种“怕”的心理。比如说,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房子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上得去,于是乎说,“我这辈子没希望了。”这种怕是否需要?是否妥当?

毛泽东回答说: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只是他那里头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很多东西给我们看,我们不一定都看完。马克思那么多东西,时间不够,不一定都要读完,读几份基本的东西就行了。我们实际做的,许多都超过了马克思。列宁所说的许多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中国这样的革命,马克思没有做,我们做了。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理论。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需要提高。我们要努力,我们可以做楼梯,而且可以做升降机。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100多年。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非圣则违法”,反对圣人就是违犯“宪法”,对外国人说我不行,对孔夫子说我不行,这是什么道理?

要谦虚是可以的,不正当的自信心,庸俗的自信心,那是不能允许的。不建立在科学上的谦虚不叫谦虚。真正的谦虚要符合实际。比如说,我们见了外国人说中国现在还是农业国,工业建设才开始……这就是实际,但外国人说我们谦虚,一般是合乎实际。另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总觉得别人行,自己什么都不行。你自己干什么?你就不动脑筋。中国古诗中有一种拟古诗,就是过分的谦虚,自己没有独创的风格,就去模拟别人。

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时说,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古希腊的辩证法,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文艺复兴,这是否定的否定。

中国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是辩证法。封建时代的经学,这是形而上学,现在又叫辩证法。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时说,学问是抓来的。从来创立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博学家就来压迫。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20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祺瑞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毛泽东始终认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当然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学习,要尽量争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的活动。”^①

在毛泽东看来,青年人也有青年人的弱点和不足。“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的,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②

但是,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总认为,青年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是很丰富的,他把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1957年11月17日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时,满怀激情地对他们说: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页。

② 同上,第395~396页。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

“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第九章

治 学 态 度

在治学过程中,青年毛泽东不仅首先立志定向,探索治学的规律和范畴,而且十分注意不断端正自己的治学态度。治学态度,是一个人对学习的看法和行动的综合体。在他看来,没有诚实和谦虚、“学而不厌”的治学态度,一味强迫自己或漫不经心地去学习,未必能够取得好的效果。他认为,只有懂得“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讨论、研究问题时,“应当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严肃、认真,老老实实在地学习,才能学到真正的本领。因此,治学态度是毛泽东学习思想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学习毛泽东的治学态度,并来探讨、研究毛泽东的治学态度。

一 知识是一个科学问题

治学确实存在一个态度问题。有的人,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就摔跟斗;有的人,孜孜

以求,学而不厌,不怕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为什么?因为,前一种人不懂得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而后一种人则懂得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这就是说,治学态度是由人们对知识的性质的看法和把握决定的,由此又来支配人们的治学行动。因此,要研究毛泽东关于治学态度的思想和实践,不能不从毛泽东对于知识的性质的认识入手。

(一)“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这段话看似平常,它却是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正确认识。

我们在第六章中曾反复探讨、论述过“什么是知识”的问题。真正的完全的知识,并非是载入书本的东西。因为书本知识只是前人直接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彼时彼地的东西。在彼时彼地可能具有真理性(也不完全如此),但在此时此地就不一定具有真理性,因为客观事物发生了变化,彼一时,此一时,想用刻舟求剑的办法,解决过时的问题,没有不失败的。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共党内高层领导中的机会主义者,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经验,以攻克彼得堡(当时是沙皇的首都)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的经验,来指导中国的革命,也想在中国攻打中心城市,“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他们先后攻打过长沙、赣州,均以失败而告终。他们不听毛泽东的劝告,并多次解除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不得不逃离中央苏区。就这样,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毁于一旦。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有这样—个典型例子：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是由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指挥的。博古对军事—窍不通，对我双方的情况也不了解，实际上是“瞎子摸鱼”，“闭塞眼睛捉麻雀”；李德是刚来乍到，对中国的情况—无所知，他就在“办公室”里，成天价围着客堂间里大地图转来转去，—边抽着烟，—边用红蓝铅笔勾勾画画，然后用尺子量着距离，规定着部队行军的速度——他不管，也不知道哪里是山是河，反正按地图上的直线距离计算进军的速度。他甚至就连—挺机关枪该放在哪里，—门迫击炮应布置在什么地方，都按照地图作了规定。殊不知，他用的那些地图，全是国民党部队“供给的”，好多地方不准确。这样指挥打仗，真是比古代“纸上谈兵”的赵括还教条，能不失败吗？

从1927年到1935年1月，在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期间，他们心血来潮，乱指挥、瞎指挥的事频频发生，接连不断。结果，既害了革命，又害了自己。从学习的角度说，他们是把“知识”当成儿戏，既骄傲，夜郎自大，目空—切；又虚伪，故弄玄虚，很不诚实，很不老实。

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这就是说，知识的来源、知识的形成，以及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都是有规律的。谁不认识规律，掌握并利用规律，谁就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谁如果运用不真实、不完全的知识去指导自己的行动，谁就要在实践中碰壁，就要付出这样或那样的代价。谁如果按规律去办事，虽然也可能有失误，但那不是因为运用的知识不科学，那可能是因为主客观力量的对比有问题，因主观太弱于客观，或者是情报来源有问题，再加上主观判断失误而造成的。例如，毛泽东在那个时期也曾有过两次失误，—是对“AB团”的认识上，“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二是遵义会议后指挥打的第一仗——土城之战———半是由于求胜心切，—半是由于情报错误，毛泽东首战失利。这对毛泽东来说，只是个别性的枝节问题，并非影响和决定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全局性问题。

从此之后,直至其晚年以前所犯的错误,用邓小平所说的一句颇为深刻的话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①

怎样对待书本知识?毛泽东在“读史”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酷爱学习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读史已经成为他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他生命活动的一部分。一部“二十四史”伴他度过一生,须臾不可或缺。毛泽东晚年在读到“二十四史”的时候说: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一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他,批判他。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里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语。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必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洋洋 4000 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剥削的斗争,一律被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①

尽管“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但这并不妨碍毛泽东学习和研究它,并从中获得真知。这里的关键是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诚实和谦逊”的态度。

诚实和谦逊的学习态度,是中华民族具有优良传统的学习态度。早在 2500 多年前,孔子就对他的学生——子路,说:“由! 诲汝,知之乎?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意思是说:“由! 我教给你求知的正确态度吧! 知道就是知道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聪明智慧呀!”(《论语·为政》)孟子用以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范畴,提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中庸》认为“诚”这一精神实体起着化生万物的作用:“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唐李翱将“诚”视为“圣人之性”,是至静至灵寂然不动的“心”(精神)。北宋周敦颐用以为至高无上的宇宙本体:“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通书》)明清之际王夫之提出:“诚,以言其实有尔。”(《张子正蒙注·天道篇》)“诚者,天之道也,阴阳有实谓之诚”(《太和篇》),用以指客观的“实有”,并作为宇宙的一般规律。实,真实、真诚。如,实事求是,实心眼儿。《后汉书·藏宫传》:“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实的态度,就是按事物本来的面目、规律办事,不臆造,不歪曲,言行一致,不虚假。谦,就是谦虚。《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虚怀若谷。逊,即恭谦,“常逊言恭

^① 见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新华文摘》1994 年第 2 期。

色”。诚实和谦逊的学习态度,就是老老实实、一是一、二是二、不虚妄、不浮夸的学习态度。

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不仅自己采取“诚实和谦逊”的学习态度,而且经常教育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要采取“诚实和谦逊”的学习态度。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做总结时,告诫全党的干部:“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①

1949年6月30日,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写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②

(二)“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这句话,出自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③。这个命题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理论推导出来的。由此,毛泽东指出,当时的中国,不但存在帝国主义的文化 and 半封建的文化,同时还存在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亦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那么,这三种文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41页。

② 同上,第148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63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化,从知识的角度说,哪一种是科学的呢?毛泽东认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属于世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同盟军,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不能脱离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的。

关于民族的文化,他说:

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

接着,他又说: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

25年后,即1965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说,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到,中国的好东西也要学到。半瓶醋是不好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

西,两边都要学好,两边都要有机地结合起来。鲁迅就是这样,他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两边都很熟悉,但是他的光彩,首先不在于他的翻译,而在于他的创作。他的创作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式的,但是,他是中国的,我们应当学习鲁迅的精神,精通中外,吸收中外艺术的长处,加以溶化,创造出新的、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艺术……例如写小说,语言、人物、环境,必须是中国的,但是不一定是章回体。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非驴非马,成了骡子并不坏……

关于科学的文化,他解释说:

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也谈到科学问题。他说,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研究和发展中国的东西。就这一点说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样的。一切外国的好东西,我们都要学,学好了都要在应用中加以发展。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要做独创性的努力,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例如西方的医学和其他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化学,细菌学,解剖学,你说不要学?对这些近代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了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应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和中药,以便把中医和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关于大众的文化,他说: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以上有关反对旧文化，建立新文化的论述，实际上已基本包含了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内容。这就是文化是属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范畴；它应反映一定的政治、经济，并巩固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经济；它应该批判吸收中外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它应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并成为革命的武器，做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等等。

在对待中外文化遗产方面，他认为，世界上的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历史上的东西有精华，有糟粕，混杂在一起，积累的时间又很长，要把它整理出来，分清精华和糟粕，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但是因为困难就不要历史，把历史割断，把遗产抛弃，是不行的，老百姓不会赞成的。外国的很多东西，我们都要学，而且要学好，基本理论尤其要学好。有些人主张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主张是不对的。所谓“学”就是学基本理论，基本理论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毛泽东说的是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的观点。可是，有的人将毛泽东的话歪曲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然后加以批判。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毛泽东说的“一定的文化”是指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而不是所有的文化。因为，有些文化并非属于观念形态的文化，像书法、杂技、艺术、某些音乐、舞蹈、建筑艺术以及花鸟画、山水画、山水诗等，其本身没有多少意识形态的内涵，即便是有，也看不出其阶级的属性，因此各个时代、各个阶级都可以欣赏，从中产生审美的愉悦。例如，李白的诗《下江陵》：“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完全是一种自然景观。对这样的作品就未必一定要冠上“封建主义文化”或“资本主义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的标签，也难以看出它是哪一种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是为哪种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一定要硬说它是某种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为其服务，就未免脱离实际了，反而庸俗化、不科学了。可是，有的人却说毛泽东的“观点”有某种局限和某些偏颇。其实，并非毛泽东的观点有某种局限和某些偏颇，而是“歪曲”者的观点有局限和偏颇。因为，毛泽东明明是指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他却硬说毛泽东是指“一定的文化”。“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和“一定的文化”是含义不同的两种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张冠李戴。搞学问、搞研究，先将别人的观点予以歪曲，然后进行批判，证明自己比毛泽东还正确、还高明，这是极不严肃、极不老实的态度。

毛泽东说，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研究科学问题必须持科学的态度：没有科学态度的研究，那就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装腔作势，貌似正确，借以唬人。但真理是不怕批判的，愈批判愈显出其耀眼夺目的光辉。反而是造假者，到头来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吃亏在于不老实。

(三)“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有人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酷爱学习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读史,已经成为他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甚至也可以说是其生命活动的一部分,须臾不可或缺。毛泽东是一位历史知识渊博的政治家。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苦诵强记,引古为鉴,展示了一代伟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确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有人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要继承,又要批判分析。”因而他具有师古知今的非凡才能。

毛泽东读史,有一种基本态度是贯穿始终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在中国很多古书里,历代农民起义运动及其领袖人物,大都被当作“贼”、“匪”、“盗”、“寇”,任加贬斥。但毛泽东则给他们以很高的历史地位。毛泽东读中国史书,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包括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对陈胜、吴广、张角、张鲁、王仙芝、黄巢直到李自成等的传记,他是常要看的,而且还看得很细。如在《旧唐书·黄巢传》后,毛泽东特意画了一张黄巢行军路线图。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

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①可以说,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这种学习观点和学习态度,始终是他认识和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

我们可以举早、中、晚三个时期的例子来说明。

在1926年5月~1926年9月,毛泽东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为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等课程。据保存下来的当时学员的听课笔记,毛泽东是这样来分析中国历代朝廷的兴衰的:秦朝末年,陈胜、吴广不堪其苦,遂辍耕而叹,揭竿而起,他们纯粹是代表农民利益者。同时刘邦、项羽等皆起兵讨伐秦始皇,结果刘邦获胜,项羽等失败。刘邦立汉为高祖,他虽为地主阶级,但胜利的原因在于,初入秦时,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得一般人之信仰,故秦人大悦。项羽入关,粗恶无比,不得一般人之信仰,此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曄、班固、班昭等——因为他们吃的是汉朝的皇粮,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样怎样坏。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个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均田制是王莽提倡的,可见他注意农民问题了。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惟其土地,而他先节制田地。地主阶级见王莽所行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阶级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刘秀遂于是时起来了,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盖因王莽代表农民利益,不得地主阶级拥护,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故能得最后之胜利。唐末黄巢起义,所向皆克,由于他不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被地主们宣传为强盗、无恶不作,遂失败了。宋代梁山泊宋江等英雄好汉,精明善战,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农民利益,不容于当时社会,遂至失败。元末,朱元璋是一和尚,平时睡着了常作“天子”字形,郭子兴见而奇之,收为部下,后代郭子兴而起。初能代表农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25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利益,以后遂变为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了,故能贵为天子……^①

毛泽东此时的认识和看法,还不像以后那样明确和深刻,表述上也还有逻辑不甚清晰的缺陷,但这毕竟是他直接用阶级分析法评说中国历史兴衰的较早实例,或者说是他的阶级斗争(其间又主要表现为农民起义)历史观的较早表述。他当时的基本态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根本上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皇帝只不过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历朝皇权的更替,都是地主阶级分裂的结果,更来换去,还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历史上以农民起义为代表的进步的历史力量,或某一地主阶级集团在某一时期具有进步性,根本上是因为其代表农民的利益,但由于它无科学的世界观、社会观为武装,所以,斗争总是归于失败。

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把他上述的历史观表达得更为明确,而且更有理论深度。他说: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

^① 陈君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958~959页。

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1964年春,毛泽东写的《贺新郎·读史》,可以说是他晚年对自己的历史观的鲜明表述: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他以诗论史,思路清晰,把他读《二十四史》所引发的感受表达出来,意味深长地体现了他的基于被压迫者立场上的“阶级斗争——奴隶革命”的历史观。这是何等明确、严谨而又科学的学习态度!上阕以“彼此弯弓月”一笔荡过“几千寒热”的历史风云,即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下阕则以革命家的立场、观点,明确提出,一部二十四史,毕竟必须从“盗跖庄舄”说起,必须从奴隶们“奋起挥黄钺”说起,因为,历史是奴隶们创造的。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毛泽东无论是对中国的历史,还是对世界的历史,他学习、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鉴古戒今”、“鉴外戒中”,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正如周恩来所说:“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作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毛泽东丰富的历史知识、历史观以及学习态度,他论史、评史的原则和方法,也都反映在他的文章、讲话、诗词中,他对祖国历史的尊重与热爱,他对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憧憬,都熔铸成了闪烁着智慧光彩的诗文。

二 学习有两种态度

毛泽东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从这一学习目的出发,他又认为:“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两种学习态度”,虽然针对中共党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说的,但实际上对任何人,在任何学习问题上,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因此,毛泽东关于“两种学习态度”的思想,具有普遍的意义。我们不能不重视对“两种学习态度”的研究。

(一)“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

知识分子出身的人,讨论问题时,动不动就咬文嚼字,习惯于

从定义出发,而不是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这可能是知识分子的通病。

在土地革命时期,农民问题是党内争论的焦点,而农民问题又主要是土地问题。久远的问题不谈,仅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说起。孙先生的“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他这么说了,也写进了国民党的“党纲”中。但是,他连半步也没有迈出去,当然就没有做到。孙中山晚年改组国民党,制订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令人遗憾的是,孙先生死得太早,也太突然,“三大政策”刚刚开始实行,他就辞世了。中华民国的政权先后落到汪精卫和蒋介石手里,“三大政策”也就随着孙中山的去世而归于西天。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实行者,决心不辜负孙中山先生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决心将土地革命进行到底。

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然而,对于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毛泽东来说,他不相信农民问题在中国就不能解决。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并曾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他在国民党“一大”会上,曾为孙中山的不明朗的而且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民主义”进行过辩护。会后,毛泽东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并主持过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他在理论宣传上做出了可贵的努力。1925年12月1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4期上,他发表了国共合作以来的他的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也是收到《毛泽东选集》中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文章劈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和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这是最初发表的原话,后来收进《毛泽东选集》时,作了改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后来,他又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刊载了这篇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两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是的,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均分析了农村的阶级状况。他的分析,如,什么是地主、什么是贫农,等等,并不是从定义出发,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毛泽东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①可是,陈独秀就不赞成毛泽东的观点。毛泽东开始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策持不同意见。

1927年4~5月间,中共召开“五大”。毛泽东出席了“五大”,并提出了“广泛的重分土地”的报告。因为这个时期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共产党农民部的工作。中央委员会把他的报告否决了。

当时,尽管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并且开始在上海和南京袭击共产党,陈独秀依然主张对武汉的国民党(即汪精卫)妥协退让。他压制所有的反对意见,奉行右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对于当时党的政策,特别是有关农民运动的政策,毛泽东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页。

非常不满。但是,陈独秀奉行封建家长制作风,独断专行。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且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在革命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举行的中共“五大”上,没有通过一个恰当的土地纲领。对毛泽东要求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意见,甚至没有进行讨论。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占 500 亩以上土地”的人,才是地主。这样的地主,在中国是很少的,或者说是极个别的。于是就不再考虑土地问题了。毛泽东后来说:“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而且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农村经济的特殊性。”^①不久,首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陈独秀垮台。但是,陈独秀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却是无法估量的。1927 年大革命的失败,就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

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对从定义出发,而不从实际出发,从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是终生难忘的。1942 年 5 月 23 日,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结论时说: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我们再回到土地革命时期去。

^①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版,第 52 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当时,毛泽东对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态度,就不是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是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

毛泽东作过调查,中国 70% 的可耕种土地被只占人口总数 10% 的地主、富农、官吏和高利贷者占有,另外 15%~20% 的土地为农民占有,而占全部人口 65% 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仅占有 10%~15% 的土地。这种极不合理的占有关系,造成了农村中的贫困落后和动荡不安,同时也为毛泽东发动一场革命准备好了炸药。

毛泽东知道如何在这样的基础上组织农民。有人称毛泽东为“社会主义的工程师”,“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什么,而且完全懂得这些疾苦怎样能够转化为行动”。土地是农民的主要生产手段,农民称它为“命根子”。有了土地他们就可以不饿肚皮,没有土地他们就得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讨,成为“兵匪游民”或者欠下高利贷,沦为债务奴隶,永世难得翻身。谁能够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他们就会不惜生命跟谁走。因为,毛泽东知道:历史上,李自成“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曾经唤起了千军万马,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他后来曾对斯诺说过:“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所以,“打土豪,分田地”这六个字,便成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纲领。

为了尽快发动农民都来革命,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就拟定了一个土地纲领: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实际是富农)和自耕农的土地在内,然后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农和雇农耕种。为什么要没收一切土地呢?毛泽东说:“如此方可安民。”因为仅仅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还不足以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但是,这样做又出现了另外的问题,没收一切土地而不只是没收地主的土地,这就把中农的土地也划在没收之列了,等于连中农的命也革了,中农很不满意。此外,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农民只有使用权,并且不许买卖,中农、贫农都不高兴,出现“不安耕种”现

象。

毛泽东没有死守“规章”不放，于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以缩小打击面，团结争取中农。同时采取“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的办法限制富农。这些办法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一切革命因素，减少了革命的阻力。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看当时只有我这种办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的办法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大问题。农民从共产党手中接过土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以后，就必须投身保卫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以免他们手中的土地得而复失。这样，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二)“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这个话，是毛泽东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论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时讲的。

大革命时期，我们党曾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吃过“照抄照搬”苏联革命经验的大亏。但，那时的错误已经纠正了，已经成为历史了。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教条主义学习态度，显然不是指大革命时期的教条主义的学习，而是指建国初期表现在经济建设——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学习态度。这个时期的教条主义学习态度，是指学习苏联的经济建设经验，它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的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灾害,虽然没有大革命时期那么严重,那是因为“革命”和“建设”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况且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了。即使是这样,教训也是够深刻的。

有人可能要问:当时为什么要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不会不学?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答有人质问“你们一边倒”时,说:“‘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当时,惟一的选择,就是一边倒,倒向苏联。这样“一边倒”意味着两点:第一,政治上同资本主义国家决然分开,打消一切对西方国家的幻想;第二,不能脚踏两只船,一只脚踏在社会主义这边,另一只脚踏在西方资本主义那边。

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世界政治格局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苏、美各领一方,其他国家有四种可能的选择:一是倒向苏联一边;二是倒向美国一边;三是放在两者之间,左右逢源;四是谁也不靠,独当一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刚把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赶出国门,当时又在朝鲜战场跟美国打仗,再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二、三条路不能走,走也走不通;由于综合国力不强,第四条路也不能走。只剩下一条路,倒向苏联一边。这是自觉自愿的选择,同时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刚刚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几乎谈不上有什么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一切都是从零开始。苏联在中国过去的革命中帮了不少倒忙。毛泽东对此很有意见。1945年,他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现实相结合,这样差不多挤掉了苏联模式,然而5年之

后,他却提出这样一个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制订的。58%的资金用于重工业,60%的基本建设需要依靠苏联的技术援助。不仅如此,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体育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学苏联、模仿苏联。那时的电影、流行歌曲,是苏联的,大、中学校教材,基本上是搬用苏联的,学外语只学俄语,连考试成绩记分法也改为苏联的“五级记分法”。1953年~1954年,全国许多新建中学校舍用的也是苏联图纸。甚至有一段时间,青年男女穿的花布、列宁服、军队士兵的船形帽也是学苏联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很好,工业年增长率为11%,钢铁产量增长了4倍,煤炭和水泥增长了2倍。在这期间访问中国的人已抛开了中国的思想目标这一话题。一些人称中国人为“蓝蚂蚁”,一些人称中国人是“崭新的人”。但不管怎么评说中国人,中国正在阔步向前。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他在最后论“中国和外国关系”时说:“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又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毛泽东比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聪明得多,当他发现自己“教条式”地学苏联出现了错误时,马上由自己来纠正。

他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了,苏联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们的压力很大。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承学习,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了。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讲到中苏关系时说:“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他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相互排斥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是互相转化的。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完全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完全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毛泽东说,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他还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

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总之,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①

(三)还要学会两种本领,头一个是松树的本领,第二个是柳树的本领

社会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人生在世,待人接物,没有点松树的本领和柳树的本领,其最终结局是难以想像的。因此,于1945年8月毛泽东在赴重庆跟国民党谈判之前向党内作指示说:还要学会两种本领,头一个是松树的本领,第二个是柳树的本领。松树发育成长,不怕刮风下雨,严寒之中也能岿然屹立,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插到哪里都能活,一到春天,枝长叶茂,随风飘荡,十分可爱,柳树有“灵活性”。这些话,人人都会说,但未必人人都能做得到。正因为如此,人才有“伟大”与“平庸”之区分。这也就是说,人一生偶尔具有松树的本领和柳树的本领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具有松树的本领和柳树的本领,无论大事和小事,无论公事和私事,无论对什么人,都能显示出松树的本领和柳树的本领来,坚持言行一致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1~402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开始,直到他生命的终止,都是把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看得重于一切、高于一切,因而具有一种反抗邪恶,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老子不怕,鬼不怕,死人不怕,官僚不怕,军阀不怕,资本家不怕,权威不怕,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胜利的精神和本领。

毛泽东自幼表现出来的反叛个性应该最早来源于抵抗他父亲的严厉。由于父亲长期以来受封建宗法思想的影响,毛氏家规也要求很严,加上外出当兵的军旅生活,他的脾气变得暴躁而专横,这种性格又促成了他独断专行的作风。他一心要发家致富,当然也希望全家人都朝这个目标奋斗。他或许认为自己是一家之长,读过两年私塾,又外出长过见识,全家听命于他的指挥、围着他的指挥棒转是天经地义的。

然而,他的儿子毛泽东却不买他的账。从小就以各种形式发泄他对父亲的不满。在父亲责骂或严打之后,幼小的毛泽东从不痛哭、告饶和求援,有时是噘着小嘴,怒视父亲,站着不动也不哭;有时是在上学路上将饭盒摔到河里,以发泄对父亲的满腔愤恨。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识的增多,他想尽办法反抗父亲。正如毛泽东自己后来回忆少时生活时所说:

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利用我父亲引以为据的经书上面的话来同他进行辩论的好办法。我父亲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就引用经书里关于长者必须慈爱的话来回敬他。针对他指责我懒惰,我反驳说,年长的应该比年轻的干得更多,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所以应该多做工作。^①

有一次,毛贻昌邀请了一些生意场上的人到家里来吃饭,毛泽

^①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16页。

东本来就对这些惟利是图的商人没有好感,更讨厌那些繁文缛节,他不顾父亲要他倒茶递烟招待客人的吆喝,拿了一本书看,装作没听见。父亲一把抓起他的书扔在地上,并当着客人的面骂毛泽东是一个又聋又瞎、好吃懒做又不孝的东西。毛泽东当着客人反驳道:“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父亲看见儿子竟敢顶撞老子,火气更大了,抄起一根棍子就朝儿子打去。毛泽东撒腿就往屋外跑,父亲气势汹汹地追了上来。眼看快要追上了,毛泽东突然收住脚,指着他身边的水塘大声喊:“你再追,我就跳下去。”

父亲看到这架势,也赶紧收住脚,但还是扬着手中的棍子,不服输地说:“你想吓唬老子!?”

二人虎视眈眈。正在这时,母亲急匆匆地赶来了,她一边劝丈夫说儿子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不要硬让他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一边又要让儿子向父亲认个错。

在这种情势下,双方提出了“和谈”条件。父亲坚持要儿子下跪磕头认错。儿子则表示,如果父亲答应不打,可以单跪一条腿,并说这是看在母亲的面子上,跪下的这条腿是娘腿。父子间就这样达成了协议。从此,毛泽东悟出了一个直观的道理:在专制和压力下如果温顺示弱和屈服,那就丧失了原则,拿原则做交易,反会遭受更多的打骂,只有用孟子说的“威武不能屈”、坚决反抗的办法,才能保护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长,毛泽东同父亲的抗争变得机动灵活了,他和母亲、弟弟乃至雇工联合起来,组成反对“党”,即与其父亲执政党相对立的反对“党”。1936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曾谈及此事:“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于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动感情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① 这种朴素的“统一战线”思想奠定了毛泽东后来的“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基础,为其驾驭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局势铸造了本领。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都是一些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的原则问题。对于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他是坚决斗争,寸步不让。尽管他先后五次受到残酷打击,被撤去党、政、军一切职务,甚至差一点被开除党籍和杀头,但他仍不示弱、屈服,而且非常的自信和乐观。他坚持原则,决不放弃自己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主张,同时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当实践证明他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只有毛泽东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惟一正确的道路时,当他在遵义会议之后重掌军队和党的最高权力之后,他与犯错误的同志的斗争仍在继续,在对人的处理上,却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极为灵活的方针。

在跟蒋介石的斗争上,毛泽东更表现出了坚定的原则性和巧妙的灵活性。

著有《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的德国友人王安娜 1937 年春天在延安请教毛泽东:“要是统一战线成功的话,延安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毛泽东答道:“党的现行的许多政策,大概会放弃吧。比如,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只是要求减租。对我们来说,蒋介石如果真的认真抗日,我们甚至准备把红军交给他指挥。边区的领导权也可以协商。我们的目标暂时可以搁下,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为了抗日大计,甚至可以交出军队领导权!但这只是“暂时”的。暂时这样并不意味着将来也是这样,一切依时间转移。暂时这样做首先是

^①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版,第 16 页。

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人打进中国,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而中国不只是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也有一份。如果民族利益得不到保全,谈何共产党一党利益?暂时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共产党及其军队暂时还很弱小,还不足以同国民党及其军队抗衡。而抗战正是扩大影响、积蓄力量、壮大自己的好机会。这样看,暂时搁下我们的目标,岂不更有待于将来吗?毛泽东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把眼前的目标与将来的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于将灵活性与原则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前者为后者服务。蒋介石是“反共”和“抗日”同时并举。毛泽东则把“反蒋”和“抗日”两个目标巧妙地错开,并使两者互相照应。他在“联蒋抗日”的同时为下一阶段的“反蒋”工程做好了准备。他吃透了“日、蒋、共”三方面两对矛盾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跟美国的斗争上,毛泽东也坚持了原则性与灵活性对立统一的观点。

毛泽东准备和美帝国主义斗到底。具体要斗多少年,他没有精确预计,反正是“你死我活”。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讲到中美关系时说:“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莫及……”

1970年12月18日,这位东方巨人突然向大洋彼岸发出了恳切的邀请:“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这是怎么回事?是美帝国主义突然变得不坏了吗?不是,是毛泽东变得现实起来了。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对中国真正构成威胁的已经不是美国,而是来自过去称为“老大哥”,当时称为“北极熊”的苏联。当时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苏联到处扩张。1969年又在东北和新疆挑起两起规模不算小的武装冲突,随后的边界谈判停了下来。作为军事战略家的毛泽东心中明白谁是最主要的敌人,因此必须面对现实。毛泽东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歧,重新考虑他的外交战略:消灭帝国主义的问题也许可以放到以后再说,目前最要紧的是中国的安全。同时对付两个超级大国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古人不是说过“远交近攻”吗?得把对自己没有直接威胁的敌人暂时联合起来做盟友,以便共同对付对自己有直接威胁的敌人。

当然,毛泽东之所以做这种考虑,也与当时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关。美国人比毛泽东更现实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20多年,并逐渐强大了起来。美国再想孤立中国已不现实了。中国有庞大的商品和文化市场。中国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1971年10月25日,26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与此同时,蒋介石的代表被驱逐出了联合国。既然大陆中国成了中国的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它还能跑到哪里去?台湾问题一下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通向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后障碍已不是那么显著了。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正式访华。毛泽东会见了。两人竟像阔别了多年的老朋友,谈得非常认真、坦率,似乎早该如此似的。会谈中,毛泽东对纠缠了20多年的台湾问题表现得很超脱。基辛格后来回忆说:“他(毛)巧妙得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次要位置,把它当作中国内部的一项不重要的争端;他甚至只字不提美国在台湾的驻军问题。”“在那次会见以及以后的任何一次会见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台湾问题表示过不耐烦,没有规定过任何期限,没有进行过任何威胁,或把它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试金石。”

“我们可以暂时不管它们,过一百年再说吧”。“为什么要这样匆匆忙忙呢?”“这个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这些就是毛泽东多次向美国总统表明的

他对于台湾问题的态度。他之所以这样表态,一是因为台湾当局已被从联合国席位上赶了下来,美国再难以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了;二是考虑到,北边苏联的威胁和台湾问题比较起来,北部边境确实显得更为重要。

毛泽东主动打开了通向美国的大门,说明他的世界战略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考虑,他开始从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上,而不再是从意识形态、从“两大阵营”的框架上去考虑中国与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的关系问题。这是他在国际斗争中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对立统一思想的新突破、新发展。

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还说,有时我们不妨互相骂几句,反而会增加国内对我们合作的支持。毛泽东提到在中美建交这件事上,他在国内受到激进派的压力。说骂几句美帝国主义,可以叫激进派放心:中国仍然把美国当作敌人,只是这个敌人暂时可以为我所用。这一声明也是提醒美国人,不要把“打倒美帝国主义”之类的口号当真了:为了照顾国内情绪,就让我们相互骂几句,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毛泽东本人内心是不是真想骂,美国人心里很清楚,不过他们已习以为常了,看得无所谓了。骂几句美帝国主义还有一个好处:第三世界广大朋友不会因为中美言和而离开中国。

综上所述,要真正学会松树的本领,是需要智慧的。松树的本领——原则性,对一个人来说,就是始终要坚持正确的人生方向,不管在何种时空、何种情况下,永不迷失人生的大方向;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就是要有坚定不移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科学信仰。为了信仰,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柳树的本领——灵活性,是一个人、一个革命者通达“方向”所采取的策略与战术。只要不违背大方向,策略和战术可以灵活多变,不必恪守一端。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不管是松树的本领,还是柳树的本领,都难以从书本上学得,而必须通过实践,并且只能通过实践才可以学到手。

第十章

学习的诸种运筹

这里说的诸种运筹,是指青年毛泽东学习活动中的心理运筹、时间运筹和智谋运筹。运筹是一门科学,它是高等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运筹学。运者,行也;筹者,划也。运筹就是调动心力智力,运用数学的方法制定策略。毛泽东虽不懂高等数学,他的运筹本领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从实践中学来的。善于运筹,敢于运筹,是毛泽东聪明之所在。因此,学习的诸种运筹,就不能简单地视为一般学习方法,而是学习中的方法论。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不从学习的方法论原理的高度来研究毛泽东在学习活动中的诸种运筹问题。

一 学习的心理运筹

人的心理是学习活动的产物,又反过来作用于人的学习活动。社会生活条件是幼儿、儿童心理发展的决定因素,而学习对幼儿、

儿童心理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幼年及童年时期毛泽东的心理的形成与他的家庭、外婆家庭及韶山、唐家塅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环境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及其在父母、外婆、舅父的教育下形成了他的学习的兴趣、情感、意志等诸多心理品质,这给他的学习活动以这样那样的影响。从研究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毛泽东学习心理的运筹可以看出:毛泽东并不是什么天才,也不是什么神童,但他却具有一般孩子所没有的诸多心理品质——对学习特别钟情,从小对不良现象和事物就有厌恶感,是非观念比较明确,学习多半从兴趣出发,对其感兴趣的书籍学起来情感特别投入,其意志力使我们加深了对青少年毛泽东的认识和理解,并以其为榜样在学习活动中运筹好心理,以利于更好的学习。

(一) 兴趣所致,读书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轻松,像休息一样,人就不会感到苦和累了;没有兴趣,咬着牙看书,如同嚼蜡,即使有毅力,也仍看不下去

有人曾这样评价毛泽东: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更不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他的出生地韶山,只是一个小山村,闭塞落后,信息不通,对于毛泽东革命思想的启蒙和领导才能的养育,可以说是作用不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向隅而居的乡村生活导致毛泽东在同时代青年中略显“晚熟”。

从出生到17岁以前,毛泽东在学业上仅有读过“六年孔夫子”的经历。如果毛泽东不是毅然走出韶山冲,到山外的湘乡东山读书见一点世面,并有幸被好心的老师带往长沙省城上中学的话,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当然,在毛泽东的成才之路上,他的主观努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否则就难以解释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当时他的许多同学读书之后无所作为,毛泽东却读而优则革命,读而优则成为著名的革命领导者了。

这里说的:“他的主观努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当首属他心理因素中的“兴趣”。

兴趣,也叫爱好,或喜欢。兴趣是主体力求认识某种事物,喜欢某种事物,或爱好某种活动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是和一定的情感联系着的。例如,毛泽东对阅读小说有兴趣,对报刊、杂志中的新知识,反映的新思潮有兴趣,对体育活动有兴趣。毛泽东从小喜欢读书,在上私塾时,老师让买的书,父亲毫不吝啬。可是,毛泽东爱看的是“闲书”、“杂书”,对看这些书,父亲本来就反对,何况他平时一个钱恨不得掰成两个花,哪肯花钱买这些书呢?

少年毛泽东学习的兴趣是其对客体的一种选择性态度,是在需要的基础上,在生活、实践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他后来回忆私塾时说:“我熟读经书,可是并不欢喜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少年毛泽东的这种心理反映,是产生于对父亲的粗暴、专制的反抗。他在这种“反抗”心理的支配之下,才对“造反”的故事特别感兴趣;他愈是对“造反”的故事感兴趣,就愈爱看“造反”的故事,直到有那么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他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这一发现,使他由反抗家庭中的“执政党”——父亲,而萌发了反抗当时社会的统治者的意识。

若干年后,毛泽东曾对人说起过他当时的心境:阅读“闲书”和“杂书”时的知识发现,在他的心里涌起了巨大的波澜,成为他为广大劳动群众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的最初的朴素思想基础。正因为

有了这个思想基础,日后的毛泽东终于践履了当年向老师许下的诺言——“写一本农民的书”,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是一部亘古未有的宏篇巨著。这本书里,千万年来被压在社会最低层的农民觉醒了,站起来了,他们拿起了斧头和镰刀,砸碎了捆在身上的锁链,拿起了锄和镐,挖掘了埋葬旧世界的坟墓,建造了一座崭新的社会主义大厦。自然,这些都是后话。毛泽东的学习兴趣可分为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两种。阅读“闲书”和“杂书”,这是他对事物本身感到需要而引起的兴趣。另外,一开始他对某些“书”本身并没有兴趣,而是因为这些书中的知识与“造反”故事有某种联系,学了后可能对未来有某种好处,于是也就认真地学了起来。例如,《盛世危言》、《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样一些带有浓厚爱国主义色彩的救国图存方面的书,并深深为书中的内容所吸引。

在6年的私塾求学期间,毛泽东很爱看书,对老师故意让他背的经书,他都能应付自如,但这正如他后来说的:“那时我能读书,可就是不好好读,后来在家种了两年田,到了东茅塘麓钟二伯手下读书,才晓得用功了。”

是的,在私塾学习的最后一年,毛泽东在毛麓钟的严格指导下,广泛阅读了历代各家诗词歌赋,加上他读书颇具天分,博闻强记,古文功底打得十分牢固扎实,往往出口成章。到东山学堂后,学习条件优越,图书藏量丰富,对于渴望追求新知识的毛泽东来说,更是如鱼得水。从这时起,他对于本来只是间接感兴趣的书籍,也渐渐地有了直接的浓厚兴趣。他把“天才”与勤奋“嫁接”在一起,刻苦攻读了大量新书。

在定王台自修半年,毛泽东读书的兴趣可以用他自己的活来形容:“那时,我贪婪地读,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样。”这真是达到了令人神往并陶醉了的境界。与此相比,毛泽东初进一师时,对其不感兴趣的功课,不仅不重视,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有时甚至干脆不学。例如,他对美术毫无兴趣。让他画画,他总是挥而就,画个椭圆形,说是学“达·芬奇画蛋”;画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个半圆,说是表现“半壁见海日”,往先生那里一交了事……在一师学习期间,毛泽东学习的兴趣,在喜读国文、历史、地理的基础上,开始研究哲学、伦理学和时事等。这时,他的学习兴趣,已不是孩提时代的朴素而幼稚的兴趣,而是涂上了十分浓重的理智的色彩。也就是说,毛泽东这时的学习兴趣,是与他救国救民的凌云壮志联系在了一起,他所感兴趣的,他所思虑的不是一己的出路,而是天下万民的出路;他要学的不是一技之长,而是探索中国、世界、宇宙的大本大源。

毛泽东曾坦率地告诉两度任一师校长的孔昭绶:他不喜欢一师,尽管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教学条件比原来读书的四师好得多。可是,在这个学校“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校有很多规则,我同意的很少”。正因为这样,许多必修课程与他的学习兴趣发生了冲突。他学习历来颇有些“感情用事”,也就是说通常是凭兴趣爱好读书。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兴趣所致,读书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经松,像休息一样,人就不会感到苦和累了;没有兴趣,咬着牙读书,如同嚼蜡,即使有毅力,还是看不下去。按他制定的自学计划,学习的兴趣完全放在文学、哲学和史地等学科上,对其他的课则不愿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不屑去争高分、满分……

在一师,毛泽东除了对学习文学、哲学和史地最感兴趣外,那就是对“游学”、体育锻炼和当“学生志愿军”饶有兴趣。毛泽东曾被孔昭绶任命为学生志愿军“总指挥”。学生志愿军,编制成一个营,营下辖二连,一连三个排,一排三个班,每班14人,计269人。营长、副营长由兵式操老师担任,营以下的连、排、班长由学生担任。毛泽东经历了近两年的学生志愿军生活,曾率领荷枪实弹的100名学生志愿军突然袭击当时桂军付良佐,致使付的队伍顷刻

瓦解,溃不成军,约有 3000 余人当场缴械投降……这段生活,在他的头脑中注入了尚武精神,使他经受了严明的军纪的考验,系统地接受了战术、兵器、地形等军事训练,培养了研究军事技术和指挥艺术,特别是战争的兴趣。

毛泽东对学习的兴趣效能,促使他和蔡和森为突出代表的一大批有为青年,最后把一师作为医世救民的演练场,锤炼坚强的意志、砥砺高尚的品质、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卓越的才能的场所,他们从早期参加一些有益的组织和活动起步,发展到后来投身于爱国和革命运动,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终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领袖或领导骨干。

(二)“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

人在学习活动中的心理运筹,不只是表现在兴趣机制上,兴趣又常常表现为积极的或消极的情绪。这就是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的:“然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则非,知识固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动作者半……”^①这就是说,作为心理因素的情绪或感情,它是从人获取知识的活动中产生的,在其产生的过程中就具有了动机的作用,它既能促使人从事积极的学习活动,同时也能够阻止或干扰人正在进行的学习活动。例如,毛泽东刚进南岸私塾读书时,业师是邹春培,他奉行的是封建“正统”教育,四书五经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容有丝毫异端邪说。因此,毛泽东在这里是从读《三字经》开始的,继而点读《论语》、《孟子》、《诗经》等儒家经典。先生的教授之法是让学生鹦鹉学舌般朗读,背诵那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老师不做讲解。这样的教育方法自然遭到后人抨击,也令童年毛泽东生厌,使他对经书毫无感情,对老师也没有什么感情。建国后,他在同人交谈,回忆起蒙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227 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师和当年在南岸私塾读书的往事时,以特有的语调说:“邹先生是个好人!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调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反哩。”言语之间,流露出对昔日老师邹春培深深的崇敬与怀念之情,同时也流露出对“经书”的厌恶之情。

情绪与情感跟需要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由它们引发的学习行为是否延续,并不取决于是否获得某种知识或技能的满足,而取决于情绪和情感活动本身。例如,在私塾读书的6年中,毛泽东所读的书多为儒家经典。虽然他具有强烈的反抗、叛逆性格,也经常对老师“捣蛋”,但当“捣蛋”、反抗无着时,他的不满或者愤怒情绪自行消失后,一般来说,类似的反抗性行为也就不再发生,这些经典也使他获益颇丰。随着所读的书不断增多,涉猎的知识面不断拓宽,这个昔日顽皮的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也变得日益浓烈了。

情绪和情感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反映,它不是自发产生的。任何情绪和情感都是由一定的对象引起的,都有其客观的原因,当然也有主体的主观原因,是两者的相互作用的结果。毛泽东之所以离开私塾,要到50里之外的东山学堂去求学,是因为他早就听到在这里读过书的表哥王季范说过,校长李元圃是个维新派,思想比较开明,热爱教育事业,在湘乡学界很有名气,是一个好人。于是他便奔东山学堂求学来了。毛泽东入学时的出色的“入学考试成绩”及表现,令校长李元圃惊叹和兴奋不已,因而给毛泽东以特殊的厚爱。在李元圃校长的鼎力帮助下,毛泽东有了一个比较舒心的学习环境,于是,对东山学堂,对李元圃校长产生了一种深厚的感情。这种感情,促使他广泛学习国文、美术、经学、修身、历史、地理等各科知识。特别令毛泽东佩服的是,李校长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他常在学生早晚点名的时候,向学生讲一些中国日益贫弱、迭遭列强侵略和侮辱的情况,启发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听了李元圃多次的讲话,毛泽东心情更加沉重,他感受到要救国救民,光读“死书”是不行的,还

要钻研“天下国家之要事”。从此,他除了学习文化课外,还十分关心时事政治。毛泽东的读报习惯就是从这时养成的。后来,毛泽东对谭咏春的儿子深情地说:“是啊!李元圃先生,贺岚岗先生,还有你父亲,都是热心的教育家,他们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们,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呢!……在当时,他们能够这样关心一个学生,真是不容易呢!现在应该好办得多了,我希望所有办教育的人,都注意爱惜人才!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人与人之间有了感情,就像毛泽东所说的“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半”。老师对学生的感情体现在一个“爱”字上,而学生对老师的感情体现在一个“尊”字上。学生由衷地尊敬老师,又体现在对老师“言听计从”上。在东山学堂求学时的毛泽东刚十七八岁,正是接受新事物、新知识最快的人生阶段;又是获得一知半解便急于与人交流、幼稚和尚不成熟的人生阶段。他通过谭咏春先生在课堂上讲康梁文体和自己在课余时间读康梁文章,仿佛透过沉沉深夜,看到了新思想的光亮,虽然这光亮是那样阑珊。他为此感到激动、欣喜,内心有一种要和人交谈的冲动。于是他想起了被人称为“假洋鬼子”的萧先生——他要把自己这些时日来的学习心得告诉萧先生,萧先生知道自己的长进一定会很高兴的。当然,还有许多自己一时还弄不清的问题也要向萧先生说一说。于是,一个星期天,毛泽东找到萧先生,就“康梁的维新变法像不像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了深入的交谈。通过交谈,毛泽东明白了“康梁维新”与“明治维新”的区别以及“康梁维新”失败的原因。毛泽东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些事,他先前把维新的希望寄托在康梁身上,想不到他们已是自身难保,亡命海外了。

听了萧先生的话,毛泽东深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他急切地问萧先生:“你说说看,我们中国还有出路吗?”

“出路还是有的。”接着,萧先生把革命党人1905年在日本组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织“中国同盟会”的事,及他们在国内斗争的情况一一告诉了毛泽东。最后说:不管他们革命的道路多么曲折,“目前,反清排满已成大势,只要天下人起来抱成团,满清王朝崩溃覆亡的命运便为期不远了”!

两人临别时,萧先生对毛泽东说:“润之,以我的观察,你是个勤学而好思的学生,应该有个大的志向才好,将来有机会,走出这湘乡城,走出湖南省,走出国门,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闯一闯吧……”

又过了一段时间,即快到放寒假的时候,李元圃校长打算在下学期推荐毛泽东到省城长沙去读中学。毛泽东把这件事告诉给了萧先生。

萧先生听后高兴地说:“好啊,润之!巴尔扎克说过:离开了人才荟萃的中心,呼吸不到思想活跃的空气,不接触日新月异的潮流,我们的知识会陈腐,趣味会像死水一般变质。到外面去看看吧,这对于你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毛泽东似乎天生就是独特的那一个“毛泽东”,他的血肉之躯内像是有太多的不安分的基因。就像巍巍韶峰上那窝山鹰一样,小鹰的翅膀长硬了,就要挪窝,就要离开老鹰独自到长空中去搏击风雨。是的,小小韶山冲,留不住渐渐长大的毛泽东。他要走出封闭落后的韶山和小小的湘乡城,到山外那个广阔的天地里去求知问道。

到了外面的世界一看,外面的世界十分精彩,精彩得使他眼花缭乱,无力暇顾,外面的世界也十分无奈,无奈得使他一筹莫展,一时无以应对。这“精彩”和“无奈”双双迫使他“真心求学,实意做事,要有“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志气。有人曾这样说过,世上有着许多种感情,惟有师生之情最真挚,最令人难忘,此论不无道理。作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其人际世界无意是广博深邃的,其情感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最让他萦

怀的,是与师友们的那份真挚的情谊。这位泱泱大国的领袖人物,曾无数次地向中外友人念及其老师昔日给自己的恩惠。

1936年,他在向斯诺追忆早年在湖南省立一中读书的往事时,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

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那里的一个国文教师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爱接近我。这位教师借给我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

这位教师就是胡汝霖先生。毛泽东从阅读《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开始,便步入中国历史知识的宝库,获取了无穷无尽的瑰宝。

但真论起毛泽东与他的老师的情谊,恐怕除了一师黎锦熙之外,其他人概莫能比。黎先生在治学和做人方面,均给毛泽东以重大影响。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给黎先生的信中说:“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这就是两人真挚情谊的生动写照。母子之情是一种割不断的血缘之情。毛、黎之情不是血缘之情,却胜过血缘之情。这种感情是以知识为纽带,以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为基础建立起来的。1920年6月7日,毛泽东给黎先生的第六封信称赞他“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就是指这位良师的品行。我们在本书第七章中说过:自1913年在湖南四师任教开始,到1976年终止,黎、毛之间的交往保持了半个多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虽然人世苍茫,时事变迁,但他们师生加挚友的那份情谊并未因此而淡薄。60多年间,他们的交往历经了生与死、贫与富、贵与贱的种种考验,却愈发显得深厚。“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交情乃见”。^① 这句毛泽东极为欣赏的太史公对于友情的精辟之见,用在他俩人身上,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世上最难之事莫过于觅知音,当年毛泽东觅到师友黎先生为知音,才得以与其探讨“宇宙之真理”、“大本大源”,从而“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等,确定自己的“主张”。“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圣域”,并以“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三)“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

毛泽东是个感情丰富,并且从不掩饰自己情感的人。在他为理想奋斗的时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经常听到他高兴时候豪放的笑声,也见到过他痛苦时淌下辛酸的泪水;但是,毛泽东又是一个意志坚定和坚强的人。他在为理想奋斗的时候,他的意志坚如磐石,任你是十二级台风,也休想拂动他一根毫毛,他的意志坚如金刚,任你是什么魑魅魍魉,在他看来不过是一根草芥。

在学习上,毛泽东的意志表现为自觉地确定学习目的,并根据其目的来支配、调节自己的学习活动,克服各种困难,从而达到其目的。

意志是在有目的的学习行动中表现出来的,这个目的是自觉的、有意识的。毛泽东曾讲过:“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特点。”^②

① 《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8 月版,第 33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477 页。

青年毛泽东的学习目的是“救国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他自觉确定的,并非其他任何人强加于他的。为了实现其学习目的,他在学习上表现出了异常的、惊人的意志力。

早在私塾读经时,毛泽东就特别喜欢学习历史,在中学时又较全面地学习了中国历史,读过不少著名的中国历史典籍。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时,又阅读了大量的外国历史书籍。在一师读书时,毛泽东仍然酷爱历史学科的学习,课堂上专心致志,学习成绩优异,深受罗元鲲的喜爱。他从罗先生那里借到一套《二十四史》。于是,在毛泽东的读书史上,便留下了“竹筒罩灯光,夜读二十四史”的动人故事。

1915年的一个冬夜,北风呼啸,雪花飞舞,整个一师校园都被茫茫大雪覆盖着,因天气太冷,学校破例批准学生不必到教室自习,而可以在寝室里看书。

没有老师的管束,学生们早早上床,假在被子里,天南地北地聊起来。惟有毛泽东倚床而坐,聚精会神地读着罗老师借给他的史书,其神情的专注犹如置身于无人之境,连同学发出的阵阵说笑声,他都浑然不觉。他和罗先生事先有约,计划用两个学期的课余时间读完二十四史,读完一本归还一本,再重新借。为了按期归还借阅的书籍,他不得不通宵达旦地不停地读书,连这数九寒冬也不例外。请看:

每天晚上,两个小时的自习时间很快过去了,熄灯的号声阵阵传来。毛泽东急忙下床,把自己仅有的衣服穿上,像往常一样来到茶炉室借光读书。谁知他刚到这里看书不久,茶房老头因天气冷,熄灯关门睡觉去了。他只好又走到走廊的灯光下继续夜读。

一阵凛冽的寒风袭来,他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不一会手也麻了,脚也僵了。他一边读着,一边来回地跺着脚,可还是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抵御不了严寒。“得想个法子啊!”他寻思着。

这时,他的目光被走廊里的木柱子旁的一口水缸吸引住了。这是夏天给学生盛茶水的,现在已经不用了。水缸里有一根棍子,它是用来舀水的竹勺柄。他眼睛一亮,有办法了!他不禁笑了起来,惊喜地走到水缸边,把这个废置不用的竹水勺,从已结冰的水缸里取出来,又用力将木柄拔掉。尔后,他如获至宝似地飞快向寝室跑去。

他轻轻地推开门走进寝室,从床底下端出一盏小油灯来。他把竹筒套在油灯上比试了一下,竹筒口的直径略大一些。他划了一根火柴把油灯点着,然后再把竹筒罩上去。嗨,太好了,整个灯被竹筒罩住了,但有一束光线从原先插木柄的孔洞中透出来,这样,既能照明,也可防风,还不会妨碍其他同学睡眠。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他顾不得冻得红肿的手,急忙地捧起书,凑近灯光读了起来。他时而摇晃着脑袋,时而抿着嘴笑,仿佛和历代贤哲们进行着亲切的对话。他读啊,写啊,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寝室里的同学,也忘记了滴水成冰的寒夜。

就这样,毛泽东伴随着这盏特制的竹筒子灯,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终于读完了罗先生慷慨借给的二十四史和楚辞、汉赋等文史巨著。^①

毛泽东还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在任何环境下孜孜求学的顽强意志。有时,他到学校后面的妙高峰上看书,称为“静中求学”,有时则到喧闹嘈杂的长沙南门口去看书,任凭身边车水马龙,他仍专心致志,丝毫不受干扰。

^① 《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304~305页。

毛泽东在一师时刻苦读书是出了名的。他持之以恒,从三心二意。他认为人格的完善、学问的长进,都有赖于“积累”。他在《讲堂录》中写道:“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积,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蓄,则终身不得矣。”^①我们在前几章中曾提到过,当时毛泽东还写过这样一副对联自警励人,来说明学习贵有毅力和恒心的道理:

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

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正是这种为了理想而坚持不懈、刻苦求学的精神,使毛泽东打下了深厚渊博的知识基础,成为他探求真理、认识世界、改造社会的有利条件。毛泽东于一师毕业后不久便成为一个青年革命家,也得益于他的刻苦、顽强的学习意志力。

他这种刻苦好学的品德保持了一生。在革命战争中,在长征路上,他身边总带着两大筐书。据斯诺记载,有一次,毛泽东拿到几本新书,便闭门谢客,通宵达旦地研读。1970年,他已近80岁,还认真学英语,在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上写满了中文注释。

1975年,即毛泽东逝世前一年一个春光明媚、柳絮飘飞的日子,他的保健大夫请来了北京著名的中医和西医的眼科专家给他会诊。毛泽东因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他同前来的专家边握手边问他叫什么名字,这位专家以洪亮的声音告诉毛泽东他叫“唐由之”。这三个字读音刚落,毛泽东的兴致即刻表现出来。他认真地又费力地说:“这个名字很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个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个‘由之’的名字。”此时,毛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01页。

泽东双目虽然呆滞,但背起诗歌来却抑扬顿挫,富有情感。他背诵鲁迅悼杨铨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他虽然步入了耄耋之年,又在病痛之中,但记忆仍不减当年。他竟出口一字不漏地背出这首诗,令在场的专家惊叹不已。试想毛泽东青年时期,如没有博闻强记那种刻苦顽强的学习精神,能即景应酬吟诗吗?

一个学习者如果没有顽强的学习毅力,是什么也不能学,什么也学不好的。

二 学习的时间运筹

人们都懂得时间对于生命的意义。有的人把时间运筹作为学习的一般方法看待,就像时间可以同人的寿命等值,时间也可以同人的学习画“=”号。毛泽东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世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由此义而引申之,可得一别开生面之世界。”“时间意识必立其根本于实在意识,而后,可以说明其发生及存在。”^① 时间是个哲学概念,学习的时间运筹实在是个哲学方法论问题。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存在的形式之一。而任何物质都有一个“量”变“质”变的问题。学习时间的长短与学习的“量”有比例关系,一般来说,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量(内容)就多,学习的时间短,学习的量(内容)就少。但是,学习时间的长短与学习的“质”就不成比例关系,而是一种复杂多变的函数关系。学习时间长,学习的“质”可能高,也可能低;学习时间短,学习的“质”也可能低,但也可能高。因此,学习的时间运筹,就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般学习方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266、268 页。

法,而是学习中的方法论。毛泽东很懂得,并很会掌握运用学习的时间辩证法,因而取得了一般人难以取得的最佳学习效果。

(一)“我会规规矩矩干活的,但我也要读书”

1907年秋天,毛泽东已在私塾里度过了5年的学习时光。5年中,他所读的书多为儒家经典,虽然他具有强烈的反抗、叛逆性格,但这些经典也使他获益颇丰。随着所读的书不断增多,涉猎的知识面不断拓宽,这个昔日顽皮的学生对学习兴趣也变得日益浓厚了。正当他凭借自己的天资,在书本中对宏观世界的宇宙奇迹和微观世界的人生奥妙,开始初步探寻的时候,家庭情况也正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几乎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轨迹。当时,毛泽东还不满14岁。

我们曾说过,毛贻昌让儿子上学的目的是极有限的,他认为儿子的书已经念得不少了,能识文断字,写个信,记个账呀什么的,再也不用求人了,自己对儿子所希望的那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眼下,家业的兴旺发达,生意买卖的日益昌隆,使毛贻昌迫切感到需要一个好帮手,而帮手就在身边,他就是已渐渐长大成人的儿子毛泽东。与其说再把白花花的银子往书的“无底洞”里扔,倒不如停学跟自己学种庄稼,跑跑买卖,挣现钱。于是,毛泽东不得已,被迫辍学了。

人虽离开了学校,可毛泽东渴求知识的愿望丝毫未减,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强烈。他采取半耕半读的形式,忙里偷闲地挤时间去用功读书。

那时,毛泽东家里田亩多、人手少,他的父亲一向精打细算,为了少雇一个工,硬是让年纪尚小的毛泽东和毛泽民跟着他干农活。白天,毛泽东要挑粪、犁田、播种或插秧,还要砍柴、舂米、喂猪和放牛……似乎总有干不完的农活;晚上,则要替父亲记账,跟着父亲学打算盘,难得有片刻的空闲。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说来也巧,这事被关心他的一位先生——李漱清知道了。李先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虽然很为毛泽东的学习担忧,但鉴于毛泽东的家庭现状,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好主张来帮助毛泽东解决没有时间读书的问题,只能鼓励他克服眼前困难,见缝插针地挤时间抓紧学习。为了帮助毛泽东树立刻苦学习的精神,李先生特地给他讲解了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勉学》篇;用“自古明王圣帝,尤需勤学”,“有志向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不能“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用这样一些经典事例教育毛泽东勤奋学习,希望他以古时圣贤为榜样,勤学博问,修身利行,学成一艺,得以自资。

受到李先生的教育和启迪后,毛泽东更加坚定了学习的决心,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发奋读书。

白天没有时间看书学习,他就等晚上父母睡觉后点着桐油灯夜读。对于他这种耗油费神的夜读——读的又不是他父亲所希望的经书,自然遭到父亲的反对;母亲怕深夜读书有伤身体,出于疼儿子也加以反对。毛泽东就用蓝布床单遮住窗户,使父母亲看不到灯光。有时就干脆躲到存放杂物的小阁楼上去。夏夜,蚊虫叮咬,他就在床头放一条凳子,凳子上搁着灯盏,将头从蚊帐里探出来,趴在床头,读得“不亦说乎”。可是,他的“秘密”还是被半夜起床给猪牛添饲料的父亲发现了。父亲是一个十分有心和精明的人,他虽然看不见灯光,却听得出儿子翻书页的声响,便悄悄地走近窗户,揭开那幅遮挡灯光的床单,于是,房里的一切便自然“曝光”了。脾气暴躁的毛贻昌对儿子斥责道:“石三,你一夜熬掉我一盏桐油,一个月就是几百文铜钱,这样下去,一份家产怕是要败在你的手里!”好心的母亲听到吼声,披衣出门给儿子打圆场,这才解了毛泽东的围。

夜里不能看书,毛泽东就白天把书带到田间地头,得空便躲到

一座古坟后的老栗树下面,读得心醉神迷。毛贻昌开始发现儿子经常溜号,不由得“盯梢”起来……这以后的故事我们在前几章中曾叙说过,不再赘述了。

时间,对宏观世界的宇宙来说,是无限的,因而也就无所谓时间不时间;但对微观世界的人生来说,又是极为有限的。时间,属于毛泽东的只是从1893年12月26日至1976年9月9日,这将近83年的时间。此前与此后的时间,均不属于他的。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以“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来激励自己。

毛泽东在一师上学时,曾对王立庵老师说:“先生,我知道自然科学很要紧,可是,我以前读的是孔夫子,如今年龄大了,学不进数理化了……”

“啊!”王先生不解地看了他一眼,“你有多大年纪呀!”“已经21岁了。”毛泽东不好意思地说。

是呀,21岁,这在今天的孩子已是大学毕业的年龄,可当时的毛泽东,论学历才相当于今天的初中毕业生。人生能有几个21年,他怎能不为自己的前途焦虑呢?当王先生以历史人物——“孔子云:‘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魏武、袁遗,老而弥笃,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尤为硕儒;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云亦四十始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始学《孝经》、《论语》,皆成大儒”为例,提醒毛泽东要明确一个道理:人因早年迷误,学习上起步较迟,这并不可怕;只要中晚年渐渐明白读书学习的道理,不放松,不自弃,而后奋起直追,终会大器晚成,有所作为。正所谓:“少而好学,如日出之光;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光。看看你吧,刚到婚冠之年,便说自己年纪大了,嫌学习为时已晚,对照古代名贤,将作何感想?”

“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你误解我了……我也晓得二十多岁年富力强,精神专一,正是读书的大好时光。可是,我又总在想,

古往今来,有多少忠臣良将,都是力壮有为,为国家建功立业,可我们这一代人,偏偏生逢乱世,国运衰微。人的生命有限啊!已经过去了21年,还有几个21年呢?不能再白白浪费青春了。我要把宝贵的时间用在读我喜欢的学科,将来能为国出力,为民造福的学科上……我不是不喜欢自然科学,只是当今对救国救民用处不大,故我暂不想它。”

是的,因为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把有限的学习时间,用在对自己、对国家、对民族的命运前途最有用的学科的学习上,的确不失为上策。

(二)“所谓五段课程,实用功至浅,前以劝陈君课余宜以学文,遂随及之。言先于行,良滋惭愧”

进入一师的第三年春天,毛泽东对自己的学习时间,作了很好的运筹。这从他于1916年春给萧子升的信中可以看出:

“所谓五段课程,实用功至浅,前以劝陈君课余宜以学文,遂随及之。言先于行,良滋惭愧。晨读英文,午前八时至午后三时上讲堂,四时至晚饭国文,明灯至熄灯温习各门功课,熄灯以后一时运动。所谓五段者如此……”^①

从毛泽东的“五段课程”计划可以看出,他的学习、休息、运动都有自己的严格的“法规”,使其形成了生活秩序,养成了有规律的学习生活习惯。

王立庵先生曾滔滔不绝地对人谈起毛泽东对自己学习的时间运筹情况,他说,毛泽东平时与同学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在一起探索宇宙与人生。为了求得更多的知识,他发奋读书,将一天的时间作了极紧凑的安排:每天早晨,学校还没有吹起床号,他就提前起床,进行冷水浴和六段操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3页。

锻炼,然后进自修室或去后山君子亭,迎着熹微的晨光,朗读他喜欢的诗文,间或还有意识地到喧闹嘈杂的南门口看书,任凭车来人往,时而默读,时而朗读,专心致志,旁若无人;午后的空闲时间,常到图书馆去借阅书刊或阅览室看报;晚饭后,照例邀集一些同学外出散步,互相交谈一天的学习心得,或谈论时事,这就是他白天惟一的休息时间了;晚上的自习时间,便集中精力,认真钻研社会科学,熄灯后还要到走廊或茶炉室的灯光下看一阵子书,直到深夜人静同学们都已进入梦乡……

毛泽东求知欲望极强,读书面极广,由于囊中羞涩,买不起书,就常到古旧书店去买降价书。他还常向老师和同学借书,见其喜爱的内容,他便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记录下来。现存的《讲堂录》的前11页就是他手抄的《离骚》和《九歌》。罗学瓚在1917年9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毛泽东手抄的西方伦理学方面的七本书,令罗学瓚读了三个月,可见毛泽东是如何抓紧时间刻苦学习的。即使在星期天,暑假放学回家,他也不肯浪费半点时间,在炎夏之中,仍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

毛泽东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习,并不是不注意休息。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会休息,就不会学习。他曾说过:“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眠,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①

学习是一种繁重而复杂的脑力劳动,不可不注意劳逸结合。解放前夕,毛泽东曾告诫报纸编辑人员说:不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②该弛的时候就弛,不弛反而有害身体,妨害学习。建国后,毛泽东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321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于1953年6月13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要求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他说:“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蹦蹦跳跳。不然他们就不高兴。”又说:“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还说:“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①

青年就是青年,如果青年人不考虑自己的特点,一味地埋头学习,那势必得不偿失。一旦把身体弄垮,后悔就来不及了。因此,按规律地学习、工作和休息,应成为青年人生活的习惯。

三 学习的智谋运筹

中国人向以谋略智慧著称于世。《孙子兵法》、《三国演义》风靡于世界,成为现代商战的经典。现代人从政、经商、搞公关,都离不开谋略。可是论起谋略来,古今中外没有哪一位谋略家能够和毛泽东相比。毛泽东的谋略不是一般的雕虫小技,而是一代大师的雄韬伟略。它博大精深,变化无穷,运用起来有出神入化之妙,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页。

堪称谋略史上的瑰丽精品。

毛泽东的谋略智慧表现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治党、统战、宣传、学习和人生等方方面面。我们在这里只探讨其学习智谋运筹,而对其学习智慧谋略,也只探讨五个问题:一是,“人非圣贤,不能孜然而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是,“年少峥嵘屈贾才……”三是,“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同时也要有人留在中国……”四是,“……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五是,“我在湖南先建立青年团组织,接着建立党组织……”

(一)“亲师而外,取友为急,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

在探讨理想、寻找国家、民族的出路和前途的实践中,毛泽东日渐感到团结同志一道奋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人非圣贤,不能孜然而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改造中国社会的大业,绝非少数几个人可以包办的,必须要有一批志同道合可以共谋大事的同志、朋友,团结起来为共同的事业和志向而协力奋斗。为此,毛泽东非常注意广交朋友,与本校的同学和外地的朋友进行比较广泛而有实质内容的通讯联系。

1918年4月14日,星期天。岳麓山下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中,聚集着13位风华正茂、兴致勃勃的青年。他们约定到此来参加新民学会的成立大会。

新民学会的成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

毛泽东善交朋友,他刚进入一师,就在同学中广交朋友,例如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陈昌、陈绍休等人,因观点相近,结交较早。况且他们又都来自农村,家境比较贫寒,有的自己就务过农,或做过工,并且又都耳闻目睹城市和乡村小资产阶级日益走向破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产和没落的景象,因而经常在一起研究治学做人的道理,讨论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前途等问题。即使如此,毛泽东还是感到自己周围的朋友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活动范围也太窄。他日益认识到:要求得更多的学问,开阔视野和活动范围,做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必须联合更多的青年朋友,组成一个严密的团体,才会有力量,统一步调,有所作为。

那么,到哪里去找志同道合的人,又怎样去找呢?有多年社会实践经验的毛泽东,通过周密调查,反复研究,终于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办法——征友。

1915年暑假过后,毛泽东“效嚶鸣之求,步将伯之呼”,发出《征友启事》,以表示迫切求友的心情。启事的署名是“二十八画生”。这个《征友启事》不仅寄往长沙各个学校,而且还张贴在长沙的几个城门口。但是,毛泽东此举,当时并不被一般人所理解和接受。一些头脑守旧的校长,竟认为“二十八画生”一定是个怪人,征友是不怀好意,于是把“启事”没收,不准张贴。湖南一女师的校长,甚至认为这个“征友”的人是为了找女学生谈情说爱。她便到一师通过校长打听“二十八画生”究竟是什么人。当她得知“二十八画生”其名叫毛泽东,是个品学兼优、受到师生普遍赞扬的好学生,征友是为了共同寻找真理、救国救民、改造社会时,这才放心了。

通过两三年的努力,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主要有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瓚、萧子章、罗章龙、彭璜等10多人。他们多数是一师和长沙各中学的学生及中小学的青年教师。他们是一群有朝气、有锐意、有理想,脚踏实地、“真心求学、实意做事”的人。他们勇于反抗旧世界、热心追求新理想,想为改造国家、改造社会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正如毛泽东对斯诺所说的:这是一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只愿谈论大

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经常聚会,会址就是蔡和森的家或城内的楚怡小学(萧子升在此任教)。“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是他们讨论的中心问题。经过多次认真地讨论,达成了如下共识:

一是,自己的品行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甚切;

二是,国内的新思想、新文化已经发展起来了,再过静而孤独的生活是不对的,应追求一种动且团体的生活。

到1917年冬,大家从讨论中得出结论:一定要以“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根据讨论的结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成立一种严密又有纪律的组织。此提议一提出,即刻得到普遍赞同。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新民学会成立的条件成熟了。于是,便出现了我们在前面说的那一幕,召开成立会议。到会的13人,实际最初是21人。

会议从上午11时开始,首先讨论了毛泽东、邹彝鼎起草的会章。会章条文颇详,经过讨论,作了删改,并于通过。会章采“大学之道在新民”之意,确定学会的名称为“新民学会”。其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章规定,会员必须遵守五条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鉴于学会的部分会员即将毕业,各有所归,为了便于了解外出会员的情况,以利于学会的活动,会章还规定:“会员对于本会每年负一次以上通函之义务,报告己身及所在地状况与研究心得,以资互益。”会章还对学会的组织机构、会务活动、会址、会费及新会员入会手续,一一作了规定。会议还讨论了发展会员问题。毛泽东说:人要多,力量才会大,所以会员要多发展,但标准要严格,不能降低,一定要品格好、志向好、学问好,确有向上要求的青年,经会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员五人以上介绍及过半数承认,才能吸收他人入会。会议最后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由于萧子升不久即赴法勤工俭学,所以新民学会的会务工作实际上是由毛泽东自始至终主持的。

新民学会是由一些愿为救国救民而求索的青年知识分子集合而成的进步团体,它一开始就充满了勃勃生机,办事认真,组织严密,因而是一个有希望的、富有战斗力的团体。它写下了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光辉篇章。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道:“新民学会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但在它存在的三年中,在中国革命动荡转变的年代里,逐渐由民主主义革命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毛泽东后来在延安与斯诺说:“这个学会对中国的事情和革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新民学会成立之后,遇到的第一个具体问题,就是会员的出路问题。大家相继从学校毕业了,去何处呢?毛泽东主张,新民学会的会员应该立志“向外发展”,“各方面的阵地都要打开”,各方面都要派人去打先锋。他在给陶毅的信中则更明确地指出:“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方面。”^①毛泽东的这一主张,获得了普遍的赞同。而此时,全国正掀起一个赴法勤工俭学的小浪潮,于是,新民学会便决定也投身到这一潮流中去,组织会员赴法勤工俭学。1919年3月,第一批会员去了法国。但毛泽东一直未出国,他另有自己的打算。

新民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是毛泽东热烈追求理想的尝试,是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65页。

他胸怀万丈豪情、力争携来百侣搏击中流、掀起巨浪遏飞舟的革命精神的体现。李大钊高度称赞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

(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将湖南首批赴法勤工俭学的热血青年送走后，又决定派罗章龙等去日本学习，毛泽东为他筹措旅费，发动会员出资捐助。临行前，毛泽东作了一首诗：《七古·送纵宇一朗东行》赠给罗章龙：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舳舻巨舰直东指。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平浪官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送朋友出国，他觉得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将来会有更多的有志青年到国外寻求知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心中自然感到喜悦和激动。毛泽东希望朋友们离家出洋后，要保持向上精神和纯洁品质，要胸怀求学济世的远大抱负和壮阔情怀。他真挚地期望新民学会这个有朝气、有希望的先进团体和年轻有为的会员们，能有像屈原、贾谊一样的爱国济世之才华，立志扶摇直上九万里，担当起拯救天下、整顿乾坤的历史责任，创造国家和个人美好的未来。

毛泽东为新民学会制订的谋略是“国外发展”与“国内研究”并重，而以“国内研究”为主，实行“中外研究”相结合和向国内、国外共同开放的发展模式。为此，一方面，毛泽东与蔡和森等带头倡导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向国外发展进取；另一方面，毛泽东等又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坚持留在国内,向省内外发展探索,研究和解决湖南、中国问题,“从事实际的改造”。新民学会在国内外的两支劲旅并驾齐驱,相互激励支持,共同努力奋斗,建树卓著,最后殊途同归,集合于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毛泽东最初提出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消息来源于杨昌济老师。1918年6月杨昌济赴北大任教后,毛泽东给杨先生去了一封信,谈了他和同学们眼下的窘境,请老师指路。

正当他们翘首以待的时候,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他们法国政府又继续来华招募工人,正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好机会。随即,毛泽东、蔡和森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专题讨论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之后,蔡和森受学会委托前往北京,负责联系、解决有关问题。不久,蔡和森从北京写信给毛泽东,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希望他“到北京来,一面主持勤工俭学事宜,一面入北京大学学习”。8月中旬,毛泽东率领湖南青年20多人,从长沙启程赴京,由于沿途辗转,约在9月上旬才抵达北京。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故土,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此时,当了8年穷学生的毛泽东身无分文,路费是借同学的,饭钱是同学们合伙掏的,他惟有的是胸怀天下、憧憬未来、追求真理的一腔热情和愿望。

当时的北京,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新青年》正以它那摧枯拉朽的气势,从这里向全国放射着启蒙运动的光芒;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正以其勇猛之心、不怕断头的精神,向一切愚昧落后的东西进行猛烈的抨击;民主和科学这两面中国人最陌生的旗帜,已经开始在古都上空飘扬,东方最古老最辽阔的国度,正经受着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的洗礼。

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也已传到了这座古城,使这座本已不平静的城市更加不平静了。1918年10月,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

同年12月,李大钊、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创刊。这标志着新文化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得到宣传和传播。

而这时,毛泽东正在北京过着艰辛的生活。他先是在杨先生家,与看门的老头同住在一间小屋里。后来为了办事方便,与蔡和森、罗学瓚等七八个会员一起,搬到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居住。他们“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过着清苦的生活。”但是,他们心中被理想的追求所激荡着,全然不顾生活的艰难与困苦,一心朝着前进的方向而努力奋斗。

毛泽东与蔡和森会合后,即把主要精力放到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上。他们邀请李石曾等人介绍留学情况,制定赴法工作计划,筹措出国费用,并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长辛店等处,举办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做出国的各种准备。由于毛泽东的出色主持,会员们虽然“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是“大家都望着前头的乐园,本着冲动与环境的压迫勇往直前”,“没有一个人灰心”。在这项艰难的工作中,大家公认毛泽东“出力最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

毛泽东在北京的生活太艰难了,连每月几元钱的生活费也难以筹到。所以他必须马上找到一个赖以生存的职业。9月底,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来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在北京大学,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后来在中国相约建党的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受到他们的启蒙和熏陶。他甚至赶到天安门广场,专门聆听了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演说。此时的毛泽东,充满了活力和智慧。从当时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双目炯炯有神,神态异常凝重。应该说,是这次北京之行和随后从北京遍及全国的“五四”运动,把毛泽东从一个长沙学生团体的头,激变成一个社会活动家,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群众运动领袖。北京之行,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京的五六个月的时间里,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毛泽东求得了新知识,结识了新朋友,增加了新的社会活动经验,开阔了视野,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开始接触了同他的方向最为吻合的马克思主义。并且直接置身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腹地,使青年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正在走上中国现代历史的舞台,即将站到时代潮流的最前列。这在毛泽东回到湖南之后,便马上显示出来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北京之行在毛泽东个人生活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与杨开慧的真诚、纯挚的初恋和后来的婚姻,在其一生中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三)“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偕同一批准备去法国的青年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他和吴玉章等人在上海静安寺路51号,参加了环球中国学生会等单位组织的欢送第一批赴法青年的活动。3月29日毛泽东又参加了欢送第二批赴法青年的活动。在上海,毛泽东久久伫立在黄浦江码头,望着渐渐远去、载有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的法国邮船,心潮澎湃,难以平静。许多会员、同学都认为,毛泽东是一个有志的令人钦佩的人,出国留学会大有作为。作为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他自己却没有迈出最后的一步。此时的毛泽东已决定仍留在国内,立足于自己土生土长的这片沃土地,探求民族振兴之路。

毛泽东是主张留洋的。新民学会成立之初,他就指出学会要向外发展。赴法之事传到湖南时,同当时许多湖南青年一样,他也是很欣喜的,认为“留学一事,总算是湖南教育的一个新生命”,并设想去日本等国留学。这些在有关材料中都得到证实。例如,萧三在1918年3月31日的日记中曾记载:“二兄(指萧子升)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民学会简章……又述润之等赴日求学之计划。”罗学瓚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提到:“你说要在长沙预

备两年,要把古今中外学术弄个大纲出来,做出洋求学的准备,我很赞成。”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说:“兄与章甫于两年中将小学校办好然后赴俄,则根深蒂固矣。”

那么,当时的毛泽东又为什么不出洋去领略外面的世界呢?研究者认为,当时的毛泽东并非出于权宜之计,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智谋决定。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问题,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①他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的信还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不想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吾人如果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中国这地盘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②

除以上以外,他认为暂时留在国内研究,还有两大好处:其一是,看译本较原本快速的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得较多的知识;其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在世界文明中,东方文明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

① 见周世钊:《湘江的怒吼》,载《光辉的五四》,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74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北京之行,使毛泽东的视野开阔了,也使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他认为自己对中国社会了解不够,“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因而更需要在国内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促使毛泽东在国内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当时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希望毛泽东能留在国内“殿后”,为学会在国内的发展打好基础。

不过,毛泽东也不是不想出国,他“觉得俄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文明国”,他“想两三年后”,“组织一个游俄队”。1920年6月7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同住都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两年后,俄路通行既往。想找一俄人,学习俄语,此时尚未找到。”^①后因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一愿望终未能实现。

历史已整整过去80年,当世人认识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当人们认真地思索造成这种错误的根源时,禁不住要假设:要是毛泽东当年赴法或留俄,也许情形会不一样?是的,要是毛泽东赴法或留俄,情形肯定会不一样。不一样在:毛泽东可能不会犯晚年那样的错误,但在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他也不可避免地会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那种“教条主义”的错误,因为他对中国的情况不太了解,不可能将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犯错误岂不是怪事。如果是这样,毛泽东就不称其为毛泽东,中国革命的成功肯定无望。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虽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却不能假设。如果历史也能假设的话,那还有什么不能假设?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人世间只有真善美,不可能有假恶丑了。

毛泽东留下来,在湖南,在全国搞了许多社会实践活动。他曾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78页。

对周世钊说：“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从有关资料看，毛泽东在湖南，确实搞了不少社会实践活动：他主编《湘江评论》，领导驱逐张敬尧，搞“新村”实验，创办文化书社、发起俄罗斯研究会、领导湖南自治运动、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切，都是他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验阶段的产物，或成功，或失败，都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是当时出洋留学的人没有办法得到的财富。

（四）“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有所趋赴”

从1918年第一次赴京，毛泽东在李大钊、陈独秀的教诲和影响下，由于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所以促使他的思想急剧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处于转变时期的毛泽东，急切地向新民学会的会友们，向广大青年，向社会各阶层人们传播这种崭新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新文化、新思想在湖湘大地激荡。

毛泽东从北京返回湖南时，除经过上海外，还在湖北武汉停留，他特邀武汉明德大学的马礼春一道回湘，筹创文化书社，旨在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对湖湘青年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学说的启蒙工作。

创办文化书社，是毛泽东在湖南推进新文化运动、传播新思想的重要谋略之一。湖南近代以来，有湖湘文化的孕育和发展，但是地处内陆，风禁不开，虽有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冲击，但还是“不能说湖南已有了新文化”，因此，毛泽东不补上新文化一课，就无法研究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也无法研究俄国革命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学说,各种进步的革命新思想新文化便无法在湖湘大地生根开花结果,湖南也就没有根本改造的条件和可能。当时,湖南缺乏种种外界出版流行的新书刊,因此,毛泽东决定创办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新式书社——文化书社,以解决“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的现实问题。

1920年7月31日,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文化书社缘起》一文,文中指出:

……其实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澈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9月9日,文化书社在长沙潮宗街56号正式开张营业。这虽是一条不起眼的石板小巷,但是文化书社的开张营业,使潮宗街热闹起来。所有的新书报随到随销,供不应求。毛泽东以“特别交涉员”身份,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想方设法扩大营业规模和范围,扩大宣传效果。他同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文化界知名人士联系作信用介绍,以扩大书刊销量。书社越办越红火,资金迅速扩大一倍,并有赢余。文化书社还同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10多家书局报馆建立了经营性营业联系,并在平江、浏阳、宝庆、衡阳、宁乡、武

冈、溆浦等地设立了分社,使新文化之花逐渐开遍了湖湘大地。

文化书社推销了大量的新书刊,像《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劳农政府与中国》等新书售数百册以上,《新青年》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劳动界》等刊物售数千份以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书报是文化书社推销的重点。经过文化书社的得力宣传推广,湖南成为全国销售新书报刊最多的地区之一,成为传播和普及新文化的重要阵地。毛泽东在售书的同时,赠予读者许多传单,说明书社的目的是“湖南人个个像先生样思想得了进步,因而产生出一种新文化。我们的方法——至诚恳切的做介绍新书报的工作,务使新书报普播湖南省”。毛泽东还向读者推荐组织“读书会”的好办法,一来少花钱多读书,二来可以改变中国人“关门研究法”的不良习惯,实行共同研究;三来还可以订报看,做到“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又与方维夏、何叔衡、彭璜等人一起,联络教育界、新闻界和社会知名人士姜济寰、易培基、包道平、贺民范等,发起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公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

经过短期的筹备和宣传,1920年9月16日,在刚营业不久的文化书社召开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大会。会上推举了总务干事、书记干事、会务干事各一人。毛泽东被推举为书记干事,负责记录及文书事务。会议同时决议:除会员各人进行研究外,每星期六下午可自愿去潮宗街文化书社集体讨论;集中个人和集体的研究成果,发行一种《俄罗斯丛刊》;派代表赴京与俄罗斯代表洽谈,筹备赴俄勤工俭学事宜,并在船山学社开设俄文班,聘上海之俄国人来湘教授。

在俄罗斯研究会的推动和影响之下,毛泽东千方百计地介绍一批富有热情的进步青年到上海,然后通过有关方面的努力,突破重重困难,转赴俄国。他们回国后,多数都成为共产党的早期骨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干,像任弼时、肖劲光等人,都是湖南第一批赴俄留学成员。俄罗斯研究会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共产党早期的优秀干部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领导了湖南自治运动……湖南自治运动的尝试,使毛泽东认清了中国社会的腐败和黑暗,认识了统治阶级与民为敌的本质,认识到在中国进行政治改良这条道路是绝对行不通的。这就进一步加速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探索。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新报,反省检查自己走过的道路及思想认识,总结成功与失败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致向警予的信中说:“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① 在给李思安的信中说:“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② 在同期加写在易礼容来信的后面的一段文字,毛泽东更明确指出,要“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在致罗漱阶(罗章龙)的信中说:“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们斟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③ 这个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还向张国基明确表示:“拯救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其为大业”,完成这个大业必须“取世界主义”,“愿大家有好的主义”,也即社会主义。这次运动,还促使毛泽东树立起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48页。

② 同上,第557页。

③ 同上,第554页。

正确的群众观。他说：“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通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利，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①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实际的革命运动，是毛泽东克敌制胜的主要法宝之一，因而，他非常注意树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面旗子。

（五）“接着建立党组织”

毛泽东于1918年组织的先进团体——新民学会，在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中，起了领导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作用。3年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这个团体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日渐纯洁和严密起来。确立马克思主义为旗帜之后，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中，毛泽东更深刻认识到，一个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于革命事业取得胜利是最为重要的。这种认识，在他同蔡和森的通信中得到了充分的表露。

蔡和森于1919年12月赴法勤工俭学。到法国之后，他先补习法文，继而收集了约百种小册子，夜以继日地“猛看猛译”。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将世界大势、各派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情况基本弄清楚了，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蔡和森在法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坚决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走俄国人的路。在蒙达尼会议上，蔡在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目的的方法上与萧子升等产生分歧，后于1920年1月和9月16日，连续两次写长信给毛泽东，阐述自己的观点。^②

在这两封信中，蔡和森非常强调建党问题的重要性。他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如何着手准备将来实现社会主义呢？“我以为

① 《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31页。

② 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先要组织党——中国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党，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利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缓宜急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中国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劳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他在信中还特意详细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入党条件、组织原则和铁的纪律，并具体论述了他对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步骤的意见：“要有严密的研究和组织宣传团体；作各种调查统计和出版刊物；最重要的是严格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村、议会等处；必须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收到蔡和森的来信，毛泽东异常高兴，对信中所提各点无不赞同。毛泽东熟谙历史，深知中国历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以先进阶级为基础的政党领导。他依据五四时期的中国现状分析说，“社会中坚力量实是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现代产业工人在全国人口中虽然只是少数，但有先进的革命觉悟，且战斗力强。他用通俗而生动的语言高度赞扬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他说工人最伟大、最神圣、大有所为。

一次，毛泽东在给夜校的工人讲课时，在黑板上写了“工人”两个大字，然后对大家说：“好些工友埋怨自己的命苦，说工人没有出息，一世也出不了头。其实，工人力量最大，最有出息！”短短的两句话，一下子就把这些工人吸引住了。接着，毛泽东用手指着黑板说：“大家不是讲‘天’最大吗？你们看，‘工’、‘人’两个字连到一起，不就是一个‘天’字吗？工人不是没有出息，而是大有出息。只要团结起来，力量就会像天一样大！”毛泽东这一深入浅出的比喻，启发、鼓舞了大家，使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通过办夜校，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实现了结合：一方面，经过知识分子这种社

会实践——桥梁,把马列主义传播到工人阶级中去;另一方面,使党的重要骨干(开始多为知识分子)有机会了解工人,真正与工人阶级建立感情,为以后能自觉地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创造了条件。

为了打好建党的组织基础,就要物色好建党对象。毛泽东说:“同志联络问题,这项极为紧要”,只要有“真同志就好”。1920年秋,在筹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时,他特别强调要积极、慎重地联系“真同志”为建团建党的对象,多次指出:“要寻觅真同志”,“找真同志,只宜小缓,不可急进”。及早提出了严格入党条件、严防投机分子混入、保持党的纯洁性的问题。

1965年在湖南长沙的省委九所,天高气爽,汪东兴给准备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读《新民主主义论》,一下子引起了他对湖南建党活动的回顾。他说:“我在湖南先建立青年团组织,接着建立党组织,1921年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都积极建立这支后备军。1920年8月,上海最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毛泽东同何叔衡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经过多次研究,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建立了青年团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和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表明新民学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这样,新民学会也就自行消亡了,

从1920年秋至1921年春,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法国和日本,也由在国内入党的同志建立起旅法、旅日共产主义小组,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派马林和尼可洛夫来华,对中国革命进行具体的帮助。他们在上海同陈独秀、李达等进行了商谈后,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于是,陈独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秀、李达领导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就担负起了发起、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6月下旬,毛泽东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关于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29日,毛泽东与何叔衡一起离开长沙前往上海。7月上旬,毛泽东与何叔衡经武汉到达上海。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召开,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来自各地的13名代表在一栋简朴的两层楼房内围坐在一起,共商建党大计。他们是(以姓氏笔画为序):毛泽东,王烬美,邓恩铭,刘仁静,何叔衡,陈公博,陈潭秋,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周佛海,董必武以及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分别代表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50多名早期共产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也出席了大会。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大会的最后一天(31日)改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大会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确立了正确的建党原则,完全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遵照列宁的建党学说,并选举党的中央机关,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

大会闭幕后,毛泽东被派回湖南,住在船山学社,开始进行建立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1921年10月10日这天,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正式成立了,毛泽东被选为书记。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开始焕然一新了。从此,作为党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也就更加自觉地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第十一章

读书要讲究艺术

书籍使一些人博学多识,但也使一些食而不化的人疯疯癫癫。这说明,在学习中读书是要讲究艺术的,并非只要认得字就可以说读懂了。

毛泽东一生注重实践,但又是以书为伴的。他读起书来,如痴如醉,不能自己,然而他从不做书本的奴隶。他既能钻进去,又能出得来;他阅读书籍就像看梅兰芳表演京剧一样;对他自己来说,是一种艺术享受。也就是说,我们研究毛泽东的读书思想和实践,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的启迪,而简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惟有艺术才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很难从艺术之外的东西得到艺术的享受。我们能从毛泽东的读书方法中得到艺术的享受,说明他每每读书都能进入角色,或喜或悲,或泣或诉,或怨或怒,或贬或褒,或弃或效……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并任其挥洒。这难道不是一种艺术?

一 读书的基本方法

我们知道,青年毛泽东要立的志,显然不同寻常,用他的话说:“发达个性。至不同即至同,至不统一即至统一。”老子曾谓处世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对慈和俭毛泽东不反对,唯第三宝,毛泽东一贯反其道而行之。他的最大特点或特色,就是敢为天下先。一师同学彭首艮曾向罗章龙介绍毛,称毛“品学兼优,且具独立独行之性格。他常语人‘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做个奇男子。合而观之,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为毛奇。”毛泽东显然赞同这样的观点:寻常人“有雷同心,无独立心。有独立心,是谓豪杰”。毛泽东这种奇特之性格,表现在读书上,就是按照“自修计划”读书;不动笔墨不读书。

(一)“(我)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

这里,我们不想再泛泛探讨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读书的情况,只想再强调两点:一是,毛泽东读书是有计划的,不是胡乱读;二是,以读社会科学为重点,博览群书。

毛泽东的“自修计划”,是在听了湖南省立一中胡汝霖先生的建议之后制订的。胡先生向毛泽东口授了《父师善诱法》中的读书总要:“有当读之书,有当熟读之书;有当看之书,有当再三细看之书;有必当备以资查考之书。书既有正有闲,而正经之中,有精粗高下,有急需不急需之异,故有五等分别也。学者苟不分别当读者何书,当熟读者何书,当看者何书,当熟者何书,则工夫缓急、先后俱误矣。至于当备考究之书,不备则无以查考,学问知识何从而长哉?”胡先生希望毛泽东认真借鉴前人读书治学的经验,掌握好自

修中的诀窍。他让学生先去了解馆藏情况,再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知识结构的层次,选择学以致用书,选择好书和新书,急用的先读,通俗易懂的先读,然后由近而远,由浅入深,扎扎实实,博览群书,真正学到课堂里面学不到的东西。

听了胡先生关于读书的一席话,毛泽东感到深受教益和启发。他回到住处——湘乡会馆后,拟定了一个以攻读社科书籍为主的自修计划,绘制了别具一格的学习蓝图。

这期间,毛泽东广泛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他读书的面很宽,什么书都想借来读,像中国的经、史、子、集,美、英、法、俄等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文学、哲学,并穿插阅读了一些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罗马的神话、童话故事书籍。不过,他主要还是集中精力认真读了大量反映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著作,以及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其中有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等。

毛泽东博览群书,有计划地进行读书,坚持终生。我们通过他于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窥其一斑,可知全豹。

10月23日

主席今天外出,要带走一大批书,种类很多,包括的范围很广。他指示要以下一些: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诸如:《资本论》、《马恩文选》(两卷集)、《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马恩通信集》、《列宁文选》(两卷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退两步》、《做什么》、《什么是“人民之友”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

《毛泽东选集》全部。

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艺术论》。

黑格尔的著作。

费尔巴哈的著作。

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

《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荀子》、《韩非子》、《论衡》、《张氏全书》(张载)、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

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

米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尤金等:《辩证法唯物论概要》。

艾思奇:《大众哲学》及其他著作。

杨献珍的哲学著作。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

从古典经济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一些主要著作。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选集。

《六祖坛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

《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

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

西洋史(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日本史》。

《昭明文选》、《古诗源》、《元人小令集》，唐宋元明清《五朝诗别裁》、《词律》、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

朱熹：《楚辞集注》、《屈守古音义》。

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

《古文辞类纂》、《六朝文集》。

《鲁迅全集》（包括鲁迅译文集）、《海上述林》。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

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

苏联一学者给主席的信（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

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字贴和字画。

中国地图、世界地图。^①

（二）不动笔墨不看书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养成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良好习惯。我们可以通过毛泽东对《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注及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了解他奉行“不动笔墨不看书”这一读书诀窍的情况。

《伦理学原理》一书，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1909年由蔡元培译成中文。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一师把它作为本科毕业班的修身课教材。毛泽东很爱读这本书，并且以先秦诸子百家、宋明理学以及王船山、谭嗣同、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学说，与之比较，综合研究，

^① 见逢先知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8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分析批判,常有独到见解。他在这本仅有10多万字的书上,用毛笔小楷写下了一万二千余字的批语和提示,而且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黑二色毛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注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抒发对道德、人生、历史、宇宙的看法……

现举几例:——

批注:

此举直觉论者之说。

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

伦理学示人生正鹄之所在,有裨于躬行。

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原文:

持真觉论者,以伦理学为无关于经验之知识,以为设道德之条目者,不可以恃经验,且亦无待乎经验焉。伦理学中之命令,出于人类之良心,是即天命之性,本具有立法决事之能力者也。且为之说曰,凡人屏除一切经验,而尚有善恶之观念者,事实也。

伦理学之所以有裨于躬行,在能使吾人于人生正鹄之所在,不惟口说而实心领之也。不知康强之益者,虽有医师日说以卫生之术而无效。

是故吾人苟于古今历史中,删除其一切罪恶,则同时一切善行与罪恶抵抗之迹,亦为之湮没。而人类中最高最大之现象,所谓道德界伟人者,亦无由而见之矣。

凡原著中与他的观点较相吻合之处或颇能发人深思之处,他就密加圈点,批上:“切论”、“此语甚精”、“振聋发聩之言”、“洞悉人性之语”、“吾极主此说”、“此节议论透彻之至”、“真理在此”等话;对于著作中有怀疑或否定的地方,便批上“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吾意不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完美”等字样。许多处还联系我国历史和五四前后的政局及思想动态,加以分析对比。如原著中论及专制政体与暴君时,他便在旁边注上“如袁政府”;当论及康德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哲学时,便注上“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等语。这些批语,充分表现了青年毛泽东惊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造性的见解,初步显示出他作为一个严肃的思想家的宝贵品格。它既是研究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珍贵资料,又是探讨青年毛泽东治学经验的重要历史文献,同时也是中外读书史上的一件奇闻!

从一师起,毛泽东养成的手中无笔不读书的良好习惯,后来他终生坚持不废。从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保存的他阅读过的大量书籍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他圈圈点点、朱墨纷呈的斑斑笔迹。这些琳琅满目的、由毛泽东亲笔批注的书籍及批注的文字,是毛泽东学习史宝库中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它对于研究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毛泽东是一位大诗人,他也特别喜欢读古诗词。每每读过一首或几首诗词,他都要用毛笔写下自己的心得或见解。下面是他读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和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笔记:

笔记: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指《苏幕遮·碧云天》和另一首《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引者注),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属于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

原文:

碧云天,黄叶地,彩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意。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毛泽东读诗词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豪放派词人中，他最爱读辛弃疾的词，约 98 首。婉约派词人的词，他喜欢柳永的词，当然也读其他人的婉约词作。毛泽东读了不少南唐后主李煜的婉约缠绵之词。李煜的两首名作《浪淘沙》和《虞美人》，毛泽东都把它作为书法内容写过。两词中“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是千古名句。

毛泽东是豪放诗人，但他并不乏婉约情调。除读婉约作品外，他还把这一情调形于笔端。1923 年填的那首《贺新郎》，是人们所熟悉的。那“今朝霜重”、“半天残月”、“凄清如许”的景色描绘，那“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的情态勾勒，那“汽笛一声肠欲断，从此天涯孤旅”的内心感受，深切表达了毛泽东和杨开慧之间缱绻缠绵的柔情蜜意，透射出毛泽东并不常露的“重感情”这一方面的内心底色。值得注意的是，上个世纪 20 年代初，毛泽东还填过一首《虞美人》，也是写给杨开慧的：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
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显然这是一首地道的爱情诗，分明的婉约派。

我们应该学习毛泽东的读书艺术，采众家之长，终成己之特点。

(三) 别具一格的《讲堂录》

在一师求学时，毛泽东有一本别具一格的课堂笔记，冠名《讲堂录》。说它别具一格，是因《讲堂录》这本课堂听课随笔共47页，一万余言，它全部是毛泽东用“兰亭体”毛笔小楷字书写而成。在前面的11页中，《离骚》和《九歌》全文抄录，一笔不苟；后面36页主要是国文和修身的听课笔记。他所记范围很广，凡是先秦哲学、楚辞、汉赋、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以及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等，都有所涉及。有许多处是评论中国历代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也有论及拿破仑、凯撒等外国著名历史人物的。所读名篇，凡典故、词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间或加以议论。这些议论多是做人和治学的随感，却包含了较深刻的哲理，其内容和观点并非完全是毛泽东自己的，但至少是经过他理解、消化和加工整理而形成的。由此不难看出，只有在课堂上认真听讲的学生，才能抓住要点，获得精粹，并有这样的《讲堂录》。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

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

理想的人物。理想者,事实之母也。

某氏曰,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圣贤救世实有如此,如孔子(在陈匡),耶苏(磔死十字架),苏格拉底(以故毒死)。]

语曰,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天下生者,仁人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也。)

——这是说,人生在世,要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奋斗目标,为了救国救民、改造中国和世界,要舍得牺牲自己的一切,必要时也不惜牺牲生命。

修身 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藪。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藪也。

奋斗 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朝气 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这里是说,理想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为了实现人生理想,首先要跟“懒惰”作斗争,因为“懒惰是万恶之渊藪”。青少年要有蓬勃向上的朝气、锐气,要发扬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自强不息、敢于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拼搏、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

真精神 实意做事，真心求学。

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而为之。

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

天下之道，未有见之不真，蓄之不厚，而可以苟为之者。

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

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

——这是说，理想的实现不是靠吹牛皮，而必须依靠艰苦卓绝的积蓄功夫，脚踏实地，兢兢业业，从而使自己具有真才实学，才能真正有所为。

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蓄，则终身不得矣。

——刻苦攻读，持之以恒，这是中华民族人格的完善和学问的长进的传统经验；毛泽东继承并发扬广大了这种赖以长期“积蓄”的治学和做人的经验。

为学之道则不得不重现在，何也？某氏有言曰，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豫测何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谅哉言矣！使为学而不重现在，则人寿几何，日月迈

矣，果谁之愆乎！盖大禹惜阴之说也。

——这是说，若遵循学习的规律，就要“重现在”。过去了的光阴，已经过去，无法追悔，追悔也无益；未来尚不确定，也难以确定，惟有“现在”是属于自己的。因此，从现在开始，持久坚持，以“久”制胜，是最可靠的办法。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字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穡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毛泽东认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为重要的学习。只有书本知识而脱离实践的人，是担当不起大任的。他十分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经验，尤其向往司马迁周览天下名山大川，开阔襟怀的壮举。毛泽东经常搞游学和社会调查活动，这使他在课堂的书本之外，读了许多“无字之书”，进一步接触和了解了当时中国社会乡村的情况，长了见识，增了才干。

谨言慎行即是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曰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思矣。

孔子称颜子一簞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簞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而乐也，岂不易哉。苦仆，无所依归，无簞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不亦难乎？

——毛泽东一生既赞赏，又效仿颜回的学习精神，故其才胜今人，学胜古人，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风流人物。

二 各种书籍都要读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方针和建国以后的党的路线和政策，他的报告后来当作“全会”的决议下达，成为新中国各项工作的行动指南。10天以后，他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启程前往北平。3月25日，毛泽东暂住于京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5月，从香山搬进中南海，毛泽东从此定居于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中南海位于故宫西侧，原是帝王禁苑。中海开辟于金元之时，南海始建于明初，清代统称之为西海子，为皇帝宴游之地。苑内碧波荡漾，绿树成荫，楼台相接，错落有致。“翡翠层楼浮树林，芙蓉小殿出波心”。丰泽园大门面临南海，而菊香书屋则北临中海，毛泽东出门可在“海”边散步，进屋可静心读书和思考，研究国家及天下大事。他十分喜爱这幢古色古香的书屋。

菊香书屋是一处四方形的四合院，东西南北各有五间屋。北屋正中一间是毛泽东的小会客室，靠墙排满了书橱与书架。东头两间是毛泽东的卧室，里面放一张特制的五尺宽的大木板床，床的半边都摆满了书。那些书都是由图书管理员根据他的需要而排放

的。隔一段时间,作一次调整。毛泽东有时躺着看书,在书上加批注,或随手画些只有他自己才懂得的符号。他越是心爱的书,越是批语满纸,浓圈密点,杠划不断,乃至杠外加框,字上叠字(铅笔字上叠写毛笔字)。

卧室靠北墙和东墙两面也全是书橱和书架,这里放的是他随时翻阅的书籍。北面西头两间屋原来是江青的卧室,江青搬出去住以后,这里也变成了书房。还有西屋北头的三间房、南屋西头的三间房,后来也都变成了书房。书籍分类上架,排放井然有序。据估计,藏书总数达六七万册,俨然是一个小型图书馆。

毛泽东收藏并阅读的书籍,大体上可以分以下四大类:

(一)工具书与马列著作

毛泽东经常使用的工具书是《辞海》与《辞源》。1947年从延安撤走时,他随身带着一部袖珍本的《辞源》。解放初期,他还继续使用,在上面留下了各个时期圈画的笔迹。由于袖珍本的字體太小,后来换上了一部字体较大的《辞源》,一直使用到晚年。

毛泽东用得更为频繁的是《辞海》。这部工具书也是在延安时就有的。他在转战陕北时,有一次因敌情严重,需要轻装,便把它埋藏了起来,此后再未找到。他进京之后,才又重新添置了一部《辞海》。1957年,毛泽东见到原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便说:一部《辞海》我20年前使用至今,现在这部辞书太老了,希望修订一下。后来经过专家们的10年努力,修订版的《辞海》于1965年问世。毛泽东看了,觉得还是过于简单,要求重编。工作几经曲折,直到毛泽东逝世之后,才于1979年修订完毕出版。

早在1920年,毛泽东就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等三本书,并自称领会最深的是“阶级斗争”四个字。他一生事业的成败与兴衰,盖源出于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读过《反杜林论》及列宁的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读列宁的这些著作,有助于其掌握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在延安时期,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上海等地出版的马恩著作,诸如《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及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列宁文选》、《理论与策略》等,他才有机会读到。

在延安时期,经他圈画过的马列著作,留下来的并不多。但上个世纪30年代苏联的红色教授们阐释马列哲学的著作(中译本),如西洛可夫、爱森堡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都保留得相当完备,而且几乎每本都经过精心研读,随手写下了自己的心得体会。现在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就是当年批读的原始记录。而《实践论》、《矛盾论》则是在批注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的创新之作。如果把他读30年代苏联哲学著作的《批注集》同“两论”做一番“由此及彼”的对勘研究,便可以看出他当年用力之勤与体会之深了。

进入北京之后,马恩列斯的全集、选集、单行本、大字本,陆续出版,一一进入菊香书屋的书库。还有各种阐释马列原理的第二手书,更是目不暇接。往日,在战争环境中,这些书来之不易,他找来便如饥似渴地批读,直至废寝忘食。现在,这些书得来容易,再加上他有了理论储备,便失去了紧迫感,反而读得少了。

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因已打下天下坐江山,他读书的重点也由哲学转向了经济学。1958年“大跃进”时,毛泽东曾下功夫钻研《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读了四个本子。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他又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边读边议,毛泽东发表了许多意见,后来读书小组整理成了两种笔记:一种以原书章节为序,记录了他的谈话;另一种按问题归纳了他的谈话内容。遗憾的是,毛泽东再也无法像延安时期发愤攻读哲学书籍那样,通过批注或笔记而形成自己的经济学著作了。

我们在前几章中曾经指出,青年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做过相当认真的研究,在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五四时期,他提出要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以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主张。在延安研读苏联上个世纪30年代哲学著作时,做了很多意蕴深刻的批注,接着便写出了“两论”那样理论成熟的著作,这些成就显然同他自幼形成的哲学兴趣分不开的,当然与他历年的革命实践中的荣辱得失、坎坷经历也是分不开的。而对搞经济,他早年似乎是看不起的。他的大同理想,甚至把工商业都视为多余。革命胜利以后,虽提出要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却并不熟悉经济规律。他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① 他讲的两本书,代表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并不全都是成功的。即使在苏联取得成功了,也并不一定适合于中国。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想跳出苏联模式,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种愿望虽好,但他对经济建设本来并不熟悉,加上又片面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因而后来便引向了一条比苏联模式更“左”的路。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的山沟里、窑洞里,曾经登上哲学领域的高峰;但建国后,住进了旧时皇家的深宫幽苑,反而在经济及经济学领域,他的红旗几度摇落,乃至陷入人穷财尽的困境。1976年病重时,他要随侍身边的秘书张玉凤反复朗读庾信的《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沧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攻守有异势,术业有专攻,人事有代谢,潮流有涨落,客观规律如此,谁能拒?!

^①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21日。

(二) 攻读史书

从少年时代起,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古籍就情有独钟。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是历史书。早在韶山的私塾里,他就点读过《左传》、《史记》、《纲鉴易知录》。在长沙上学时,又自学过《读史方輿纪要》、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在延安时期,他于百忙之中,还亲自去听范文澜讲经学史。进京以后,他买了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共八百五十册,全书四千万字。他从头到尾又通读过一遍,有些部分还反复研读过。如1959年在上海主持八届七中全会期间,他就重读了《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和《明史》中的《海瑞传》。他喜欢郭嘉,在于其多谋,又善断,且谋断都很准确。再加上英年早逝,更使人惋惜。作为一代领袖,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位多谋善断的历史人物,自是希望他领导下的各级干部向郭嘉学习,做事要多商量,但不要优柔寡断;要当机立断,但不要武断。这样,党就可以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海瑞是明代名臣,以直言敢谏著称。但1959年,毛泽东宣传海瑞有特殊的心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喜欢“左派海瑞”,并不喜欢“右派海瑞”。言下之意,“右派海瑞”则无疑是指他当初赠送《海瑞传》的彭德怀了。这种左右派的分法,无疑是他庐山会议前后矛盾做法的一种解释。直到晚年病魔缠身,他还在《晋书》上写下了“1975.8 再阅”、“1975.9 再阅”的字样。配合通读二十四史,毛泽东还结合研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和各朝的纪事本末,这些书原先他都是读过的。尤其是把《资治通鉴》经常放在床头。这部书真是被他读“破”了,有一些地方都是用透明胶纸贴住的。

毛泽东不但自己认真读史,而且在百废待兴的开国初年,还抓紧组织史学家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

据谭其骧回忆,1954年冬,毛泽东曾同吴晗谈起《资治通鉴》这部史书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现在还值得批判地研

读。但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读起来不方便,市上也难买到。他提出要组织人力来做整理工作,出一种用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与标点《资治通鉴》相配合,他还提出要编一部历史地图。后来,这两件事都委托吴晗办理。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进展顺利,一年就完成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却十分费事,直到1982年才出第一册,1988年才出齐八集,毛泽东都未能看到。

在“二十四史”中,毛泽东最重视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四史”,他批读的最多。他指导刘松林(毛岸英的爱人)学历史,叫她从前“四史”读起。后来,他组织史学家标点“二十四史”,也是从前“四史”入手。1959年4月,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写信给毛的秘书田家英:“主席指示标点出版前四史,去年起就紧张的进行这一工作……现在送去《史记》排样两份……如果方便,请转呈主席一阅。”前“四史”出来以后,范文澜、齐燕铭、吴晗、金灿然等又将其余“二十史”(包括《清史稿》)全部整理出来,毛泽东深为赞许。

(三) 读古代文学

毛泽东收藏和阅读的古代文学作品,包括诗词歌赋、小说戏曲、诸子散文、杂记随笔等,无所不有。毛泽东故居的图书管理小组的张贻玖,曾经汇编过一份毛泽东圈阅批注过的诗词目录。其中包括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20首赋。总计诗词曲赋1590首。涉及诗人、词人等429位。他读过而未留下印记的还不知有多少。^①看这个统计数字,就可从中约略窥见毛泽东对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诗词的浓厚兴趣。

在诗词歌赋中,他特别看好屈原的诗;屈、贾的赋;三李(即唐朝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和辛弃疾的词。

^① 张贻玖:《毛泽东和诗》,第2页。

我们在前一节中曾谈到毛泽东自幼不动笔墨不读书以及他的《讲堂录》中前 11 页为手抄之屈原的《离骚》和《九歌》。《离骚》是一首长达 2000 多字的抒情诗,代表了屈原创作上的最高成就。他对《离骚》评价极高。司马迁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旨极大,举类迕而见义远。”这是把屈原的作品价值同他的人生遭际和人格光辉联在一起评价的。毛泽东很同意这一点,认为自古以来的好诗,都是如司马迁说的那样,处于逆境人的“发愤之所为作也”。故他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九歌》是祭神的乐歌,充满神话色彩和奇瑰想像。据毛泽东在一师的同窗好友周世钊说,那时的国文老师推《左传》、《孟子》、《庄子》和骚体为写文章的最高典范,同学们也都争相效法。但对毛泽东来说,他终生嗜读不倦的,莫如屈原的“骚体”诗赋。

屈原是“骚体”的创始人。篇中“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带有浓厚的湘楚地方特色。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以汉代效仿“骚体”的作品汇成一集,冠名《楚辞》。东汉以后,相继出现了王逸、洪兴祖、朱熹、汪瑗、王夫之、蒋驥、戴震等多家注本。1957 年,毛泽东曾设法广泛搜集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研究《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多达 50 余种,并对他们作了相当认真的比较研究。1958 年,他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959 年、1961 年,他又两次要《楚辞》读。1973 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步美国总统尼克松之后尘来华访问,毛泽东送给他的礼品就是线装《楚辞》一部。

毛泽东终生爱读《楚辞》,纯粹出于非功利的审美趣味。屈原那浪漫主义的艺术想像和创作方法,作品所展示的龙凤图腾、美人香草、百亩芝兰、菱荷芙蓉、望舒飞廉、巫咸夕降、湘君山鬼、流沙毒水,等等,是既鲜明又深层的扑朔迷离的缤纷世界,吻合毛泽东的

审美趣旨和对艺术风格的追求。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其思维方式,自幼继承着王夫之以来湖湘文化的求实精神与独立根性;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其感情态度则远接以屈原为代表的湘楚的浪漫主义文化传统,两者交互作用,形成奇妙的结合。

毛泽东不但是一个古代文学的爱好者和欣赏者,而且是一个很有造诣的诗人和评论家。他的诗词既粗狂豪放、气度不凡,展现出“万水千山只等闲”、“不到长城非好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英雄气概,又情深意浓,优美无比,辉映出“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待到山花烂漫时”、“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的儿女情长;同时也神奇瑰丽、蕴意深远,衬托出“截断巫山云雨”、“寂寞嫦娥舒广袖”、“芙蓉国里尽朝晖”的人间春色。其诗品与人品了无判隔,文学界对此已有定评。

毛泽东对文学作品的评论见于平日的讲演、谈话和书信之中,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性的,即通过评论作品来表达或批评某种政治倾向,诸如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973年、1975年先后两次关于评论《水浒》的谈话等。这,留到下一节去细说。还有一类则近乎学究式的。如:他论刘邦的《大风歌》,就把它与刘邦的身世为人联系起来看,指出“这首诗,唱出了一位开国皇帝对创业的追求,思想感情豪迈,很有气势”,并认为刘邦“没有读过几天书,能写出这样的‘好诗’很不容易。”^①

他评《徐霞客游记》也联系作者的生平,说:

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同时,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

^① 张贻玖:《毛泽东和诗》第40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①

他读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写了如下的评语：

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②

这评语真可谓知人之谈，应是深得白居易之心的。

在研读古代的作家作品时，毛泽东很重视考证，仅从他论王勃与贺知章的批注和信中，便可窥一斑。

《毛泽东和诗》一书的作者张贻玖曾在书中介绍说，在一本《初唐四杰集》里，毛泽东对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钱崔使君序》一文，写了一条长达 1000 多字的批注，考证这篇文章“是去交趾路上作的，他在淮南，或是寿州，或是江都。时在上元二年，勃年应是二十三、四了”。注中还指出，王勃作《滕王阁序》时“应是二十四、五”而不是像传说中的“十三岁或十四岁”。批注写道：“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诗文，都是在北方——绛州、长安、四川之梓州一带，河南之虢州。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数几首，淮南、南昌、广州三地而已。广州较多，亦只数首。交趾一首也无，可见他并未到达交趾（安南）就翻船死在海里了。”

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的一封信中考证了贺知章。贺的原诗是：

① 见《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 1986 年版，第 270 页。

②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人民出版社，第 221 页。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刘少奇在一次谈话中，曾借此诗以论证古代官吏禁带家属，说明两地分居自古有之。毛泽东听了以后，觉得不妥。为此，他认真查阅了《全唐诗话》、《唐书·文苑·贺知章传》，得出相反看法，并立即写信与少奇商榷：

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的融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得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时

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

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①

这封长信对贺知章的身世剖析甚详,从已知推未知,步步考证,逻辑严密。足见他对于知人论世和考证的重视了。毛泽东从来不屑于当一名书斋学者,但他的确具有文史学者所应具备的学养及运思、表达能力。

(四) 学习自然科学与实用文化

我们曾多次说过,考入东山小学堂这所新式学校,十六七岁的毛泽东已初步树立起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志向,并为自己取了“子任”的别名,深感要唤醒民众,改造社会,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必须学好社会科学知识,而自然科学知识只是教人以谋生的技能,则不必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因此,学校开设的数理化等“格致”课,他只学了一点皮毛。上中学后,他对社会科学课程更是特别喜爱,每门功课都订有学习计划,学习也很刻苦。对一般课程只是听听讲,并不去钻研,对他感到肤浅和浪费时光的课程,则常以“病假”为由开小差,或者进了课堂也是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毛泽东就读于一师时,重文轻理的现象则更为严重。他说:“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

^①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第535~536页。

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这些课程,我得的分数很差……”从一师毕业后,1921年初,新民学会会员讨论个人的学习与发展计划时,他表示,要在30岁以内(当时,毛泽东已28岁了,实际只有两年),设法补足自己缺乏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缺憾,但后来事与愿违。建党并投身于职业革命之后,繁忙的革命活动耗费了他主要的乃至全部精力,他不但未在两年之内,而且终其一生,都未能循序渐进地实现自然科学的补课计划,只能从一般的报刊杂志中多少了解一些世界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动态。

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写信给在苏联上学的儿子岸英和岸青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①鲁迅先生临终前写的《死》一文中嘱其家属的话,有一条是:“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②岸英写信要诗,毛泽东是政治家兼诗人,不给寄诗去,却劝儿子“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似与鲁迅对儿子的告诫有类似的意向。从历史背景来看,以王明为代表的一批教条主义者,都是苏联留学生,学的是社会科学,搞的是空头政治。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一讲演中嘲讽他们是一些“华而不实,脆而不坚”、“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毛泽东说这话比给他儿子的“信”晚两个多月,内中有某种联系,那就是,两个儿子当时都在苏联学习,他也可能是担心儿子误入歧途,蹈教条主义之覆辙。

1949年建国之后,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多次提出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重要性。1956年,中共中央召

① 《毛泽东的儿女们》,中国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7页。

② 《鲁迅选集》第4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221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要求各级党的干部“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养成学习的习惯。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①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并没能使这一方针得到认真落实。他自己曾挤时间读过一些科学技术书籍,但数量有限。其中一部分是与当代中国科技发展的重点有关的。如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6月,毛泽东就要来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的科普著作来读。另一部分是与哲学有关的自然科学理论。他爱读《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力图从一个哲学家的视角来审视和吸取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此外,他还涉猎过李四光、竺可桢、杨振宁以及坂田昌一等著名科学家的某些新著。当他读了坂田《新基本粒子观对话》以后,非常重视其“基本”粒子可分的见解,并于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对几位哲学工作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青。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同原子核可以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78~479页。

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听了些说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赏《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没有看过这样的文章。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引了列宁的话。^①

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找来周培源和于光远谈话时,又说:

今天我找你们就是想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么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无穷尽的……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

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宙(称)守恒,后来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说它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组成了宇宙。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也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

^①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02~103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这本身就是辩证法。^①

他的这些见解,对科学家们进一步探索“基本粒子”以下层次的粒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美建交后,1974年5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时,曾表示:他为自己没有时间研究自然科学而深感遗憾。其实,对毛泽东来说不能研究自然科学,不只是个时间问题,恐怕是除了缺乏时间和某些客观条件以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难免受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局限。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古典文化发祥地之一,但近代却落入不发达国家的行列。所谓不发达,主要是科学和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不发达。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具有实用理性的特点。学者不致力于探求自然界的规律,而究心于协调人际关系,诵经传道,以守业而不是以创业为本。因此,思辨理性的科学实验,从国家整体看,成为缺门,而兵、农、医、艺等实用文化却曾得到长足发展。毛泽东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生存、生活和成长起来的。他涉足于实用文化的诸多领域,并有其独到的创造与收获。在几十年战争中形成的军事著作,是他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冠古绝今的“兵法”奇葩。在1958年“大跃进”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虽告失败,但他在总结和推广传统农业技术经验方面的浓厚兴趣,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医学方面,他力排众议,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方针,号召西医向中医学习,已取得相当可观的成效。在艺术方面,他热爱传统戏曲,但也不反对“洋”的东西。当年,他一进北京就观赏梅兰芳的《霸王别姬》、程砚秋的《荒山泪》和侯宝林的相声段子。直到垂暮之年,还坚持一连看几小时的电视戏曲节目。俗话说:“会看的

^① 见于光远:《毛泽东和自然辩证法》,《缅怀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

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他对京戏各个流派的唱腔和套路都相当熟悉,的确是懂得其中的门道。

三 读四大名著

“古为今用”是毛泽东对待古代文化的基本立足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目的都在“推陈出新”,为今天所用,为建设社会主义所用,也为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新文艺所用。他自己的旧体诗词,固然有援引古代典故的,还有拓自前人诗句以翻新的,更引人注意的是,他还在文章、讲话、谈话中经常引用古代文学名著的辞语与内容,去说明他所要论证的道理,使这道理更具有说服力。

毛泽东自幼爱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凡70年如一日,对书中的人物、事件等,都进行精深的研究,每每谈到这四部名著及其他名著,都能联系当今社会现实予以阐发。其独到见解与运用之妙,往往令一般学者却步。这一节,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毛泽东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名著的研究和运用情况。

(一) 自幼喜读、善用“三国”

毛泽东最爱读的古籍,有二十四史,其中有一部是《三国志》,也有古典文学,其中有一部就是《三国演义》。《三国志》是史书,也是文学;《三国演义》是小说,也有史实。毛泽东一生不离“三国”。从有记载的文字佐证,他至少读了70年的“三国”。

1906年,当毛泽东识的字足够他看一些简单故事书时,他便弄到一些他大致能看明白的小说。在他出生的那个小山村里,书是极少的,大家都爱看的正好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本小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说。前者讲的是一百零八将聚义的壮举,后者讲的是三国打仗的故事。毛泽东对这两本书入了迷。在农忙中,一有空闲,他就去读这两本书。他一直是把《三国演义》当作历史来读的,并认为通过这本小说可以了解三国时期的历史,因此,他对《三国演义》等小说都读得十分认真,绝不是泛泛而读,只作消遣。

1918年,毛泽东在杨昌济讲授修身课的教材《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涉及三国史论称:

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①

毛泽东作联,擅长古为今用,旧瓶装新酒。1924年1月,他在挽陈子博的联中,借用了杜甫《蜀相》的尾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1928年3月,毛泽东在中村得到了湘南起义失利的消息后,便立即率领部队同湘南农军向井冈山转移。在离开中村之前,他向全体指战员讲话时说:上级让我当“师长”,但是,本人“军旅之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85~186页。

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话：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战士，这么多干部，大家都来当参谋长，大家都来当师长，只要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

1937年7月，毛泽东写作了《实践论》这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他在文章中说：

《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出判断和推理的功夫。

又说：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①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贺龙说：“中国有三部名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贺龙连忙说：“没看过，没看过，不过我不是外国人。”毛泽东又问徐海东：“海东，你看过这三部小说没有？”徐海东说：“《三国》看过，《水浒》也看过。这《红楼梦》嘛，不知是什么意思，没看过。”毛泽东笑着说：“那你算半个中国人！”

1941年1月，我国历史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之后，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问题上，党内产生了不同意见。有的同志主张从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全面反击。毛泽东

^①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出自《三国演义》第七十回。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说：

皖南新四军军部被歼——这是蒋介石杀我们的一刀，这一刀杀得很深。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都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该反对。我们必须指出，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到这种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闹摩擦、闹惨案、闹分裂。不管他们心里怎样想，他们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日本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惩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卖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坏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

说到此，毛泽东话锋一转，说：

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当孙权数次讨荆州时，诸葛亮总是一再推诿软磨，而不硬抗，直到最后才让出荆州的部分地方。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派了根本不执行“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要

有理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荆州。关羽这个人虽然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擒庞德，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刘备封“关、张、赵、马、黄”五虎大将时，关羽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当孙权派诸葛瑾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以结秦晋之好，共伐曹操时，关羽却勃然大怒，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诸葛亮）之面，应斩汝首！再休多言。”诸葛瑾抱头鼠窜而去。孙权便攻占了荆州，孙刘联盟瓦解。刘备见关羽被杀，荆州丢失，遂起兵攻打东吴，众臣苦谏都不听，实在是因小失大。正如赵云所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诸葛亮也上表谏止说：“臣亮等切以吴贼逞奸诡之计，致荆州有覆亡之祸；陨将星于斗牛，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诚不可忘。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可是刘备看完后，把表掷于地上，说：“朕意已决，无得再谏。”决意起大军东征，最终导致兵败身亡。^①

毛泽东由此总结刘备的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别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毛泽东认为，只有“抓住主要矛盾，分清主次与轻重缓急，先曹后孙才是大局为重的上策”。毛泽东通过分析《三国演义》这段刘备兵败身亡的历史故事来给大家以启示：皖南事变是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即次要矛盾，中华民族（以

① 盛巽昌：《毛泽东和“三国”》，文汇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9～31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共产党为代表)与日寇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即主要矛盾,我们要先抓主要矛盾解决,后解决次要矛盾,不要因小而失大,很快统一了全党同志对皖南事变的认识。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特别法庭判处腐化堕落分子刘青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天津专署专员)死刑。在此以前,华北局将“刘张事件”上报中央,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薄一波等书记处领导在颐年堂开会,专门研究杀不杀的问题。毛泽东说:“非杀不可。挥泪斩马谡,这是不得已的事情。”

薄一波曾回忆毛泽东对他谈到《三国演义》,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的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

1976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用孔子、秦始皇、曹操、朱元璋没上过大学来说明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增长才干。

(二)读《水浒》,运用《水浒》

在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对《水浒》等旧小说的认识深化了。1925年到1927年,在国共两党合作推进的大革命洪流中,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农民运动上面,他认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和“关键”,希望农民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改变现实的社会秩序,进而改变他小时候深切感受到的“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当主人公”的不平等的文化处境。这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以及《水浒传》这样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便成为毛泽东传播自己观点的材料。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告诉学员:中国的历史甚多,而小说如《三国》、《水浒》等,都是看过的,昔人的思想,多偏袒统治者及地主阶级。我们是革命者,这种思想是不可要

的……我们要造一个锄头,这个锄头,马克思已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毛泽东在讲课中还举了《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的描写,他说:诸葛亮,当其未出茅庐时,一点用也没有,及一出山握有兵权,则神出鬼没了。毛泽东认为,这恰恰不是说明帝王将相和掌握知识的人有什么特殊的能耐,而是表明,如果没有民众的拥护,一点力量也没有。可古代小说的描写却不是这样,完全不反映民众的力量。其实,《水浒传》也是这种情况。里面 108 位头领中,除了那位以锄头为武器的陶宗旺以及打猎为生的解珍、解宝兄弟外,没有一个是靠种田为生的穷苦人家。毛泽东的这个看法,显然是他早年感受的延续和发展。不同的是,他不只是感到“不平”,而他是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从 1927 年大革命的农民运动开始,毛泽东看到了改变这种被颠倒了的文化现象的希望,并为一切新的文化现象叫好。在 1927 年 3 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说:“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

1944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在延安看了评剧《逼上梁山》以后,连夜写信祝贺。他写的信是: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按:根据《水浒传》所述林冲上梁山经过改编的京剧《逼上梁山》,当时称为“评剧”)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

薄一波回忆说,毛泽东讲到:“《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进而他就引申出:“我们领导革命也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到消灭山头,克服山头主义。”

《水浒传》从第47回到第50回,围绕梁山义军同祝家庄豪强势力间的矛盾斗争,展开了绘声绘色的叙述。“三打祝家庄”成为这部小说最著名的故事情节之一。毛泽东很喜欢这段故事,多次评论和发挥它的含义。几次评论,都着重谈到它在解决矛盾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

1937年,他在《矛盾论》中评论,说:“《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象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他这是立足于哲学角度,以说明要解决矛盾,首先要“从调查情形入手”,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前两次打祝家庄失败,就是因为“情况不明,方法不对”。

武松打虎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水浒传》里的精彩段落。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借这个故事来回答一些人对人民民主专政提出的“你们太刺激了”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专政”手段确实是“刺激”的,但它是用来“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人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因为,毛泽东说:“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岗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岗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本来,在人们对武松打虎的一般体会中,主要是赞叹武松不畏强敌的勇气和胆量。毛泽东的引用,则更多地发挥这个故事的另一个方面的意义,即人民民主专政之与敌对阶级,就像武松与老虎的关系一样,不是老虎死,就是武松活,在这种冲突关系中,老虎要吃人,这是它的本性决定的,这种本性不会因为武松的退让、怯懦或仁慈而有所改变,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武松凭力打死老虎,就像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对敌对阶级实行不留情的专政一样,是无所谓是不是在“刺激”对方的。

《水浒传》写了不少胆大敢为的英雄好汉,石秀就是其中的一个。石秀在书中的出场,是第44回,其绰号为“拼命三郎”。这绰号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路见不平,但要去相助”;二是拼着性命做事的勇敢果断,这一点,在第62回“劫法场石秀跳楼”中描写得可谓淋漓尽致。1957年3月18日和19日,毛泽东分别在济南和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两次讲话都紧扣一个主题,“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革命胜利后,党员干部仍要保持过去战争时代的作风。毛泽东列举了一些革命热情和革命意志消退的现象,如争名夺利、讲吃讲穿等等。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他用石秀的例子,意在用石秀把个人性命置之度外的献身精神(“革命精神”),来对照现实中革命意志消退的人,让人警策。

(三)读《西游记》,赞孙大圣

毛泽东自幼喜欢读《西游记》,并十分钦佩孙悟空的造反精神。后来,他在不少地方谈到《西游记》,大多是对孙悟空等形象作古为今用的借题发挥。

1938年4月,在延安“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要求学员应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接着,他笑谈《西游记》的人物,比喻这三句话的重要:“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到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够,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地提到了那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西游记》这类地道的神话作品所展示的,则基本上是远离现实生活的虚幻世界了。如果仅凭直觉体验,则很难从中读出现实内容。鲁迅在1924年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就谈过这样的阅读体验:“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鉴赏了。”五四以前,关于读书的宗旨,虽议论纷纷,大体也不过是“劝学”、“谈禅”、“讲道”之类,由于作者笔调幽默、滑稽,对这些宗旨读者也是“无所容心”的。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对《西游记》的主题作了较多阐释的是胡适。他经过

大量考证,确认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鲁迅也认为,这部神魔小说“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显然,他们都没有发掘出其积极的历史内涵。

如果用反映论的观点来分析《西游记》这样的神话作品,结论就不同了。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此,可以视为毛泽东评论《西游记》的一个指导线索。

毛泽东读《西游记》,最注重大闹天宫的故事,最喜欢孙悟空这一形象。在讲话、文章和诗词中,经常引用。有时从正面来引用,有时从反面来引用。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他对孙悟空形象的引用,可以说是“中性”的,主要根据小说的情节和孙悟空的特点,来说明和比喻现实中的具体问题。

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里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时,他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这并非是笑谈,而是战争的必然。

1957年3月8日,在宣传“双百”方针,提倡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背景下,他同文艺界谈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的时候,告诉人们: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敖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

1957年4月5日,在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座谈会上,毛泽东谈到“双百”方针时,说:孙悟空到龙王那里借一件兵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来不给不行,压也压不服。总之,生怕出妖怪来。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

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与郭沫若唱和的一首《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便专从“古为今用”的角度去引用《西游记》,更是人们所熟悉的: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
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毛泽东激情洋溢地“欢呼”着孙大圣,使其成为自己的反修诗作的主要英雄人物,渴望着“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那样的壮观激越的乐观景象。其内在的意蕴在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又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说,在同苏共的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个人武器”。

(四)“《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

毛泽东在韶山读私塾时,就爱读旧小说,但同斯诺谈话中,没有提到那时读过《红楼梦》。毛岸青和邵华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一文中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爸爸在少年时代就看过。”估计是到了长沙读书后,才读到《红楼梦》的。在1913年做的《讲堂录》中,便记有《红楼梦》里的“意淫”之说。在后来风风雨雨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经常阅读和谈论这部小说,并给以极高的评价。

在毛泽东少年时,社会上对《红楼梦》仍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伪道学者斥之为淫书,甚至编出种种故事,说《红楼梦》的作者死后堕入拔舌地狱之类,肆意谩骂;而一些有见地有眼光的人,则认为《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废者”。(黄遵宪语)

对《红楼梦》这部书,尽管喜欢的人甚众,但各人所得不同。鲁迅说过,读《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欣赏,本来就是一种再创造,即在作者的作品中,掺与欣赏者自己的立场、观点、思想、经验以及现实的需要。见《易》、见淫、见缠绵、见排满、见宫闱秘事,均因此而出。就像马克思所说:读《哈姆莱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是一样的。

毛泽东读《红楼梦》,另是一路。如果说,少年时当作有趣的故事读,那么,后来特别是在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小说不是单纯当作文学来读,而是首先当作社会生活的反映,当作历史书来读的,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生活的解剖考察。对这个观点,他反复申明,从不讳言。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在井冈山时,有一次,贺子珍谈起她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不喜欢《红楼梦》。她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泽东一听,就反驳她说:“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

1938年4月28日,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演讲中,说:“《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这明确表达了他对《红楼梦》的评价,以纠正人们的偏见。在延安同文化人交谈时,毛泽东经常发表对《红楼梦》的看法。茅盾曾回忆说:1940年6月在延安时,一次毛泽东来问候,“和我畅谈中国古典文学,对《红楼梦》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①

1949年初,国民党战败求和,提出以他们的“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为和平谈判的条件之一。毛泽东在《评战犯求和》这篇评论中,极尽挖苦地予以反驳:“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怎么好说不‘保障’,或者虽有‘保障’而不‘确实’呢?”

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和外国关系、中国的缺点和优点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对《红楼梦》评价之高,可以说无以复加。

《红楼梦》第68回《苦尤娘赚入大观园,酸凤姐大闹宁国府》中,记凤姐发觉贾琏偷娶尤二姐,到宁国府撒泼一事,当时她的长

^① 《延安行》,《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篇讲话中有一句：“俗语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毛泽东对这句话很感兴趣，在谈话、开会时，不止一次引用过。1956年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说过：“现在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几个月之后，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整风的时候，又引了这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经过他的一再引用，后来这句话流播甚广。

《红楼梦》第82回《老学究讲义警顽心，病潇湘痴魂惊噩梦》中，记林黛玉听到袭人评论尤二姐惨死的事之后，说：“这也难说，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对这句话，毛泽东也不止一次地在会议上引用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谈到“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毛泽东用此话来说明“世界大好形势”：“现在我感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同期，即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实习生谈话时，再次说：“世界的风向变化，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风。……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给东风和西风赋予如此重要的政治内容。此后不久,中苏合拍了一部电影,名字叫做:《风从东方来》。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多次讲到《红楼梦》:“《红楼梦》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这段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

读《红楼梦》,就要了解《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以及《红楼梦》中的思想反映了怎样的历史进步要求。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7世纪到现在,已经有360多年的时候,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的思想价值,毛泽东的观点是:“不满意封建制度。”说的较有分寸。毛泽东还说:《红楼梦》是尊重女性的。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又说:《红楼梦》与谴责小说及《金瓶梅》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这些说法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民主性”。一般来说,民主性及人民性是毛泽东评论封建社会文化中好的一面的常用的概念。

毛泽东把《红楼梦》当历史读,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阶级斗争。这部小说在取材和构思上并非是着眼于阶级冲突,它主要展示封

建大家族的内部冲突并由此兼及周围的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曹雪芹在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自觉意识。

据谭启龙回忆毛泽东对他谈《红楼梦》，说：“读过一遍没有资格参加议论，最少要读五遍。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① 张仙朋回忆毛泽东谈《红楼梦》：“《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②

在毛泽东“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中，有统治者，便有被统治者。四大家族之所以具有“统治的历史”，根本上是存在着“奴隶主”和“奴隶”这两个对立的阶级关系。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个（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毛泽东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读《红楼梦》，得出的又一个看法是借爱情写政治。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八大军区负责人的

① 《缅怀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238页。

② 《为了人民……》，载《当代》1979年第2期。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谈话中说到：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吊膀子（爱情）掩盖它。这同他说《红楼梦》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写了剧烈的阶级斗争，反映了封建制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无可挽回的衰败命运，是不能分开理解的。

《红楼梦》反映没反映封建社会里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当然反映了。但是，毛泽东如此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评价《红楼梦》，与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处处充满阶级斗争”、大抓阶级斗争是分不开的。1964年毛泽东有一段与王海蓉关于《红楼梦》的谈话，充分说明了他对于这部作品的认识作用、审美作用的重视。

他们谈话的片断如下：

王：现在谁都不准看古典作品，我们班的那个干部子弟，尽看些古典作品，大家忙着练习英语，他却看《红楼梦》，我们同学对他看《红楼梦》都有意见。

主席：你读过《红楼梦》没有？

王：读过。

主席：《红楼梦》可以读，是一本好书。读《红楼梦》不是坏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所有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个，你看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要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红楼梦》，你怎么会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读《红楼梦》要了解四句话：“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说贾家）；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说王家）；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说薛家）；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说史家）。

可见毛泽东对古典文学作品认识作用的重视，他实际上把《红楼梦》看做认识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但《红楼梦》毕竟不是史书，

而是文学作品,是具有审美特征与作用的,所以毛泽东又称赞它的语言好,称赞它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如何成功!

四 古为今用

“古为今用”,要求研究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为历史而历史”,而是着眼于为现实斗争服务。建国以来,毛泽东往往通过评论历史人物与作品的方式,来推动现实斗争。或以古人为范式,或以往事为殷鉴,或推陈出新,或引古以筹今……其事例繁多,此节仅就几件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的事例简述之。

(一) 批电影《武训传》与《红楼梦》研究

早在1949年2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曾指出:

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①

毛泽东认为,如果不是这样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就要犯极大的错误。这是理解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发动一场又一场思想文化战线上思想政治斗争的十分重要的思路。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27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几次大的思想文化批判,主要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即主要发生在社会的急剧转型期——全面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当时,清理旧社会的思想废墟,并在此基础上建设起新的思想文化大厦,不仅是革命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而“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则是毛泽东的哲学,也是他深信有效的方法。

第一个例子是从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开始了对《武训传》的批判,这是开国后第一桩震动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大事件。电影《武训传》主人公武训实有其人,他生活在清朝末年,主要事迹是行乞兴学,一生历尽屈辱艰辛,办起了三所义学,最终获得清朝皇帝的嘉奖,敕封为“义学正”。在武训身上既体现了贫贱者不甘愚昧无知而渴求提高文化的善良愿望,也反映出在长期封建统治下扭曲而成的自卑自贱、乞求恩舍的奴才性格。电影编导孙瑜在解放前夕即将武训的事迹写成电影剧本,建国后又加以修改,并由著名演员赵丹主演投入拍摄。这部电影在1951年元月放映以后,文艺界几乎一片赞扬声,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员的教育家和文艺家,两个月里报刊发表影评四十余篇,绝大多数给予好评,当然,后来也有一些文章提出了适当的批评。

毛泽东一向关心文化事业。《武训传》上映不久,他就看了这部影片和报刊上的有关评论,并且自告奋勇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

社论劈头就指出: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

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①

事隔 50 年之后,重读这篇社论,仍然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武训传》和武训的批判,的确眼明手快,开篇就揭破了问题的实质。全文析理分明,有助于人们分清“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这在建国初期向人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育是非常有益的。

因为,各个时代的各个阶级都难免要在文艺作品中有所歌颂和有所反对,以此扩大本阶级的思想和价值取向,以利于本阶级地位的巩固和发展。统治阶级尤其如此。所以歌颂什么、反对什么确实是文艺创作中极为重要的问题。如果听任《武训传》所代表的一股思潮泛滥起来,文艺作品纷纷去歌颂维护旧统治阶级利益的人和事,那么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便很难巩固和发展起来,这是合乎生活逻辑的。所以,毛泽东敏锐地抓住问题的实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批判。尽管这个过程中有不少文章对武训进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46 页~47 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行了完全否定,但由于对历史人物的功过缺乏更细致的分析,文章显得过于简单,但在总体方向上,它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得到一次与实际问题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明确了社会主义文艺应当歌颂什么、反对什么,这并非不是一种正面收获。至于今天的人们对《武训传》和武训又作如何分析和评价,那是今天的人们的事。历史就是在是是非非、曲曲折折中前进的。任何时代的人都标榜自己是惟一正确的,但事实上,任何时代的人,都有其正确的一面,又有其不正确的一面,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因此,没有必要在今天重评历史人物。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曹雪芹所著的长篇小说《红楼梦》,自问世后的 200 多年间引起了种种红学家的索隐和研探。晚清以来,学术界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已逐渐形成一项专门的学问,简称“红学”。“红学”大体上有三派,即从最早的评点派,到后来的索隐派,以至胡适、俞平伯考证派的新红学。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受胡适影响,从考据入手,但在艺术分析上深入了一步,他是“新红学”的佼佼者。1923 年俞作《红楼梦辨》,是“新红学”代表作之一。解放后,他将这部书修改、增订,于 1953 年更名为《红楼梦研究》出版。同时,又把他在各报刊发表的有关评论汇编成册,题名为《红楼梦简论》刊行。几十年来,俞氏潜心研究“红学”,对《红楼梦》原稿和各种版本的考证,对其思想和艺术的分析,以及对人物形象的探讨等等,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为文艺界和学术界所公认。

俞平伯是五四以后新红学派的代表学者,他曾经认为《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这种观点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学术界曾有相当的影响。1954 年,两位“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突破各种困难,先后在山东大学《文史哲》和《光明日报》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与研究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

为《红楼梦》并非作者自传,而是典型概括的现实主义杰作。俞平伯的根本问题是以自然主义的唯心观点来分析和评价《红楼梦》,抽掉了它的丰富的社会内容。他们将俞平伯与胡适联系起来,说:“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典型的社会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除此以外,批评还涉及俞作对《红楼梦》的风格、传统性及“色、空观念”、“钗、黛合一”等问题的理解,都是与根本问题密切相关的。其实,两个“小人物”与俞的争论属于学术问题,本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他们的文章投给冯雪峰主编的《文艺报》却被退了稿,后来投给母校——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才获发表。

毛泽东本来好读《红楼梦》,李、蓝的文章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引进红学研究领域,他感到十分高兴,不但细心研读,并随手在文章旁画了不少圈圈、杠杠和各种记号。他在批语中称赞《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成熟的文章”。在李希凡、蓝翎的名字下批注道:“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二岁,一个二十六岁。”当毛泽东得知李、蓝文章的遭遇情况后,十分生气,竟至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有关人员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

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①

毛泽东的这封信当时并没有公开,只在小范围内传达。但通过间接的方式,信的指示精神很快向理论界宣布了。《人民日报》于10月23日发表了《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钟洛)的文章。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座谈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家和各有关报刊编辑60多人,俞平伯和李希凡、蓝翎也参加了会。先后发言的有周扬、冯至、舒芜、钟敬文、王昆仑、老舍、郑振铎、何其芳等全国著名的文艺界人士。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于27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报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34~135页。

告”说：会上一致认为李、蓝文章具有重要意义，经过这场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发言中为俞平伯的考据劳绩辩护，主要担心今后的考证工作会不被重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发言中适当地作了解释。这次讨论的目的是要在关于《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划清界限，并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出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报告”提出，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接受，对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采取团结、教育的态度，旨在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又说：这次讨论不应该只停止在一本书、一个人上面，也不仅限于古典文学范围，要发展到哲学、历史学、教育学各个领域，彻底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毛泽东阅读该报告后，批示“照办”。

毛泽东的信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陆定一的报告更是比毛的信有过之而无不及。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的》的文章；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以《文化学术界应该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的斗争》为题，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他希望“讨论的范围要广泛，应当不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而应当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去。”12月12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个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经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后实施。

这场批判运动对俞平伯不但未作政治处理，相反，他还被提升为一级教授，但冯雪峰却被免去《文艺报》主编的职务。批判的积极影响，当然是在思想学术领域，特别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授。而消极之处则是对俞平伯、对胡适在学术上的有益贡献没有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

俞平伯早年所持的自传说他后来已放弃,退一步说,自传说也并非没有一定的根据。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历史考据方法,也并非全然无用和一概可以归为唯心论。至于个别文章中甚至说俞平伯的观点“有引导读者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这不仅不符合事实,也开了后来随意给作家作品上纲上线的恶劣风气。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关心非同一般,上一节中已详谈过了。通过批判《红楼梦研究》,形成了一条从文化讨论转向政治批判的惯性轨迹,接下来,由对冯雪峰的批判导向对胡适与胡风的批判,于是出现了波涛汹涌的更大高潮。因这个问题不在此题目之内,不必赘述了。

(二)《不怕鬼的故事》

1961年2月,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受命于毛泽东,编辑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该书故事主要选自晋人作的《列异传》,刘宋时刘义庆的《幽明录》,唐朝戴孚的《广异记》,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洪迈的《夷坚志》,明朝郎瑛的《七修类稿》,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等笔记小说中。所选篇目,短则几十字,多也不过千字,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人不怕鬼并且有智有勇战胜鬼的故事。例如晋人作《列异传》中的“宋定伯捉鬼”: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曰:“鬼也。”鬼曰:“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亟,可共递相担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

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答言：“唯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无声音。定伯自渡，漕漕作声。鬼复言：“何以作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着肩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着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于时石崇言：“定伯卖鬼，得千五百文。”

毛泽东为什么要指示何其芳编辑出版《不怕鬼的故事》呢？

上个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随着“大跃进”后的天灾人祸，中国进入困难时期。特别是在这个时候，国际局势趋于恶化，反华势头增大。如何克服困难，怎样看待日趋紧张的中外关系，对人们的意志信念是一个考验。在这期间，毛泽东经常谈论古代小说中描写的不怕鬼的故事，以鼓舞人们的志气。在他看来，一切敌人、对手和困难，都属于“鬼”，只有不怕它，才能战胜它，克服它。

有资料显示：毛泽东首次谈“鬼”是在 1959 年 2 月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之后。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接着各省相继传达会议精神。3 月 30 日，毛泽东对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笏关于山西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作了批注。其中说到：“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竿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他们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台。”“这三条办法好。群众一到，魔鬼全消。本来没有鬼，只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做‘怕群众’。”看来，起初，毛泽东说“鬼”，主要是指国内问题。

1959 年 4 月 5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又举“鬼”为例，还详细讲了《聊斋志异》里那个“狂生夜坐”的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故事,明确提出此后多次谈到的观点:不要怕鬼,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

1959年5月6日在同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和驻华使节谈话时,又说: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有狂生夜坐的故事。有一天晚上,狂生坐在屋子里。有一个鬼站在窗外,把头伸进窗内来,很难看,把舌头伸出来,头这么大,舌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把墨涂在脸上,涂得像鬼一样,也伸出舌头,面向鬼望着,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望着鬼,后来鬼就跑了。

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

……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①

何其芳将选编好的《不怕鬼的故事》的初稿送毛泽东审阅,并请他为这本书写个序言,以说明在这个时候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用意,引导读者结合现实更好地阅读。毛泽东指示,先让何其芳起草一个,再给他看。这样,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1万字的序言。其中说道:从前,“许多人相信有鬼,而且怕鬼。这是无足奇怪的”。“今天看来,值得我们惊异的,倒不在于当时有鬼论者之多,

^① 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74~375页。

而在于当时有鬼论者占优势的时候,还是有主张无鬼论的少数派。”此外,过去的笔记小说作者,很多都是喜欢谈鬼的。“他们之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虽然认为有鬼,却对这种大家以为可怕的鬼表示不敬,认为没有什么可怕,并且描写了一些敢于骂鬼、驱鬼、打鬼、捉鬼的人物。这类故事是很有意义的。它们机智地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大无畏精神”。“序言”又说:“我们编这个小册子,目的不在于借这些不怕鬼的故事来说明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和。我们主要是想把这些故事当作寓言、当作讽喻性的故事来介绍给读者们。如果心存怯懦,思想不解放,那么人们对于并不存在的鬼神也会害怕。如果觉悟提高,迷信破除,思想解放,那么不但鬼神不怕,而且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一切实际存在的天灾人祸,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可怕的,都是可以战胜的,都是可以克服的。”“序言”还认为,“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到帝、修、反,严重的天灾,小到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因此,“彻底扫除这种落后的‘怕鬼’思想,对于每个革命者来说,是严重的斗争任务”。正像编选这本书的起因具有明显的政治性一样,这篇序言也很有点像政治论文。何其芳把这篇序言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961年1月4日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何其芳,对何说:

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指何其芳请他审阅的《不怕鬼的故事》序言稿子——引者注)。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指《不怕鬼的故事》——引者注)上,就有这样的例子。《聊斋志异》的那篇《妖术》,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还有《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①

经过多次反复修改,《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出版了。可以说,这本约6万余字的小册子,从编选到写序到出版,毛泽东实实在在的是以“编者”的身份出现的,书中凝聚了他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强调的“打鬼”思想。从中可以概括出这样几点:其一,怕“鬼”没有用,越怕,“鬼”越多;其二,只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通过斗争”,就一定能战胜各种各样的“鬼”;其三,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教育的工具;其四,“不怕鬼”,进而打“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其五,要注意改造“半人半鬼”的人。

五 终身学习

从文字记载看,毛泽东从1896年春寄居在外婆家,充当“小小陪读郎”算起,到1976年8月26日,躺在病榻上,临终前索要《容斋随笔》止,在长达81年的岁月里,无一天不学习,真可谓:活到老,学到老,至死方休。

(一)“我决心学习,至死方休”

毛泽东的渊博学识,过人韬略,不是从学校课堂里学来的,而是靠他终身学习得来的。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在一次演说中表示: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那么就要学9年零365天。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也确实是这样做。1975年,毛泽东已82岁高龄,因患

^① 见《毛泽东之歌》,载《何其芳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老年性白内障，不能看，不能写，内心非常痛苦，于是就找人来为他念书听。

当时，北大中文系讲师芦荻为毛泽东读了一段时间的书。一次，读江淹的《恨赋》，为了解释其中的“溢”字，毛泽东就将《西厢记》中的原文背了一大段。^① 据查，江淹《恨赋》中只有一个“溢”字，那段原文是：“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溢，武力未毕……”毛泽东背《西厢记》中的原文，有“溢”字的又非常精彩的一段，就是第四本中第三折《长亭送别》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那一段，其中有这样几句词：“这忧愁诉与谁？相思只自知，老天不管人憔悴。泪添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山低。到晚来闷把西楼倚，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

可是，一旦手术后视力稍稍有恢复，他又手不释卷地读起书来。1975年8月2日，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如何评价韩愈和李商隐的无题诗，谈了自己的看法。信中谈到：“关于李义山（商隐）的无题诗，说有一部分是政治诗，也有少数是恋爱诗，这样妥当吗？”“如果能得到主席的指教，解此疑难，那真是莫大的光荣和幸福。”

事情是这样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同刘大杰曾两次面谈过对李商隐和韩愈的评价。毛泽东非常喜欢李商隐的诗，尤其是他的“无题诗”。对韩愈的诗毛泽东也非常熟，而且有自己的见解和评价。刘大杰所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一部较有影响的著作，毛泽东翻阅过这本书，直到逝世，还摆放在书架上。1974年，在“评法批儒”的政治形势下，刘大杰决定再次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于是，他便给毛泽东去信请教。

① 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半年之后,即1976年2月12日毛泽东给刘大杰回了信。他在信中说:“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这个意见是遵循学术研究规律的。其实,早在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刘大杰时,谈到李商隐的《无题》诗,毛泽东就说过:“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①

毛泽东一生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在病魔缠身和右眼患严重白内障的情况下,他仍仔细阅读了刘大杰的来信和作品,还在思考古典文学研究问题,并复了信,这实在令人起敬。据说,给刘大杰的这封信,是毛泽东的最后一篇论文艺的文稿。直到临终,也就是毛泽东心脏停止跳动的前几个小时,虽然他已无力说话,却还示意工作人员给他读书听,当他听到满意的内容时,脸上还露出微微的笑容。毛泽东切实实践了自己的誓言:“我决心学习,至死方休。”

(二)“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毛泽东晚年,特别喜欢沉雄悲凉的南宋词,尤其是对岳飞的《满江红》,更是倍爱有加。1975年8月,医疗组织根据毛泽东当时的身体状况提出了实施白内障摘除手术的意见和方案。为毛泽东进行手术,没有去住医院,而是在他的泳池住处进行。在为他进行手术而搭起的临时手术室里,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就在他马上就要做眼睛手术的时候,他仍给人以满怀信心和壮志凌云的气氛。为了配合手术,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给他放一首曲子:岳飞的《满江红》。这首曲子是上海昆曲剧院演员岳美缇演唱的。她演唱的《满江红》高亢、有力,充分表达了一个爱国志士的宽广胸怀和伟大抱负。

毛泽东特别喜欢这首词,他听着铿锵乐曲,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手术室坐下。“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

^① 孙琴安:《毛泽东与刘大杰谈古典文学》,《文艺报》1991年12月28日。

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此时此刻，毛泽东神情镇定，从容现乐。他在想些什么？他又为什么喜读这些南宋词呢？

据说，1961年毛泽东写给工作人员一个批示：“找南宋张元干的《归来集》，找南宋张孝祥的《于湖集》，找南宋洪皓的诗文集。”

我们知道，南宋初年，有的词人积极投身于恢复北方疆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他们的词作突破了北宋末年平庸浮靡的风气，上承苏轼的豪放传统，形成沉雄刚健、慷慨悲歌的爱国词派。代表词人有洪皓（1088—1155），著有《鄱阳集》；张元干（1091—1175？），著有《芦川归来集》；岳飞（1103—1141），有《岳武穆集》；张孝祥（1132？—1169？），有《于湖集》、《于湖词》；陈亮（1143—1194），有《龙川词》。他们的作品基调，是抚时感事，抒发昂扬的北伐斗志，描绘恢复中原的理想，展露不得其伸的壮志情怀。毛泽东喜读这类词作。

据臧克家讲，毛泽东在阅读《词综》时，圈得较多的是辛弃疾、张元干这样一些爱国主义词人的豪放作品，也圈了岳飞、文天祥，以及一些思想内容并不现实而艺术表现却颇动人、名字颇为陌生的词人的作品，如王硕等。

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前期的多事之秋，党和国家濒临危机，年老、多病、体衰的毛泽东常常用慷慨悲壮南宋词来表达自己的忧患情怀。1973年，还专门组织了一个班子，请来上海昆曲演员岳美缇等，灌制了一批宋诗词唱片，其中大量的便是南宋词。毛泽东经常听诵这些南宋词曲。

1975年4月2日，董必武逝世，毛泽东很难过，那一天都没有吃什么东西，也不说话，整整放了一天宋人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词的唱片。这首词是主张抗金的胡铨上书请斩秦桧，反被除名编管新州时，张元干写来送他的，表示对胡的同情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与支持。毛泽东时而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神情严肃悲痛,借这首词中的某些句子寄托自己对董必武的沉痛哀悼。过了不几天,他又把词的最后两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说是原来的两句太伤感了。

1975年8月初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慷慨悲歌地吟罢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词后,又让在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念了这首词:“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无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疆对。”

在以上这类作品中“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危楼还望,叹此意,古今几人曾会”;“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等等。反复表达的都是英雄们那种“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济世壮志。

昔日那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战斗岁月已不能再现。无人会,悲难诉,既是英雄超越现实群体心态的孤独,也是面对不可企及的“天意”(历史理想?)所发出困惑疑问的悲怅。这些爱国词人词作固然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和主题:山河分离——河山统一。但对毛泽东咀嚼南宋词人词味所产生的共鸣心态,也不必过于着实地解释为毛泽东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未能统一的悲哀。他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时候,曾对基辛格说过:台湾问题与“北极熊”相比是个小问题,并且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不急于解决。当时,令毛泽东悲伤的是70年代的中国政局,许多事情是违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的。眼看来日不多,“天意”难违,“业未竟,鬓已秋”;“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特别是这类作品中描绘的那种“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岁旌旗拥万夫”激动人心的、他也

确曾亲历过的场面,更唤起这位历史巨人比眼看祖国最终没有完全统一还深层广阔得多的忧患。我们不难体会:1976年春节,观看电影《难忘的战斗》,看到共和国诞生之前那遥远的波澜壮阔的斗争,看到解放军入城时受到人民群众的无比热烈的欢迎时,毛泽东为什么会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平心而论:充满诗情的历史巨人,是无法填平那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过去与未来的鸿沟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毛泽东晚年偏好的南宋悲凄沉雄之词,折射出他的内心世界陷入了一种永恒的无法解脱的遗憾。

这也许是留给后人的一个千古之谜。

(三)临终索要之书——《容斋随笔》

1976年8月26日,离毛泽东去世只有15天时间了。可是,他还向秘书索要书籍看,要的就是《容斋随笔》。人们不好说这本书是毛泽东临终阅读的最后一本书,但《容斋随笔》的确在他身边伴到他离开人世。

毛泽东自幼喜读杂书,除了反复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和《西厢记》等古典文学名著以外,他平时还广泛涉猎历代纪实性很强的历史演义和笔记小说之类“杂书”。

1937年1月31日,他专门给李克农一封电信:“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这是指近人蔡东藩所著的流传甚广的历史通俗演义小说。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给远在莫斯科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随信寄了一批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其中有《精忠说岳》、《子不语正续》、《小五义》、《续小五义》、《薛刚反唐》、《何典》、《侠义江湖》等演义、传奇和笔记小说。1944年7月28日,在给谢觉哉的信中,说:“《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1947年9月12日,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谈到学习安排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时,毛泽东又特地叮嘱:“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上个世纪40年代,范文澜送给他的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保存,后来带到了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批注过的笔记小说就有沈廷松的《明人百家小说》、冯梦龙的《智囊》等。

《容斋随笔》是有较大参考价值的一部笔记小说,作者洪迈(1123—1202),字景卢,别号野处,鄱阳(今江西鄱阳)人。南宋绍兴年间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他广泛涉猎各种书籍,凡有所得,随笔记之,前后近40年,乃成《容斋随笔》。此书分为:《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共5篇74卷。其主要内容是关于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笔记。其中考证了宋以前的一些史实、政治经济制度;记述了不少词章典故;对宋以前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也间加评论,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颇有可读性。

据逢先知介绍说,《容斋随笔》是毛泽东一生中比较喜欢读的一部有较高价值的笔记书。逢先知从1950年开始,为毛泽东管理图书长达17年之久,他对毛泽东那一时期的学习生活了如指掌,最有发言权了。

毛泽东最初从什么时候开始读《容斋随笔》,尚无详实资料可证,一时难以断定。但从前面引用的给谢老的信里可以知道,在1944年7月28日以前,他手里已有一本《容斋随笔》了。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里,也有《容斋随笔》。

第十二章

思维的艺术

学习,并非认得几个字就可以了,它还必须懂得思维,并且学会思维。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懂,连两个最简单的事物都联系不在一起,只是读书,只能认识几千个字,只会翻字典,书也不见得能读好。这里说的“联系”,指的就是“思维”。思维是学习的一道门槛,门槛跨不过,登堂入室不过是妄言;一旦跨过了这道“门槛”,登堂入室就不难了。

书是没有长腿的,可以任人随意打开合上。读书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比大师傅做饭容易得多,比屠夫杀猪容易得多。猪有腿能跑,他必须捉住这头猪,他杀猪,猪会叫。放在桌上的书不会跑,也不会叫,人们可以随意翻它,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的?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不经过思维读书、学习,就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囫囵吞进肚里,食而不知其味,而且还会弄出胃病来。学习必须思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维对于学习来讲,就像人吃饭一样,是一个咀嚼——消化——吸收的过程。只有学思结合,才能学得好,学得有用。

思维又是一种艺术。不懂得思维规律、思维特点、思维方法的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人,照样是不会思维的。毛泽东在其一生的学习活动中,积累了很丰富的思维经验,不但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思维理论,而且也创造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思维艺术。我们总结、研究毛泽东的思维理论、思维艺术,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借鉴他的成功的思维理论,运用他的高超的思维艺术,即使是不能像毛泽东那样“才胜今人,学胜古人”,起码也保证在学习的活动中,少走许多弯路。

一 要学会思维

既然思维对于学习是那样的重要,那么,我们就应当而且必须学会思维。

当然,纵观毛泽东一生的学习活动,他并非是先懂了“什么叫思维”,然后才去思维的,恰恰相反,他是一边学习,一边领悟什么是思维,然后将“学”与“思”结合起来,自我促进学习。因此,我们探讨、研究毛泽东的学习思维和实践,是先研究他的一般学习活动的方式和规律,最后才研究他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规律。这既合乎事实,也更合乎逻辑。我们学习、借鉴毛泽东的思维理论和思维艺术,就应从搞清“什么是思维”入手。

(一)“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人之所以有思想,是因人的大脑能反映客观现实。也就是说,人的思想,从其产生的方式来讲,是外部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所引起的高级神经系统的活动,是人脑的反射活动。因此,毛泽东说:“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948页。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之“三十六”条中说:“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地考查,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性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法告诉别人。”他把这个过程称为“思维的过程”。

在毛泽东看来,懂不懂思维,会不会思维,是说话、办事成败得失的关键。坏人干坏事,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好心人为什么也会办坏事呢?究其原因,那就是他的思维不恰当或有问题。

1944年,“延安整风运动”已进入最后阶段,即组织处理阶段。对人的组织处理得适当不适当,不仅关系到被处理者个人的命运、前途问题,也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是否真正英明、伟大和正确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整风”成败的问题。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有人心怀叵测,以“组织”的名义诽谤、陷害其他人,企图将组织处理引入邪路。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他于4月12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时,说:

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的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二)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①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缺乏分析的头脑”，就是说，许多人“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再有一些人“则因为自己背上了包袱，就不肯使用脑筋，他们的聪明被包袱压缩了”。因此，他劝党的高级干部要善于思索，勤于思索。思索，就是思维。人为什么会思维呢？毛泽东说：“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②

那么，怎样思维呢？他说：“凡事应该用脑筋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如果我们既放下包袱，又开动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③

（二）“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为什么要“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呢？因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去看。毛泽东利用列宁的话说：“对于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的简单结论。”结果，没有不吃亏的，没有不犯错误的。这就是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938～939页。

② 同上，第948页。

③ 同上。

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世上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即:有主要矛盾,有次要矛盾;有矛盾的主要方面,有矛盾的次要方面。事物又是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的,绝对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

毛泽东认为,分析、研究问题,要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他说:“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的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那些主观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没有不犯错误的。

“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则,“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列宁说:‘要真正的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所谓“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的看到一点矛盾的形象,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

总之,“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他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

因此,“我们必须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

1964年,毛泽东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谈到《关于分析和综合问题》时,他说:

分析和综合有许多哲学家讲不清楚,历来综合和分析就讲不清楚,分析讲得比较清楚。关于综合我想讲几句,现在只讲概念的分析 and 综合,不讲客观。

过去我们搞国共合作,国民党和共产党无非是多少力量、多少党员、多少根据地、多少武器、多少人,大城市多大,我们有延安,他们有上海,延安有七万人,上海有几百万人。他们长处城市大,有外援;人多、兵多、武器好,但是兵是抓来的,官兵对立。当然有些人能打仗,不是一打就垮。我们的长处是联系人民。过去他们编了歌骂我们绿眉毛、绿眼睛,杀人放火

样样都干。反而给我们作了宣传。有个小孩听了,问他爸爸共产党怎么样?他爸爸说:长大了就知道了。又向他叔叔再问,他叔叔说,再问我就打你,不要相信反动宣传。那时,人们听了反动宣传就不相信。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分析,才能清楚。《红楼梦》我看了五遍,就是当历史看的,不受影响。有人说第四回不必看,其实第四回是总纲,四大家族都交代了,统治者不过二十几人。

怎么综合?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对立面。他们军队打来,我们一块块吃,就把它一块块吃掉,不是×××的合二而一,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他们是不要和平共处的。我们就要一块块吃掉,因为他们要吃掉你,不然为什么要进攻延安?你有你的自由,你们军队打来,我能吃就吃,不能吃就走。最后把它全军消灭了,不就综合了吗?刘戡几十万人马向我进攻,结果被打死,就综合了。军队被俘的人,愿留下就留下,不愿留的,发路费就走,把武器拿过来不就是综合了。辽沈、平津一战,傅作义四十万军队没有打,不就综合了吗?大鱼吃小鱼,一个吃掉一个,两个对立统一,有一个主导方面,一个吃掉一个,一个吃掉一个,就综合了。

本问题从来也没有人写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没有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讲合二而一,不可分割的联系。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最后一定要分割,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从生活上讲,人天天吃饭,吃蔬菜,没有吃马牛羊吃的草,而吃大白菜。为什么不吃砂子?神农尝百草,经过分析,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经过分析,达到南方人吃蛤蟆、蛇,陕北人不吃鱼。

总之,分析就像剥笋一样,一层皮一层皮地剥,剥到最后,不能再剥了,笋肉露出来了,把它做成菜吃掉,就综合了。思维是勤于

动脑思考问题。那些智谋高手,其实也并不是天生的,与平常人不同的是习惯于思考问题。碰到什么不懂得,非打破砂锅纹(问)到底——非弄明白不可。弄明白,就长了智慧。因此,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是通向智慧的大门,大门一进,出现在面前的是一种奇特的景象——别开洞天。

(三)“一分为二”与“左、中、右”

毛泽东自从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从哲学角度讲,他是一元论者,坚持“一分为二”的两分法;从政治角度讲,他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左、中、右”的三分法。他历来反对“调和主义”和“折衷主义”,从不相信儒家的“中庸之道”。他曾说,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在认识事物、分析矛盾的时候,都看到它的两个方面。例如,在总结的时候,既肯定成绩,又看到缺点,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败的教训。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把它们看做都一样,各占一半,半斤八两,而是严格地把它们分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个方面,分为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他的《矛盾论》,就是以唯物主义为根基,以辩证法为灵魂写出来的。他说:“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他说:

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

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和被动论……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

毛泽东之所以坚持“一元论”、“二分法”,是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方面,既内因规定的。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起来,就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就不能判断是非,就不能进行工作。折衷主义用二元论代替、冒充、偷换马列主义的两点论,就是他把两点论中间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了。他们把事物的两方面,矛盾的两方面并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结果就掩盖了事物的真相,模糊了事物的本质,使人们工作中分不清是非界限,把人们引到错误的路上。

毛泽东认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然就没有矛盾,就没有对立面。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世界上没有纯的物质,没有真空。完全纯是没有的,不纯才成为社会、物质自然界。纯就不合乎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统一。

政治上,毛泽东是主张“三分法”的。最明显的例子,是:

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劈头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他描绘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各社会阶层的互相关系和地位:城市工人阶级人数较少,但却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即是“我”;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一部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情革命;农民是革命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是革命的盟军,即“我们的朋友”。“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及“帝国主义”,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即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我们的敌人”。

1951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他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1927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

1958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第十九条中说:“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先进和落后,中间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状态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同年5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八大第二次会议上第三次讲话时,说:“世界上总是分党派的,社会上的人总是分左、中、右三种,有的处在先进状态,有的处在中间状态或落后状态,现在的任务就是先进分子争取中间状态的人,让他们站到左边来……”

1967年1月9日,毛泽东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们搞革命,自1920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我们要用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都不赞成。”

1968年4月26日,当时的《红旗》杂志评论员在一篇文章中引用过毛泽东这样一句话:“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

以上,是毛泽东著名的“左、中、右”三分法。这是他一生不变

的一种“思维”模式。其实,这种对人群的“三分”法,在我国民间早已流传。例如:“前面有骑马的,后面有坐轿的,中间是骑驴的——比前不足,比后有余。”在认识和处理人际关系时,“三分法”还是一种比较适用的思维方法。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众多。亚洲除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这就是毛泽东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其实,这不过是他惯于使用的“左、中、右”三分法在国际范围内的一种应用。他的整个外交谋略都是以此作为基本框架的。

二 思维的特征

与毛泽东包举古今、囊括中外的思想相适应,他的思维方式,也独具特征,其思维的问题性、概括性、间接性、能动性、超前性、逆向性、借鉴性、批判性等,都为同时代的人所不及。这表现在他对事关中外的重大决策上,贯串于他的全部论著里,也反映在他的诗词中。

(一) 思维的问题性

人的思维总是指向于解决某一个(或数个)问题,完成某一项任务。如果没有问题(或问题情境),就不会导致思维。因此,思维就被赋予探觅的性质,并且经常是一种有组织、有目的,又十分紧张的过程,有些时候甚至令人疲劳不堪。思维中的问题,既可以来自别人的提问,也可以是自己主动的思索,这便是“关注心”、“好奇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心”、“猜测心”等等。因此,催发思维最好的途径是开掘难点,寻找问题,尤其是要能在平凡之中见到不寻常之处,在危难之中见到光明的未来等。我们只要翻开《毛泽东选集》或《诗词集》,几乎到处都有他的问题性思维的踪迹。例如,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提出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伟大抗日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所有这些,都是思维的问题性。

1961年10月7日,日本作家岛田政雄一来访,毛泽东向客人讲当时国际范围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讲中日两国人民为什么要团结起来,国际统一战线应当怎样发展壮大等等,最后回到中国革命道路上来,毛用一句话作了概括:“问题在于是否能够联合大众。”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也到处是问题性思维。例如《沁园春·长沙》中的“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是说谁来主宰国家的兴衰和人民祸福的命运呢?《清平乐·六盘山》中的“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里的“苍龙”,是指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时全副精神对付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日本侵略者。

人生,是在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中渡过的。每天,只要睁开眼睛,问题就接踵而至。有问题,就要思考问题之所出,问题的性质,问题之深度与广度及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等等。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问题。有人曾这样说:除非是处于沉睡状态,只要是醒来,毛泽东无时无刻不在思考问题。他也没有办法不思考问题。因此,思维的问题性,是毛泽东思维方式的首要特点。

(二)思维的概括性

思维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感性的材料的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和综合而进行的。这一过程是对客观事物一种本质的认识。它要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特点,反映、并且把握诸多对象的共同特征,即规律性。这就是思维的概括性。

对于思维的概括性,列宁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哲学笔记》中谈到黑格尔关于对本质的看法时,特别提醒:“注意:‘一般’即‘本质’。”在谈到黑格尔“类”的概念时又写道:“注意:类概念是‘自然的本质’,是规律。”这就说明,思维中的“一般(概括)”反映着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

关于思维的概括性特征,毛泽东有同列宁类似的见解。毛泽东在阅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写下了“概念比感觉更为深刻,是进一步的东西,例如商品与价值”的批注。毛泽东的这一批语,集中体现了列宁和马克思的思想实质。他在《实践论》中系统阐明了这一观点。他写道:“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①

无论从论著看,还是从诗词看,毛泽东思维的概括性特征是异常明显和突出的。例如,《七律·长征》这首诗,几乎概括了二万余里长征的全过程。《沁园春·雪》这首词,从雄伟壮丽的祖国山河起兴,引起对曾经统治过这美好河山的历史人物兴亡代替的感慨,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些历史上曾经创立过丰功伟绩的有代表性的帝王人物作了概括而又恰如其分的评价:“惜秦皇汉武,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85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最后则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一高度的概括和正确的结论，说明历史上一切个人建功立业的帝王将相，都比不上今天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

(三)思维的间接性

思维的“间接性”，是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首先使用的。他是指思维的反思性、中介性。黑格尔认为，思维不是认识直接主观的东西，而是认识间接的东西。间接的认识必须经过中间环节，以它为中介，通过直接的东西，深入到它的背后或深处，只有通过这个中介才能认识它背后的本质或根据。毛泽东对思维的间接性也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实践论》中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他说，“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是人们“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这就是说，人们借助于思维，可以通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所产生的结果以及其他一些媒介来间接地认识事物，获取知识。正是由于这一点，使我们有可能根据前人及旁人所总结出来的一些知识（包括事实、联系、概念、原理等）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其实，任何一种科学著作，都能给予我们许多间接认识的例证。

在毛泽东的诗词里，这种间接性思维的运用，是很鲜明、很成功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除第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是写实——直接思维外，其余就全部是间接性思维了。

(四)思维的能动性

人的思维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不脱离社会实践的人，只要一息尚存，他

的思维、智能就仍在发展。毛泽东说的“我决心学习，至死方休”；“我无法不思考问题”的道理也正在这里。这个思维发展规律说明，一个人只要不断地勇于实践，就能毕生保持“智慧之树常青”，不断开发大脑“超剩余性”所提供的潜力。这就是思维的能动性。

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当然也是他的思维的重要特点。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军事指挥员要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主观指导的能力，驾驭整个战争，夺取胜利；1938年5月，他在《论持久战》中的《能动性在战争中》一节中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又说：“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毛泽东依据唯物辩证法关于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原理，在详尽分析了中日双方在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情况的基础上，不但从战略上论证了中国人民必将胜利的前途，而且说明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鼓起全民族和军民的抗战热忱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关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取得革命胜利来说，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问题上他未能处理好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1958年的“大跃进”的失误,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这又是令人遗憾和应引以为戒的。

(五)思维的超前性

思维的超前性,又称思维的预见性,它几乎是所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思维的共同特点,因为他们所从事的现实斗争的严酷性,使他们必须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又因为他们都为理想而坚持进行不懈的斗争,所以他们又必须是热情的浪漫主义者。任何一位革命的领袖,在他们从事现实斗争的同时,总是不断地规划着未来,不断地绘制未来的蓝图,以此鼓舞人们永不满足、永不停顿地斗争、前进。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党内几乎普遍存在一种悲观情绪,因为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毛泽东说:“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当有人问毛泽东“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毛泽东回答:“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婴儿。”^①

当着10年内战即将结束,长征即将到达陕北的时候,他已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99页、106页。

考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考虑“不到长城非好汉”,“何时缚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即大大超前思维了。《毛泽东传》的作者[美]R·特里尔说:“1921年,毛和萧子升一起乘船去上海时,他曾对萧预言说,共产党会在‘三十到五十年’内取得政权。他在1946年夏天预计要经过‘一年半的战斗’。1948年春天,他谈到了‘1951年7月。’1948年底,他宣布,‘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结果证明了他预言的正确。”^①。这种超前思维,使毛泽东成为伟大的预言家,而且这些预言都显示了惊人的科学的准确性。斯诺曾称赞说:“毛泽东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袖,成了一位向美国的亚洲政策进行强烈挑战的人。有趣的是,对后来发生的大多数事件,毛在二十年前和我谈话时就已经预言了。他要求停止内战,成立包括一切‘爱国力量’的抗日统一战线,并说很快就能实现。他详尽而精确地叙述了他将要领导的抗日‘持久战’(后来,他确实这样领导了这一场战争),以及这场持久战将会以何种方式使革命取得政权。他也预言,日本不久就会进攻欧洲殖民地,进攻美国。他确信俄国将最终被卷入一场打败日本的大战,并结束在亚洲的殖民主义。”^②

(六)思维的逆向性

思维的逆向性,也叫做思维的辐射性。这种思维的特征,是俗语说的“倒”着思考问题,或者说,从与人相反的方向思考问题。这种思维,在现实生活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历来,帝国主义利用强大的战争机器,例如几万万大军,现代化的装备,如原子弹、氢弹、中子弹,对世界人民进行讹诈,主要目的无非是制造一种恐怖心

① 《毛泽东传》(修订本)[美]R·特里尔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第229页。

② 《斯诺文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192~193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理,以便使世界各国都听命于他们。而毛泽东却从不听这套,1946年8月他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又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① 这就是逆向思维。

1955年1月28日,毛泽东在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敦递交国书的时候,说:“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②

1956年7月14日,即美国独立日那天,毛泽东同两位拉丁美洲人士谈话时,说:“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③

以上,毛泽东借助于逆向思维,看透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仅在朝鲜战场敢顶它一下,而且敢于战而胜之。

新中国诞生,面对的是,上百年帝国主义掠夺、战争破坏所造成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而条件却是一穷二白(穷——指经济,白——指文化),似乎共产党人也无回天之力。可毛泽东却想:“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④ 于是“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焕发出扭转乾坤的伟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创造性劳动,与帝国主义的愿望相反,中国以雄健的姿态,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由此可以看到思维的逆向性特征,在现实生活中所发出的威力。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194~11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137页。

③ 同上,第291页。

④ 同上,第6页。

(七)思维的借鉴性

毛泽东思想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源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也来源于中国久远、深厚而丰富的传统文化。毛泽东思想正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即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和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晶。

毛泽东是个虚怀若谷的人,他不拒绝任何可借鉴的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

在他的论著中,中国古代的、外国的成语典故、神话故事,只要有借鉴价值的,他都拿来运用。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针对蒋介石集团穷途末路、大叫“和平”的谎言,以及外国势力假惺惺地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说:“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的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①当时的中国人民、中国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兵士,并没有人主张怜惜这种蛇一样的恶人,然而,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377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毛泽东在胜利的关键时刻发表了《七律·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号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戒骄戒躁，一定不要松懈，务将革命进行到底！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七律·登庐山》）是借鉴东晋诗人描绘的一个美丽幸福的奇境，说明要使中国成为现实的桃花源，不能靠空想，而要经过千百万人民流血奋斗才能获得，而且要靠人民继续斗争来保卫，因为战乱虽成为过去，但斗争依然存在，人民的桃花源也可能得而复失。“桃花园里可耕田？”这一问，不止风趣，确是深沉，不止令人感到豪情，更令人感到诗人对未来更深层的思考。真的山口大开，任世人进入桃花源，和平耕作，普天同乐，也并非短期内能实现的目标！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被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贺新郎·读史》）古人云：“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广大劳动人民已经受了几千年的骗，如今清醒了！“流遍了，郊原血”六个字，是一部人类社会阶级斗争史的高度概括。毛泽东借此告诫人们：世界上还存在帝国主义和敌视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势力，他们除了使用武力外，还会用剥削阶级的和平经向胜利的无产阶级反攻，以夺回失去的天堂。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人们，再不能做蒙受欺骗的“无涯过客”，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分清敌我，明辨是非，扬善除恶，识破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的借鉴性思维的名篇——《读史》一词所应领悟的“弦外之音”。联系当今“和平”与“发展”的世界的现实，和平之中

有战争,发展之中有暗流,“和平”与“发展”能维持多久?这“弦外之音”更是足以令人振聋发聩!

(八)思维的批判性

毛泽东曾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并吸取其精华的过程中诞生的,是在批判种种机会主义和其他的错误思潮的过程中成熟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一切现实的思想、文化意识和一切传统的、外来的思想、文化意识,无不持审慎的态度,或者说,他都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予以批判和改造,取其精华,剔除糟粕,建立起自己的——毛泽东思想的文化理论体系。从已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来看,没有哪一篇论著、文章,不带有思维的批判性。或者说,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跟党内外、国内外形形色色的、错误的、腐朽的,甚至是敌对的观点、思想、理论的斗争过程中撰写、发表的。他说过:“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①这就是说,对旧的国家机器的批判,所用的武器是枪,是炮,是手榴弹,是暴力革命;而对旧的剥削阶级的,敌对阶级的,错误的思想文化、意识的批判,所用的武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就靠这两杆子。这种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在革命的文武两大战线,缺一都是绝对不可的。这种思维的批判性意识,不仅体现在他的论著里,也鲜明地体现在他的诗词里。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47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我们以他的诗词为例：

驰名中外的词《沁园春·雪》，上阕写雪景，下阕除开头一句“江山如此多娇”属过度之外，重点就是转而进行批判：“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里列举了五位历史“英雄”人物：秦始皇、宋太祖，都富有雄才大略，成为秦、宋二朝的创业开国的皇帝；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虽不是当朝的奠基者，但也都是武功卓著，在中国、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引起轰动的风流人物。所以，说这些人物是当时的“英雄”，肯定他们的功绩，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但是，这些皇帝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最大的代表人物，都有应该被批判、否定的一面，他们的所谓建功、立业，都是为了他们的家天下、万世帝业，不是为了人民的长治久安，也绝不会改变劳动人民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命运。所以，毛泽东用一个“惜”字对他们予以总的否定，作为领起，然后，再用“略输”、“稍逊”、“只识”进行具体批判；虽有武功，但进行文治不够，他们都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于是，毛泽东挥动如椽大笔，以“俱往矣”三个字，翻过了这段两千多年的历史，画龙点睛般地突出了这首词的主题：批判两千多年乃至以往阶级社会的一个反动侧面。这种本质的艺术的批判是尖锐的、鲜明的，又是彻底的。

这种对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批判，在《贺新郎·读史》中，也有突出的体现：“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也是对五千年来的反动统治阶级作了坚决的批判，只是这种对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彻底否定，是通过一系列形象来实现的。

诗如其人。毛泽东是20世纪国际斗争中具有崇高威望和巨大影响力的政治家、战略家。所以，不管是国内阴晴，还是国际风雷，都是他作诗的题材。《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的上阕，写鲲鹏展翅，俯视人世的情景，突出蓬间雀的丑态。下阕写雀儿洋洋得

意。结尾“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既可以看做鲲鹏对蓬间雀的怒斥，也可以视为诗人所发的愤慨之言。了解了这首词的写作背景，就不难了解鲲鹏、蓬间雀两个形象，毛泽东分别寓指的是坚持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其他兄弟党和当时以尼基塔·谢尔盖叶维奇·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者，也就是他当时所指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社会帝国主义者。

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与美国（时任总统艾林豪威尔）和英国（时任首相麦克米伦）在莫斯科“订了三家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都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都是不能容忍的背离马列主义根本原则的行为，并认为这是过高地估计了帝国主义的力量，被帝国主义的一时的猖狂吓破了胆。所以，毛泽东用一句“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予以批判和谴责。这种批判是彻底的，是无情的，而且感情色彩特别浓烈，又嘲讽、藐视、喜笑怒骂熔于词，具有独特的情趣和格调。词中“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觉令人想起一件往事，即当时在国内曾广为流传：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活动。在赫鲁晓夫陪同的一次进餐时：

“毛泽东津津有味地嚼着克里姆林宫厨师长伊万诺维奇做的土豆烧牛肉。

“‘要是每个劳动者的碗里都有土豆烧牛肉，’赫鲁晓夫不失幽默地岔开话题，‘我看就到共产主义了。’

“‘我只吃了土豆。’毛泽东吮吮油亮的下唇，绽出哲学家的微笑：‘共产主义如果是烧牛肉，那么我宁愿要红烧猪肉。’”

这无疑是对赫氏面对面的讥讽和批判。

这首词的批判力量，来自鲜明的对比：鲲鹏与蓬间雀，一个博大，一个渺小；一个高瞻远瞩，英勇无畏，一个鼠目寸光，怯懦自私；一个坚持原则，毫不动摇；一个叛卖共产主义事业，投降帝国主义。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词中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和所表现的革命英雄主义、无畏的战斗精神,都起着巨大的教育作用。

毛泽东诗词中的这种批判意识,尽管都是借助于形象,并充满了幽默和风趣,但都不是主观的、简单化的否定,更不像一些古典诗词,批判之后,把读者引向脱离现实的幻想,而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为依据,以对国内外斗争形势的观察为基础,引经据典,以历史为鉴戒。所以,这种批判都是有战斗力的,也都是具有很大的说服力的。

三 思维的类型

思维的类型究竟有多少?有的说有三种,有的说有七种、八种。之所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是各家划分思维类型依据的标准不同。如果依据思维活动所反映出的性质来划分,可以分为形象思维、形式逻辑思维和辩证逻辑思维,这样三种类型。其他的关于“思维”的表述,似归为思维的特点为宜,不应视为思维类型。俗话说,“物以类聚”,类者,事物之本质所决定也。就是说,分类应从本质上去区分,不应从现象去区分。质,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决定性的东西。毛泽东关于思维类型的思想和实践,也体现在这三个方面,即在思维类型上,并没有新发明和创造。他之不同于,或者超过他人的地方,在于运用三种思维类型之妙,存乎一心。

毛泽东主张:“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这里讲的是形象思维。

又说:“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这里讲的是形式逻辑思维。

又说:“感性认识不从论理认识分离,感性认识中已有论理认

识的萌芽。一般性的东西已在具体性的东西中间包含了的,但包含的只是外在的联系,不是内在的联系。由浅向深,由外向内,由各个向一般,只有依据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才能达到。”这里讲的是辩证逻辑思维。

形象思维、形式逻辑思维和辩证逻辑思维,这是毛泽东思维的三种基本的和主要的类型。毛泽东是否还运用过其他类型的思维?我们尚无任何资料根据,故不能妄说或冒昧揣测。现就其以上三种思维,试探究如下。

(一) 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寓抽象的道理于具体的形象之中,使人看得见,摸得着,想得到,深入浅出,容易明白。

我们知道,人的感觉器官接触到某个外界事物,感官上的神经细胞就兴奋起来,把冲动传到大脑里而产生感觉。不同类的感觉(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相互联系,经过综合以后形成知觉,通过知觉就在头脑里形成所感知的外界物的感性形象,心理学家把它称作映象。用哲学术语来说,这就是通过感性认识而获得了表象,也就是保留在大脑皮层上的外界物的映像。用表象进行的思维活动叫做形象思维。在人们的生活中,尤其是在艺术创作中,都运用它。形象思维是艺术创作的主体思维,它贯穿于观察生活、摄取素材、构思情节、塑造形象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在对生活和艺术品进行审美鉴赏中,同样不可或缺形象思维。运用形象思维讲话、著文、赋诗、填词,就形象生动、鲜活,极富艺术的感染力。所以,有人说形象思维是文学艺术家独具的思维能力,故又称“艺术思维”。

毛泽东关于“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的思想主张是深入人心的。这个主张,是毛泽东在与陈毅论诗的通信中提出的,全文先论陈毅的诗作,然后写了如下的话: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的《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①

毛泽东不仅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的主张,而且还是这种主张的实践者、卓有成就者。毛泽东的诗词,就其政治内容来说,当然是革命的;但它不是没有艺术性的标语口号,也不是空洞的豪言壮语,而是把革命的政治内容寄寓于非常完善、优美的艺术形式中表达出来的。它纯熟地运用形象思维,巧妙地运用比、兴手法,使作品诗趣盎然,诗味浓郁,真正达到了革命的政治内容和高度完美的艺术形式十分和谐的统一,真正成为这二者统一的光辉典范。他用古诗词这一文学形式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和政策、策略,形象地再现了革命斗争的壮丽图景,用诗词语言对这些政策、策略和革命理论进行艺术的表述。

我们试举一些诗词作具体分析。

写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贺新郎·别友》(1923年)、《沁园春·长沙》(1925年)、《菩萨蛮·黄鹤楼》(1927年春)、《西江月

^① 《毛泽东诗鉴赏》,第287页,《致陈毅》。

·秋收起义》(1927年秋)四首词,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革命活动。

《贺新郎》抒写了投身革命斗争的青年知识分子毛泽东的战斗决心和英雄气概。全词如下: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这首词,诗人写的是他同杨开慧青年夫妻之间的爱情,但又表达了革命者如何正确处理革命与爱情生活的矛盾。尽管恩爱夫妻深情脉脉,难舍难分,但当革命需要远离相别的时候却依然“挥手从兹去”,不惜“割断愁丝恨缕”,去作“天涯孤旅”。儿女情长未必便是英雄气短。在这首词中,毛泽东使革命与爱情的矛盾得到正确的处理,使“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的离愁别恨与“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的壮志豪情得到统一,而且最后还满怀胜利信心地寄希望于革命成功后的“重比翼,和云翥”。这首词,不但表现了毛泽东为革命献身的无私无畏精神,也为现代青年树立了正确对待工作与爱情、革命与家庭生活的榜样。它是一曲细腻优美的恋歌,但又是一篇决心投身革命的宣言,政治性与艺术性在这里得到完美和谐的统一。

在《沁园春》中,诗人首先交待了写作环境、时间和地点,接着就触景生情地写道: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以绚丽多彩明快的艺术语言，通过对自然界万物生机勃勃的描绘，反映了大革命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并且用“怅廖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样深沉含蓄的诗句，形象地表现他对天下兴亡的高度责任心和对革命领导权属谁的关注。

在《菩萨蛮》词中，诗人通过对诸如“茫茫”、“沉沉”、“莽苍苍”、“锁大江”等凝重沉寂景象的描绘，暗示大革命遭到重大挫折的形势。当时，党内许多同志彷徨、失望、悲观、消极，甚至有人动摇、叛变、投敌，“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但毛泽东自己却“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在这里，字面上没有说出，而我们却可以体会到诗人深沉的忧愤，并向滚滚东流、大浪淘沙的江水盟誓，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诗句中激荡着百折不回的澎湃心潮。

《菩萨蛮》一词，是毛泽东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之前写的。在此之前，毛泽东已初步形成了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虽在同一期，反映在论著和诗词中，其面貌却截然不同。他在“八·七”会议上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现在虽已注意到，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之后，党中央派毛泽东去湖南领导举行秋收起义。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反映在《西江月》一词里，就别开生面了。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这首词,全是形象的比、兴和生动的形象描写。他把由从事工农运动到进行武装斗争的历史转变都熔铸在“镰刀”、“斧头”、“暮云”、“霹雳”等形象中。并从这些形象的彼此关系、变化中,显示诗词的主题,也达到了革命的政治内容与艺术形象的和谐统一。

毛泽东不仅仅在其诗词中擅长运用形象思维,而且在其论著中也常运用形象思维,使抽象、深奥枯燥的理论得以形象化的释义。例如: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在文章最后回答“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快要’”二字的含义时,运用的就是鲜明、生动的形象化语言。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的婴儿。

他把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用“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和“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的婴儿”来比喻,这就使人看得见、摸得着、想像得到了。

毛泽东的艺术造诣的惊人之处,在于这种惊人的思维能力,不是主要成功地运用了逻辑思想,依靠所谓概念、判断、推理等等,而是主要成功地运用了形象思维,借助赋、比、兴等艺术手法。

(二)逻辑思维

这里说的逻辑思维,是指形式逻辑思维,它是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的形式而进行的思维活动。

毛泽东历来非常重视逻辑思维问题,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之“三十七条”中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他认为：“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大革命时期，发生在党内的许多错误，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源，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但也存在一个逻辑问题，即使用概念不准确，判断不恰当，使用概念和判断推理时又缺乏严密的逻辑性。所有这些问题，在毛泽东的文章和由他起草的文件中都不存在。不仅不存在，而且他的文章，可作为人们学习语言、逻辑和修辞学的范本。

他对概念的使用是非常准确的。例如，“实事求是”这个成语，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人使用，但却没那一个人能阐明究竟怎样叫“实事求是”。但到了毛泽东，他科学地、准确地阐释清楚了“实事求是”的涵义。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

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这样来揭示“实事求是”的含义，让人看了觉得心中豁然开朗，不仅理解了“实事求是”之词义，而且确实认识到：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本质之所在。

毛泽东运用概念、判断进行推理的功夫也是非常过硬的。他是严格遵守逻辑规则的。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有一段文字是论证“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整个一段话，是按照演绎推理之直言三段论规则进行的。这段推理过程的总的大前提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

也是一个一般性知识前提,由此立论,他要推导出特殊性或个别性知识的结论来。

他的推理过程是:

一切反动派都是有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竟那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蒂,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做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相反的,苏联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比人们所预料的强大得多。

以上这段推理文字,包含着下列几个三段论:

①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沙皇是反动派;所以,沙皇是纸老虎。

②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希特勒是反动派;所以,希特勒是纸老虎。

③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墨索里尼是反动派;所以,墨索里尼是纸老虎。

④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反动派;所以,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由于在这种思维活动中,其结论(四个结论中的任何一个结论)所涉及知识的范围不能大于大前提所涉及的知识范围(上面推理中的大前提是一个全称肯定判断;结论则是特称肯定判断),

故其前提与结论间具有蕴涵关系,在思维合乎逻辑规则的前提条件下,由断定其前提的真,必然可以推出其结论的真,即前提真而结论假是不可能的,故这种演绎推理,也叫演绎思维。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谈哲学问题时,说:“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是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那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的理由?”毛泽东在这里说的“理由”,即推理的前提、论证的论据。人们常说的充足理由律是相对于推论和证明而言的,它包括两方面的要求:①理由(即前提、论据)的内容真实;②理由能必然地推导出结论,换句话说,就是推论的形式正确。一个推论或论证的真实正确要靠这两条共同保证。由于形式逻辑是撇开内容,仅从形式方面来研究推理论证的,而真实与否是认识(辩证逻辑研究)的内容问题,涉及到作为前提的命题的思想内容,毛泽东从这个意义上否认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是完全正确的。至于把“充足理由律”仅限制在形式方面,仅理解为结论必须在形式上逻辑地包含于前提之中,能否继续保留在形式逻辑之中呢?这倒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毛泽东的观点是否有认识论上的含义,即他是否也否认理由在内容的真实可靠性上有一致的标准呢?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再细分析。这里只从原则上指出,要区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毛泽东否认的是价值判断中存在各个阶级的共同的充足理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举例说,罗素有没有充足理由?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属于一个政治问题,包含有阶级的内容。他还举例说: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各阶级的大前提是不同的。国民党反动派骂我们是“匪徒”。他们说:“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反动派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反动派,所

以蒋介石是匪徒。”可见,结论实际上是包含在大前提里面的。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大前提”,就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而不属于事实判断的,更不属于科学判断。所以,他认为各个阶级间不存在共同的或同一的充足理由。当然,如果误以为对于事实判断和科学判断各阶级也有权自立标准,各行其是,那么在理论上势必导致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

毛泽东不仅在其讲话、文章中运用逻辑思维,就是在他的诗词中也经常运用逻辑思维。《念奴娇·昆仑》这首词,是在红军长征刚刚到达陕北时,革命展现坦途的形势下,毛泽东豪情满怀、信心百倍,为改造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所谱写的理想之歌。词里所唱“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便是运用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把这行诗句译成白话,便包含这样两个问题:自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便联成一体,再也不可分割了;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一国数国首先取得政权,却不可单独进入共产主义,必须全世界各国同时实现共产主义,即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之日,才是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之时,只能是“环球同此凉热”。

(三)辩证思维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毛泽东的论著、诗词和讲演、谈话无不充满辩证法,尤其是他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等,都是辩证思维的杰作。在这里,再探讨、研究毛泽东的辩证思维似乎是多余的。但考虑到辩证思维不仅仅是个思维方法问题,其实质是世界观、方法论问题,对此,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学会并掌握,事实是,形而上学的、唯心的东西充斥于我们的生活,并致使不少人误入歧

途。因此,我们现在探讨毛泽东的辩证思维,是不无益处的。

“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统一法则”。这是毛泽东在读西洛夫、爱森堡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时写下的批注。时隔不久,1937年7~8月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矛盾论》一开篇,毛泽东写道:“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他又说,“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①后来,毛泽东将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法则(即规律)形象地称之为“一分为二”。看问题、想办法、做事情,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是胜利还是失败,思想上都应是一分为二,万万不可搞形而上学、思想僵化。有辩证思维的方法,才能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胜不骄,败不馁,不断前进。

1957年2月,毛泽东针对当时发生的“匈牙利事件”、“1956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风潮”,以及国内一些“群众闹事”,是好事还是坏事的问题,告诫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说:“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倒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7~398页。

这里提到的老子的话,出自《老子·五十八章》。毛泽东从幼年就喜读《老子》,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毛泽东认为,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但《老子》中却充满了辩证法。书中提出了有无、祸福、荣辱、智愚、巧拙、大小、生死、胜败、攻守、进退、静躁、轻重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概念,认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毛泽东非常重视老子关于矛盾相互转化的思想。《老子》认为,事物都是向相反方向转化的。举出的诸如“物壮则老”,“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多则得,少则惑”等例证,说明强弱、祸福、曲直、洼盈等对立的事物,都会向他们的对立面转化。《老子》曰:“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我们上面引的毛泽东那段话,他就是以老子的祸福相依相伏的思辨方法和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来强调事物的矛盾转化的观点。

毛泽东对《老子》里“将欲取之,必固予之”这句话印象很深。在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固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

毛泽东不仅在文章、谈话中经常运用辩证法,他的诗词也无不体现出辩证法来。

1961年10月,郭沫若作《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毛泽东于11月7日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诗相和。毛泽东的相和,并不是一般的应酬唱和,而是借此纠正郭沫若原作中形而上学的错误认识,表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和诗便充满了辩证法。

上个世纪60年代初,苏共以22大“三和两全”纲领及致中共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的“公开信”为标志,挑起了中苏大论战,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不少人对这种局面不知如何去认识,采取何种对策为好。毛泽东的诗的发表,就具有了特殊的战斗意义和教育意义。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风雷”和“白骨精”都是寓意双关的。“风雷”,一是指自然现象,一是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即马克思主义。同时又指出,“白骨精”的出现实属必然,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基于这种辩证思维,诗中满怀信心地唱出“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七律·冬云》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全诗如下:

七律 冬云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雪压冬云白絮飞,
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
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从1962年11月起,苏联领导集团指挥某些国家的共产党进行反华大合唱。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公开的全面的反击。“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形象地表达出当时政治气候的严峻,但中国共产党人并未被吓倒。正是以辩证思维为武器,才不

会被一时的挫折所吓倒。更不因共产主义运动一时出现的逆流而气馁,而是在遭遇困难和挫折的时候,看到光明的前途,坚信共产主义必定要实现,所以他才豪迈地宣誓:“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杂言诗·八连颂》这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赞歌,可以看做是《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姊妹篇。全诗如下:

杂言诗 八连颂

一九六三年八月一日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好八连于1949年5月进驻上海南京路,历经14年,连队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热爱人民,助人为乐,抵制了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批准授予该连队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就是根据该连队的事迹拍摄的。

如果说,《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提出了一个战略任务的话,那么,《杂言诗·八连颂》就是达到这个战略目标的具体策略和政策。只要有“为人民”的坚定意志,有“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思想觉悟和警惕性,就能够“不怕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就能“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要坚持运用“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还必须注意识别诡辩论和调和主义的中庸之道。诡辩论者,经常耍偷天换日的鬼把戏;中庸之道者,则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只知道量变,而害怕质变,两者虽其表现形式不同,但实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折衷主义。折衷、调和、诡辩,都是违背事物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因而迟早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主要参考文献和资料

《毛泽东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第2版。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人民出版社出版1966年版。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版。

《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传》(1893~194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

《中共党史人物传》,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西行漫记》,[美]埃德加·斯诺著,三联书店1979年版。

《毛泽东传》(修订本),[美]R·特里尔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出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版。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下),陈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毛泽东之初》,叶永烈著,作家出版社 1991 年版。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著,三联书店出版。

《伟人之初——毛泽东》,曹志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版。

《传统下的毛泽东》,汪澍白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版。

《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尹高朝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8 月版。

《毛泽东的三湘情结》(上、下),夏远生、马娜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5 月版。

《毛泽东谋略》,萧诗美等著,湖南出版社 1993 年 5 月版。

《毛泽东最后十年》,陈长江、赵桂来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

《领袖泪》,权延赤著,求实出版社 1989 年 7 月版。

《毛泽东诗词史话》,萧永义著,东方出版社 1996 年 12 月版。

《在巨人的光环下——毛泽东和新中国文学》,张炯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1 月版。

《毛泽东求学的故事》,王以平著,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的父亲毛泽东》,李敏著,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版。

《毛泽东的儿女们》,华英著,中外文化出版公司 1990 年 2 月版。

《毛泽东诗词涵咏》,路则逢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

主要参考文献和资料

《毛泽东和“三国”》，盛巽昌编著，文汇出版社 1995 年 9 月版。

《红色的起点》，叶永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毛泽东之初》，叶永著，作家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

《毛泽东心路历程》，湖南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

跋

正像胡小林在《自序》中说的,这本书本来是由我们两人共同研究拟定提纲,由他一人撰写。当初稿即将完成的时候,作为枣庄师专校长的胡小林全身心地投入了学校专升本的繁重工作之中,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加工、修改初稿了。于是,他便请我助其一臂之力。我二话没说,便欣然答应了。我在修改、加工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有些话随之写进了书里,但现在仍感觉言犹未尽;同时,山东人民出版社鼎力支持出版《毛泽东的学习思想和实践》这一事实,又可以引起许多联想;再之,为了跟前面胡小林写的《自序》呼应,我便写了这篇《跋》文。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学习是人的一种追求理想、追求真理的社会实践活动,又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惟有科学才是真学问。在当今,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水平,主要看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科学技术成了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命线。因此,学习问题不能不成为关系一个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毛泽东不仅非常重视个人的学习问题,而且也非常重视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学习问题,他甚至将学习与人类的未来联系在一起思考和探讨。

有资料证明:毛泽东曾分别引用富兰克林和马克思的话,说:“人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动物”、“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还是

思想动物”。他说,人是万物之灵,在封建社会就有了,要从进化的观点看问题,人至少经过了百万年才发展了大脑和双手。我就不相信只有人才有双手,将来动物就不发展了,只有一种猴子才进化?马牛羊犬猪就不进化了?地球原来是死的,后来氢和氧结合才有水,以后才产生了万物。所以人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研究不成,要读些书,为需要而读书,有知识很重要。

1964年8月23日~24日,毛泽东在同周培源、于光远等科学家、学者谈话时,曾多次谈到:辩证法的生命不断走向它的反面,万物总是发生、发展到消灭。他引用恩格斯的话,说: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单有理解还不行,还必须对客观有改造,对客观弄清楚了,加以改造才能自由。当他谈人类的未来时,说:“人类是产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和基督教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的阶段。”^①这是毛泽东终生不变的思想。早在1917年,当时的毛泽东还是一个青年学生,就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多次说:“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②在毛泽东看来,人类的灭亡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毁灭,而是哲学意义上的灭亡,即人类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是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的阶段”。那么,这个“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是什么呢?当时,毛泽东并未预言。

我们知道: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是学习创造了人的智慧。最

① 见1978年9月10日《光明日报》的《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是科学的旗帜》。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99~202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学习实践上的和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这样,人类的进化就已经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进化了,而变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为进化了。那么,这种“人为进化”能否产生出“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早在1876~1878年,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说:“直到现在,除了由生物繁殖,自然科学还不能制造出生物,甚至还不能从化学元素制造出简单的原生质或其他蛋白体。因此关于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学到目前为止所能肯定的只是: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的。”^①

然而,事隔才一个多世纪,人类就改写了原来的答案,认为“人为进化”能产生出“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这句话说白了,就是现在的科学技术能产生出比人类更进步、更高级的东西来代替人类了。只是碍于伦理道德等原因,科学家们暂不进行生产的实验而已。这就是说,以往几万年几亿年,植物、动物完全听天由命,只能任其自然进化,而现在,人类可以科学地认识客观规律、改造客观规律,因而能够科学地控制、主导自身的进化了。我们已经看到的基因技术、克隆技术、干细胞技术、冷冻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等等,已使我们可以展望出科学创造“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比如,科学家利用基因技术可以进行各种基因预测、基因诊断、基因治疗、基因改造;利用干细胞技术可以使器官移植变得简便易行,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换掉身体上各种不良的部分,一切器官都能修理、替换;细胞端粒的发现又可以使我们掌握调拨“生命时钟”的权利。利用各种高新科学技术,我们可以进行直线成“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可以进行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2页。

技优生、科技优体、科技优学、优教,也可以掌握曲线成“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的保存人的躯体的“保身术”、保存人的灵魂的“保心术”……有人将“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称为“仙”、“仙类”。其实,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名字只不过是“符号”而已,重要的是能否揭示出“名字”——“仙”、“仙类”概念的内涵和本质来。王小平说:“‘仙’人的长生不老、全知全能、至善至美、终日极乐,是其‘四大属性’。”^① 我们认为,这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他把事物看得太绝对了,是有悖于辩证法的,是不科学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的未来,必定是自由的和全面发展的。因此,他们共同预言: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才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引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也会消失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② 由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自然科学尚未达到今天的水平,故他们只能从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然进化的角度来预言人的未来和将来的人。如果他们的在天之灵能获取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特别是基因技术的最新成就的话,那么,他们肯定会说: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非但没有推翻我们“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反而更加充实了我们“学说”的内容,更加加速了人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使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共产主义的到来,不再是一种科学的

① 《第二次宣言》,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版,第 11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460 页。

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

预言,而必定成为一种事实。这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发展,必将破除人们的已经过时了的伦理的及法的许多观念,进而消灭“人为”造成的“阶级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以及“城乡差别”,使人类早日迈进“大同”境域——不管人类现在处于什么社会形态下,也不管有的人现在愿意不愿意——这是人类“人为进化”必然出现的美好景象。

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自然科学发展的背后,是人(类)的学习实践活动,没有人类学习实践活动的发展,就没有自然科学的今天。因此,不管人类如何“人为进化”——依赖高科技创造生命,未来的“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仍然是“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不可能是像“机器人”那样的毫无生命、毫无“人”性的纯机电存在物。只要他是“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是对立统一的“东西”,那就不可能不学习。惟有学习,才能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惟有学习,人类这样的“事物”才能“发展到更高的阶段”。

总之,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人类发展到今天,人类所拥有的科学技术力量已经足以使人类的自然进化置换成为人为进化。人为进化,就是用自然科学来了解人之自然、克服人之自然和改造人之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这一切都是人类学习的功劳。因此,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学习不仅是人发展的必由途径,也是人类“人为进化”的必由途径!

我们在撰写《毛泽东的学习思想与实践》的过程中,参考了一些中外毛泽东研究专家们的著作,汲取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值此拙著付梓出版之际,我们衷心向这些专家、学者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跋

本书的出版问世,得到了山东人民出版社领导和编辑们的热情关照和支持,为此,我们更要向山东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笔者的水平有限,又是初试“毛泽东研究”,再加上史料不足,书中不当之处恐在所难免,诚望广大读者和学界同仁不吝赐教,以使再版时订正和充实。

于云才

2003年6月20日于青岛

责任编辑 袁丽娟 封面设计 武斌

定价: 28.00 元
ISBN 7-209-03293-2



9 787209 032933 >